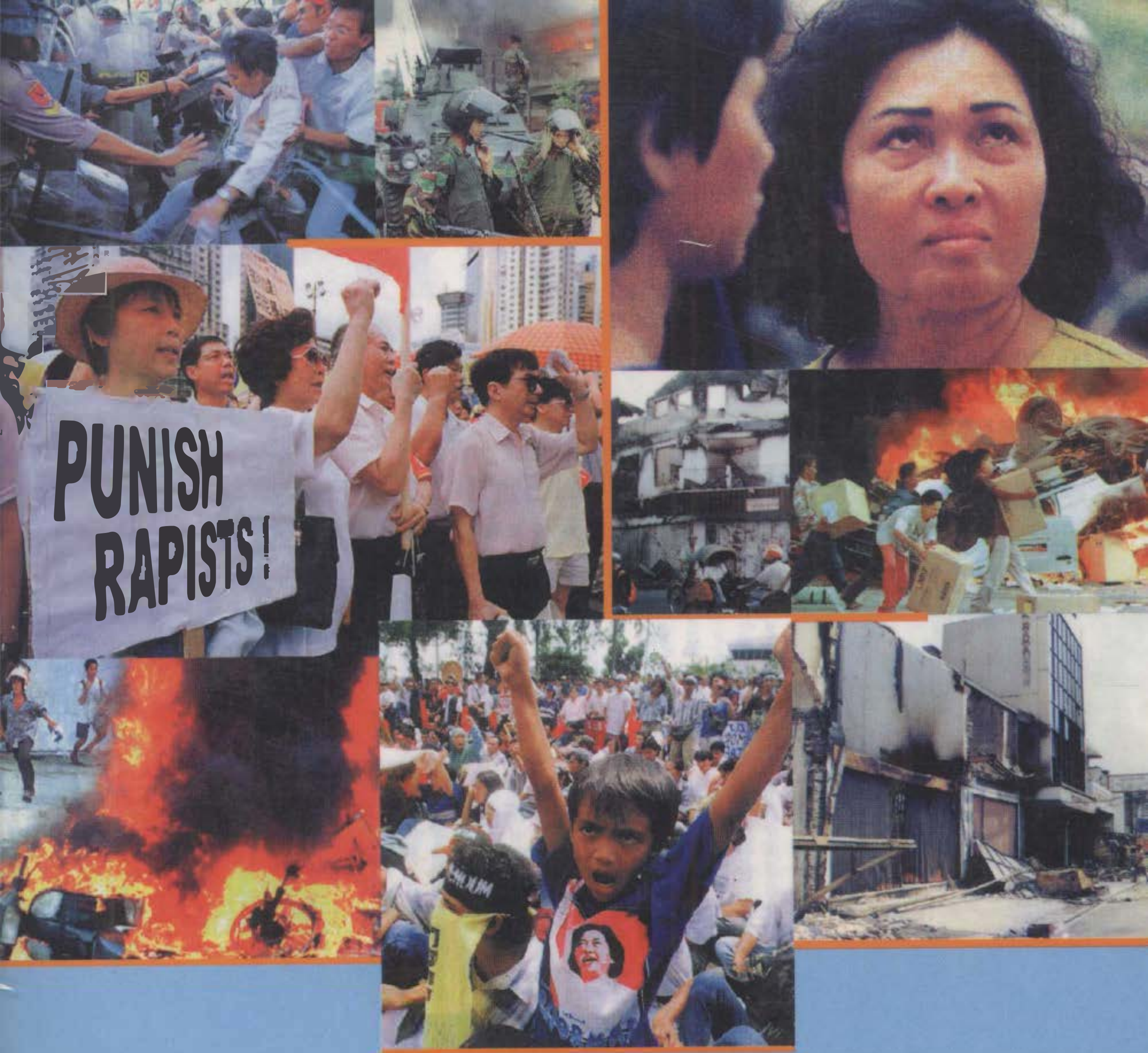




'98

乔岩 华声 主编

印尼华人遭遇实录

暨南大学出版社

VIS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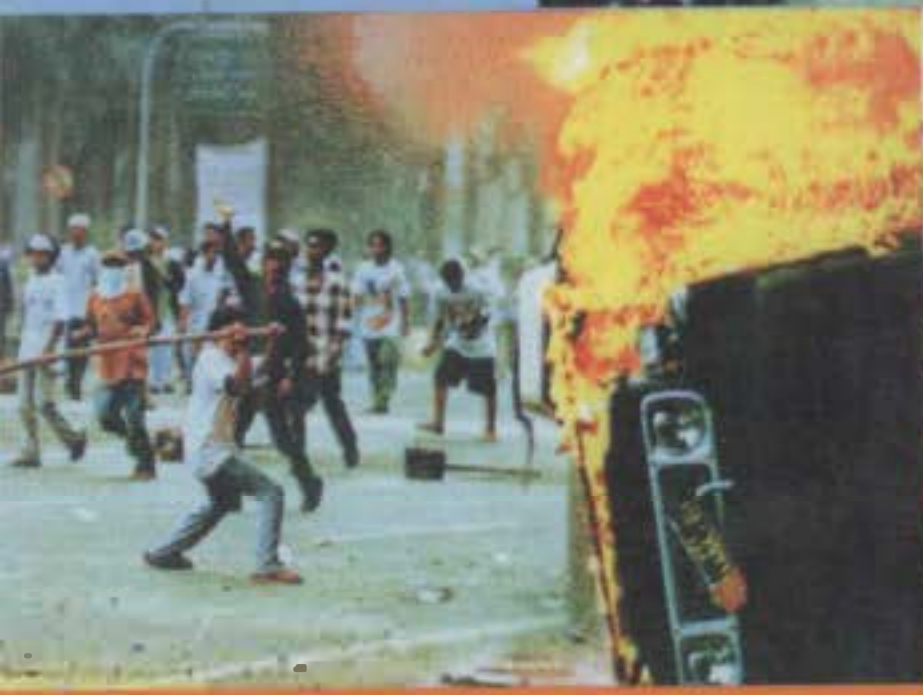
LANZAROTE
Caliente.COM

文稿统编：郭招金 夏春平

责任编辑：杨新之

装帧设计：法满 红竹

责任校对：朱特



ISBN 7-81029-7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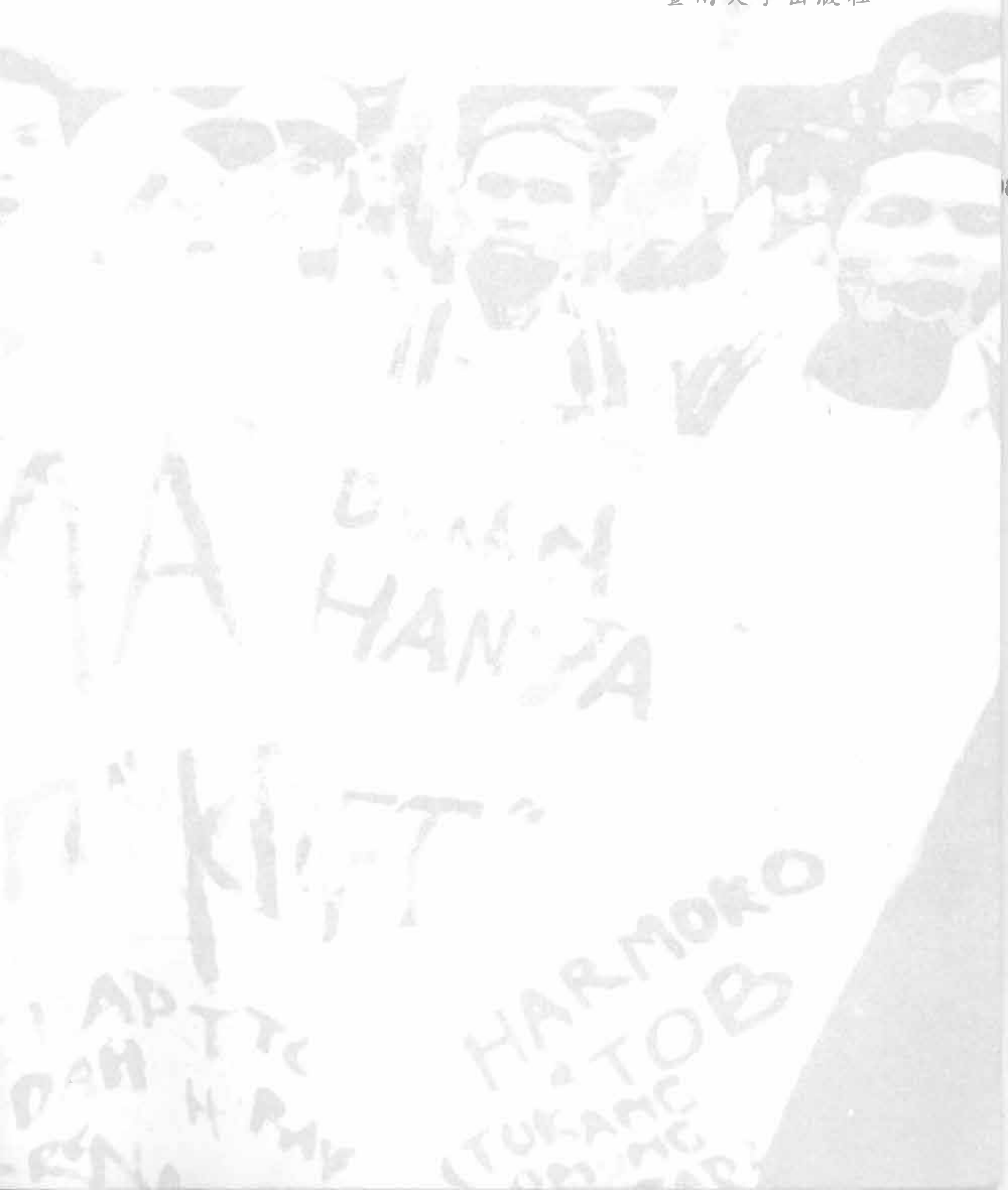
9 787810 297653

ISBN7-81029-765-1/D ·

定价：28.00

'98 印尼华人遭遇实录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 98 印尼华人遭遇实录 / 乔岩 华声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8.12

ISBN 7 - 81029 - 765 - 1

I . ' 98... II . ①乔 ②华 III . 对外关系 IV . D822

' 98 印尼华人遭遇实录

乔岩 华声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510632 广州石牌)

华声月报电脑照排室排版

北京市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 / 32 印张: 12.25

字数: 330 千 印数: 1 —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部真实、客观、全面记录1998年印尼华人命运的实录，一本全方位分析印尼华人现状和历史的论著。

1998年5月，印尼华人在社会暴乱中遭受的种种不幸，是本世纪世界华侨华人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本书以大量生动和真实的材料向读者客观地描述了这一不幸事件的原貌和过程，揭露了暴徒对华人非人道、骇人听闻的残害，并提供了有关事件的详实背景材料和学者对这一事件的分析评述。

本书精选于海内外各种华文报刊上的文章，融新闻性、资料性、思辨性于一体。既有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梳理，又有各国新闻记者现场生动详实的报道；既有在暴乱中受害者的哀诉之作，又有专家学者冷静理智的分析评论。



学生示威游行



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左），当地传媒称他家族资产超过 200 亿美元。



学生要求苏哈托下台



华裔创办的雅加达特利刹蒂大学：引爆大规模骚乱的地点。

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





军队驻守雅加达：暴乱传言不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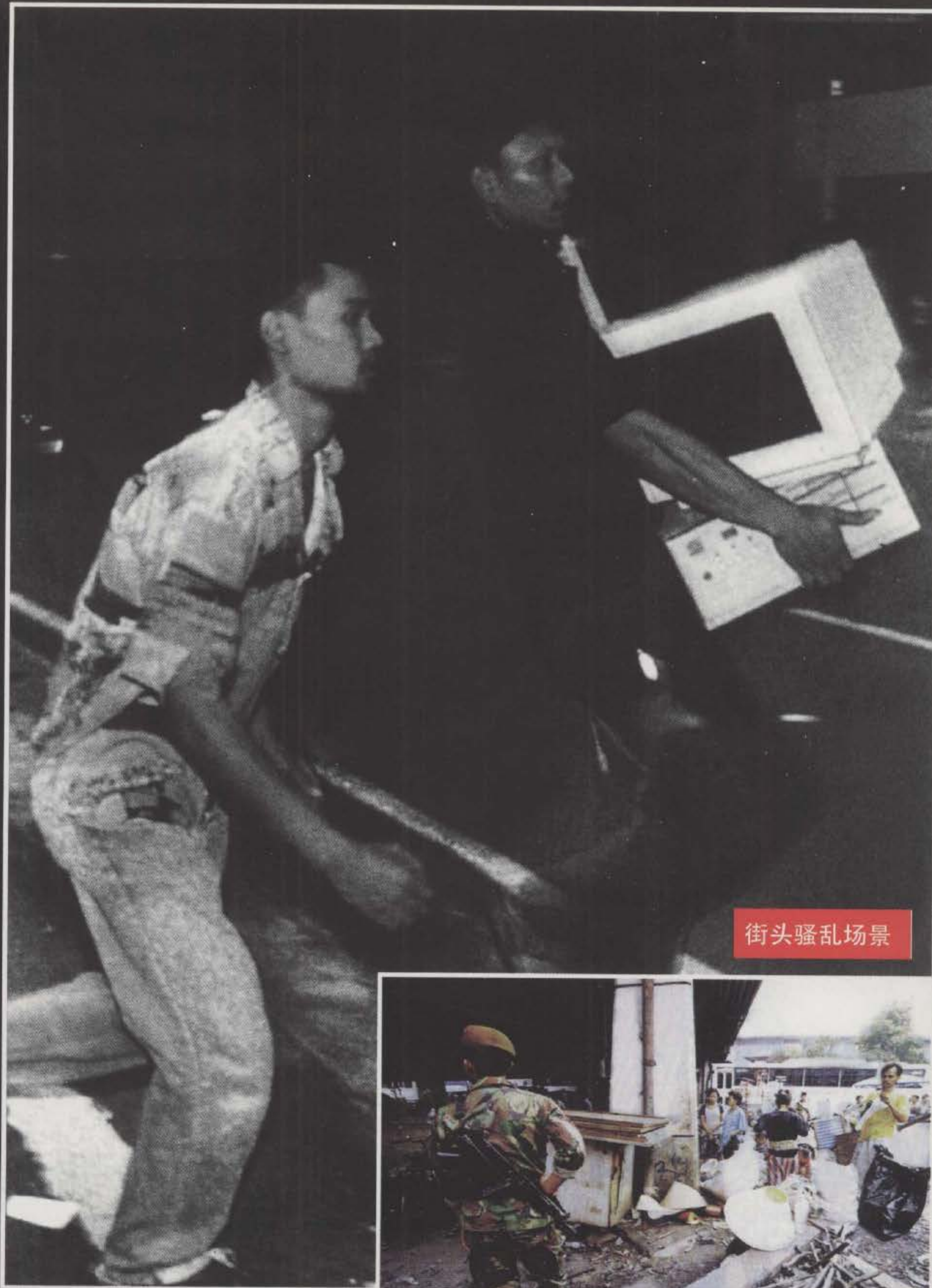
印尼陆军特种部队





街头骚乱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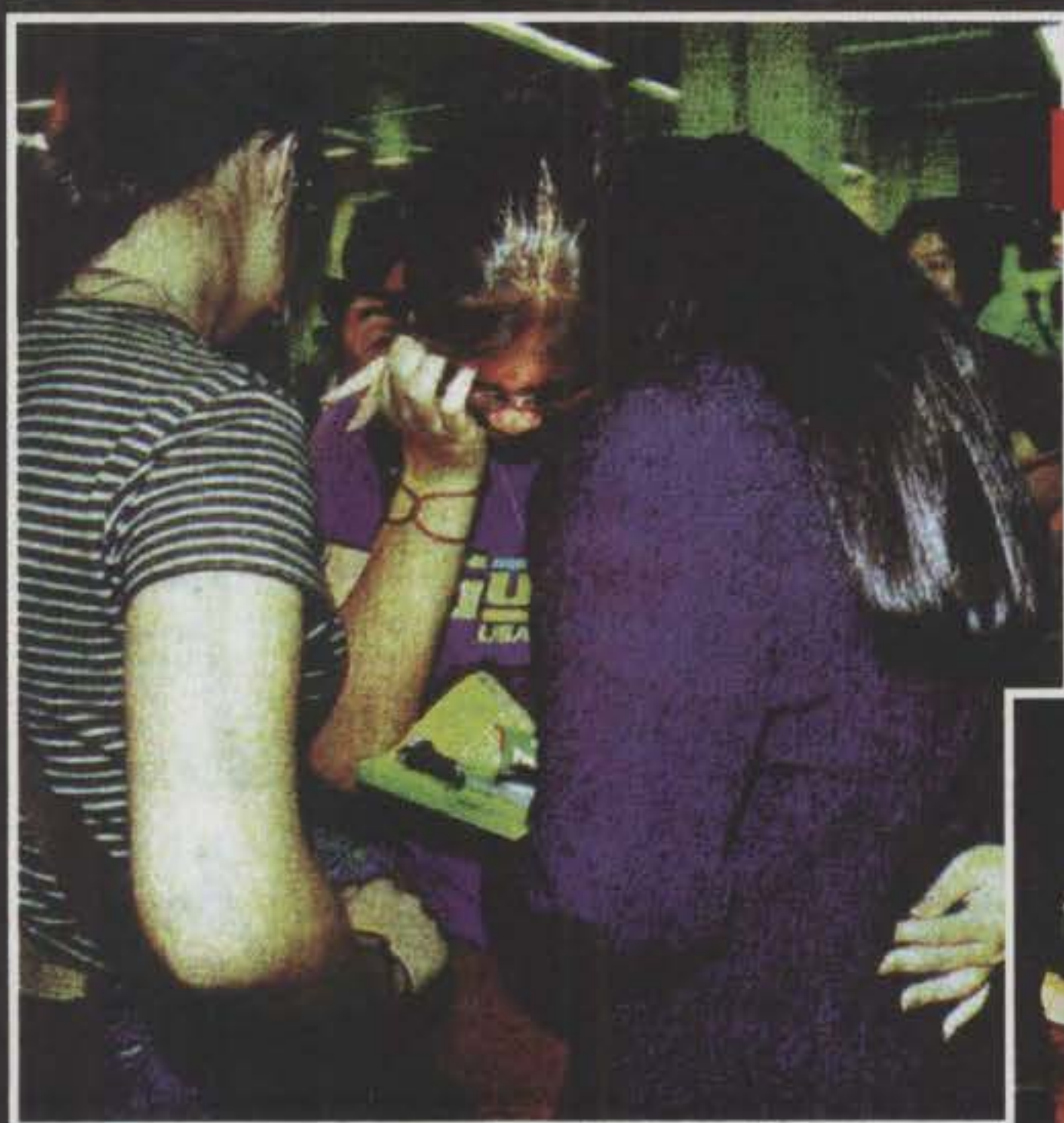
街头骚乱场景



华人避乱逃离



伤心话别



美国侨民离开雅加达





华人店铺劫后余灰





骚乱之后满目疮痍

华人店主一脸无奈





多年辛苦毀于一旦



雅加达华人基督教堂被焚毁



华人进香祈求平安





骚乱造成民众伤亡



华人自组自卫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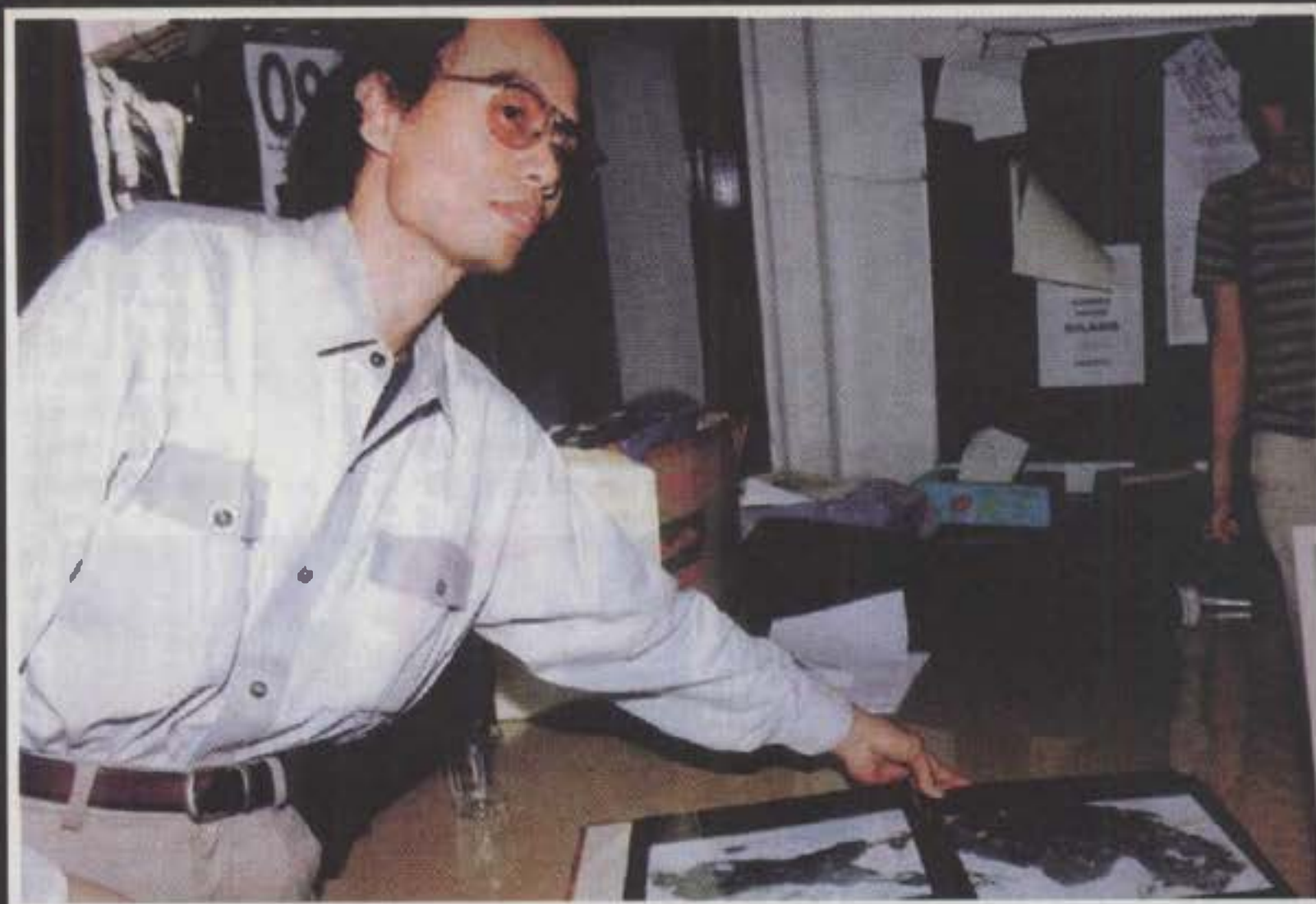




印尼国会工作人员换总统像：三十二年第一回



印尼善迪阿宛神父最早挖掘
出华人妇女被集体强暴事件



挺身帮助受害华人妇
女的印尼羽毛球国家
队教练王珠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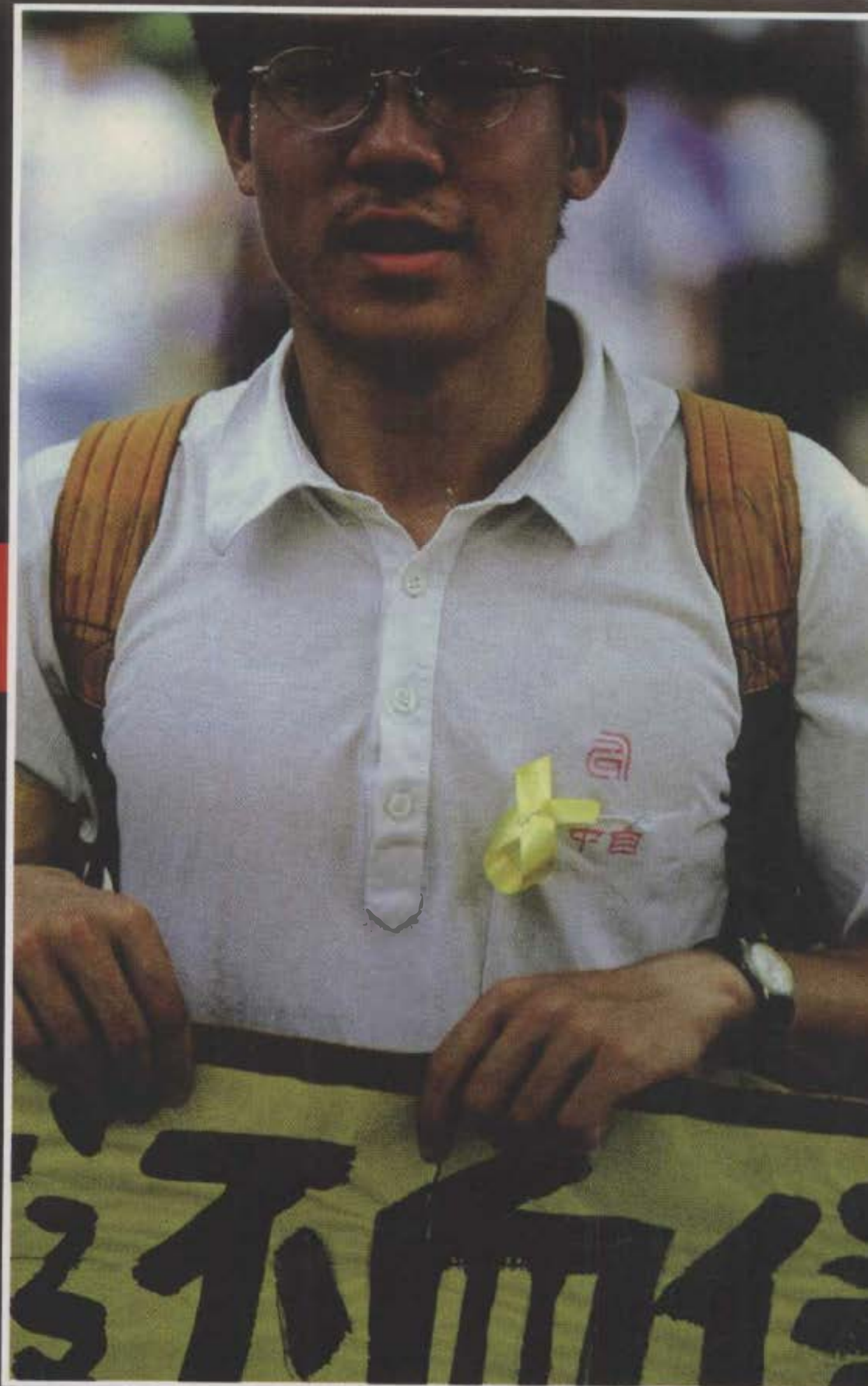


印尼民众声讨前特种部队司令帕拉波
禾，传媒指称他是暴乱的策划者。





中国大学生到印尼驻华大使馆递交抗议书





华裔女义工伊塔(中文名王静丽)因协助被受害妇女而惨遭奸杀,姐姐手持遗像伤痛欲绝。

香港印尼归侨集体抗议：回忆起当年排华的恐怖





钱其琛副总理在1998年国庆招待会上讲话中，关注印尼华人处境。

江泽民主席 1998 年 11 月在吉隆坡会晤印尼总统哈比比时，要求印尼政府保护华人合法权益。





录

序 张伟超(1)

中国政府关注印尼华人

江泽民关注印尼华人处境 (4)
钱其琛对印尼华人处境深表关注 (5)
唐家璇阐述中国对印尼华侨华侨问题的态度 (6)
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答记者问 (7)

遭遇实录篇

苦夏
——五月骚乱和华人遭遇日志 夏春平 (9)
树难静风未止
——五月骚乱后华人遭遇月历(7—12月) 夏春平(42)

亲历亲闻篇

淌血的五月 寒 川 (53)
不祥的十三号
——揭开首都暴乱之序幕 雷文吼(58)
灰暗的5月13日 宇 顺(63)
又是打家劫舍，又是装腔纵火
——嫉风恨雨横扫棉兰及市外华人区侧记 胡 儿(66)
火烧雅加达 小 沈(73)

棉兰骚乱实况报道.....佚名(77)

最惨的一夜.....佚名(82)

华裔的血泪控诉.....张玉瑛(83)

强奸华裔妇女暴行不容抹煞.....赵子隆(88)

义工遇害公义荡然!.....尤莲娜 张 弓(93)

三日“风暴”我们受困在新村里.....云 文(97)

一位印尼华人青年的控诉.....常 虹(99)

恐怖的日子.....莲 花(100)

来自棉兰的血泪报告.....沉 冤(103)

暴徒把我的家抢劫一光.....小 翁(105)

致哈比比总统的公开信.....钟喜甲(107)

告全世界同胞书.....(111)

还印尼华人一个公道

——我们的一封公开信.....一群印尼华人(112)

请听我们的呼声

——致纽约国际基本人权组织.....(117)

呼吁与控诉

——印尼华人向安南详述苦况.....印 华(119)

一个受害少女的见证词.....微微安(122)

梭罗的劫数.....佚 名(124)

血之控诉

——致世界华人组织的感谢信与反华暴行的控诉书.....(126)

爱玲小姐的公开信.....(130)

雅加达日记.....李明欢(132)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1—11）.....曾秉钧 陈华芝(142)

别再当代罪羔羊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结束篇.....高玉梅(174)

激情与危情共舞.....丘启枫(178)

五月暴乱真相大揭密.....萧曼殊 章云(183)

印尼华人里外不是人.....丘启枫(186)

华人与印尼人有道鸿沟难跨越.....梁东屏(189)

在印尼，华人变成一种原罪.....杨素雅(192)

全球评说篇

关注印尼华人命运·····	郭招金(196)
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症结何在? ·····	梁立基(200)
印尼华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李金珊(209)
印尼排华是自毁国宝·····	郑赤琰(212)
谈印尼暴民排华与不干预内政·····	《星洲日报》社评(214)
她们被毁去自尊·····	《星洲日报》社评(217)
挂羊头卖狗肉的“融合”·····	朴 萍(219)
忽然想到·····	夏之秋(221)
向印尼华裔进言·····	星 洲(224)
印尼能调整华人政策吗? ·····	乔之音(230)
印尼与印尼华人的噩梦·····	《大公报》社评(234)
印尼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	魏 知(236)
金融危机对印尼华人的冲击·····	黄昆章(238)
不能忘却的5月·····	庄永康(242)
为受害的印尼华裔妇女挂起黄丝带·····	孟 驰(245)
愿天聆听妇女祈祷·····	何文欣(247)
阳光下的兽行	
——国际舆论谴责印尼五月排华暴乱事件·····	夏春平(249)
印尼华人代代流不完的泪水·····	韩山元(260)
天谴人怒的罪行·····	《联合早报》社论(263)
印尼应痛定思痛·····	《联合早报》社论(265)
国家恐怖主义把印尼推向暴乱深渊·····	阿里尔赫延托(267)
印尼华人遭践踏 美国社会是否漠视? ·····	阮次山(270)
印尼华裔胡不归? ·····	余文锁(273)
印尼的贫民与暴民·····	黄大志(276)
印尼华人的空位任何人都可以填补? ·····	湛焕义(279)
真相尚未大白	
——评印尼五月暴乱调查报告·····	赵子隆(280)

我们受够了！

——一名印尼华裔的心声……………拉哈瑜·拉那宁西赫(283)

华人应有信心在印尼长期生存……………焕 发(292)

印尼排华运动的前因后果……………吴金帆 林洛川(294)

印尼排华动乱的根源: 文化上的失策……………郑赤琰(304)

印尼华人的生存之道

——痛定思痛后的探讨……………桑 尼(307)

印尼种族主义的来龙去脉……………(澳)萧忠仁原作 孔远志译(311)

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问题……………DRS · H · JUNUS JAHJA (315)

印尼骚乱调查始末……………乔之音(321)

印尼暴乱调查报告能否揭露真相? ……………余文锁(325)

印尼5月暴乱调查报告因政治因素内容被歪曲……………孙传炜(328)

各方反应篇

一、中国政府和传媒对印尼华人被迫害事件的立场

中国妇联发表声明要求严惩凶手……………新华社记者(331)

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人民日报》社评(332)

还华裔妇女以公道……………《中国妇女报》社论(333)

正义和良知的呼唤……………新华社记者(334)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璽强烈要求印尼确保华人权益……………(337)

还是没说清楚

——评印尼5月骚乱调查报告……………《中国妇女报》社论(339)

二、世界各地华人声讨印尼暴徒迫害华人大事记……………因 因(341)

三、印尼政府对印尼华人受迫害事件的态度

哈比比: 暴乱期间系列强奸案“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346)

哈比比: 华人不回国印尼不会完蛋……………(347)

哈比比质疑报章关于华妇被强暴的报道..... 余沧歌 (348)

哈比比改变态度盼印尼华裔回国..... (349)

哈比比：5月暴乱不是排华事件..... (351)

哈比比否认回教徒强奸200名华妇.....(353)

印尼政府承认5月暴乱曾发生76起强奸案..... (354)

附录：

印尼华裔应对暴乱负责.....马里斯·阿曼(355)

后记..... (359)

目
录

序

1998年5月，印尼发生华人资产被劫掠、华人妇女被强暴的严重事件。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对这一不幸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印尼华人和其他族裔的印尼公民一样，其正当权益应得到印尼政府的合法保护，印尼政府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印尼华人的祖先在中国。中国人移居印尼有很长的历史，都是以谋求生存为目的的和平移民。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大部分已加入印尼国籍，成为印尼公民。由于历史原因，千百万中国家庭和千百万印尼华人家庭有千丝万缕的亲情联系，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关注印尼华人的处境，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是一种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传播媒体高度发达、全球居

民广泛联系的今天，发生五月惨案这类的严重事件，必然会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和不安。乔岩、华声两位同志搜集海内外媒体的有关报道和评论，编成《'98印尼华人遭遇实录》一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编者将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收集在一起，并非表示都认同这些文章的看法，只是为了给这个不幸事件留下一份历史实录，以警醒世人，这种悲剧不可以再度重演。编者的这种想法我颇赞同。

印尼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物产丰富，人民勤劳而又善良，我在那里度过难忘的青少年时代。作为一名印尼归侨，我热爱中国，也热爱第二故乡印尼，希望印尼民族和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希望中印友好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是为序。

1998年12月30日

中国政府关注印尼华人

江泽民关注印尼华人处境

本报吉隆坡 11月17日电（记者 徐宝康） 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下榻的香格里拉饭店会见了正在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哈比比。

江主席再次祝贺哈比比就任总统，并对他重视并积极推动中国和印尼关系发展表示赞赏。江主席说，印尼是中国的友好近邻，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尽管印尼国内形势今年发生很大变化，但中国政府致力于巩固和加强中国和印尼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决心没有变化。中国和印尼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建设、努力维护本地区的繁荣和稳定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哈比比感谢中国在自身也遇到各种困难的情况下仍向印尼提供了珍贵的援助。他说，患难之交才体现出真正的友谊，印尼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谈到今年5月印尼骚乱中发生的不幸事情时，江主席说，印尼华人加入印尼国籍后，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印尼公民，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他们应像普通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他说，我们注意到阁下本人和印尼政府多次表示要保障华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中国在华人、华侨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相信总统阁下和印尼政府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的感受和关注。我们认为，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我们两大邻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

哈比比说，印尼华人都是印尼人，是多民族的印尼大家庭中的一员。印尼政府认为，5月发生的事件是一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印尼将根据法律进行严肃处理。

（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1月18日）

钱其琛对印尼华人处境深表关注

去年以来在亚洲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当地华侨华人遭受严重损失。对此，我们深表同情。我们相信，广大华侨华人发扬在艰苦环境和激烈竞争中创立基业的传统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重振事业。对于今年5月发生的印尼华人惨遭暴徒袭击的严重事件，中国政府深表关注。在印尼的华人，多年来同当地人民一起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作为印尼公民的地位理应受到尊重，应当享有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人身安全和正当权益理应受到保护。我们注意到印尼政府承诺将严肃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希望尽快落实，并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

（摘自钱其琛副总理在1998年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

唐家璇阐述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华侨问题的态度

新华社香港8月3日电（记者卢劲、陶文革）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菲律宾参加了第5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及中国与东盟对话会后返回北京途经香港时，今晚对新闻界发表谈话，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人华侨问题的立场和看法。

他说，在今年5月，印尼一些城市发生骚乱时，当地不法分子对许多华人华侨商店进行烧、砸、抢的洗劫，不少华人华侨妇女还遭受强暴。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及团体对此感到十分义愤，“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极为关注在印尼的华人华侨的处境，并多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印尼方面惩处凶手，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件。

唐家璇介绍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官员夜以继日，忘我工作，追踪事态的发展。他们还冒风险应求帮助不少华人华侨脱离险境。驻印尼大使多次向印尼外交部进行了交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发表谈话，阐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不久前，我利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之机，在会上发言时提出了印尼的华人华侨问题，会后又约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进行了双边会晤。会晤中，我指出，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多年来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印尼陷入严重的困境后，华人华侨又为印尼摆脱经济困境，争取早日恢复印尼的经济活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地位理应受到尊重，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充分的保护。他们应该像普通的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和权利。我强烈要求印尼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尽快采取措施，确保华人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对不法罪犯严加惩处。”

唐家璇说，阿拉塔斯外长在会晤中表示，发生这类事件是印尼的耻辱。哈比比总统也认为，这是一次极不人道的事件，已下令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印尼承诺，将对肇事者绳之以法，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这种事件。唐家璇表示：现在，我们正拭目以待印尼方面的调查委员会将发表怎样的调查结果，作出怎样的结论。我们也在密切注视印尼方面将采取哪些有力、有效措施，来确保在印尼的华人华侨的安全和权益，杜绝再度发生类似事件。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8月4日）

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答记者问

【本报讯】北京 28 日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今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今年五月印尼骚乱中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

有记者问：最近，香港同胞及海外华人对印尼华人妇女在五月骚乱中遭强暴纷纷以不同形式表示义愤，请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

唐国强答：对印尼骚乱中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和印尼华侨、华人所受遭遇，中国政府一直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我们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希望印尼政府彻底查处有关事件，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

唐国强说，长期以来，旅居印尼的华侨、华人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印尼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应该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使他们能够同印尼各族人民一道安居乐业。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也有利于印尼自身的稳定和发展。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7 年 7 月 30 日）

遭遇实录篇

苦 夏

——5月骚乱和华人遭遇日志

夏春平

1998年5月间，印尼发生的社会暴乱，既是印尼民族的悲剧，更是印尼华人的悲剧，也是近代文明史上耻于翻阅的一页。

直接触发印尼这场危机的，是1997年中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因在危机中陷得极深，印尼政府无法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共识，尽早展开救援工作。在旷时废日之下，经济社会问题不断恶化，物价高涨，失业严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正如苏哈托所说的，印尼数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已一扫而空。事实上，印尼金融危机会发生得如此严重，爆发后又无从下手解决，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数十年的各种弊病所造成的，绝非源自一时一事。印尼人民当然感同身受，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是自然的，问题是人民所要求的已不是简单的一个物价的问题，而是更深入的政治改革。

在这次印尼动乱中，令人扼腕的是，当地的华人又无辜的成为代罪羔羊和泄愤的对象。他们世代代为印尼所做的奉献，他们设法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在一夕之间付诸东流。正如一位印尼华裔政治学者所言，“印尼华裔就像是政府的情妇一样。它虽然是美丽的，也可能是最受宠爱的，可是却永远没有机会跟着情人一起出席宴会。”

对于5月暴乱中发生的这段历史，史学家目前还来不及梳理。但那段刚刚过去的历史却让人们难以忘怀。

为真实地再现印尼华人在那场暴乱中的不幸遭遇，笔者将当月发生的有关印尼政情的事件依照时间顺序择要编排，以期读者对“黑色的5月”这段历史进程有个大概了解，通过这一组组文字将华人在5月暴乱中的遭遇连串起来。虽然这些材料难免显得零琐、杂乱，但它真实、客观而又鲜活。

5月1日—5月6日

物价飙升全国酿连串骚乱 暴乱纷起华人成攻击目标

5月初，印尼政府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协议要求，对电力、交通、燃料等费用提高价格。这一决定引起印尼各界的普遍不满，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和暴乱。

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受到几十年来最沉重的打击。为克服金融危机，印尼政府1997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了总额达43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协议，并根据该组织的要求开始实行紧缩财政、整顿金融机构、提高利率等改革措施。然而，当1998年5月初印尼政府为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二笔的援助条件而大幅提高电力、运输、交通收费时，立即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不满，导致政局出现剧烈动荡。

5月4日，印尼政府发布大幅度调升燃料等公共费用。

由于印尼政府取消了燃油补贴，燃油价格一日涨71%，这一决定引起各界的普遍不满。包括不少国会议员都认为，在■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提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带动生活用品价格上涨，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更大的冲击。

人们对国家经济的不满情绪因此加剧，持续了数月的学生抗议活动逐渐扩大到社会。

5月4日，随着政府宣布取消对电力和燃料的补贴，以至燃料价格飙升后，首都雅加达，以及万隆、爪哇、棉兰、苏门答腊等多个地方接连爆发骚乱、抢掠和放火事件，导致最少30多人受伤，其中华人又一如以往地成为暴徒袭击的目标。

5000名学生在西雅加达一所私立大学前聚集，抗议政府提高燃料价格和苏哈托的治国手法，约300名警员到场戒备。

与此同时，逾百名暴徒在西部城市棉兰放火焚烧商店和四处抢掠，以示对当局调高燃料价格不满。

印尼民怨沸腾不但助长反政府学生运动蔓延，且触发全国性暴乱，包括棉兰、日惹、泗水、乌绒巴东，以至首都雅加达连日来接二连三出现暴乱事件，

并造成大规模警民冲突。

在各地暴乱纷起之际，印尼股市5月5日收市报435点，创下13个星期以来的新低点。

5月5日，印度尼西亚的北苏门答腊省首府棉兰发生骚乱，1000多名示威者在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区纵火并抢掠，许多华人商店被洗劫，13辆汽车包括两辆警车被烧毁，有人甚至放火烧警察局。

5月6日，印尼的暴乱持续激化，在棉兰及雅加达的骚乱愈演愈烈。

在棉兰市，暴徒捣毁一间华人经营的摩托车商店，纵火焚烧摩托车，一名年轻的暴徒将掠得的家具抛入火堆中。

在万隆市，学生们举行了反政府的示威，防暴警察与学生发生冲突，学生向警察抛石子，起飞脚。

在苏门答腊北部棉兰与邻近市镇，暴徒抢掠商店，军警则向示威者开枪，暴乱中有4人被困在一座焚烧的建筑物内被烧死，另外一人被军警射杀。

印尼华人在连日暴乱中成为众矢之的，暴徒不但以华裔为攻击对象，并针对华裔经营的商店抢掠纵火，在动乱最为激烈的棉兰市，防暴警察为阻止暴徒袭击华裔，不但动用催泪气体及橡胶子弹，甚至施以实弹镇压。棉兰市华裔居民人人自危，最少有五个华裔家庭往当地警察局寻求庇护，经营商店的华人瑟缩在重门深锁的店铺内，而门外则不乏荷枪实弹的军警严阵以待。

而后，暴乱演变成针对当地少数华裔居民的袭击及抢掠行动。成群结队的暴徒肆意破坏、洗劫以至纵火焚烧当地华人店铺，华人动辄成为攻击对象。印尼军警虽不断增援，但仍难遏止暴乱，当地警方甚至劝说华人走为上策；棉兰市好些华裔家庭已赶紧飞赴新加坡和大马逃难，也有大批华人离家挤往酒店避难或投奔市外亲属，留下来的誓死保卫家园产业者则纷纷自我武装及组成自卫队，以应付暴徒的狂乱袭击。

市内好些华人聚集区的社区连夜成立自卫队对抗暴徒。目击者说，那几天晚上已有数百计华人在他们的商店外严阵以待，当中不乏头戴钢盔、手持木棒大汉向进袭暴徒还以痛击，一些华裔妇女则以滚热开水泼向暴徒。一名华裔男子更以大汽油桶盛载硝酸，准备还击。

一名劝说华人家庭离开本市暂避风头的警官说：“暴徒根本不是在示威抗议，他们实与盗贼无异。”

为了平息局势，5月6日，印尼军方出动装甲车在棉兰市驱散暴徒。

在连日来的暴乱中最少有10人死亡，超过1000家华人商店遭抢掠或焚烧。

5月7日

棉兰仍有掠夺事件 暴乱蔓延苏岛各地

暴乱和抗议行动蔓延到苏门答腊各地。

在棉兰多个地区和市郊，掠夺者无视严厉保安措施，引起动荡不安，苏门答腊其他城市再次传出暴动消息。

在西苏门答腊首府巴东，数千名暴民今天毁坏至少7座政府大厦、一家电影院和一座购物中心。

师范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校园举行自由演讲论坛后，游行到有400名保安人员守卫的省长办事处。

学生在省长办事处举行另一个自由演讲论坛后离开，但在回家途中，中学生、巴士司机和愤怒的暴民加入他们行列。

暴民向印尼执政的戈尔卡总部抛掷石头，一部汽车在街道上被推翻。多座建筑物遭破坏，包括国家电力公司大厦、公共工程办事处、“总统”电影院和音乐厅、一家购物中心和丰田汽车展览室在内。

在棉兰，军方调派更多军队在棉兰的主要街道上进行戒备。据报道，棉兰的勿拉湾港已经停止一切活动。不过，尽管市内有大批军警，棉兰依旧有零星的掠夺事件，而且就连附近的城镇也受到波及。

棉兰数以百计的华裔居民由于担心性命受到威胁，因此已经逃离该市，另一些人则到当地爆满的旅店寻求庇护。

5月8日

议长警告不政改国家将崩 学生示威矛头直指苏哈托

印尼副议长沙旺哈密中将警告说，政府如果不推行政治改革，整个国家可

能会崩溃。

据报道,沙旺哈密中将今天在会见印尼的广播媒体与报章的总编辑时指出,印尼目前虽然用了最能干的管理班子来推行最好的经济政策,但是国内的经济危机还是继续恶化。他说:“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大家都会完蛋。”

这位陆军中将指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公众人士目前已经形成共识,认为印尼只有推行示威学生所主张的全面改革,才有可能挽救国家。

不过,沙旺哈密中将并不同意学生认为应该彻底更换国家领导层的看法,并指出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主张。

他说:“你总不可能要求印尼武装部队发动军事政变吧?如果你触及更换国家领导层的问题,就意味着我国将出现大规模的冲突。他们的这个要求太不实际了,也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他主张印尼通过渐进的、和平的宪制改革方式来实现政治改革的目标。

印尼军警在全国性的反苏哈托学生示威浪潮进一步升温之际,今天逮捕了200名在人民协商会议大厦前静坐示威的大学生。

这群大学生主要是来自雅加达的一所回教大学。他们高举各种各样的反政府标语——其中一条是“消灭一切贪污和裙带风”,从校园游行到人民协商会议大厦。

他们抵达人民协商会议大厦后,不顾军警的警告,在大门前面坐下来。军警接着便采取强硬手段,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推上警用卡车载走。

中爪哇梭罗市则发生了大学生和军警冲突的事件。

三一一大学的警卫苏瓦迪指出,有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军警在大学门外发生冲突,大学生拾起石头来攻击军警,军警则还击以催泪弹和塑胶子弹。苏瓦迪说:“在我们这里,这次的学生示威规模是最大的。”

在日惹的默哈末迪亚大学是日也发生了大学生和军警冲突的事件。双方在冲突时动用了石头、汽油弹、催泪弹和塑胶子弹,至少造成11名学生受伤。

印尼大学生在几个月前开始示威时,只是要求政府推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现在,他们已经把示威的矛头直接指向苏哈托总统。

在雅加达,一所教育与师资训练学院的学生设立了一个模拟法庭来审讯苏哈托总统。

一名扮演“人民检察官”的学生说:“特别人民法庭应裁决被告苏哈托谋杀、抢劫、贪污等罪名成立,并判他死刑。”扮演“人民法官”的学生则高喊:

“必须处决苏哈托！”

当这名“人民法官”做出这项“判决”后，其他的示威学生一边焚烧苏哈托的肖像，一边欢呼鼓掌。

今天，代表印尼超过1000万名基督教徒的教会领袖也加入要求改革政制的日益壮大行列，并誓言支持学生示威者。

印尼基督教协会秘书长帕特蒂阿斯纳对路透社记者说：“改革是当前急务，我们呼吁这个国家全民支持改革。”

他说，协会代表1000万至1500万名基督教徒。在印尼以回教徒为主的2亿人口之中，基督教徒超过5%。

他在协会发表声明后讲话，声明谴责“亲民运分子无法无天地失踪和被绑架”的事件，并呼吁教徒支持改革运动。声明说：“协会支持学生和社会其他组织要求的改革运动，并鼓励社会所有成员支持。”

5月9日

多处触发学警冲突 苏哈托恫言调军警

印尼六个城市日惹、雅加达、万隆、望加锡、三马林达和泗水的学生，今天继续举行示威，要求当局进行改革。

在日惹市，来自两所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今天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也计划在明天游行，抗议当局在前天导致一名示威学生丧生。

在雅加达和万隆，也发生学生与保安队冲突的事件，但没有人受重伤。

在雅加达，镇暴警察与100名走上街头举行示威的学生发生冲突。镇暴警察竭尽所能把高喊“改革”口号的示威学生赶进小巷。一名哲学系学生说：“现在是结束苏哈托时代的时候了。”

在万隆，来自国立帕查查兰大学的500名学生，与阻挡他们走出校园的警察发生冲突。校警队队长苏哈达说，警察发射催泪弹和树胶子弹驱散学生，但学生只是受点轻伤而已。

在南苏拉威西省省会望加锡，数以千计的学生今天乘卡车、汽车或电单车游行，要求政府进行改革。

在东加里曼丹省的三马林达市，仍有示威活动。公务员把官家用车的车牌改为普通车牌，因担心成为受攻击的目标。

在泗水，自星期一以来，有11名学生为要求当局进行改革而在校园采取绝食行动。

日益澎湃的学生示威运动，获得更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肯定及支持，各界精英就召开人民协商会议（人协）特别大会的主张，作出积极的反应。

来自印尼全国五所重点大学，即雅加达印尼大学、万隆工艺大学、茂物农业大学、日惹卡查马达大学及泗水艾尔朗卡大学的21名著名教授发表联合声明，吁请学术界支持大学生提出的全面改革诉求，因为这项诉求具有牢固及客观的思维，各方应精诚合作来体现改革的目标。

印尼总统苏哈托今天恫言利用军警镇压任何危害国家稳定的抗议活动。

他说：“我很了解国内的局势，我希望印尼人民将不会牺牲我们所取得国家稳定的成果……保安部队将采取行动对付任何干扰及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士。”

“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拥有国家稳定及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

他指出，军警及法庭将采取严厉的行动来对付那些违法的人士。

苏哈托今天上午启程前往开罗出席15国集团峰会前，在雅加达哈林军用机场举行历时25分钟的记者会时发表这项谈话。

苏哈托说，印尼可从现在开始为政治改革作好准备，但是，他促请人民为了国家，牺牲个人及团体的利益。

苏哈托总统还要求印尼国会，对于人民提出的改革要求作出反应，召开会议讨论改革问题。同时，他也希望印尼人民镇静，提供机会给国会去修订各项政治及经济法令。

5月10日

哈比比否开人协大会 大学生示威改换总统

印尼副总统哈比比反对有关召开人民协商会议（人协）特别大会的主张，并否认所谓他所领导的回教精英组织回教知识分子协会赞成召开人协特别大会及改组内阁的报道。

哈比比今天回答媒体询问时表示,召开人协特别大会的主张除了不合理之外,也蔑视了民主和人民,印尼于两个月前刚举行过人民协商会议,现在又要求召开人协特别大会,这项主张不合理,与逻辑不符。如果人协决议案执行人(指总统)违反了 1945 年宪法,才有必要召开特别大会。

谈到改组内阁一事,哈比比说,这是总统的特权,人民授权总统去实施人协所通过的国家总方针纲要,由总统组成的内阁协助实施该纲要。

哈比比也表示,由他担任总主席的回教知识分子协会不曾敦促召开人协特别大会及改组内阁,该协会不久前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不曾讨论过该政治问题。

总统苏哈托呼吁人民平静下来的要求,被学生们置若罔闻。

《雅加达邮报》引述一名学生领袖的话说:“我们要继续举行集会,直到印尼有一位新领袖,以及政治和经济改革全面展开时为止。”

苏哈托昨天飞往埃及访问之前发出呼吁说:“我相信,人民已经意识到国家稳定和政局稳定的重要性,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要从改革,我们就必须有一个平静和安定的环境。”

虽然电视台直播了他在机场的讲话,不过,今天在许多城市中,学生仍不断示威,要求立即进行改革,并要求苏哈托下台。有的示威活动甚至出现暴力现象。

在西爪哇的 IKIP 师范大学,示威学生还举行模拟审判,并判处总统的模拟像死刑。当这个模拟像燃烧起来之后,人群中响起一片欢呼声。

5月11日

苏哈托：多年成果毁一旦 反对派：联合声明苏下台

总统苏哈托今天在开罗召开的15国集团峰会开幕仪式上发言时,公开承认印尼 30 年来的国家建设成果已经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毁于一旦。

苏哈托指出,印尼在过去的 20 年里,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 7%,可是今年却会出现负增长。他说,根据经济学家的预测,印尼今年的经济增长率的

最低值是负4%。

他说：“经济危机不仅影响到经济，也影响到了社会。印尼会继续推行改革计划，不过这需要印尼人做出牺牲。印尼人要有耐性，而且要更加守纪律。”

印尼主要反对派领袖今天呼吁人民协商会议，取消今年3月对苏哈托总统的任命。

由39位著名反对派人物署名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决定设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来协调各个改革派的力量。

这39人是属于“10·28集团”的成员，该集团的成员包括回教领袖莱士和著名反对派领袖美加华蒂，但这两人没有在声明上署名。

这批人发表的五点声明说，人民协商会议应当取消委任苏哈托和哈比比为正副总统。声明说：“如果人民协商会议让这两人继续担任正副总统，我们争取进行全面改革的努力将是徒劳的。人民协商会议如果是真的尊重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就应当这样做。”

这批人在声明中说，他们支持几个星期来学生为要求政治经济改革而举行的示威。在署名的39个人中，有的属于前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包括雅加达前任市长沙迪金。

另一方面，印尼拥有2800万名会员的第二大回教组织领袖莱士今天在体育馆的一个集会上演讲，要求苏哈托总统下台。他说：“我除了要求他下台之外，已没有其他选择，因为如果他死抱住政权，将使印尼天天发生流血冲突。”

莱士说，苏哈托政府已失去人民的信任。学生和人民已经有勇气来要求更换国家的领导层。

5月12日

各地学生继续示威 警察开枪六人丧命

印尼各地的多所大学学生，继续举行反政府示威。雅加达起码有六所大学的学生举行示威集会，要求印尼总统苏哈托下台。

在西爪哇首府万隆，500个镇暴警察跟600个示威学生对峙时，朝空中开枪，警告示威学生。学生高喊口号“必须打倒苏哈托！”，还齐唱国歌。

在中爪哇城市日惹，一所大学的学生焚烧写上“苏哈托有罪”的模拟像，

还高喊口号“烧死苏哈托”！

私立阿默达兰大学的数百个学生在保安部队严密监视下，离校上街游行，学生到达校园以南约半公里的东区。

在南苏拉威西首府乌戎潘当，今天上午多所大学有学生示威，学生要求苏哈托为政府无法应付经济危机负责，还要求政府撤消上周宣布燃油涨价的命令。

在帝汶岛南部城市古邦，镇暴警察用胶弹和催泪弹驱散 300 个学生。

与此同时，非官方的印尼福利工会数十个工人，在雅加达游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尼代表团办事处所在的印尼中央银行大厦，要求该组织利用 400 亿美元的拯救配套来支持印尼的政治改革。

印尼镇暴警察今天向雅加达市中心特里萨克蒂大学 (Trisakti University) 内的数千个示威学生和支持者开枪，造成至少六人丧命，数十人受伤。在死者之中，有三人是华裔学生。

该大学的大约 5000 个学生和支持者原本要游行到人民协商会议大厦，在校门外遭镇暴警察阻挡，在街头静坐示威。学生稍后发现并殴打混进队伍的一个便衣官员，触发这起血腥冲突。

5 月 13 日

雅城大暴动 华人遭大殃

著名私立特里萨克蒂大学昨天发生 6 名学生被镇暴警察开枪打死后，雅加达今天发生大暴动，暴徒纵火焚毁华裔经营的商店，一名男子遭警察击中头部重伤毙命。

暴徒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瓶，迫使镇暴警察动用水炮和发射催泪弹，并向暴徒开枪，起码 10 人重伤，数十人受伤。暴徒稍后设置路障，入夜还点燃篝火。

由于局势恶化，在埃及首都开罗访问的苏哈托总统提早回国。

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警告：“骚乱逐渐失控。”

西雅加达商业与住宅区潘格兰·图巴古斯·安克的一排商店今晚失火。街

边一个摊贩说：“所有被纵火的店铺，都是华人拥有的商店。”

印尼首都西部地区的居民说，至少有10人在雅加达的暴乱中丧生，其中有9人相信是华人。这些华人是在商店和住家中被暴徒纵火烧死。他们不但把柜台里的金银首饰抢走，还放火烧保险箱，然后撬开保险箱，把里面的钻石珠宝都抢走。这还不够，他们还放火烧掉金店。一些印尼华人在这次暴动中损失掉所有的财产，连衣物都被抢光和烧掉。

华裔财团三林集团旗下中亚银行在西雅加达一家分行，被一群暴徒破门闯入，引来大群劫贼进入抢钱。

特里萨克蒂大学学生在校园追悼六名遇害学生之际，邻区格罗戈中午前后发生暴动。暴徒捣毁街灯路标，焚烧汽车，劫烧数十间店铺和建筑物，洗劫巴厘银行分行，并朝东冲向华裔聚集的罗西商业区。

保安部队出动多架直升机在市区上空盘旋。罗西世贸中心有海军陆战队一批士兵保卫，四周街道也有大批军警驻守。

在西爪哇首府万隆，5000多个学生游行到议会大厦，并在接管大厦后展示布条和标语，表明关注保安部队向学生施暴手段，同时要求即刻改革。

在中爪哇城市日惹，加查马达大学数千名学生在校园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推翻苏哈托，高喊“吊死苏哈托”！

5月14日

暴民焚城掠夺 华人狼狈逃难

雅加达爆发苏哈托执政3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大暴动，大批坦克和装甲车开进了首都。数以万计的暴民到处纵火、烧毁民房、汽车和购物中心，并烧毁洗劫商店和银行，雅加达红十字会人员说，暴民今天放火烧毁雅加达一家百货公司和一个购物中心，造成超过250人死亡。华人纷纷出国逃难。据报道，社会福利部大厦也被暴徒纵火焚烧。掌管这个部门的部长是苏哈托总统长女哈迪扬蒂。显然暴民是冲着苏哈托家人而来。

印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下午在记者会上说，政府还不会在发生大暴乱的首都雅加达实施宵禁，并已调派15000个士兵进入首都维持

治安。

当局出动架起机关枪的装甲车保卫重要据点，还首次出动坦克巡逻。

他指出，武装部队将不顾危险，继续贯彻执行职责，确保维系全国安危的首都的治安。

维兰托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和给予军方全力支持，并指出“武装部队将顾全人民的利益。我们（武装部队）有能力控制局面，但我们需要社会各界支持。”

在他举行记者会之际，市中心一座购物大楼被暴民纵火。雅加达军区镇暴队 150 个士兵和 15 辆装甲运兵车，奉命开到失火大楼附近的公路驻守。

手持 M-16 型步枪、全副镇暴戎装的军队，一连第三天封锁总统府不远的大道。约 12 辆装甲车列阵徐徐驶经总统府和国家纪念碑附近的政府大厦和办公楼。

两辆装甲车和一辆装甲运兵车则在市中心阿马查亚大学不远处驻守。镇暴警察稍早在该处发射催泪弹，试图驱散约一万个暴民，可是徒劳无功。

两辆装甲车则停在文华旅馆旁。另三辆有催泪弹发射器的装甲车则停在附近。希尔顿等旅馆爆满，许多酒店都成了避难所。

雅加达多处冒出漆黑浓烟，暴民一早就出动焚烧汽车、轮胎、商店、办公楼和房屋，后来暴动越来越逼近市中心。

一所警署着火燃烧，一架直升机凌空发射催泪弹。救护车和消防车在暴乱区鸣叫疾驰。

成千上万的暴徒肆意抢劫纵火，抬米搬货，甚至搬走电器和冰箱等笨重物件，许多百货公司、银行和多栋建筑物被人放火。四处尽是玻璃碎片、残余物、汽车焦骸和被捣毁的交通灯，暴动区恍如战场，造成许多街道阻塞，使得有 1100 万人口的雅加达的交通陷入混乱。

被攻击的商行大多是华裔商店。跟贫民区格罗戈尔毗连的华裔聚集区普卢伊特，华裔居民用金属条、木棒和大刀等守卫家园。

在通往苏加诺——哈塔国际机场的收费大道，路旁乡村青年设置路障向外国人强行索讨过路费，还逐辆检查是否有华人，造成公路堵塞不通和暂时无法通行。

雅加达一间有 120 年历史的老字号咖啡加工厂，今天上午遭上千名暴民破门抢劫。华裔老板一家不得不爬屋顶到印尼人邻居家里避难，才免遭毒手。不过，家里的 6 辆车全被烧，价值十多万美元的珠宝首饰，以及还无法估价的其他财物，都被洗劫一空。

咖啡加工厂老板娘谢丽凤（36岁）事后说，当日上午9时左右，厂里的工人慌忙跑来通知他们说，有上千名暴民正朝工厂冲来。“我们赶紧跑到工厂后面，爬上屋顶到印尼人邻居家避难。如果晚一步，一定没命了。由于慌忙，什么都来不及带，只是拿了事先包好的护照和文件。”

她心疼地说，她放在家里的一箱钻石珠宝全部被抢，暴民把厂里和屋里能搬的东西全都抢走，连汤匙也不放过。“他们撞破铁门，然后一窝蜂冲入洗劫。”

暴民抢完后原本想烧掉他们的工厂和住家，但她的印尼人邻居上前阻止说，放火烧屋会殃及他的房子，暴民才打消此念头。但为了泄气，暴民把他们的6辆车推到大路旁，放火烧掉。

她将两名女佣寄住在邻居家后，自己与丈夫、次子和小女儿一起逃到新加坡。“我们逃亡时必须穿印尼服装，包头巾，扮成印尼人。”

“这次暴动是历来最严重的一次。暴徒放火烧店屋和住宅，一些来不及逃出的人就被活活烧死。我当时逃难时，连换鞋的时间都没有，只好拿着拖鞋坐飞机。我们都只有一身衣服，两天没洗澡。没想到会这么狼狈。”

仓惶逃难的，不只是谢丽凤一家。雅加达机场象巴刹，里面都是逃难的人，许多人都在那里过夜，机票相当难买。

印尼雅加达动荡不安，暴徒肆意掠夺财物的局势，使到该处的居民及外地人担心生命安危，纷纷搭机飞到邻近的新加坡。雅加达机场出现大批“黄牛”，一张飞到新加坡的机票竟被炒高到1000美元，但问津的不乏其人。平时来往于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的新航双程机票值约几百美元。

另外，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城市的航空交通已经因局势混乱而暂停，目前只有国际航班起落。然而，一些航空公司的机师和空服员却因为受困酒店，无法到机场去接班，以至一些航空公司的班机无法起飞，另一些航空公司的班机则由原机的机师和空中服员继续服务，而无法换班。

雅加达国际机场到处都是人，你推我挤，抢着买机票，以便尽快离开雅加达，整个机场乱七八糟，好像菜市场；售票处很多人排队，盼能买到机票；很多人累了，便倒在地上睡觉，一片混乱。

外国使馆和外资公司今天开始从雅加达撤离职员，机场则有数千人惊慌地等待搭乘飞机离开印尼。

美国和加拿大使馆留下少数官员值勤，并下令其他官员和他们的家眷尽快离开。两个使馆也劝告所有侨民和旅客离开印尼。

美国石油集团科诺科一名职员说,该公司上午用一架包机把近40个职员载往新加坡,第二班包机则在下午飞抵雅加达载人。

一家法国公司的职员说,通用电气——阿尔斯托姆、里昂水务和多家欧资大公司也开始疏散职员。

在机场,数百人在航空公司柜台前苦候,不管客机飞往何处,只要买到机票离开就行。

美国使馆发言人斯特勒默说,美国政府已租用两架波音747型客机,运载无法买到机票的美国人。他又说,使馆在雅加达市区安排三个集合点,每人只准携带一件行李。

澳洲的昆达士航空公司从今天起,派出较大型的波音747客机投入雅加达至悉尼的航线,让每趟班机可多运载100名乘客,并密切留意局势,以便在必要时增加班机。

日本许多公司今天关闭在印尼的工厂,并劝告员工及其眷属留在户内或离开印尼。

据有关组织公布的资料作不完全的统计,13—14日雅加达大暴乱造成如下损失:

受损项目	受损数额	备 注:
旧式市集	13 处	几乎全为华裔所拥有
商店	5186 家	多为华裔拥有
店铺兼住家	2479 家	同上
银行	535 家	其中包括中亚银行属下122间
大型菜馆餐厅	24 家	
私人企业办公大厦	383 家	
酒店旅馆	12 家	
住宅	1026 间	
购物中心、超级市场	75 间	
大型汽车维修部	45 间	
汽车	1948 辆	
电单车	1119 辆	
骚乱后失业者	13,500 人	
扣捕待审暴徒	2500 人	
死亡者	1339 人	
被大火围困烧毙者	293 人	
受重伤入院治疗者	101 人	
华裔妇女遭强奸	百余案件	
华裔向印尼民族人权委员会投诉	1288 件	

5月15日

总统下威令八国联声明 学生占电台暴乱始漫延

总统苏哈托今天下令部长采取强硬行动，对付暴民和抢劫者。他还下令收回提高油价和电费的政令，希望借此平息连续多天的暴乱。

新闻部长阿维达兰说，苏哈托今天同九名高级部长和顾问会面后，下令“部长们采取行动对付罪犯和抢劫者”。

提高油价和电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安排拯救配套的附带条件之一。但自油价和电费提高后，学生的反政府示威一浪高过一浪，局势陷入严重的失控状态。

印尼银行今天暂停营业，中央银行也宣布暂停所有印尼盾交易和结算活动，令印尼金融市场瘫痪。

雅加达股票交易所全天的成交量只得145万股，相等于平时的1%。综合指数在极度平静的交易下攀高2.24点，以405.94点收市。当地官员说，由于暴乱不断发生，多数人都不敢出门，今天只有大约20%的交易员上班，交易所内空荡荡的，整个上午只有六家公司的股票有买卖。

印尼的动乱在昨天恶化后，德意志、美林、渣打和富士等外资银行便撤离派驻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在当地有业务的新加坡银行也已经暂停当地业务。在印尼的马来亚银行也在今天停业。

中爪哇三宝垄市的几千名学生和示威者今天强行占据当地国营的印尼共和国电台，并且强迫电台播放他们的要求。

示威者的要求包括即刻进行全面改革、降低物价、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会议以及呼吁武装部队不要对学生和老百姓动武。

几千名示威者较早时也在市内游行示威。不少商家由于担心发生暴动而不敢营业。

示威者沿途也强迫办公室和私人住所降半旗，以哀悼在星期二的雅加达示威行动中，遭镇暴警察开枪打死的6名学生。

另一组示威者则到当地市长的办公室进行抗议。

在西爪哇的万隆市，好几万名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当地的议会大厦，举行自由论坛。

示威者要求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大会,并且要求总统苏哈托应该即刻辞职。

东爪哇泗水的好几万名学生和市民也在市内多个地方举行示威集会。一些示威者还游行到当地的议会大厦。

雅加达数个地带继续发生暴民洗劫商店和购物中心的事件,而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和西苏门答腊省省会巴东也都发生暴乱,暴民攻击商店、银行或放火烧建筑物。

在泗水,一名杂货店女主人因为拒绝把钱交给暴民当场被刺死。数百暴民骑电单车在市内横冲直撞,向商店扔石头,逢人就勒索。

在巴东,数百人在大巴刹区,攻击那里的商店、银行和住宅。

中爪哇的梭罗市,今天发生数百间商店和住宅被抢劫或遭纵火的事件。

泗水今晚也发生商店遭抢劫和受攻击的事件,数十间商店和一座银行大厦以及 15 辆汽车遭破坏。

雅加达东部郊区克连德的日惹百货公司昨天失火,救援人员今天已抬出 170 具尸体。

八大工业国领袖今天呼吁印尼进行政治改革以制止日益严重的暴乱,他们也促请印度结束核试炸,但他们并不准备向印度采取集体制裁措施。

他们针对印尼局势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对印尼发生暴乱表示痛惜,呼吁当局“显示最大的克制,不要动用武力与尊重个人的权利”。这是八大工业国领袖首次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印尼进行政治改革。

印尼执政集团戈尔卡的一个主要派系“科斯戈洛”今天也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哈托总统下台。

“科斯戈洛”(Kosgoro)派系在声明中说,苏哈托总统应该归还人民协商议会在今年三月赋予他统治印尼的行政权力。这个派系的一名领袖今天受访时说:“如果他不愿意和平地下台,我们就必须强迫他离开政坛。”

5 月 16 日

华人区残垣断壁 雅加达恢复平静

受到破坏、抢劫及纵火后的雅加达,今天逐渐恢复正常,不过,所有商店、

工厂及其他营业场所仍未有任何活动，重灾区的华人区一片满目疮痍，令人侧然。

5月13日暴动开始时首先遭到攻击的达安莫格路，至今天为止，还可看见许多残骸及玻璃碎片，多家被焚毁的旅馆、工厂及汽车修理厂等一片残垣断壁。

作为唐人街标志的草埔城市酒店 (City Hotel) 及购物中心整座大楼全被焚毁，连酒店前面的摊位也不能幸免，附近被波及的建筑物至还在冒烟，两旁有许多电器商的天桥，以及对面的奥利安电器中心，不远之处的格罗朵普拉莎商场，都被洗劫一空或遭纵火。

许多市民在灾区徘徊，以茫然的眼光在望着被毁损的商店，其中大部分是华裔。据知，这一带被毁的店铺及摊位不下千间，其中有许多是每天只赚取生活费的小商人。

近10年才建设的芒加都阿商业中心，已发展成为国际知名的本地产品或进口货销售中心，在暴动第二天成为主要攻击目标。

被视为雅加达特种营业区的孟加勿刹街旁仍有10多部汽车残骸未清理，整条大街的建筑物被砸得稀烂，不忍卒睹，许多中小餐饮店也难逃劫运。

从宾都柏西，新巴刹，沙哇勿刹，直至芝利翁河流两旁的哈炎武禄及卡查马达街，所留下的暴民肆虐痕迹，令人触目惊心，被毁的一辆大巴士还躺在河边，好像在向路人椰揄。

从万登岸经二脚桥到红溪大街，暴动时许多汽车被烧毁，仍有数十部残骸未运走，沿途有多名机工模样者，正在向汽车残骸动手术，搬取还可用的组件。整条红溪大街的店铺及银行等，遭到严重的毁坏及纵火。

印尼军方发言人华合今天在记者会上证实，在被暴民放火烧毁的购物中心和商店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近500人。

被暴民纵火的五座购物中心和一些商店，大火狂烧过一天后才熄灭，抢救人员今天进入废墟中寻找尸体。

雅加达西区警官苏哈迪说，抢救人员进入雅加达西区斯利达购物中心4层大厦时，发现了118具尸体。

雅加达市长苏蒂约索今天说，印尼首都雅加达市已恢复平静，并呼吁逃往国外的市民和外籍人士回返雅加达。市政府正设法恢复公共交通的运作，并确保雅加达有足够的燃油和其他物品的供应。

雅加达市的街道今天已恢复运作，不过，这个经常塞车的城市目前的交通

流量却有明显的下降。大部分的商店仍然没有营业，在市内巡逻的坦克与装甲车随处可见。

在雅加达郊区苏加诺哈达机场，成千上万人在班机服务台前和离境处留宿，设法取得离开印尼的班机机票。离境机票早已被订购一空。相比之下，入境厅却显得额外冷清，入境班机几乎空无一人。

日本外长小渊惠三今天说，若有必要，日本将出动商业包机或军机，大规模撤离侨居在印尼的2万名日本人和旅客。

马来西亚和荷兰在计划撤侨。台湾当局也在撤走在印尼的台湾同胞。

5月17日

市民长龙提款 数千外侨逃离

数以百计的市民今天在提款机大排长龙，轮流提取现款。首都星期四大暴动后，所有银行都停止营业，提款机也暂停操作。

提取现款的唯一办法是到提款机提款，可是只有寥寥数台照常运作，大多数提款机都成为暴徒破坏掠夺的目标。今天仍正常运作的提款机，分别有100多人排队。

市民苏甘达说：“我们必须排队四个小时，才能拿到钱。”

中亚银行只有四台提款机照常运作，两台在市中心，两台在南区。许多银行都在前门张贴通告解释提款机担心暴动恶化，因此自星期四起暂停营业。

印尼中央银行今天说，所有银行在明天恢复营业。据市政府发给报章的清单显示，雅加达市313间分行、221间银行办事处和220台提款机被毁或被破坏。国营电力公司在全国各地设备和输送网络的损失达10亿盾。12个添油站和三辆运油车被暴徒纵火，造成国营帕塔敏纳石油公司及其私营伙伴公司的损失达40亿盾。

当雅加达动乱局势有所平息之际，数千名惊慌失措的外国侨民今天继续从印尼撤离。

在美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国政府都派出了包机之后，各国公民都在纷纷逃离印尼。在日本政府向自己的侨民发出警告之后，住在印尼的日本人也开始疏

散。

美国官员说，大约 3000 多名美国公民在已乘坐八架包机离开了印尼。

德国外交部今天说，他定于星期天派遣一架大型包机前往印尼撤回德国公民。这家从德国航空公司包租的飞机将在新加坡接运德国人。

此外，数百名澳洲人今天从雅加达返回悉尼和珀斯等地，他们是乘坐澳洲政府派出的包机离开印尼的。

几百名香港居民今天也从雅加达飞抵香港。

5 月 18 日

学生继续示威 银业恢复营业

印尼多个城市的学生，包括雅加达、万隆、泗水、日惹等今日继续展开反政府的示威活动。

大约 5 万名学生聚集在万隆，游行到省议会，要求苏哈托下台。

在雅加达，3000 多名学生在由军队守卫的国会外挥舞玫瑰花，要求苏哈托总统辞职。

巴士和汽车满载学生离开大学校园，学生们一路高喊“自由”和“自由万岁”等口号。

数百名学生获准进入圆顶国会大厦的两道门，向印尼最高立宪机构——人民协商会议——递交请愿书，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以促请苏哈托辞职。

示威者之一、印尼大学教授哈托诺说：“现在是一个转折点，是印尼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数十名军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列队排在国会大厦前，不过，学生可以不受阻拦地进入国会。除进入国会大厦的数百名学生外，其余的人在外等候。

雅加达武装部队指挥部发布严厉警告说，在首都上星期发生抢劫和导致数百人丧生的暴乱之后，军方不允许任何人再制造任何暴力事件。

武装部队发言人纳赫维中校说：“我们将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所有的暴徒。

“如果进行暴力活动的是学生，我们不会把他们看成是学生，而是暴徒；如果搞破坏的讲师，我们也只会视他们为暴徒而不是讲师；我们也将以同样的

态度对待社团领袖。”

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普通市民今天聚集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举行反暴力的活动。他们把抢劫活动和谋杀行为归咎于身分不明的“支持苏哈托”的势力。

在中爪哇的日惹，也有数百人举行集会，要求苏哈托下台。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著名学者冒着被捕的危险，自愿加入示威的行列，公开要求苏哈托下台。

雅加达上星期发生暴乱时，各商业银行纷纷关门停业。今天第一天开始恢复营业时，每间银行外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在排队等候。

印尼中亚银行在雅加达市中心的分行外的6个自动提款机前，有大约1000人在排队。

今天才恢复营业的银行，只经营印尼盾的交易。顾客无法购买美元，因为印尼中亚银行昨天没有报外汇的兑换率。

该银行限制顾客一次只能用普通提款卡提取50万印尼盾，用优惠金卡提取100万印尼盾。

5月19日

雅城市民围国会 泗水学生再示威

印尼2万多名示威者，其中包括学生、德士司机和家庭主妇今天涌到雅加达市中心的国会大厦，要求总统苏哈托下台。

国会大厦的停车场内，不断有巴士把来自各所大学的学生送来。学生也在国会大厦主要建筑物外的巨型楼梯下，举行自由论坛。

发言的学生要求政府调查苏哈托的财富，并且把76岁的苏哈托控上法庭。

一名学生说：“我们的斗争已开始产生效果，我们将斗到苏哈托下台为止。”

一些学生还爬上楼高3层的主要建筑物，并且在二楼的阳台上摊开写着“打倒苏哈托”和“我们要求改革”等标语的布条。另一些学生则高喊口号和挥动写着反苏哈托字眼的布条。

这次的示威活动吸引了源源不绝的支持者，其中包括许多头戴传统回教头纱的妇女。

上述学生在国会大厦举行集会，要求苏哈托下台之际，电视台向全国现场

播映苏哈托接见9名回教领袖的实况。苏哈托在会谈时，心情似乎很轻松。不过，印尼第二大回教组织“穆罕默德传教会”主席莱士却没有在场。

总统府人士说，9名回教领袖向苏哈托转达了人民的愿望。

人们原本以为苏哈托会向全国发表谈话，但当电视屏幕播映他开始与回教领袖会谈时，声响就被切断，然后电视台就播映音乐节目。

一名领导医科学生示威的医生说：“我们不管苏哈托怎么说，我们就是要他下台。”

另一方面，印尼主要反对派领袖莱士今天在记者会上说，他对苏哈托的逐步改换领导层计划感到失望，因此他决按照原计划发动全国性的大示威。

他说：“苏哈托将会很快被击败，他不知道自己社会发生的事情。”

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市的多所大学今天举行反对苏哈托集会时，军方卡车驶向集会的人群，导致将近60人受伤。

目击者说，数以百计的学生和当地社团的成员坐在阿伊朗加大学西门外的马路上，这时一辆军队卡车驶入人群，显然是想驱散他们。参加集会的人坐在马路上，卡车速度很快地开到他们中间。那些受伤的人伤势都很重，都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伤者包括10名学生和20名其他人士。

一名学生说，泗水市八一七大学校外坐着许多参加集会的人，这时两辆军队卡车开进了人群，之后有28人被送往医院。

5月20日

戈尔卡强逼苏下台 日惹市示威50万众

国会议长哈莫可今天限定苏哈托总统最迟必须在明天辞职，如果苏哈托到时还未答复，国会领袖将在星期一训令各个政治派系筹备召开人民协商会议特别大会。

执政集团戈尔卡的国会议员领袖苏迪佐也表示，戈尔卡希望苏哈托辞职，该党议员也支持人民协商会议召开特别大会讨论要求苏哈托下台的建议。

与此同时，回教领袖莱士今晨在军方严厉警告后，通过电视台和电台力促支持者取消在雅加达举行的“人民力量”百万人大示威。呼吁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不要跟军队对抗，以免爆发更严重的暴力事件。

他说：“我们当今的斗争已奏效，因为学生、工人、家庭主妇和全体人民都认为苏哈托现在必须下台。我确信……他的日子屈指可数……我们国家如今的任务是用不流血的方式推翻苏哈托！”

美国、澳洲、英国和日本今天向印尼总统苏哈托发出明确信息：迅速抓紧时间进行政治改革。

美国呼吁印尼政府立即开始与人民进行对话，但却避免对苏哈托表示要下台的许诺予以置评。

澳洲外长唐纳则认为，苏哈托总统必须下台。唐纳说，拥有2亿人口的印尼，需要迅速过渡到新的领导层，以避免国内的局势动荡并恢复国家的经济。

英国呼吁印尼和平过渡，这表示伦敦支持印尼人民要求结束苏哈托政权。

日本外部今天说，它密切关注印尼的局势，并希望印尼的动乱不会导致流血。

在苏哈托的故乡日惹市有近50万印尼学生和民众今天走上文化古都的街头，举行规模盛大的反苏哈多统治的抗议游行，日惹苏丹也参加了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行动中。

日惹苏丹哈孟库布武诺向聚集在皇宫大厅及邻近广场的群众发言时高喊“改革万岁！改革还没有结束！”

除了日惹之外，印尼学生与群众今天也在万隆、梭罗、泗水、棉兰和巴东等城市举行大集会和抗议游行，但未发生暴力事件。

在西苏门答腊省巴东市，包括学生在内数以万计的人走上街头，并举行自由论坛。集会获市长慕奇理斯支持。他誓言：“我们将铲除西苏门答腊省互相勾结、贪污和裙带风等风气。”

5月21日

苏哈托被迫下台 哈比比誓言改革

32年前在动乱中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32年后也在动乱中下台。

今天上午10时苏哈托在独立宫向全国宣布辞职，由他亲自委任的副总统哈比比紧接着宣誓出任新总统。

苏哈托在辞职仪式上说：

“同胞们！我一直密切注意国家局势的最近发展，尤其留意人民要求改革国家生活所有方面的意愿。

我充分理解他们的意愿，并深信改革必须按部就班、以和平方式与遵照宪法来进行，同时维持国家的团结和推行发展，我曾打算设立改革理事会并改组内阁。

可是，今天的事实显示，改革理事会因缺乏足够支持，也就无法组成。

我认为改革理事会不是推行改革的最佳途径，因此不再改组内阁。

基于这种形势，我认为我很难执行身为国家统治者和推行国家发展的职责。鉴此，根据《1945 年宪法》第 8 条，并考虑国会及其派系领袖的意见，我决定于今天，即 1998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在我宣读这份声明时，辞去印尼总统的职位。

我辞去印尼共和国总统的辞函，也交给在场的国会领袖，他们也是人民协商会议的领袖。

依据《1945 年宪法》第 8 条的规定，副总统 B. J. 哈比比博士兼教授将在 1998 年至 2003 年本届总统任期剩余时期执行总统职权。

我感激人民在我领导国家期间给予的协助与支持，恳求人民原谅所犯的任何错误和缺点，并呼吁人民继续奉行《建国五大原则》(Pancasila) 和《1945 年宪法》。

从今天起，第 7 届发展内阁已成为看守内阁。对于我的部长们，我谨此表示谢忱。

由于局势不允许在国会大厦宣誓，副总统接任总统的宣誓仪式即刻举行，以免出现治国的权力真空。”

印尼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过后表明将捍卫苏哈托及其家人的“安全与名誉”，并表示支持 61 岁的哈比比出任新总统。

在过去 3 天里占据国会大厦的示威学生，今天在获知苏哈托下台的消息后，都欢呼雀跃。

哈比比就任总统后在今晚发表电视广播，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拥护，并保证将分阶段推行经济、政治和司法改革。

他说，他将改善印尼的政治面貌，成立一个没有贪污、勾结和裙带关系的廉洁政府。

他说，他将立即任命一个“专业、有献身精神和高度廉洁的内阁。我深明任重道远，如果要完成这些任务，社会各阶层的全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新内阁的主要任务是推动改革新进程。新进程将按部就班根据宪法进行。新内阁将检讨印尼严峻的反颠覆法令。印尼反对派一向抨击当局利用该法令压制政敌。

他保证消除垄断和不健康的竞争，和落实印尼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致的经济改革计划。

回教领袖莱士表示，要看到新总统哈比比公布内阁名单后，才决定是否要支持新政府。如果新政府由“以社会为重的诚实者”组成，他将支持新政府。

5月22日

新总统组内阁 维兰托维新政

新总统哈比比今天公布新内阁名单，不包括中央银行行长及总检察长在内，全体阁员共36人，半数以上是新面孔。

本届内阁罗致了两个反对党“建设统一党”和“印尼民主党”的多名成员参加，这是过去苏哈托时代所从未有过的。

上届内阁备受争议的部长如社会部长哈迪扬蒂（苏哈托的长女）、贸工部长郑建盛（木材大王）、文教部长阿里斯穆南达及多名部长都不再入阁。

被视为哈比比班底的人物，如同教知识分子协会秘书长萨索诺等人都入阁。新闻界出身、反对党国会议员哈扎哈兹被委以投资部长之职。

保持原职的阁员包括四名统筹部长，政治安全统筹部长仍是费沙尔，吉南加照旧担任财经工业统筹部长。外长阿拉达斯、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司法部长穆拉迪及矿务能源部长昆托罗等人也留任。

哈比比公布新内阁时，以15分钟时间念完整份名单。他显得有点失措的样子，多次念错阁员职位及名字，最后把日期1998年念成1992年，然后又马上更正。

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上将，今天呼吁反对派人士给予新政府一个机会，让它设法把国家从政治和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

维兰托说,他很清楚还是有人反对新总统哈比比在今天上午委任的新政府。

维兰托在哈比比宣布新内阁后告诉记者:“我认为我们应该结束那一切(动乱)。没有全体人民的协助,政府难以改善局势,因为国际信心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的。”

他呼吁学生们结束示威,回返校园上课。

他说:“在国家的层次上,局势是良好的。我预期学生们结束集体行动,回到校园上课。我想一切已成为过去。就让大家努力地尽快弥补所造成的破坏——实质的破坏,精神上的破坏。不管内阁有多完美,没有稳定,它是成不了气候的。稳定非常重要。但建立稳定不单单是印尼武装部队的工作,它也是人民的工作。”

他说,武装部队将支持新政府,让它有机会实施其政策。内阁将推出以国家安全为考虑,并把国家从眼前的局势中救出来的计划,我促请人民支持内阁。

5月23日

军队驱散学生 将军巩固军权

印尼军队今天在首都雅加达封锁了国会大厦和国家纪念碑,以阻止学生再举行反政府示威。

但有几百名学生在雅加达市的其他地方举行示威,要求新上任的总统哈比比下台。

在这之前数小时,荷枪实弹的军队开入被学生占据了五天的国会大厦,驱散 2000 名学生。

被派去守卫国会大厦大门的一名警官说:“政府给我的训令是,阻止任何人举行集会,阻止外人进入国会大厦园地。”

印尼学生被军队赶出国会大厦时,高喊:“我们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下午,200多名回教学生在东雅加达的印尼独立纪念碑前面举行反哈比比的和平集会。学生高喊“我们拒绝接受哈比比”和“把苏哈托提交审讯”的口号。

在雅加达中区,有500名中学生在印尼大学校园举行反哈比比的示威。

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将军今日对军方领导层进行闪电改组，包括撤换并调离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从而牢牢控制军权。

维兰托将军是在前总统苏哈托星期四被迫下台后的36个小时内采取这项改组行动。

据军方人士透露，普拉博沃中将在听到维兰托将军宣布把他调职的命令后，气得当场拔下胸前的多枚勋章，扔到维兰托将军的跟前。

维兰托将军今天在宣誓就任国防部长后对记者强调：“这不是一项突然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

他说：“将普拉博沃调职的原■，是他一向被委派进行从事主流的军务，从未在任何教育机关工作，这项调动是要给他充实专业上的经验。”

他也说，为了维护武装部队团结的形象，把普拉博沃中将调去担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这所学院位于雅加达东南 130 公里的西爪哇首府万隆。

5 月 24 日

高官家眷纷辞要职 新政企绝裙带贪污

总统哈比比的弟弟帆尼·哈比比今天辞去淡工业发展局局长的职务，以避免引起关于新政府搞裙带关系的指责。

帆尼发表简短声明说：“本人帆尼·哈比比已于星期六向印尼总统递交了辞去淡工业发展局局长职务的辞呈。”

帆尼说：“递交辞呈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我这样做是为了真正帮助当局清除政府内的裙带关系。”

他说：“作为总统的弟弟，我也有责任执行政府有关改革的任务。”

维兰托也说，其妻子和女儿已经辞去人民协商会议的职位，以设法杜绝靠裙带关系、贪污和朋党主义作风。

他说：“在这些不良风气的问题上，我的妻子和女儿在 5 月 23 日已经向人民协商会议的主席提出辞呈。”

印尼最年轻的议员莉莉埃克也宣布辞职，以支持政府杜绝互相勾结、贪污和靠裙带关系等歪风。据报道，28 岁的莉莉埃克是执政戈尔卡爪哇分部负责

人阿利普的女儿。她说，辞职是自愿的，并没有人向她施加任何压力。

印尼总统哈比比的长子伊尔汉也辞去他在研究与科技应用局的特别助理职。

5月25日

巴东学生占议会大厦 哈比比言称举行大选

约有5000名学生今天占据巴东的西苏门答腊省议会大厦，要求哈比比总统撤消土地事务部长杜林的任命。

印尼回教行动团结协会西苏门答腊分会会长穆斯里亚迪说：“杜林从1987年到1997年担任西苏门答腊省省长期间，因为贪污及专搞官商勾结和裙带关系而名誉败坏。”

巴东各大专学府多达5000名学生，聚集在西苏门答腊省议会大厦。他们举出杜林及其家庭成员的广泛商业利益为例，证明他不是担任部长的适当人选。学生也指杜林本人同若干贪污案有关。

示威学生也要求省议会议长帕蒙查以西苏门答腊省人民的名义发表声明，要求哈比比取消杜林的任命。

哈比比上星期五公布新内阁时，杜林受委为土地事务部长，同时兼任土地局局长。

总统哈比比今天表示，他将尽快举行国会选举，并赞同今后的总统只限两任。

哈比比承认公众对他从苏哈多手中接管政权的做法感到不安，因此他表示，需要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发言人阿卡巴说，哈比比总统表示，政府准备尽快举行大选，这意味着修订后的法令正式实施之后就可举行大选。

今日，哈比比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在政治领域，有关设立人民协商会议和国会的选举机制，应当进行更新。修订过的法令应当加强政党及其他政治组织的作用，准许成立新政党，并鼓励人民积极参与政治。

他认为，应当反映和满足人民的愿望。他以那些限制政治活动的法令为例说，政府将在不久之后检讨这些法令。“我知道，在社会上，现任政府的合法

性还是受到质疑。”他呼吁部长接受这个事实。

他指出，政府要修改的法令包括限制总统的连任次数。为了面对今后日益复杂的挑战，是有必要对总统的连任次数取得共识，每位总统顶多只可当两任。

哈比比也说，政府将设法拟定涉及经济、司法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议程。

哈比比今天还赦免了两名著名的政治犯宾坦·帕蒙卡斯和穆塔·帕克帕汉。司法部长穆拉迪在哈比比内阁的首次会议后说：“我们现在决定赦免并且撤销帕蒙卡斯和帕克帕汉的罪行。”

身为独立工会组织领袖的帕克帕汉，由于在北苏门答腊煽动暴动的罪名成立，而在1996年5月间被判入狱4年。帕蒙卡斯则是不受承认政党“印尼民主联盟党”的主席。他由于在德国发表演讲时，侮辱当时的总统苏哈多而同样在1996年5月间被判入狱34个月。

5月26日

哈比比：建设新印尼 麦柯里：企盼新进展

新总统哈比比今天巡视雅加达华人区时表示，他决心建设一个没有种族主义的新印尼。

哈比比说：“在印尼，我们不承认人民当中有种族或宗教之分。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

哈比比的车队经过雅加达街道时，他向夹道欢迎的数以千计市民挥手致意，并对他们说：“我们誓言，我们将给予充分关注，齐心协力解决这个问题。”

他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并鼓励他们组织警卫团进行自卫。他说：“大家要勇敢。你们可以靠组织警卫团进行自卫，当然武装部队是会保护你们的。”

印尼五位著名改革派人物今天说，哈比比总统今日表明支持全面的政治改革，并赞同寻求外国专家的协助来进行行政改。

他们是在总统府与哈比比举行会谈后在记者会上说，哈比比总统表示，印尼需要向菲律宾、泰国和韩国学习怎样开放政治，以及怎样克服在改革运动中遇到的问题。

这些改革派人物也要求哈比比公布新大选的时间表。不过,政府发言人说,政府必须在完成全面政治改革和拟定新选举法令之后,才能决定确实的大选日期。

上述改革派人物,其中包括曾担任财长,并在今年初向苏哈托挑战,寻求提名竞选总统失败的恩米尔,他说:“我们需要大选的确实日期,只是说大选将尽快举行是不足够的。”

在华盛顿,白宫新闻秘书麦柯里今天说,白宫欢迎印尼新总统哈比比宣布要举行大选的声明。

麦柯里说:“美国政府急欲看到印尼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所将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印尼领袖和人民正把重点放在能够深化民主的过渡进程中,我们认为这是令人鼓舞的。”

麦柯里也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恢复向印尼发放贷款,将取决于它的政治改革进展而定。他说:“我们希望看到印尼取得经济和政治进展,因为这两者将奠下长期稳定的基石。”

5月27日

苏岛暴民又烧华人店 总统下令重建旧城区

北苏门答腊南部距离棉兰约150公里的丹戎巴来亚沙汗,今天下午发生暴乱,许多华人开设的商店和椰油厂等都遭到暴民烧毁。

丹戎巴来亚沙汗是个港市,居民多以捕鱼为生。当地华人相当多,占了镇上人口的30%。暴动从27日下午2时30分开始,暴民到处狂烧椰油厂、商店、车辆和打劫,一直到当天午夜,还没有平息下来。

暴乱是由一名当地擦鞋童和华人小孩吵架所引起的,当地原住民在为这件事情召开会议后,便四处抢劫和烧车。

这是印尼自前总统苏哈托上周下台以来,发生的首起暴动。

总统哈比比今天下令政府对本月暴乱时被破坏的首都及其他城市的部分地区进行重建。

合作社部长萨索诺对记者说,政府将设法争取外国资助重建经费。哈比比是在亲自巡视遭受破坏的地区之后下达这道命令的。

政府官员说，在暴乱中有5000多座房屋和建筑物遭破坏。这次的暴乱也造成500多人丧命。政府还没有公布确实的损失数字。

司法部长穆拉迪今天说，哈比比总统领导的新政府将在今天释放五名政治犯。政府还将释放更多的政治犯，但不会释放与1965年共党政变事件有关的人士、刑事犯以及那些企图改变国家意识形态的人。

5月28日

林绍良银行被监管 大学生不要哈比比

印尼中央银行行长夏赫理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中亚银行因为出现过度挤提现象，已经被政府监管。印尼富商林绍良是该银行的最大股东。

夏赫理说：“从今天开始，印尼中央银行决定让印尼银行重组局监管中亚银行。”

他指出，央行是在它给中亚银行提供的信贷已经超出其缴足资本的200%后，决定采取这项措施的。

他说：“最近发生的事件导致一些银行办事处受到破坏和关闭。自从5月18日开始，中亚银行就出现过度挤提的情况。挤提情况在过去几天尤其严重，给中亚银行造成了严重的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别无选择，只能作出由印尼银行重组局监管中亚银行的决定。”

中亚银行是印尼最大的私营银行。华裔富商林绍良的三林集团拥有该行的70%股权，是最大股东。截至1997年12月底为止，中亚的总资产为52万6000亿盾，超过50亿美元。

数百名雅加达和周边地区的学生今天在国会大厦举行集会，要求哈比比总统下台并成立人民委员会以取代国会。

40多所大学的大约700名学生在国会大厦外示威。哈比比及数名部长同国会领袖当时正在开会。

学生无法进入国会。他们在上锁的大门外悬挂红底白字标语：“组织独立机构：印尼人民委员会”。

学生领袖说，该委员会应该在总统选举前的过渡期取代国会和执政者。哈比比已承诺，印尼总统选举将在 1999 年举行。

22 岁的国立回教学院学生布尔汉说：“我们不再承认现有的印尼立法委员会，所以我们想出成立印尼人民委员会（KRI）的概念，这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布尔汉说，各界人士都可加入委员会，包括武装部队人员。“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必须不能有贪污、勾结和裙带作风的弊病。”

另一名学生头系红布条，上面写着：“不要苏哈托，不要哈比比”。他争辩说，哈比比曾效命于苏哈托，因此不能当国家的领袖。

同日，总统哈比比和国会领袖表示，只要完成制定政治改革法律的工作，他们计划在 1999 年举行大选。

是日，在西苏门答腊省，数百名学生举行群众大会，要求将省长和巴东市长停职，他们指责这两人进行贿赂。

大约 500 名学生在省首府巴东检察长的办事处示威，迫使高级检察官苏巴迪停止这两个人的职位，学生指这两名官员去年底花钱买通官路。苏巴迪接受学生的要求，于今晚致函检察长，正式请求将他们停职。

5 月 29 日

苏哈托子女辞要职 新政府权力将下放

在印尼社会各界纷纷要求调查苏哈多家族的商业王国声中，苏哈托的儿子和女婿今天辞去在比曼塔拉集团（Bimantara Citra）担任的要职，此举显然是为了保存这家公司，使它不会在日益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交出资产。

苏哈托的次子班邦今日辞去比曼塔拉集团的主席职，而娶苏哈多长女哈迪扬蒂的因德拉鲁马纳也辞去总裁职。

比曼塔拉的新任总裁罗萨诺（班邦的同学）说，该公司前董事萨比已受委为主席。罗萨诺说：“班邦认为，他无法保持公司业绩，尤其是在去年。我们的盈利猛跌到仅赚 110 亿盾（1603 万新元）。”

印尼一名部长今日说，新政府已下令前总统苏哈托的儿子胡托莫控制的丁香垄断机构所收到的钱，悉数退还给农民。他已指示一个乡镇级的合作社介入

调查该机构向农民合作社收取押底金的问题。

印尼财经工业统筹部长吉南加今天向外界透露，印尼新政府已决定简化办事程序，并减少官僚作风，以吸引投资商回返印尼。

他说：“我们大部分的资本都已流失到海外……因此我们有必要简化发出准证的程序，并且为投资商提供优惠条件，使他们愿意在这里投资。”

投资部长哈扎哈兹说，款额不超过 1 亿美元（约 1 亿 6500 万新元）的海外投资，今后只需经过他一个人的批准。在过去，海外投资都必须通过总统。

哈扎哈兹说：“权力下放将能够减少官僚作风，同时加速批准海外投资计划的程序。省级投资协调局现在也有权批准 100 万美元（约 165 万新元）以下的国内投资。”

5 月 30 日

吉南加：保华人安全 奈斯：经济负增长

印尼财经工业统筹部长吉南加今天说，印尼将确保印尼华人的安全，但排除提供财援以协助他们应付惨重损失的可能性。

吉南加说：“他们需要的是安全和被当作印尼人的保证——这我们可以担保。不过他们不能期望从预算中获取财政援助，因为我们的预算案需要审查，看它是否能应付所有的目标。”

在雅加达暴乱期间，多半由华人拥有的商店和公司被暴民洗劫和纵火，而许多逃离印尼的人表示不敢回印尼重新开业。

吉南加说，印尼华人以前曾显示他们有克服困难的能力。华人通常可以自己克服困难，他们有自己的网络。我们鼓励他们重新开业。我们将让他们更容易更新准证。当然，他们可以向银行贷款。

他强调，印尼对所有种族一视同仁。这是政府的政策，我们将清楚表明这个政策将会落实。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区主任奈斯今天在结束对雅加达为期五天的考察时说，今年印尼的经济可能出现 10% 负增长，因此他认为再拖延给予雅加达援

助，可能导致印尼的经济陷入更大困境。

但奈斯说：“是否恢复对印尼发放贷款，不是由我来决定，必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局决定。”

不过他认为，随着印尼的经济迅速恶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局将会尽快采取行动，因为每拖多一星期，印尼将更加困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4月与印尼达致的协议，严厉限定雅加达必须在几年内完成各种改革计划，包括结束垄断和实行其他经济改革，以及逐步取消政府的津贴。

5月31日

老将吁哈下台 “三反”漫延全国

印尼18名退伍将领今天呼吁新总统哈比比下台，而另选一人暂时行使总统职权。

在东爪哇省首府泗水，成千上万名回教徒今天聚集在该省武装部队司令部前的空地上举行晨祷仪式时，要求政府进行改革。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改革必须继续”、“改革不只是更换掌权者”、“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

这18名退伍将军发表声明说，应当最迟在7月之前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以撤消对哈比比的授权。声明否定了众议院和政府上星期达致的协议。根据这项协议，人民协商会议特别会议将在6个月之内召开。

退伍将军的声明说，人民协商会议应当立即选举一位临时总统来处理国家政务。声明说，苏哈托5月21日把总统授权移交给哈比比的作法是错误的。

哈比比誓言要在制订了新的、有更多自由的选举法之后，在明年的某个时间举行新的选举，以改变批评人士关于他和苏哈托关系过于密切，因此应当下台的说法。

印尼学生提出的反贪污、反官商勾结及反朋党关系的要求，现正转化为全国性的“三反运动”，今日各报章热烈报道及评论与该运动的消息。

同时，一群著名法律学家、新闻工作者、经济观察家及社会要员，已成立了一个称为“民间关心国家财富运动理事会”的组织，协助政府追查由于贪污、官商勾结及裙带关系而失去的国家财富。

该理事会将收集苏哈托执政时期或以后官员通过贪污、官商勾结或朋党关系敛积财富的资料，然后交给检察官处理，理事会也欢迎公众举报。

树难静 风未止

——五月骚乱后华人遭遇月历（7—12月）

夏春平

7月

强暴事件续发生 华人再掀逃亡潮 排华组织散传单 郭氏庄园遭抢掠

印尼“妇女急难中心”成员达妮本月初指出，在五月暴动后，强暴事件仍持续发生，而且不限于雅加达市，目前该组织接获消息，已有九件案例发生，但详细情形仍在做深入查证。

达妮表示，强暴事件确实仍持续发生，从五月暴动后到七月初，该中心就已接获当事人及非当事人传来消息，在华人聚集极多的棉兰地区，已有九件强暴及轮奸案发生，其中一件是发生在一位十二岁女孩身上，手段十分残酷。

万隆一名华裔女大学生本月24日傍晚，从学校乘公共汽车回家途中，遭暴徒强行拖下车，然后当众强奸。消息人士声称，事件证明万隆排华团体上周发出的“来吧！我们烧焦支那”恫吓传单，并非纯属危言耸听。

过去两个月，雅加达和中爪哇一些城市，都传出有华裔妇女在当地出现排华传单后不久被暴徒强奸。

强暴案发生地点包括雅加达、泗水、万隆、棉兰、梭罗等六个城市。

强暴案的不断发生令许多华人妇女深陷不安，不少人不惜花十万印尼盾（美金七元五角）购买贞操带，以求自保。生产贞操带的商人说，五月发生暴动后，迄今已售出500多套，在此之前，生意非常清淡，乏人问津。

贞操带是由人造皮与不锈钢所制，并附有号码锁，灵感来自於维多利亚时代的贞操带。生产此种装备的万隆商人桑加亚说：“五月暴动时，传出不少如

女被强暴的消息后，许多妇女（几乎都是华人）陆续到我的店买贞操带。”

印尼第二大城泗水本月又爆发多起暴民恫吓、洗劫华商店、农场的暴力事件，当地华裔担心可能出现新一波暴动，再度成为暴民泄愤的对象，纷纷出国避难。这也是继五月暴动之后，华裔爆发第二波逃亡潮。

本月逃离泗水的华裔不断增加，仅17日就有三百多名华裔涌入泗水港，乘船出走，其中一艘船远赴数千公里之外的香港，而华裔在泗水开设的店本月也多半关门停业。

在泗水附近的任抹，华商店、仓库与农庄一连几天又遭到暴民洗劫，数百名暴民（其中还有妇女和孩童）涌入稻田与养虾场大肆劫掠，甚至把栽种面积广达十公顷，还未成熟的咖啡豆采摘精光。

而据7月份的一期《事实周刊》统计数字显示，自5月中旬暴乱发生至7月，已有大约11万华人离开了印尼。

继泗水之后，万隆于7月20日左右亦流传一些排华传单，由一个自称为“万隆排支那群体”的组织署名，内容更呼吁人们把握现时武装部队袖手旁观的时机，煽动更多排华分子袭击和杀害华人，同时抢掠他们的财物。

以下是万隆排华组织散发的传单：

来吧，我们烧焦万隆的支那（华人）！

来吧，乞丐地痞们、三轮车夫及普罗大众，想想你们的命运，想一想在大门敞开的时刻，我们将采取什么行动，这期待已久的机会。

不要让黄金机会流逝，武装部队总是怂恿我们杀尽支那，并袖手旁观。为此，我们应利用此机会，引出尽可能多的人群，袭击万隆所有地区支那人的生命财产。

瞧吧！（万隆的）支那仍然自由自在地处理外出！瞧吧！他们设宴婚礼，大吃大喝，然而我们却在贫困中。

不要怕任何人，包括武装部队。由于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怯弱的武装部队根本无可奈何。

来吧！抓住任何机会，把华人房屋、财产和地区给予标记，一旦行动开始，在武装部队未到之前，我们已完成抢掠的行动。

万隆排支那群体

万隆近年曾爆发过排华骚乱，惟五月骚乱中未有严重遭殃，故一些恐吓传单，便扬言万隆断无幸免之理。万隆大部分华人对恐吓以暴乱都无可奈何，唯

有将自己关在家中不敢出来。有少数华人听闻少数民族较多的加里曼丹岛局势比较平静，所以到那里避难。

居住在雅加达的华人林先生说，近来他们也经常收到恐吓信及传真，在十数天前，便有一间华人商店的老板收到恐吓勒索信，要他将一笔巨额现金放进一个箱里，否则对他的儿女不利。

在西苏门答腊以北 180 公里，约有 300 名基纳利人在 7 月 14 日冲破警方防线，闯入属于大马华裔富商郭鹤年在印尼所拥有的桑加古纳公司的油棕园抢掠熟棕油籽，以磨制成油供食用。

基纳利超过 6 万公顷土地在军方和政府的支持下被强行接管，当地人更不满占用他们超过 900 公顷土地的特里桑加古纳公司赔偿不足，于 7 月 7 日向巴东地方议会反映，但当局及有关公司反应冷淡。由于基纳利人得不到满意的答复，遂于 14 日在极度愤怒下，冲破警方防线闯入华裔郭鹤年拥有的公司 8400 公顷的油棕园，掠夺成熟的棕油籽。

8 月

三宝垄华人住家涂标记 整顿金融华人大亨遭殃

雅加达及中爪哇省会三宝垄当局已经动员市民“社区守望”，以因应在十七日独立纪念日可能再次发生暴乱的威胁。在三宝垄，华人商家店面被人涂抹标记，疑为暴徒攻击的先兆，使华人普遍心生恐惧。

爪哇中区司令苏达托少将说，军方查获的计划显示，八月十四日至十七日之间在中爪哇首府三宝垄将有示威活动。

在三宝垄，华人住家与商店被不明人士画上可能成为暴乱攻击目标的标记，军方呼吁华人不要紧张。

三宝垄华人住家被涂上三角形标记，可能是暴民劫掠的目标，涂上圆圈标记即表示该户有妇女，可能是被强暴的对象。

8 月 17 日是印尼国庆，由于谣传当天各地将发生暴动，许多华人纷纷在此

之前出国和住进旅馆，17日之前的一周间，从雅加达起飞的客机班班客满，旅客多半是华人。

约有 5000 名暴徒 8 月 12 日晚在西爪哇西冷镇（Sereng）附近锡勒贡（Cilegon）工业中心的一个夜生活区大肆掠夺。当天下午，数百名暴徒也在西爪哇拉布安镇（Labuan）掠夺三家售卖粮食和日用品的华人商店。

经历过印尼雅加达发生的暴动事件后，位于棉兰的印尼华裔开始面对当地人士的排斥。印尼华裔若在公众场所使用华语或其他方言交谈，将随时面对当地人的殴打。

此外，在棉兰驾驶“嘟嘟车”的司机也扬言，专抢印尼华裔乘客的财物。本月上旬一华裔女子刚从银行取出 1000 万盾准备乘搭“嘟嘟车”回家时，却遭司机抢走其中 8000 盾，该名司机并向她表示，他们（司机）将抢华裔值钱的东西。

居住在印尼中爪哇宁静滨海城市北加浪岸的华裔民众虽然在五月暴动中躲过一劫，本月近来却面对祖坟遭到劫掠的另一种攻击，近 300 座华人祖坟遭刨空。

领导一个基金会协助处理该市殡葬事宜的达苏基说，华裔占此地人口约百分之十，“民间无法阻止这种事，唯有靠政府。”他说郊区沿路边的 12 公顷古里邦华人墓园遭人亵渎。

住在路边破房的居民指出，约 300 座被挖空的土冢，里面的棺木尽遭破坏，尸骨尸衣散落，墓碑被污损。其中一块涂写“中国猪”的蔑语，另一块被以红漆涂上“慕沙帮”的字眼。

达苏基 8 月 8 日曾向警方及当地政府提出 268 座坟墓被盗的报告说，被盗的多是较古老的祖坟，新坟大多完好，但华人社区仍受到极深的伤害。

报告说，上等贵重的华人柚木棺材价值达 800 美元一副，歹徒在大白天公然运走尚未打开的棺木。

西爪哇南部城市芝拉扎的渔港 28 日下午发生骚乱，暴民放火烧毁 5 艘以上的拖网渔船及多辆小型货车，另有电单车被丢进海中。据了解，被烧毁的渔船多数属于来自巴眼阿比的华裔。

印尼政府本月开始整顿国内银行体系，主要的作法是将一些银行收归国有化，同时通知将被国有化的银行在 9 月 21 日前偿还较早时向政府借贷的紧急贷款，否则就将采取刑事诉讼的手段。

在这些新的措施之下，印尼华裔大亨林绍良、郑建盛、饶耀武及林德祥等人所控制的银行都遭受波及，这些在前总统苏哈托时代崛起的大型财团也面临被折散或解体的命运。

印尼之所以采取行动整顿银行，其中一个主要目的是想追回大量借贷给前总统苏哈托及其亲友的借款。

8月21日，印尼政府接管规模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中亚银行”，导致林绍良家族丧失对“中亚银行”的控制权；印尼的一些观察家指出，林绍良所控制的三林集团亦面临相当的难题，可能必须让出相当的股份给印尼政府，以求能够生存。他们表示，“三林集团如果想要在印尼继续经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求存，而不是计较规模大小，否则将面临解体的下场”。

同样是苏哈托密友，也是其高尔夫球友的华裔木业大亨郑建盛，很可能也被迫必须将其“普通国民银行”的股权让与政府。1931年出生于三宝瓏，今年67岁的郑建盛以经营木业致富，控制博哈山及巴斯奥巴迪两大集团，苏哈托在5月21日下台之前，郑建盛担任印尼内阁的贸工部长，哈比比继任上台之后立即将其免职，郑建盛随后在7月初因担任印尼三夹板同业公会理事长期间收费运用问题，被调查该案的小组传讯并限制出境。

另外，饶耀武家族拥有股份有限公司的印尼金融银行，PDFCI银行及皇冠银行也都在整顿中受到波及。

另外一个被迫关闭的银行，是盖亚通葛集团首脑林德祥所控制的印尼国民贸易银行。林德祥的事业涉及石化业及轮胎制造，亦为印尼华裔中相当有实力的人物。

9月

齐亚中爪廖内骚乱 16万华人避乱海岛

8月2日，亚齐发生的骚乱蔓延到东亚齐县时，当地华人商店及寺庙遭到破坏、抢劫及纵火。

据《独立报》报道，东亚齐县首府伊迪列越镇前天遭到暴民袭击，当地华

人商店受到破坏、抢劫及放火烧毁，暴民甚至焚烧华人寺庙。

暴乱是于下午一时半开始，该镇气氛紧张，起火的建筑物浓烟笼罩全镇，居民不敢外出。伊迪列越镇至少有 12 家华人商店遭殃。

一连两天发生严重骚乱的司马威市，至 3 日为止商业活动未恢复，被破坏及烧毁的商店及其他建筑物计数百家。成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华裔居民大部分逃离所居住的店屋，当地一些旅馆也成为暂时避难所。由于有人在暴乱中被军警打死，暴乱可能再发生的谣言一日数起。

中爪哇省一城市 9 月 7 日发生暴动。当地居民和警方说，好几千名暴民上街滋事，烧毁和掠夺华裔的商店。

警方说，暴民在距离雅加达东南部 350 公里的加布棉市烧毁了 9 家商店，另外还有多家商店遭到破坏。暴动是由于一名当地人同一名华商店主殴斗所引发的。

号称世界三大渔港之一的印尼廖内省市镇巴眼亚比 15 日晚发生浩劫，数千名暴民抢劫与纵火烧毁了镇上 500 多家华人商店及住宅，使市内主要商业区几乎全毁。

管辖该镇的邻镇朋加力斯警长鲁德尔对传媒说，暴动是由于一起交通事故引起的，一名华裔与印尼土著青年因事故而发生冲突。该名土著青年被华人打伤送院急救后，竟有人谣传该名土著青年已在医院死亡。

据本月印尼的《巴里邮报》报道，已有 16 万华人由印尼各地逃到巴里岛避难，由于巴里是著名旅游区亦是印尼吸纳外资的重要经济命脉，印尼政府十分注重其治安，所以华人均认为巴里岛是最安全的地方。大部分逃到巴里的华人已在当地买地建屋，准备再建家园，而当地的地产价格亦因此急升一倍，由原本每平方米 3000 万印尼盾升至 6000 万。

10 月

华裔义工作证前遭奸杀 暴乱又起华裔再成箭靶

一位参加调查印尼 5 月暴动中华裔妇女遭集体强奸事件的 18 岁华裔女性义

工伊塔·马笛安那（中文名字叫王静丽），本月9日下午被发现在寓所被人奸杀。令她的同事及家人极为震惊。她惨遭杀害的原因，很可能与参加志愿调查工作有关。《华声月报》1999年1月号将其列为1998年港澳台和海外华人社区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伊塔的死状甚惨，不但身首异处，腹部、胸口、心窝及手臂都遭利刃反覆刺戮。

伊塔属于“人道自愿工作队”成员，该组织自6月起就开始对5月暴乱中所发生华裔妇女遭集体强暴事件进行调查，伊塔则和母亲戴雯积极投入工作，辅导遭强暴的华裔妇女。伊塔的父亲是一位王姓华商（印尼名李奥），在雅加达东区经营家具生意。据悉，死者及其母亲原定于几日后陪同4名强奸受害者前往美国作证，不料竟遭横祸。

黑色5月暴乱后，在中爪哇城镇如梭罗及北加浪岸等地发生的数百座华人祖坟被盗掘事件，本月已蔓延至西爪哇或雅加达附近市镇。

距离雅加达约70公里的茂物县卡东山及芝库巴等地华人祖坟遭人盗掘，已受到传媒极大关注，发行量最大的《罗盘报》于头版报道该事，引起华人社会极大震撼。

该报说，单在茂物县就有100座华祖坟被人盗掘，歹徒的目的是要偷窃死者的陪葬首饰，被盗掘的大部分是20年以上的旧坟，而且多数是男女合葬的双人坟。最近10年来，雅加达甚多华人把先人遗体埋葬在茂物县。

印尼北部亚齐省、中爪哇与东部的龙目省等地于8月下旬纷传暴动，其中，亚齐省爆发五月以来规模最大的暴动，约有数千名暴民集中在北部城镇，向华人商店丢掷石块、纵火焚烧旅馆，当局出动军警对空鸣枪警告，并发射催泪瓦斯加以驱散。

在苏门答腊最北端的亚齐省，当局为了展示修好的诚意，决定自该省撤出六百多名部队，当军警列队参加撤离仪式时，若干围观者对著军用卡车丢掷石块并大骂士兵“猪狗不如”，随即将攻击矛头指向店家与旅馆，其中不少是华裔商家。

数以百计的印尼人29日在位于雅加达东南200公里的尖米士镇暴动，以石头攻击华人的商店和住宅，原因是他们不满一所华人住宅充作基督教徒礼拜的场所。暴民在尖米士攻击至少10间商店和住宅，一名华族男子也被殴打。

11月

雅城情势紧绷 扬言追杀华人老板 教派冲突酿暴 暴民高喊杀死华人

首都雅加达的情势紧绷，14日已有大批自外岛来的群众进入雅加达，并且四处宣称印尼之所以会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华人惹的祸，让人担心类似五月暴动中烧、抢华人商店的惨痛经历又将再现。

印尼总统哈比比则在14日晚的一项广播中表示，他已下令国防部长暨武装部队司令威兰托，立刻对任何制造骚乱企业破坏人民协商会议决议及推翻合法政府者，采取坚定的行动。

月初，华人聚居的老巴刹地区，已经开始发生遭群众丢掷石块并焚烧商店的情形。军警虽将大多数通往华人区的街道封闭，但是由於雅加达大街小巷甚为繁复，实际上很难作万全的保护，几乎所有的华人商店都已关门、暂停营业，华人自行组成的自卫队及民防团也都已开始部署、巡逻，用“自力救济”的方式以求自保。

在经过一整夜的警民冲突后，15日情势已经缓和，这次暴动比五月暴动小，虽有零星华人遭攻击，但情况并不严重。不过，华人社区不断有人散发“干掉印尼廿七位华裔老板”的追杀令传单，使得华人圈人心惶惶，战战兢兢。

雅加达又于22日爆发回教徒与基督徒间的严重冲突，并演变成暴动，至少造成6人死亡、15人受伤，有十几座基督教堂及无数建筑物被焚毁，冲突地点主要是在华埠地区，暴民被军警发射催泪弹及对空鸣枪驱散后，流窜到其它地方继续暴动，入夜后方才止歇。

印尼军方说，未经证实的谣言指基督徒之前被华人收买，攻击一座回教清真寺，回教徒遂忿怒而报复。但有另外一个说法指出，冲突起因是回教徒要求基督徒经营的赌馆在回教清真寺进行晚祷时暂停营业，但基督徒置之不理，两派人马早上起就开始在雅加达北区械斗，随后演成扩及全市的暴动。

印尼政府23日出动大批军警、发射催泪弹及对空鸣枪以驱散暴民，但暴民四处流窜，雅加达中区及北区几处少数族群集中的社区遭到暴民放火洗劫，包括华人社区。

在冲突稍微平静，回教暴民推出首脑与军警谈判时，曾有大批暴民静坐在华埠大街上，高唱回教祈祷歌曲。目击者说，有暴民高喊“杀死华人”，并攻击华人的店和住宅，放火焚烧一家华人学校，华人拿出棍棒和刀了自卫，并以路障堵住进出的巷弄，保护家园。

印尼两亿两百万人口中，回教徒占九成，而华人占不到5%，但主宰大部份的经济活动，引起极少数回民的眼红，因此印尼每次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暴民往往藉机宣泄他们的反华人情绪，将华人当成主要的攻击目标。

12月

雅城华人区气氛紧张 店铺住所遭鱼池之殃

雅加达华人区7日晚又出现紧张气氛，近千名群众包围及破坏五角桥地带的一名华裔成衣商佐尼的住宅，在骚乱中滋事群众砸毁4辆汽车及一辆电车，附近多家华人住所也遭鱼池之殃。

事件起因是佐尼的家人与当地原住民青年普拉益诺发生纠纷，并用武士刀把普拉益诺刺伤。事件传出后，大批群众涌至出事地点闹事。当局立即派出装甲车和机动警察及海军陆队等部队至现场镇压。

当军警把佐尼及其家人带走时，引起群众一阵骚动，纷纷以石块攻击军警车辆，但未造成任何伤亡。不过，邻近的华裔居民急忙疏散至其他安全地区，有关暴乱将发生的谣言传遍整个华人区。

雅加达军分部指挥官苏利安托中校及当地警布拉多波中校都亲到现场，指挥军警维持秩序，直至深夜才把群众驱散。

15日，雅加达又发生暴乱，当地华人再次成为被攻击目标。在雅加达以东，有1000名示威学生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期间，千多名暴徒在邻近店铺四处抢掠，他们同时高喊“焚烧华人店铺”等排华口号。

在雅加达以东的撒玛连达，当地的华人店铺受到1500百名暴徒的抢掠。一名路透社的电影摄影师，在拍摄暴动期间被警察要胁，要他停止拍摄，

否则就将他的摄影机打碎。

另外有200名示威学生成功闯入雅加达市中心的总统府，他们高叫要现政府下台的口号。

另外在雅加达市郊，亦有学生进行零散示威。同时由于暴徒抢掠示威关系，进出雅加达交通曾经一度陷于瘫痪。

亲历亲闻篇

淌血的五月

寒 川

一段30年的空白之后，从1995年到1998年，印华文坛所展现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印华作家通过种种渠道，3年来共出版了20多本个人专集或合著，较诸过去30年所出版的总数还要多；印华作家也多次出席国际性或区域性文学会议。正当印华作家正逐步走向世华文坛时，今年5月间印尼雅加达及其他大城市连续发生的严重暴乱，却再次把印华文坛推入绝境。

情势万分危急

5月6日，我收到棉兰石姓文友的长途电话，告诉我暴徒已经一连三夜，“迅速的、残酷的，彻底的摧毁棉兰及其附近地区华人的经济！”翌日上午，他把暴乱的情况传真给我，要我转交报章刊载，为“他们这数十万无辜的孤立无援、束手待毙的华人给予人道上、道义上的声援。”

他还在信末写道：“情势万分危急！”

我当然为文友、为广大无辜华裔的安全而忧心忡忡。在《联合晚报》新闻版任职的朋友仗义相助，他把传真给如实刊载了！

当晚，我拨了长途电话到棉兰，几次都无人接。试着拨电话到雅加达给袁霓（《花梦》短篇小说集的作者）文友，谈起棉兰局势，彼此还天真地认定雅加达乃各国外交使节办事处，谅必安全，不会有事！

岂知，一个星期后，雅加达传来了以华裔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大暴乱。不只房屋被烧毁，财物受洗劫一空；更严重的是：1200多人丧命，168位华裔妇女被强暴，其中20位甚至被奸杀。许多华裔为了人身安全，只好忍痛抛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家园和事业，纷纷逃到国外避难。

强暴华裔妇女

5月16日下午，在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会议室里，正当一群文友为锡山文艺中心出版的《锡山》革新号欢呼时，家里打来了紧急电话，告诉我两组亲戚，

合共 20 多人逃难到新加坡来了！

从亲人口中，才知道暴乱远比报章上的报道来得更可怕、更严重。例如：妇女在亲人面前当街被轮奸，丈夫后来也被活活打死。以后，印尼文友也来电谈及最人神共愤的，莫过于一名 9 岁的女孩被强暴后，她的阴部被暴徒狠狠的切除，最后死于医院里的悲惨事件；被强暴的女性，甚至包括 55 岁的老妇。

由于印尼政府的推诿、犯罪团体的恐吓，以及受害人难以启齿等因素，被奸污的华裔妇女的确切数字根本无法统计。有人权组织指出，正确的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以后数日，家里的电话频频作响。从印尼打来的，是亲朋戚友询问此地大众传播媒介如何报道印尼大暴乱。原来，当地新闻封锁，他们并不知道局势的发展。我也不时拨电话给印尼文友，借以了解他们的最新状况。

女作家逃难记

在盛传大屠杀即将来临的 5 月 20 日清晨，雅加达文友谢梦涵（诗集《三人行》、《沙漠上的绿洲》[16 人合集] 与《翡翠带上》[30 人合集] 作者之一）带着三个女儿，身心交瘁地逃难到新加坡来了。她们是在 19 日清晨，冒险赶往国际机场（白天，通往机场的道路均由暴徒占据），在水泄不通的机场苦等了 20 个小时之后，好不容易才买到机票，而在凌晨 3 时飞抵新加坡。在新加坡诗人秦林载来我家之前的那几个小时，母女四人累得睡在机场的沙发椅上。那天，在我家用过早餐后，上午 8 时多，她的三个女儿倒头一睡，直到晚上 8 时多才起身。

她们真的是太累了！

5 月 20 日下午，袁霓的电话也来了。她和两个女儿买到飞往巴淡岛的机票，再从巴淡岛乘搭渡轮，成功地过来新加坡。她的先生却只能买到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机票，将从吉隆坡乘搭长途巴士南下，会在晚上抵达新加坡，一家团聚。

这是两位雅加达女作家的逃难经过。毋庸置疑，她们在逃难过程中，身心所蒙受的那一种痛苦和折磨，相信是外人所无法体会到的。

即使靠近新加坡，传为“安全”的廖内群岛，住在该处的巴莱诗人北雁

(《新荷》、《翡翠带上》合集作者之一),也把妻女送来新加坡!“外传巴淡、巴莱也会暴动,宁可信其有,便也跑出来了!”北雁的妻子秋怡说。

另一位文友,《妙谈人生》的作者——泗水的莫名妙,先飞往美国,其后辗转到中国、香港,也在5月27日飞抵新加坡。当晚,在金门会馆的清闲阁里,近20位新加坡文艺写作者,还有来自汶莱的王昭英,默默地感受了印华文友逃难的那一份悲哀!

坐在火山口上

没有逃出国外,滞留在印尼的文友遭遇又是如何呢?有什么感受?

雅加达文友,著有诗集《给我微笑》、小说散文集《避雨奇遇记》等作品的立锋来函说:“……弟在班芝兰华人区的摊位也遭火焚,夏梦文友的房子、财物被暴徒烧掉了,只剩身上一件衣服与家人逃出来,幸人身与证件均安全。许多人神经衰弱,甚至发疯、进医院,悲凄情景,令人惨不忍睹。”

南苏拉威西的诗人阿里安(《骄阳下的歌声》14人合集作者之一)则写道:“今年5月发生在印尼好几个城市,针对华裔的大暴乱,是一页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血泪史。虽然我居住的小镇幸免于难,但从传媒中看到我们华裔族群所受的苦难,我非常悲痛。”

茜茜丽亚(《三人行》、《沙漠上的绿洲》、《翡翠带上》等合集作者之一)在电话中也说道:“暴徒太猖狂了,烧毁店屋还不算,甚至强暴、奸杀华裔女性。”作为文艺工作者,同时也是新闻从业员,茜茜丽亚正努力寻找受害者,计划把这些丑恶的滔天罪行公诸于世。

泗水的诗人叶竹(《骄阳下的歌声》作者之一)写道:“5月排华事件,令国际震惊,暴徒将华人的商店抢烧一空外,还强奸众多女性,真是兽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心惊胆跳,时不时有示威活动,或传言又再排华,令我们难以度日,日日精神压力加重。(泗水有传单,说八月份要“杀清”华人,您看,我们的心灵如何会安宁?)”

棉兰的晓星(《印华短篇小说选》作者之一)近日也写道:“听说棉兰印尼人已定制4000多支长刀,准备再大开杀戒。我们做生意的,每天都被印尼人骂支那狗,说我们使日用品高涨,要烧抢我们的店,要杀光我们。店主只好大做铁门;有些店铺做了三层铁门,还是不放心。我们是坐在火山口上了!”

雅加达的文友凡夫（《风雨千岛长奇花》作者之一）在5月15日的来函中说：“印尼的近况，相信你们会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可怜我华人，寄人篱下，站在檐底，必须承受种种不公平的灾难，尤其是贫穷者，逃不掉走不了，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

据报道，印尼目前约有一半的人口，也即9000多万人正在饥饿中。一些原本不富裕的印华作家更加贫穷了。以《七洲洋外》、《赤道线上》等多部作品驰名世华文坛的印华小说家黄东平说：“由于年纪关系，我已两年无业，要再找一个什么小差使，亦都不可能，而目前此地生活费狂涨，要得到安定的生活，更是不易，筹思再三，看来只有投稿一途了！”

76高龄的老作家，按理应该在家安享晚年，或为反映当前的印华社会而多写几部作品，可现在还得为三餐而烦恼，悲哉！在问候他的电话里，住家与人身都安然无恙的黄东平，却依然心怀大志，要把他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剧本结集出版。看来，这份心愿，还得仰赖海外关心印华文坛者的鼎力资助了。

走私华文书刊

为了孩子的前途，特别是女儿的清白，许多印尼华人家长都把孩子送到邻国读书。袁霓、谢梦涵把女儿送往马来西亚槟城；万隆的明芳（《沙漠上的绿洲》及《印华短篇小说选》作者之一）则送子女来新加坡。据悉，在短短的一个月，到槟城、吉隆坡等马来西亚学校报名就读的印尼学生，便有二三千名。

7月20日，在送别明芳回万隆的早上，她感慨万千地说道：“印尼盾大幅度贬值，印华写作者再也买不起华文书刊了！”她把我带给她的20多本文艺书刊，分别塞入行李箱内。“虽然华文读物依然严禁入口，不管怎样，我也要设法把书带进去，正如你所说的，走私书刊！”

全世界也许只有印尼政府，在海关的“禁止携带”条文上，公开把“中文报刊”和“各种毒品”并列，严禁入口。然而，热爱中华文化的龙的传人，却无视于这些禁令，每次回国，一定想方设法，把这些精神粮食也带进去！

防止暴乱重演

在我撰写这篇稿的时候，谁该为这回有组织性的暴动、强暴及轮奸华裔妇女负起责任，虽然呼之欲出，但能否绳之以法，尚取决于哈比比政府的态度。

据一些报道指出，暴乱煽动者是一些体格健壮，剪短发及穿军靴的年轻男性。一些在货车中遭受强奸和轮奸的受害者也看到车里有军服！

印尼国内权威人士的报道说的对：“印尼的任何族群，不管如何狂躁不安，都无法有组织性地，在短短 50 个小时内，在雅加达内的 27 个地区造成这般严重的破坏，而且肇事者竟然没有与保安部队对峙，至今也未被逮捕和起诉。”

世界各地的华人或非华人民间团体、政府及政党，经已群起就印尼的排华暴乱及强暴奸害华裔妇女作出严厉声讨，促请印尼政府防止种族主义及侵犯人权的血腥暴乱再次重演。

印尼华裔在 5 月动乱中遭抢掠，杀害和强暴，属于人权问题。我们关注这个事项，不因为他们是华裔；我们关怀一切受歧视，被杀害的人权状况。

印华作家和其他印尼华裔一样，他们视印尼为祖国，也为印尼作出重大的贡献；他们热爱这一块生长、生活的地方。然而，尽管他们入了印尼籍，起了印尼名字，他们还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没有被视为组成印尼的一分子。尤有进者，华裔每次都成为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印尼政府应该从这次的暴乱中汲取教训，废除一切对华裔不平等的条例，制订并推行长远和全面的政策，视华裔和其他少数民族为组成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分子。惟其如此，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印尼，才能带给全体印尼人民幸福！

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

（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 年 8 月 20 日）

不祥的十三号

——揭开首都暴乱序幕

雷文吼

5月13日的确是一个不祥的日子。聚集在特利沙克蒂大学校园外的一大群暴民，在围绕校园外的达安摩葛、基雅裕达巴、厄斯·巴尔曼街疯狂地破坏和烧毁建筑物和车辆。

暴乱开始于5月13日，其时聚集在特利沙克蒂大学校园外的一大群暴徒和群众，在围绕校园外的达安摩葛、基雅裕达巴、厄斯·B尔曼街疯狂地破坏和烧毁建筑物和车辆。中午11时30分，其时特利沙克蒂的大学生们正在为4名于12日示威表态中被军警枪杀而牺牲的伙伴开追悼会，群众越聚越多，计达好几千。12时，暴徒们在高架公路的十字路口焚烧了一辆用于装载垃圾的大卡车，守卫芝普特拉购物商场的军警被群众抛掷石头、玻璃瓶，暴徒们破坏和拔掉指路标及公路分界的铁栅，并用恶毒的话辱骂军警。军警开枪示警，并放射催泪弹，群众没命夺路四散奔逃。

在达安摩葛街，暴徒们疯狂地破坏和焚烧沿街建筑物和汽车。座落在芝普特拉·摩尔后面平时用于特利沙克蒂和温达尔大学学生泊车之停车场上的15辆汽车全被焚烧，另9辆全被破坏，1辆巴士车也被烧掉。被焚烧和破坏的汽车都事先被暴徒们把车里值钱的东西抢劫一空。大学生们的烧坏的证件和书籍狼藉地散落在汽车残骸周围。

达安摩葛左右街道的办公楼和店屋的玻璃窗全被打碎；位处电油亭的二间摊位被烧光；苏里雅·慕尔蒂达纳有限公司6辆汽车被烧毁，1辆被破坏；达安查雅旅馆全烧光了，并蔓延至其后面的建筑物，如：迪士哥厅、BCA银行、台球室和一系列建筑物。

媒体报导：大约3时半，3架飞得极低的直升巡逻飞机劝告聚集在达安摩葛的群众散去和回家。但群众仍群聚不散。

守卫在芝普特拉·摩尔大厦周围穿黑色制服的防暴军警由200人继续不断

增加戒备坚守，堵住所有道路。由中午至下午直到傍晚，群众仍聚集在高架公路上和乌克里达大学周围。

在达安摩葛街，暴徒们用石头和玻璃瓶等丢掷守卫军警，在葛罗克尔警察站注视现场的军警施以催泪弹。电油站的一间售卖润滑油亭被焚烧。

一辆插着红白旗载满群众的大型卡车，在无人驾驶下被推向守卫军警，并推向警察亭，幸未撞及目标，却直向聚集的群众撞去，在千钧一发之际，群众才及时醒觉并高喊呼叫奔跑，但有两个人被撞死，尸体被送往宋伯尔·哇拉斯（新明会）医院。这辆卡车撞及行人道路基才停下，群众立刻合力将之推翻焚烧。

据云，直至4时，至少有9个人受枪伤，其中包括群众、中学生和大学生。

这些暴徒也袭击葛罗克尔的警察亭，为驱散这些攻击的群众，警察向空开枪和催泪弹反击。

傍晚6时以后，暴徒们开始出现在其他地区，以雅城西区为主，在宛冷岸南街、红溪、两脚桥等地，暴徒们开始呼喊反华口号抢掠、焚烧华裔居民住宅、店屋，在婆让（BOJONG）的一间小型自选商场被烧掉。在西区外围公路群众命令所有经过的车辆停止并抢劫其财物。暴徒们也破坏和焚烧甫利·茵达和克林·卡尔登购物商场。

直至深夜，暴徒们仍继续抢掠和火烧店屋、汽车。尤其在雅城东区红溪，因电火熄灭，更增加恐怖的气氛。暴乱群众从达安摩葛一直伸延至珍卡连，离“印多西雅尔”电视台大厦约500米附近，一辆汽车遭火焚，在打满·哈拉班·柏尔麦的店屋和殡仪馆也被群众纵火焚烧。

同时，在雅城北区如格栋班让、红溪和三脚桥都仍看见赤红火焰。

而在达安摩葛街直至晚上一时暴乱已进入丹格朗的畜都芝柏尔区，暴乱也发生在打满史曼南和柯杉比一带。

暴乱进入第二天（14日），千万个疯狂的暴徒像洪水猛兽势不可挡地到处进行破坏、纵火并肆意的抢劫。男女老幼都加入了抢掠、搬运他人财物的行列。成百千的高楼大厦、巴刹、店屋、汽车和电单车遭祝融吞噬，熊熊的火焰染红了首都的天空，而一团团浓黑的烟雾更使全雅城的天空变成一片灰暗，腐焦尸臭的烟气冲鼻，窒息着人们的呼吸、令人呛咳欲呕。

中午12时在沙连巴印大的校园外周围一带，暴民们拔掉公路分界的铁栅，而防守在校园外的防暴军只静静地看着，视如不见。接着暴徒们朝向守卫在圣

卡罗鲁斯医院一事堵塞道路的军警涌来，并被抛以石头，防暴军警退至玛特拉曼街。约 13 时半海军陆战部队抵达，企图平息暴乱，但在雅城东区的玛特拉曼：和柏拉姆卡街的这一场冲突无法避免，终于造成两人死亡和两人受重伤。

其时在玛特拉曼警署前，7 辆汽车（2 辆拖拉汽车、4 辆载客车、1 辆神速部队军车）和 1 辆红色车牌（政府公务员用）电单车被焚烧。此外，6 幢办公大楼和店屋遭到严重破坏。

在柏岗沙岸、婆客拉玛西街和第波尼哥罗街，许多高楼大厦被群众丢石头，如阿斯特拉汽车大厦、印尼国际银行、美加里亚区的购物商场和英雄自选商场的货物，包括面、水果、桌椅、煤气筒、收银机、电脑、电视、雪柜、苔迪布、西装等都被洗劫一空。芒卡拉依高架公路下的警察亭和停放该处的汽车和电单车全被火烧光。每当有人抢到值钱和大型的物件如：电视、雪柜、保险箱等，围观群众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以示鼓励和赞扬！抢徒和观众把劫取别人的财物视如搬移自己所属的东西，他们堂然自若，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犯法，更不知什么叫羞耻！守卫军警也袖手旁观，有些还示以赞许的眼光或怂恿旁观者也跟着去抢劫。

他们心满意足地抢劫光了，就一把火烧光！然后，暴徒们涌向铭丁柏拉达购物中心和果尔登·特鲁利作同样的抢劫。一座阿里雅银行的自动提款机被破坏，并洗劫一空！总之，不分男女老少集体“合法”抢劫！

在新巴刹的购物中心也被暴徒们洗劫和烧光。哈尔哥商场被烧光，格列葛电影院被破坏，其他店屋也遭严重捣毁和焚烧。在古浓沙哈利、沙哇勿刹、苏柏拉多街、群众聚集在路上，疯狂的暴徒们见什么就烧什么。在苏柏拉多、珍巴卡·布蒂、巴刹史年、阿赫默·雅尼、芒卡都亚、巴尔眉拉（红牌）、新巴刹等群众密集如蚁，破坏和烧抢店屋。

暴乱蔓延至芝勒都克大路一带，赫罗（英雄）、拉玛雅纳、芝普利尔大厦等超级商场经洗劫一空后被焚烧，环近几个加油站因及时停止营业而幸免于难。约 40 辆汽车和数十辆摩托车被焚烧于公路上。

暴民们撬开商店的铁门，男女老少蜂涌着，肆意抢劫店中的所有大小物件，如电视机、电风扇、“分工合作”扛抬大冰箱、甚至背走床褥和各种家私。

在卡查玛达商业中心街，暴乱群众从上午即开始由葛罗克尔，途经基雅依打巴和哈沁，阿斯哈利街直入卡查玛达街。沿街所有店屋遭受严重破坏，一辆汽车在乐西·玛斯购物商场附近被烧毁。暴民进入卡查玛达街大举捣毁后长驱

直入葛洛朵华人商业区，同时好几千群众从居住于卡查玛达和对面哈奄乌碌街的小巷里蜂涌而出，加入骚乱队伍。

首都防暴军警只是袖手旁观注视暴乱行动，丝毫不采取步骤，有些军警还以欣赏的眼光鼓励抢掠群众，甚至怂恿围观群众加入抢劫行列。一位原住民在报刊读者信箱里投拆，他从办事处欲回家里，途中为暴乱所阻，只好立于街旁观看，身边军警怂恿他也去抢掠，他拒绝了。等他赶回家里，老婆和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都不见了，原来他们都去跟着别人“拿免费”东西去了。事后知悉他们与 200 多个抢掠群众都在购物大厦之烈火中烧焦了！惨矣！

防暴军警筑成人墙严守国务秘书处、比那格拉哈大厦和独立宫，所有通往独立东街和西街的车辆都被命令转向尤安达街。

烧抬暴乱也发生在雅市中心区芝敬尼购物中心的果尔登·特鲁利。雅利中心区的史年三角区防守森严。在珍巴卡布帮至少 3 辆汽车被焚烧。直至晚上 8 时许，军警才开始捕拿一群在卡查玛达的暴乱群众。

在葛洛朵区，一位名叫沙尤第拥有三个孩子的《默迪亚·玛抄》报摄影记者左肩中弹，伤势极其危急，被送往雅市西区的打拉砍医院抢救。

自上午就已聚集在沙哇勿刹火车站一带的群众，被坐着“虎让”车的军医驱散。不久，群众即用石头丢掷军警，军警向空中开枪示警，群众东奔西逃。但随后疯狂的群众就开始烧、抢店屋。

在打那阿邦自早上就已发生暴乱，成千群众在这商业区烧、抢。火烧 16 辆商用载货车和两辆摩托车。拉玛雅纳百货公司和座落在哇喜特·哈沁的 BCA 银行支部也全被焚烧。

防守森严的雅加达在两天暴乱中已变成一片火海，火焰浓雾弥漫整个首都天空，暴徒们高喊反华口号，先抢后烧或先烧后抢，许多华人聚集的店屋、住宅被烧光抢光，1000 多人被烈火活活烧死（其中有许多是抢劫的暴徒和无知贪心而跟着抢掠的原住民）。华人胼手胝足、数十年来甚至几代人流血流汗创立的基业在几小时内被抢光和付之一炬！更令人发指、怒愤难忍的是有 300 多个（据初步估计）自 10 岁的华裔少女到 55 岁的妇人被奸污，暴徒们还大喊反华口号“因为你是华人，所以我要强奸你！”，剥光她们的衣服，命令她们当众表演裸体舞，掌掴，拳打脚踢后并在父母、丈夫、儿女和亲人面前集体轮奸，继之丢进烈火中焚烧！

据云：一群暴徒涌入格洞班让殡仪馆将棺木中的财物劫去、把女尸吊起焚

烧，并对女尸作出猥亵的动作，暴虐残忍卑鄙下流无耻莫此为甚！

为什么暴徒们胆敢如此无法无天？为什么维持治安的军警对烧、抢暴行袖手旁观？事件背后是否另有“乾坤”？这幕后的主持人是谁？这一切都应由当局作出明白的交待！

记住5月13日这个可诅咒的日子！记住华裔遭到空前浩劫、惨烈、令人凄酸、悲愤、充满血泪的5月风暴！

5月暴乱是有组织、有周密计划的恶毒阴谋！必须揪出躲在幕后的罪魁祸首，严惩不贷！

历史绝不许重演！凶手绝不能逍遥法外！

（原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华人资料》第73期）

灰暗的 5月13日

宇 顺

5月12日，印尼军队枪杀了6名TRISAKTI大学生。

隔天——5月13日，与平时没有两样，包括我自己或许多大部分的华裔，心里都不怀什么特别的预感，照常上班、做生意去。

是晚六时半，我自公司走出来，只见平日车水马龙的街头，竟然死寂一片、公共汽车站空无车辆，心头顿时冷了半截。

我趋前问那边半闪门的街旁烟贩，他告诉我，格罗科尔发生骚乱，那处的汽油亭被群众焚烧、芝特拉超级市场泊着的车也遭殃，达安·莫科特大街已被封锁。

听到这项恶讯后，我即刻感到情况不妙，就三脚二步赶回公司，抓起电话就拨回家去。

果真不错，家人吩咐我绝不可回家，因为暴徒正袭击Cengkareng区的拉玛雅纳超级市场，并已开始向邻近住家区的TOP'S市场推进，并有传言欲向住家区进袭……我的心卜卜地跳着、又怪自己为什么要来上班，害得家中只留下妇人家和小孩，真是不知怎办？自己也只好吩咐家里人保重而已。

不出一会，公司保安人员就命令我们将灯熄灭，瞬间四周漆黑一片。有一个同事自阳台上匆匆跑下来，说PEMINGKAN批发市场已被人纵火，我自窗口向外望去，果然不远处浓烟冒起。随后，自几个同事家里人来电话得知，五脚桥开始抢烧、红溪、哲兰巴尔街已陷于危机中。

焦急万分的心，却被困在这暗室中无所作为，刹那间竟觉得自己家是那么遥远、遥远……只有在心中不断地祈祷、请愿。就是在这种恐怖、傍惶，完全睡不着的情况下渡过了那漫长的一夜。

隔天，一到凌晨6点就赶到楼下看电视，可是扫兴的是，新闻节目却未播出昨晚骇人的消息。

看完新闻后，我与另一位同事共商，决定吃饱早餐，趁早赶回家去。当时我俩都作好了“长途跋涉”的打算。至于我们这“黄皮肤”者是否能安全无牵

到家，完全是个使人心惊胆颤的大问号。

幸而那天早晨，车辆、行人也较多、使我们俩起步的心也安定了些。

乘上一辆公共汽车，汽车绕过万登岸，一到二脚桥红绿灯交叉路口，车夫就叫大伙下车。下车后，只见前路人山人海、哲兰巴尔街已被军警封守。

一路走过去，数十步就见各类汽车的残骸，偶尔还有摩托车残迹、银行、店屋被打破、焚烧的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DUTAHAS住家区前的店屋，更是破坏不堪，有的还冒着浓烟。最令人发指的是，一些不法之徒，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从一家铁门已被撬开的木料店搬出三层板、修饰木条，钢条，然后大摇大摆地运走，当时竟无任何军警阻拦。今生今世，在自己眼前出现此类勾当，乃是“破天荒第一遭”。

再向PESING方向走去，情况更惨，一列列店屋几乎成灰烬，货物早已被掠一空。间尔数座“原住民…真在原住民…回教徒所拥有”字样的建筑物却完整保存着。

赶过几十公里路，身体委实疲乏不堪，两肢几乎难于抬动。到了PESING路口，一位出租摩托车夫愿意载我们到目的地，我俩就挤上了车座。

沿DAAN HOGOT大街，因商店较少所以抢烧情况也罕见，但是路中推翻焚烧的车辆依然屡屡可见，摩托车飞驰前进之际，还见AHWAY四层大楼正在熊熊火势中燃烧。

不一会车已来到CENGKARENG INDAH桥头，当车子刚离开桥不远，就见前头的摩托车纷纷掉转头，慌张地叫：“前路有示威者！”我们也随之忙乱起来，当即勒令车夫停车，就在我们举棋未定之际，幸有好心的原住民指点我们抄小路跑。

穿过小乡、泥沼、越过铁路、垃圾堆，约步行了半刻钟，才抵达我同事住家区，进入区内，目睹一些小市场、小商店、建筑材料店也受掠夺、焚烧，心房不免升起阵阵寒意。

我先是在同事家中歇了一会，一面打听讯息，才赶路回到K区去。刚走出巷口，就听得摩托车夫指着远处的天空喊道：“RAMAYANA超级市被烧！…TOP'S市场正在起火！”，我随他指的方向望去，果真一缕缕黑烟冒起。当他得知我要回去K区时，一口答应能载我抄小路安全回到该区。

平时只需一小时可以抵达的家，如今却要经历长途跋涉、穿过那险过剃头的灾区，足足化了半天才踏上家门。

回到家与家人团聚，乃是最高兴的第一件事。可是困倦的体肢，迫使我当即倒在沙发上，闭眼养神去。

此刻，我的思想似乎受到了极为强烈的冲击，好像有一批人正气势汹汹地指责我，“喂！老兄，你过去大肆宣扬族群融合，那莫非全是废话!!!……”我的心刹间变得那么沉重、那么烦躁，又是那般的消沉。我好象飘浮于天际，一阵又掉入万丈深崖，我甚至曾进到了一个简直是疯子的想法去，我想如果我们这群“黄皮肤”全是回教徒，又全是穷鬼，大概会有不同的遭遇吧！

（原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华人资料》第73期）

又是打家劫舍，又是装腔纵火 ——嫉风恨雨横扫棉兰及市外华人区侧记

胡 儿

5月4日上午印尼矿务局与能源部长发布了一则惹起祸端的决定。5月5日零点整，7种油燃料涨价25%—71%。电火费涨60%。

已经是青黄不接，家无隔夜粮的村民怎经得起这又一经济棍棒之猛打！

当晚座落于浮罗卒双溪都安区 WILLIEM LSKANDAR 路的交通警局被捣毁。附近 AKSARAPLAZA 商店被投以石块，又被抢劫。结果59名肇事者被捕。

5日、6日两天，抛掷石块的抢劫纵火蔓延于下列地区：Letda Sujono 路，Medan Denai 区，Mandala Bypass 路，Panglima Denai 路，Aksara 路，Sukarame 区，Antara 路，Bakti 路，Pasar Merah 路，M.Yamin 路，Pancing 路，Wahidin 路，Industri 路，Padang 路，Central Pasar, Sambu 车站，Krakatau Ujung 路，Metal Tanjung Mulia 区，Brigjen Katamso 路，Kampung Baru 区，Titi Kuning 区，Glugur Bypass 路，P.Brayan 区，Bandar Selamat 高速公路入门处，Tembung 镇，Batang Kius 镇，Sisingamangaraja 路，Simpang Limun 区，Lubuk Pakam 市，Galang 镇等等。

5日上午9时许，数百名 Percut、Tembung 村民涌向 Williemiiskandar 路交通警局，查问那50名被捕同伴之命运。

几分钟后，他们行动了。

“高速公路附近的 Bandar felanlat 区，两辆汽车被他们放火烧毁了。与此同时，他们又在马路中央点燃无数的汽车旧轮胎，以阻挡国家工具向前推进。

CV. Bersanla 运输公司偌大的货仓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大门被劈开后，万岁声四起，人群涌入仓内；8辆汽车一辆一辆地好不容易被推到马路中心进行“火葬”，接着人人熙来攘往急急忙忙抢运数百吨白米及其他食物。

从 Letdasuujono 路到 Tembung 镇沿路上狼藉着14辆汽车残骸，又有数十间商店与办事处被搞得面目全非。

印尼独立战争时期苏北闻名退迹的战斗小镇 Tembung，眼睁睁看着村民胡

作非为，她也只能望洋兴叹；他们哪里晓得，今日他们抢劫的对象正是当年忠心耿耿于印尼共和国的华人先辈之子孙！散布于PASAR TEMBUNG, PASAR, BANDAR KLIPPA 和 PASAR GAMBIR TEMBUNGR 的50余间华人商店。于5日上午就已闻风先后紧锁厦门，店主纷纷忍痛抛下店屋各走一方。

5日下午12时，数千穷凶极恶的村民饿虎擒羊地奔向上述华人商店，抡起铁器，向店门硬劈硬砍。就这样全被抢光了50余间商店里的一切：汽车与电单位、车零件、电器、食物、衣服、睡床、厨椅、褥、镐头、盘碗、汤匙叉子、水桶、时钟、风扇、收音机、电视机……在2小时又15分的时间内。

那些商店门窗前挂上SAJADAH或贴上“Milik Pribumi”布告者，则免于难。

待到军警姗姗来迟，所出现的已是劫后“家徒壁立”的商店，15辆已被捣烂的电单车和三架汽车残骸。

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生龙活虎般的 Tembung 镇如今已沦为可怕的死城了！

位于棉兰 BANDAR SELAMAT 区 LETDA SUJONO 路的 ASA 的运输公司货仓椽是一个聚宝盆。自从大门被强硬戳开后，由午后至晚间，村民马不停蹄地搬走贵重的货品：冰柜、电脑、杯盘、壁钟、陶瓷器、羽球拍、脚踏车等等。

由于藏物数量多，村民索性在附近临时搭成“惊奇市场”，削价兜销，招揽顾客。

陶瓷器：Rp.3,000（商店价 Rp.20,000）

脚踏车：Rp.7,500（商店价 Rp.200,000）

脚踏车：Rp.7,500（商店价 Rp.200,000）

电视、冰柜、电脑：Rp.1,000,000 以下。

25 基罗在油漆：RP.25, 00 berp. 50, 000) 商店价 RP.90, 000 — RP.170, 000)。

数千村民拥挤于 Mandala Bypass 路。马路上，墙壁上写满了各种标贴：

“我们需要公平合理！”

“政府哇，请看看你人民的苦难吧！”

“人民万岁！”

以及一些咒骂华人、诅咒长官的字眼。

Antara 路两间店屋门窗被敲破，遭洗劫后，被淋以土油，燃烧起来了。浓烟冲天。

这边 Fferdang 路不甘示弱，两辆汽车被推到马路中央，浇上土油，照样燃烧起来了。

接着乌合之众投向另一整列的店屋：20 号、22 号、28 号、29 号、30 号、31 号、33 号、38 号、41 号、42 号。门窗一一被劈开后也被洗劫得干干净净，寸物不留。

不久前 IMF 在印尼的负责人宣称，油价上涨恐怕将掀起社会危机，如今果真应验了：

Kamnpungbam 区，Simpanglimun 区，Sisingamangaraja 路：

53 间华人商店被捣毁，又被抢劫。

Monasjyaelektronik 店空了。

Duta Antara Prima Honda 店空了。

Spotek Zooms 电器店空了。

Barumanjur 药房空了。

200 多名村民又再展开攻势，在马路中央点燃旧车胎，浓烟直冒。

ANGKASA FOTO 店真空了。三架复印机砸烂了。

BURSAMOTOR 电单车展示馆空了。8 辆电单车和一辆汽车被拉到马路中央焚毁了。

SETIAFOTO 店（离 BURSAMOTOR 店约 20 米）被火吞噬了。

MONASOPTIK 店被火吞噬了。

HUTAJULU 店被火吞噬了。

MANDALA BYPASS 区：

一间大货仓被洗劫后被大火吞没了。被抢走的货物计有：轮船零件、建筑材料、运动器械、润滑油、机器等。

P.BRAYAN 区：

BAGONG 电单车展示馆空了。14 辆电单车被拉到马路上付之一炬，变成一堆废铁了。

TANJUNG MORAWA 镇、BRINGIN 区：

数千村民成群结队冲向市区。12 辆电单车在马路上被烧成废铁。2 辆停泊在路边的汽车也被捣烂了。

7 间米较厂被倾箱例篋后，数千吨白米与谷物被劫走了。

LUBUK PAKAM 市：

数十间商店被捣碎。

1200 个摊位（零号巴刹）被烧毁了。

REZEKI 汽车零件店被抢光了。

CITIZEN 电器店被抢光了。

x 商品展示店被抢光了。

日里昔梨令区 BATANGKUIS 镇：

抢徒无法无天、肆无忌惮，从 5 日午间一直闹到第二天凌晨时分。

PANTAI LABU 镇：

众抢徒打劫了数十间商店七、八间米较厂。厂内米较机几乎已被砸烂无遗。

网眼、牙浪镇：

数十间商店承受着众抢徒连珠炮式的石块。

两间商店被劫掠又被焚烧。

从上午 11 时一直闹到下午 4 时，抢徒愈聚愈多，汇成了数千名。不可避免地，又 70 余间商店被捣毁了、被劫光了。

新的死城又出现了！

Krakatau 路、Cemara 路：

玻璃窗、玻璃壁百孔千疮：华人住宅、Lippo 银行、Bali 银行。

无数货仓被捣毁、被抢劫。

从日间胡闹到晚间。

亚洲震惊了！欧洲震惊了！日本记者到棉兰来了，英国记者到棉兰来了，法因记者到棉兰来了。虽然他们都知道这次五月反华事件在印民历史上并非破天荒第一遭。要有人问起印尼反华事件，多灾多难的华人当会滚瓜烂熟地倾诉无遗。

（甲）1740 年红溪惨案。

（乙）印尼独立风起云涌之际，发生于爪哇岛的唐格朗与加布棉反华事件。

（丙）1918 年 Kudus 反华事件。

（丁）1963 年 5 月 10 日万隆反华事件。

（戊）1966 年亚齐、苏北反华事件。

（己）1967 年雅城反华事件。

（庚）1980 年 4 月乌戎潘当反华事件。

（辛）1983 年 8 月 5 日万隆反年事件。

而且多灾多难的印尼华人血泪的历史教训里已开始懂得只有印尼政府承认华人在印尼社会里的少数民族地位，同等于印尼其他各族，华人才能争得平等的公民权、文化权和生存权。

而且多灾多难的印尼华人也懂得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一条只能以接力赛精神实现之道路！然而它又是一条非走不可的道路，假若反华事件要逐渐乃至最终完全杜绝的话！

亚洲震惊了！欧美震惊了！美国记者来棉兰了。美国CNN电视台播放了“五月事件”。澳洲电视台播放了“五月事件”，英国广播电台也播送了“五月事件”，荷兰新闻界，马来西亚广播界都极其关注“五月事件”……。

棉兰市外80余公里的丁宜市：数千人涌到马路上，好像南斯拉夫Serbia军追杀Bosnia平民一样，尽量砸、尽量抢。

数十间商店、货仓、住宅被砸烂，被洗劫。31间住宅被烧毁，41间商店、货仓、米较厂被毁坏，又被一扫光。

40人被捕，3名肇事者被枪毙。

丁宜又沦为死城了！

丁宜附近小镇也逃不出恶贯满盈的魔掌：

Sialang Buah、Seibuluh、Perbaungan、Seirampah、Kampung Pon等。

先达市：324人被捕，一名肇事者中弹而死，另一名被枪伤。

200余名村民7日上午8时捣毁了Laris洋杂货店，店内一辆电单车被拉到马路上烧成一堆废铁。团结路Famili店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市民与中小學生汇合于Horas中央市场。他们冲向市中心。数百间Sutomo路上的商店被投以石块。

Obor建筑材料店被打烂了。一辆三轮车被烧成灰烬。又烧了爪哇路上的货仓与汽车装修场，独立路的4间住宅和一辆Toyota轿车。商店住家门窗前悬挂Ulos或贴上.Milik Pribumi布告者，幸免于难。

先达又沦为死城了！

火水山市：

冷吉区警长Udi Ratman中校称，火水山经济活动尚未恢复，多数商店关门，因为各商店已被劫个精光。

20间商店倾家荡产，45家被砸得稀烂：发生于Babalan路。

25间商店被打碎，6间被一扫光：发生于Mesjid路。

23 间商店被捣毁：发生于 Wahidin 路。

76 名肇事者被捕。

亚沙区 Tanjung Tiram 市：

数千村民像脱了缰绳的野马奔向市区。从 7 日晚间 8 时一直抢到第二天凌晨 2 时。待到上午 9 时许抢风又再刮起。

40 余商店被捣毁又被搞成真空店。4 间商店被烧成灰烬。一辆汽车被推进波姆河里。

邻镇 Indrapura 也难逃厄运：40 间商店、2 间米较厂被弄到七颠八倒、七零八落后——被抢个精光！

53 名肇事者被捕。

五月反华事件期间各村巷华人青年夜间自发进行纠察巡逻，发挥自力更生的精神。

200 余名先达华商与当地社会长老向先达地方议会呈交一份声明书。

该声明书称：希望地方政府与治安当局制止五月反华事件重演。严惩肇事者。如果地方政府无能为力，他们自有办法对付之。

从集合地点向地方议会进发途中他们高举各种标语：“谴责肇事者！”“谴责抢劫者！”

“万岁，地方议会！”

“万岁，先达人民！”五月反华事件后华人暂时离开棉兰，往槟城去，往星洲去。9 号百余人从勿拉湾码头走了，10 号又百余人从勿拉湾码头走了。

在码头上一名乘客 w 毫无隐瞒地对笔者倾诉：“……恐怖哇，真恐怖！那帮抢徒手持长刀长棍，披头散发，眼露凶光，口骂“支那”，如人无人之境，抢走华人血汗的结晶品，劫走华人经年累月累积的劳动果实！

抢劫那几天，抢徒们原形毕露，他们是那样仇恨我们，简直欲寝我们的皮，欲食我们的肉！可怕，实在可怕！我还是暂避为妙。”

“那你是身历其境来的？”我追问一句。“是啊，我父母就居住于现在的死城——Tembung。嗯，你不知道，他们打劫是经过密谋筹划的：先头部队是一群 10 岁左右的孩童，他们向住家商店抛掷石块，好像向店东屋主发出警告，危险来了，要命者跑！”

接着“拖门队”出现。他们把绳的一端系于铁门，另一端系于汽车上：汽车开足马力，卡嚓一声，铁门被打开了。于是一桩令人胆战心惊的抢劫事件就

开始了。

哩，说也奇怪，Tembung 火烧抢劫事件前后经历了2小时15分，军警竟任之让之，而 Tanjung Tiram，烧抢事件前后七八个钟头，你又能说些什么呢？

朋友，你可知道棉兰市外 TITIPAPAN 小镇遭遇烧劫的惨剧？现在百余名难民暂时收容于棉兰吴氏基金会会所。他们被抢光又烧光，仅存身上一套衣服，甚至有的只穿一条短裤。

“哭，别再谈了，伤心事实在多。再见。”

她一边向我告辞，一边向船舱走去。

不久，渡轮徐徐前进，我依旧站在海边，凝望水连天的地方，带着万缕思绪，自言自语道：“她走了，可华人问题并不因此而走哇！”

5月反华事件使得印尼警长 Widodo 飞抵棉兰了，武装部队，总司令 Wiranto 也飞抵棉兰了。

接着陆军特别部队也来了，陆军战略指挥部兵种也来了，海军陆战队也来了，警察特别部队也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发生于棉兰及其环近地区）。

被捕的肇事者：806 人。

严重损坏的店屋：170 间。

被捣烂或被焚烧的电单车：21 辆。

被捣烂或被焚烧的汽车：38 辆。

目前局势算是暂时缓和了，然而五5月反华事件却不能从华人社会的历史记录本上抹杀掉！

5月反华事件将永远成为灰色的历史记载！而新的反华事件又有谁敢说将不再重演？

为展缓并逐步乃至完全杜绝反华事件，让我们为华人少数民族之被承认而努力以赴吧！

我们不能没有公民权，我们不能没有文化权，我们更不能没有生存权！

稿于华人妇孺哀号声里

（原载印度尼西亚《印尼与东协》第82期，1998年5月）

火烧雅加达

小 沈

进入5月，雅加达政治气温越升越高，大学生以及大学教授和社会领袖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大学校园内炽烈的反政府的情绪越烧越旺，5月12日达到了沸点。那天天气闷热，太阳把人们晒得出油，数千名“特里萨克蒂”(Trisakti)大学的学生们集合在校园的广场内进行抗议和示威，要求政府马上进行政治、经济、法律大改革，要求召开非常国会，要求降低物价……，这些正义的要求，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反而宣布将燃料油类提高到40%到71%，因此，使民众不满政府的情绪火上加油，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响彻校园上空；随后，学生们冲出校园要步行到国会大厦请愿，受到军警拦阻。因此，在校门口就发生冲突，相持不让的情况下，军警鸣枪示警，接着一颗颗催泪弹落在校园周围，校园内乱作一团，有人受伤了，哭声喊声乱成一片，教授们劝告学生回校园，可是正当学生们陆续退却的时候，突然从天桥上飞来一连串的子弹，二十几位大学生当场倒下，其中有6人中弹牺牲！顿时秩序更乱！

站在路边围观的群众也义愤填膺，纷纷呼口号谴责军警不人道的行动，群众不但没有散去，反而加入抗议的行列，他们自发的拦截过路车辆，不问青红皂白把车推到路中心焚烧，骚乱开始了！动乱很快地蔓延开来，不到一个钟头，校园周围的大马路上乱成一片，商店纷纷关门，人心大乱，大家像无头苍蝇，到处乱钻，看样子一场浩劫、一场大难临头了。

翌日，“特里萨克蒂”(Trisakti)大学的学生们在校园举行追悼会，而路上观看的群众，突然又发起焚烧汽车的勾当，接着一群一群的青年开始攻击校园周围的建筑物，他们扔石头，砸玻璃放火焚烧商店；接着掠夺开始了，所有商人惊惶失措、心惊胆战，纷纷关店躲避，可是在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无政府状态下，一间一间的商店房屋被砸烂、被焚烧，店内的货物被抢掠一空，一时雅加达西区一团一团的黑烟直向云霄，军警只顾监督学生，却没有对骚乱者采取步骤，或者说束手无策，尽管他们手上持着防暴器，但不敢动手驱散劫掠者；接着骚乱很快地转到华人集中的丹模戈、五脚桥、红溪，凡是华人的商

店、汽车、电单车都是被攻击的对象，十几辆来不及躲避的汽车、摩托车被推倒在路中心放火焚烧，一些商店住家笨重搬不走的东西被集体抬出来焚烧，暴徒们拿着掠取的“战利品”如电视机、电脑、电器和吃的、用的、凡是能抢的都抢，非常高兴地招摇过市，哭声喊声天摇地动震撼得地动山摇，好似世界末日就到了！

暴乱从雅加达西区的五脚桥、红溪很快的传到西区其他地区，有“唐人街”著称的班芝兰、大南门、小南门、草铺、槟榔社、迦渣玛达、哈奄武禄、孟加杜哇、孟加勿舌、雅加达街……都燃烧起来了！悲剧越演越烈！雅加达西区一片火海，浓烟和火焰笼罩上空，赶来维持治安的军警只能袖手旁观，有的还与暴徒们握手致意，增加了暴徒们的嚣张。

雅加达西区暴乱的结果，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不能幸免被掠光，烧光、砸烂，被烧毁的汽车、摩托车残骸狼藉满地，就像战后遭劫惨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

5月13日是雅加达的大灾难的灰暗日！除了西区外，雅加达中区的新巴杀、老巴杀、打那望、南区的玛约兰老区和北区的海口等，凡是有华人经商和居住的地方都不能幸免，全部店铺不是被抢光就是被烧光，只有东区华人比较少的地区受损失较轻，但华人经营的大商场如加冷德地区的损失也无法估计。受损失最大的城区草埔的电器商、电子产品、金融、杂货店等，华人经营的家具店、银行、汽车摩托车行及各行各业没有

在雅加达周围的郊区新建的城镇如唐格朗、勿加泗，凡是华人的商店、住宅也都被抢夺，很多化为灰烬。最惨的是所有华人经营的大超级市场，里面的货物不但被抢光，而且被烧，暴徒们好似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破坏、掠夺；可是抢徒们也付出惨痛的代价，有两三处的超级市场被成百的暴徒们掠夺，包括年轻人、成年人、家庭妇女、中小学生，甚至妙龄少女、孕妇，他们贪得无厌地抢劫，有的进去抢到猎物出来传给同伴后又再进去抢，结果有三处超级市场在被抢的同时，整个大厦也被放火燃烧，这些家伙被浓烟薰得不能呼吸而晕倒，结果，“偷鸡不着反而蚀把米”，有几百人白白烧死，送掉了老命！

雅加达好像一座没有居民的死城，车辆开始消失，被推翻放火燃烧的汽车躺在街头熊熊燃烧；由于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很多提早下班的职员、工人逗留在街头没法回家，有的人索性步行回家，由于一部分油站被破坏和被掠夺，许多油站也关门，因此很多私人车辆买不到汽油，有开的油站则排长龙，而且一

下就被抢购一空。

一些医院也不能幸免，在唐格朗一间产院被暴徒们攻击，医生护士出来阻止，暴徒们完全不理睬，拼命向医院扔石块，护士们抱着刚出世的婴儿哭着逃出，而那些正在坐月的妈妈也不得不拖着还没恢复健康的身，一间能逃避这场大灾难！还是在唐格朗，有两间基督教堂也被破坏不堪，在西区一间有80年历史的Sion基督教会也被洗劫一空，搬不动的电子风琴、长凳、桌椅等都被推出焚烧。

暴徒们的目的不仅是商业区，连那些住宅社区，也是被攻击的目标，因此社区的居民就团结起来组成自卫队轮流守卫，这样暴徒们不敢冒然冲进来，减少一场灾难。

著名华裔大财主林绍良先生在古农沙里的住宅也被攻击，在焚烧建筑物前将林先生的肖像拿出撕毁焚烧，然后将家里的电视、电脑、沙发、桌椅以及贵重的物品搬出来燃烧。

值得一提的是，暴徒们的目标不光是华裔，连政府机关比如警察局、邮政局、政府银行、火车站、加油站、政府车辆、公共设施、路灯、公共电话、铁篱笆、花木连盆带树搬出路中间销毁……，简直没有人性！无法无天！

由于雅加达的暴乱，引起金融更大的波动，暴动的当天，印尼的盾值一下跌了千余点，美元一下蹿起，美元兑换印尼盾为1.15万盾！加上由于汽油起价所引起的百物暴涨，使人心惶惶，动乱发生后的几天，人心还不能安定，许多房屋被烧光的华裔居民无家可归，纷纷躲在亲戚家避难，有钱人则全家奔向国际机场，争先恐后的想逃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台湾避难；许多外国侨民或驻印尼使馆的外交官及其家眷，也都到国际机场等候飞回他们的国家，有1000多名中资机构和香港投资商人及其家属，在中国大使馆协助下，顺利地离开紊乱的雅加达。由于飞机座位有限，很多旅客不得不滞留机场等候，有的不回家，住宿在机场附近的旅馆。

雅加达的暴动持续了三天，最严重的一天是5月13日，所以这一天被人们称为“黑色的13号”！三天的暴乱，财产物资损失无法统计，有人说，比国际货币基金答应借给印尼政府的第二批贷款30亿美元，恐怕还要多！这次暴乱，死的人命也不少，光是被烧死的抢东西的暴徒估计500余人，被烧死和中弹死亡的没罪过的平民也有10余人！有1000多暴徒被捕，有3000多间的房屋商店被毁！汽车和电单车被烧毁1000多辆。而保险公司已经宣布，不负责

赔偿暴动所破坏的一切。

经过这场浩劫，华裔很多面临破产，要恢复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而印尼的国家经济建设30多年的成就毁于一旦，国家的国际威望则一落千丈，就经济建设而言，估计10年也恢复不过来！

在雅加达发生暴乱的同时，在印尼一些大中城市如泗水、梭罗、三宝垄、巨港、日惹等地也发生严重的骚乱掠劫事件，损失惨痛！在这以前不久，在苏门答腊的棉兰市、巴东市、先达市及苏北一些大中城市，也发生暴徒烧抢破坏的严重事件，受害的都是为印尼建设事业作了大量贡献的广大华裔，是印尼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排华事件。

事件发生后，国家领导人和治安当局才发表声明，谴责不负责的行为，要求人民镇定，不要受谣言所影响，许多百姓发出怨言，这些都是马后炮，早知有棉兰事件作教训，为什么不作事先准备？为什么不“亡羊补牢”？而事件发生时，为什么又不马上进行抢救，军警们看着暴徒们抢烧作乱而按兵不动？而被掠劫的对象又都是华裔的中小商人，在许多被掠劫被火烧过的商店房屋发现许多反华标语，“杀死华人！”、“华人滚蛋”！这不是有计划的排华事件吗？假如当局不纵容暴徒们作案，为什么在一天之内就将繁荣的城市变成瘫痪，变成死市？广大华人成了惊弓之鸟，没有一个人能安心工作和生活，大家说天理何在？

雅加达各大报刊也发表述评，强烈谴责这类野蛮不道德的行为。印尼销量最大的报纸《罗盘报》形容这个严重事件为“极荒谬”，《印尼媒体日报》说“这是大悲剧！”，印尼前任财政部长穆·玛利在电视记者专访时大声谴责说：“耻辱！耻辱！！耻辱！！！”而印尼总统苏哈托从开罗赶回雅加达，对这次暴乱“表示遗憾”，并表示要严惩肇事者。

目前局势虽然得到了控制，但是气氛还极紧张。由于金融危机未过，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谁能预料更大的灾难不会重来！

（1998年5月17日寄自雅加达）

（原载北京大学亚太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印度尼西亚排华问题》）

棉兰骚乱实况报道

佚名

棉兰成了死市，商店与购物中心闭们休业。如果还有商店或杂货铺仍开门营业，那一定是原住民。没有任何排场体面的轿车敢驶上街，有的只是老爷车或公共汽车才敢招摇在大街上行驶。卡车呼啸驶过，共运载了5营布吉答利善第一地方军区属下的军队，3营从雅加达空运来的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属下的军队以及北苏门打腊省地方警区属下的警察。全部荷枪实弹和刺刀上膛在街上巡逻棉兰各处散布各种废墟。其中一个商业区曼达立街（JI. MANDALA），可看到烧剩铁架子的汽车与摩托车在塞尔棠街（JI. SERDANG）华人的商店被砸得一塌糊涂、玻璃碎散到大街上。独立先锋街（JI. PERINTILS）（EMERDEKAAN）蒂摩尔牌汽车展销室和肯塔基炸鸡快餐店被砸得稀烂。最少五50辆汽车和百辆以上摩托车烧到只剩下架子。

不能准确计算有多少家房屋烧成焦炭或砸坏。数不清的商店粉碎。如果还有完整的，其东主选择逃命，免得再受骚乱冲击。基本日用必需品奇缺，价格腾升到令人咋舌。“大家都遭受损失。你也一样！”苏北省长拉查伊纳耳西列加尔（RAJAINAISIREGAR）退休少将在5月15日棉兰市军署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他估计财物损失达几千亿。出席的还有第一军区司令尤柴利查尼阿科（YUZAIRICHANLAGO）少将，苏北地方警区警长杉答斯警察准将（MA. SAMBAS）。

但从治安的角度，军区司令已能展颜微笑了：“棉兰市已安全和受到控制。”他在该记者招待会上说。

可是，并不意味着棉兰及环近地方的居民已能安枕无忧到了夜晚，还是一片死寂。骚乱前正常的现象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下里巴人唐突音乐吵得人头昏昏都消失无踪。生活好像谱上休止符。但忙坏了治安人员，他们到每个角落巡逻。虽然没有颁布宵禁令，军警检查过往人的居民证。

在市郊，虽已黄昏日落，气氛还是热哄哄。远离棉兰市区的一条大街上，聚集着一群青年，每一辆驶过的漂亮汽车，他们拦住并叱斥：“放下镜窗！”他

们注视车中的人。如果是华人，便拉下汽车，再把车砸烂。如果是原住民则放行。

本是好看的华裔公民店屋，全部变成一塌糊涂和满目疮痍。有钱的华人赶紧跑到有治安人员严密守卫的五星酒店，诸如多答湖酒店、巴尔德德酒店或嘉鲁达酒店。他们的豪华汽车也一并驶到酒店。这几家大酒店在华裔公民惨遭逼害之际却财源广进。以多答湖酒店为例，平时只在周末或公假日或礼拜天才会客满，现在突然爆满，如惊弓之鸟的富有华人，全抢着住进去。因经济危机而门可罗雀的嘉鲁达与巴尔德德酒店，也财源广进。

不少华人选择离开已成炼狱的棉兰。在波罗尼亚机场售飞机票处可看到面带惶恐的华人排长龙买机票，有的飞出国到邻邦大马或新加坡；有的飞答谭岛（以便续程往新加坡）或雅加达。自发生经济危机，国人出国者大幅减少，机票一升再升地调高，没有极紧要事，谁也不会想到出国。但是，骚乱逼有钱的华裔公民争著上飞机，飞往邻邦的班机全部客满。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华裔公民都是身缠万贯，都有大把钞票住进星级酒店或飞上云霄。也不是所有原住民都仇视华裔公民。在几条街上如谭林街（JL THAMRLN）一隅、苏约诺街（JL.SUJONO）和塞尔棠街（JL SERDANG），这些走投无路的华人跟附近的原住民联合起来保卫家园与商店。他们手持长刀、剑、长镖枪等利器，头上戴头盔。

上述是棉兰经历连续四天骚乱后的惨况。其实自两周前星期一开始感受气氛已白炽化。苏北大学大学生的表态示威是骚乱的导火线。

棉兰所有高等学府跟著苏北大学展开示威。起初他们只在校园内举行，治安人员遵照政府和军方领导层的决定，放任大学生在各自的校园内表态，只在大门外戒备而不干预。虽然新闻媒体已经广泛报导各地的表态示威，但大学生似乎感到未跟民众直接沟通是一件憾事。苏北大学学生会主席玛尼克：（MANIK）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跟社会大众直接沟通。”媒体虽有报导我们的示威，但不够全面。

其他高等学府不甘落伍，“诸如诺门森基督教大学，棉兰工科学院，苏北回教大学，国立回教大学，棉兰师范大学的大学生打开校园大门乱哄哄突破治安人员的封锁。受命围堵的治安人员不放行，冲突已不可避免，所以几乎每天都有大学生或军警受伤的消息。

两周来群众只能围观校园内大学生的示威。可是周一在班京街发生的冲突

便拉开了骚乱的序幕。当时棉兰师范大学的表态示威，因被治安人员堵在校园内，上千名群众只能围观。在大学生中间突然传开了有女同学被军警非礼和剥光衣裙。流言不径传开，也传到了校园外的群众耳里。愤怒的大学生随即用石块甩打军警，群众亦参加行动攻击军警。

骚乱亦随之爆发，大学生与群众汇合冲上大街，第一个遭殃的是柏尔汝交警哨站（POSPERCUTSEITUAN）。办公处和泊在那边的警方公车，1辆卡车和摩托车被纵火烧掉。“拉哈尤”公共巴士车3辆被破坏。苏哈托总统异母弟普罗勃苏特佐拥有的布阿纳购物中心（在阿克沙拉街）和在塞尔棠街的商店，货物搬上街，有的被纵火，有的被群众带走。因为大部份遭殃的都是华裔公民，所以苏北省长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群众已进行种族主义暴行。”人们随即想起于1994年由工人示威而引起造成一位华裔惨死的旧伤痕。

为什么拿华裔公民当作目标？据乌斯曼贝里（USMAIPELLY）教授表示，理由是经济鸿沟。华裔由于会奉承讨好有权有势的官员，加上他们的本领而控制了经济命脉，他们一般上都比原住民富裕。“他们聚居在本族的社区。欲想不再发生这种事件，华裔应跟周围的原住民社会打成一片。”该人类学教授说。

事实证明骚乱群众只选择攻击华裔居民，而且贫富不分。以阿海为例子，他现年40岁，膝下六个儿女都还很小，他其实是贫穷的华裔公民，当卡车司机日工资才才8000盾。他跟另15家华人聚居在一排房屋里。哪些不负责任的暴民并不放过他们。家中的一切值钱东西：电器、油炉、煤油灯甚至衣物全部被抢光。

经历劫数后，阿海一家和其他落难的华裔公民只好逃到县级军署要求庇护。每天口完全仰望人们的怜悯施舍。“有时有人会送一包饭，只好给儿女们分着吃，我已失去胃口。”

27岁的阿杰，他在棉兰市郊小镇答当车伊斯（BATANGKUIS）的店屋被焚。平时有点名气经营自行车的店东，携妻儿消失无踪。电器殷商何文与阿伟，店在苏约诺街；存放在货仓的价值二百亿盾电器，大部分被群众洗劫，一部份被纵火化为灰烬。

连续四天暴民凶性发作。除了棉兰市中心、所有市郊区都受骚乱冲击。遭殃最严重的地方是：班京街、塞棠街、曼达拉街、芯邦里蒙、玛蒂港（SEHAO），普罹贝拉延、蒂蒂库宁、特姆汶、甘榜答鲁、苏卡拉迺和丹绒摩拉瓦。在特姆汶和芯邦里蒙的一家摩托车展销室，一部分被洗劫，很多被焚毁。发生骚乱的

地方处处黑烟上腾，有的是商店起火，有的是旧车胎、汽车、摩托车、店屋与平常住家被纵火焚毁。

周三骚乱伸延到其他小镇，如卢布克巴坎、迤琅、旧德里（DEITUA）和柏害翁岸（PERBAUNGAN）透四更伸延到较远的特宾丁宜（TEBINGGI）和先美（PEMATANGSIANTAR）。骚乱发生后，这些中小城镇立刻成为死市。周三从雅加达前去视察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威兰多上将说，“军方将对那些在示威时搞暴行与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严厉步骤。”随他一行的还有几位将官。

在社会中间流传说，最少有6人丧生，其中2人被子弹击中，其他4人死于其住家或店屋被纵火时来不及逃生。110人受伤，其中9人被枪击伤，两人被烧伤。距棉兰80公里的特宾丁宜有两人被枪击毙。

但苏北省地方警区警长杉害斯说，迄至周四102人受害，其中2人丧生（被檐击毙和在店里被火烧死），2人的伤势严重，另98人受伤。在棉兰有423人被捕，但被扣押的只50人，其他的经辅导后被开释。很多是正在抢劫时人赃俱获的暴民。“其中不少是小学生与儿童。妇女与老妪，可怜兮兮的，我要怎样对待她们？”杉斯说。在先达，警方扣押了324人。

目前棉兰相对平静。但是，人们充满各种质疑骚乱是因大学生示威引起的自发行动吗？是否有方面人士在混水摸鱼坐收政治利益？

省长警长与地方军区司令并没有指控大学生，但他们没有忽视大学生与群众骚乱存在着关系。“现在该明白为什么我们禁止大学生走出校园的理由了！如果到街上示威，它的后果便是这样啊！”警长说。他的意思是指会挑动非大学生的群众汇合而进行骚乱。

大学生方面当然拒绝对他们的指控。“大学生通过示威想表达的目的跟社会大众所想表达的一样，哪倒是事实。可是，我们的目的可不是进行无政府主义的骚乱，这一点是必要弄清楚的。”利克宛说。

军区司令和警长预测有某方面人士正在活动，或一如利克宛所说的，有“群众之鬼”到处挑动进行骚乱。这一点可以从在某一处未发生骚乱之前，通常有卡车运载不知来自何处的一群人，并动手甩石块砸华裔的店屋与洗劫。

棉兰法律协助机构主任古斯比安托也有相同的推测。“除了确实存在着种族主义的种籽成为潜在的原因，有组织的某个组合趁机利用形势。”他说。但他不晓得该有组织的组合到底是什么人。“但显然它们甚专业化。这点可从几乎在各处同时发生骚乱可见一斑。意思是搞骚乱者分散到各处挑起动乱。”治

安当局还正在研究谁是幕后主使者。

上周四那天，棉兰已开始平静。可是在苏西省巴棠市又再冒烟。肇事原因还是大学生示威。安达拉斯大学与巴棠师范大学在巴棠师范大学广场示威，然后走到苏莱曼街与苏迪甫曼街游行，上千群众围观。

其实在示威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秩序良好和平静。可是，响午后，当大学生回到各自的校园后，轮到群众开始行动。几乎所有商店和政府办公署都大门紧闭。每条街都一片寂静，没有车辆来往。公共巴士车或其他小型载客车全部无踪影。原因是群众甫进行暴乱。

成百名青年和正在罢驶抗议石油燃燃与汽车零件涨价的司机及社会大众一齐行动。他们在拉苏纳沙益德街、苏莱曼街和涵卡教授街用石块摔商店和办公署。

不只如此，执政党苏西省从业集团地方理事会办公署被捣毁。巴棠国营电火公司，努山打拉农园有限公司的办公署。雄腾公司的铃木与本田汽车展销室，阿斯特拉与奥托 2000 的汽车展销室同样遭殃。

且转到爪哇岛看一下，在日惹，破坏行动虽不及棉兰那样严重。可是从格查延街、默利占街到阿迪苏集托街以及把日惹划分成南北的梭罗街，在整 8 公里的街上被群众捣乱的一塌糊涂。直至上周末，上周二发生的骚乱在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很多大石块散乱在整条街道，肇事原因是沙纳塔达尔马大学的大学生在庭院上示威表态。

正如军方领导层和政府所一再强调者，大学生只可以在校园内表态示威而不得走上街头，政府担心群众受到挑动而引发骚乱。政府所持的一般性逻辑是考虑到群众的易燃性极高，容易受到煽动。迦查玛达大学社会学教授卢克曼苏特利斯诺博士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目前社会上有很多挑衅代理人。为达到某种目的想利用学运滋生事端，在印尼的社会还稳藏著极容易被煽动的情绪，“如反华的情绪。”他说。

因此，他同意军方与政府的看法，大学生只可以在校园内表态示威，他不能苟同大学生的看法，以为不上街头，他们改革的要求便会掉入死胡同。卢克曼相信，大学生表达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不过，他们必须坚持表态。卢克曼极赞成尽可能快展开政治与经济改革。

稿于 5 月 14 日雅加达发生大骚乱之夜

（译自《短语》（GATRA）周刊第 26 期第 25 至 28 页）

最惨的 一夜

佚名

雅加达醒了。晨雾混合着砂尘，迎面扑来，飘浮在空中的，还有焦烟，浓郁的血的气息，这一切共同谱出了这座梦魇的城市的图像，还有那最长的一夜，5月14日。

暴动最炽烈的5月14日，在现场做报导的美国记者丽莎回忆说，原本还算平静的街头，在学生被射杀的校园外，只是聚集了许多人群，但是，几乎是瞬间同时，人群开始烧东西、敲破建筑物玻璃门窗，整个雅加达的东南西北4个方位都冒出浓烟火光。

对55岁的林黄梅（化名）来说，她没想到会遇上这么悲惨的一天，她和先生并不是有钱的华人，她的先生过去教华语，印尼禁止华语后，先生改行做小生意，两人积攒大半生，买下了华人社区一座普通的平房。暴动当天，隔着河流对岸的贫民区印尼邻居都都冲过来了，拿着长棍、菜刀，高喊：“中国人，滚回去！”3个面目黧黑的年轻人，当着林黄梅的先生面前轮暴她，林黄梅吓得一动不能动；事情过了第三天趁先生不注意时，林黄梅喝下一瓶“拜贡”杀虫药水死了。

印尼华人，为了求生存，自己家的女人被强暴了，也喊叫不出来；印尼就像无政府状态，华人的命运已沦为贱民，好像人人可踩踏。

一位在庇护所作的人员说，这群因为政治因素而遭受强奸的妇女，许多已出现不稳定的状态，不是眼神空洞，直视前方，就是又哭又笑。

生活在印尼的妇女，生命更像芥子。连庇护妇女的组织，本身都是属于秘密非法的一种组织，需要隐藏在曲折的暗巷内。不管暴动中的强暴行为，是否作为一种有计划的行动，强暴弱势妇女已足够做为一种恫吓手段。

（原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年7月5日）

华裔的血泪控诉

张玉瑛

尽管对印暴动之事早有所闻，但日前抵达雅加达时，面对满城残破的凄凉景象，仍感到怵目惊心。暴动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华裔，许多人家破人亡，更令人悲愤的是，华裔妇女在这场灾难中，已确知有168名遭强奸，23人因而死亡。但仍有更多的惨案未为人知，并且可能还在发生。

经救援组织查证的168件案子几乎都是集体施暴。施暴者衣着整齐，并非穷困贫民，目击者都说他们开车而来，开车而去。

我在一家医院亲眼目睹一名受害者。这可能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时刻。病房的药水味弥漫在每个角落，病床上躺着一位被强暴的年轻华裔女子，她脸色惨白。她勉强笑了笑，但那受惊受怕，惨遭灭绝人性虐待的心灵按捺内心激动。问她为什么不公开控诉暴行，她说：“如果能保证我全家安全，我会把心都掏给你，但现在连政府高层都说没有这种事，谁能保证我们安全？我们是华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以欺负的。”这名生长在印尼的华人只会说印尼语，透过翻译和我交谈。“我们怎么报仇，用枪吗？华裔申诉无门。现在只有向人权组织讨回公道，只有蒐集资料，只有国际压力，我们的环境太过敏感”。

在发生一幕幕惨绝人寰的事件后，大多数受害华裔妇女至今仍在暗处哭泣，生怕被人发现，毁了自己、毁了家庭。我试图接触另一个受害者，但她哥哥取消了原本答应过的见面。他说警察到他家去调查，并警告他们不得对外说话。我从友人处得知她受害的经过。那是个停电的夜晚，穿着整齐的数名匪徒乘车前来，入屋后，把女佣和幼小家人关进浴室。她本人惨遭施暴。

一名接触过受害者的华裔义工告诉我，“有些受害者医学常识不够，父母、丈夫又觉得羞耻，只往伤口涂上一些红药水，不去看医生；有些人已精神失常，甚至残害自己的身体；更令人悲伤的是，有些观念十分保守的华裔痛苦的父亲竟逼迫受害女儿喝杀虫水自杀”。

受害者大多躲在雅加达市内不知名的角落，有些人则远离雅城逃到香港、新加坡等地。直到现在，受害华裔妇女因有许多苦处，仍不能挺身揭发这些暴徒的丑行。

伊美达（Imelda Wigoeno Kurniawan）是印尼国家羽球队教练，拿过1979

年共和联邦与 1980 年世界比赛女子羽球双打冠军。这位基督徒在动乱后担任义工。她在探访受害者后对我说：“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惩罚，但社会也要严惩暴徒，我希望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我甚至认为应该阉割这些人。”

身为华裔，伊美达有个她自己也不会写的中文名“王珠金”，她用英语说出个别字的意思，以免听者写错。不过她说，“我代表国家出去比赛，内心想的就是要为印尼争光，在我心中，这里就是我的国家”。她认为印尼社会有名望的人应挺身而出，帮助这些受害者，“形成一种社会运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家都怕，使恶徒的暴行不受严惩，这是姑息养奸”。

自 1996 年 7 月后，就开始有宗教团体成立救援组织。今年雅加达血腥事件发生后，这些组织迅速召集义工展开救援。许多印尼人不顾忌阴谋者威胁，自愿加入救援行列。在雅加达郊外一个杂乱的小屋里，我见到挺身而出援救受害者的善迪阿宛神父。

善迪阿宛神父在动乱发生几天后，听说雅加达以外一名华裔妇女惨遭强奸的事，就判断在动乱中心的雅加达城内必定有更多这类事情，于是和义工深入调查、探访，挖掘出数目愈来愈多的悲剧。

半数受害者惧露身分

善迪阿宛曾因争取人权而入狱，是印尼广受尊敬的人权斗士。他在首都市郊设立救援中心。很多教友在他感召下，不论肤色种族纷纷出钱出力。在他努力下，已有半数以上受害人得到义工的医疗照顾，但从数字来看，至少仍有一半受害妇女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善迪阿宛表示，暴徒恐吓阻挠调查，意图掩盖真相。他说，受害人的身心都受到难以言喻的创伤，强奸和绑架有很大不同，受害人有着难以形容的恐惧。美国国会希望能带受害人去美国，在听证会作证，但印尼受害人不可能前往，因为对她及她的家人都极危险。不过目前已有受害人到了国外，如果他们愿意前往美国作证，就能起作用。善迪阿宛说：“我成立救援机构的目的，首先是在社会上帮助受害人，第二步是要打开深锁阴谋的大门，并下定决心深究隐藏在这些罪恶、屠杀、暴行之下的真相。”

希望去中国大陆或台湾

在我和神父交谈的时候，大厅里有愈来愈多的人前来寻求协助，他们大多

数是暴乱中房子、工厂被烧毁的华人。住在雅加达郊外的华裔廖吉轩说，他的村庄有500户人家，暴乱时蜂拥而来的暴民至少几千人，“他们抢啊烧啊，什么都抢光了”。受华文教育的他说：“如果他们敢再来侵犯，我们一定跟他们拼，死也要死得有尊严。”这些华人有的带着乡长、区长的证明文件，有的带着房屋工厂烧的照片。义工请他们填表，了解损失，发给援助金。只会说闽南话的黄章谦表示，他已经快三个月没有工作，“家里有三个小孩，最小的才六个月，要吃奶粉，一罐要五万印尼盾（约四美元）。现在靠亲戚帮忙，我也卖点小吃，可是不够用。这里赚钱很难，如果中国肯让我们去，我们很感谢。台湾如果肯让印尼华裔去做工，我也要去。”

清秀的钟云妮23岁，她用生硬的华语说，父亲是工厂老板，受打击很大，伤心得不愿出门。她带着家里汽车、房屋、工厂被烧毁的照片来救助中心，“知道有很多华裔女孩被强奸，我也很害怕”。

前来求助的人中，有一些是贫穷的原住民。义工蒂蒂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家人“在百货商场被烧死，有些只是小孩，死时手里还抱着玩具”。她说，这些穷人受到挑唆，纵火者高喊“抢抢抢，免费的”他们煽动进商场抢东西，结果在屋内被烧死。

救援行动民开不久，恐吓猥亵电话不断。不过透过各地民众热心通报，配合实地勘查探访，终于统计出168名的被害人数字。一位被称为“勇女士”的华裔义工表示：“我们真正接触到的受害者并没有这么多，很多人拒绝我们帮忙，因为他们十分害怕别人知道，也怕遭受报复。”

被奸怀孕却难以堕胎

一些被奸妇女检验出已经怀孕，而医生不敢随便做堕胎手术。有些女孩尚未成年，须由父母作决定。虽然专家认为，受害者怀胎的精神状态会比受强奸还要令人难以承受，但中心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由受害者自己决定。

电话通报热线遭到窃听，也增加了他们的困难。勇女士说，“一方面我们要清楚知道情况，但又担心受害人遭到报复。现在我们要设法避开窃听”。

救援团体共设有医疗、法律、心理咨询、热线与调查等五部门。在接获通报后，调查部门会去现场模拟有没有可能，也调查这名妇女是不是这里的居民。勇女士说，每次调查都有男性义工陪同，也安排能讲华语的义工。法律部门则向大众报告真相，也要向军事法庭、政府控诉。至于民众在大火中烧毁的

契约、证明文件等等法律问题，他们也提供协助。捐献也是由这部门负责。“对外我们向世界人权组织报告这些调查结果，也报告世界妇女组织，国际回应也很好，希望声援活动能持续进行”。

“这些施暴者的共同特征是，都在华人区下手，而且是很平常的家庭。如果是贫富不均造成，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的结论是强奸行动是有组织的行为。另一个疑问是，在大火中，怎么还会有兴趣强奸？除非他不是人。”勇女士说，正常人不会做这种事，“我们相信这是藉伤害华裔妇女，达到打击整个种族的目的”。

原住民查勒世是天主教徒，他在善迪阿宛神父处担任义工。他说，印尼发生这样的事让他很不舒服，“我常在想，为什么要发生这种反华人的事，希望我们的医疗救助工作，可以帮助受害华人的重建家园，自己也可以从中释怀”。

谈到一些受害女子现在看到肤色较深的原住民就会惊恐或大骂，他说，“这需要时间来抚平伤口，至于我做义工时被误会，这没有关系”。他说，“如果再有华裔妇女被伤害，我愿意保护她们”。不少华人告诉我，很多原住民员工保护华人老板的店铺，而很多华人也因原住民保护而未受害。

当地佛教团体也成立一个佛教援助受难协会。慈济志工陈金福表示，“我们6月初才开始行动，因为暴乱时我们也是受害仍，现在安定来来，大家才赶快出来做事”。陈表示，慈济在医疗上较有经验，受伤的受害人由他们负责，有些家庭经济成问题，没钱让孩子读书，他们也帮忙。

华人需要免恐惧的自由

留学台湾的陈金福认为，暴乱除了历史原因，印尼的学校教育、大众教育也都出了问题。“学校没有教导学生道德意识，常有数十学生拿刀拿枪在街上械斗：大众教育更糟糕，譬如农业部长居然在电视公开讲，养殖业、咖啡园被抢不超过5%，暴民的所作所为可以原谅、可以理解”。

华裔女企业家张锦美对我说：“海外的人一定要清楚，这里的华人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出门怕，在家也怕。我住的那区有一天晚上10点停电，我心头一震不觉恐惧，因为不知是真停电，还是暴徒又要来”。她表示，华裔要的不过是免于恐惧的自由。56岁的她谈到受强奸的华裔妇女，忍不住痛哭出声，“太惨了，这些女性成为牺牲者，我们挺身站出来为她们、为华裔说话，是我们该做的”。

过去华裔多只顾生意，但现在政治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年轻的黄传强近日黯然结束自己的贸易生意，但现在政治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年轻的黄伟强

近日黯然结束自己的贸易生意，和一些过去生意上的朋友投入社会服务工作。“现在大家都没有生意可做，有时间关心族群。过去30年我们在印尼没有地位，现在我们要站起来，华人被害得这么惨，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他们准备成立一个组织，到海外和香港、台湾争取华裔投资者，也替受害者募款，和帮助分期的印尼人与华人。“只有华裔出去说话才有说服力，因为我们是受害者。但也只有政府对不法分子绳之于法，才能吸引投资”。

在这次暴动，印度族也受到伤害，除了有印度裔商店被毁外，也传出两名印度裔妇女遭强奸。他说：“以前在我们村里，印度裔和华裔从不往来，现在我们都非常团结，甚至在研究怎样合作生意东山再起”。

手无寸铁的居民，现在也纷纷购买防卫工具。为了怕给安上“私运军火”罪名，华裔买的大多是气枪、原子枪及瓦斯枪；年轻妇女组成自卫组织。一支法国制警察用手枪配塑胶子弹卖200美元。我看到的塑胶子弹手枪来自澳洲，枪主未透露价钱。“我们只想吓退暴民，并不要打死人，所以不买真枪，因为打死人是要上法庭的。”一名枪主说。

李冠瑶是当地著名中医，他用办义诊的方式改善和原住民的关系。“我办义诊已有一段时间，华裔、原住民都来求诊，平均一次义诊可以服务100多人”。他不避谈许多印尼高层政治人物都曾是他的病人。“要改善华人和原住民的关系，需要更多有经济能力的人合作，帮助当地政府、人民”。

华裔改生活习惯

行经几处破坏最厉害的地方，只见整排的店屋已成一片废墟。拿着铁锹、卷起裤管袖子和工人一起拌水泥的牙医李珊喜把损失看得很淡，“他们很早就来烧我们这里，我那时家中还有病人，根本不知外面发生什么事。只是奇怪为什么这么吵，推窗一看，外面的车子全向后倒，旁边屋子冒出火光，很短时间就一片大乱，我的两个原住民女佣一直叫我快逃”。她笑着说，现在只是修补一些地方，还不敢开业，“仪器都被搬走了，现在不敢随便再进口”。

雅加达的街上无业游民也愈来愈多。许多没有工作的人在街道转角处替车辆开道，讨些小费。不少华裔也改变生活习惯，不再驾驶高级车，很多人改开便宜的面包车。街上也出现一些市集，专门摆卖从华裔家中、店中抢来的物品。虽然也有华裔到此闲逛，但大多都不齿于买这些东西，因为东西的主人可能正是熊熊大火下的牺牲者！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8月3日——8月9日）

强奸华裔妇女暴行不容抹煞

赵子隆

印尼人权组织强烈批评政府，在调查小组未有正式报告之前就先作评论复作恐吓，是别有企图。

台湾一个妇女组织投诉：在印尼的台商被印尼警方警告，不要谈论强奸事件。

在导致独裁总统苏哈托辞职的暴力事件中，数以千计华人住宅、商店和建筑物遭到焚烧和抢掠。根据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和人道志愿者组织公布的材料，5月13到15日在雅加达发生的骚乱中有1200人死亡，五千多间制屋被抢劫和烧毁。另外。5月13日至7月3日期间，有168名华人妇女遭到强奸和性骚扰，其中20人已死亡。特别是有关强奸的报道激起全世界华人义愤。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举行了反印尼的抗议行动。

印尼当局不得不作公开谴责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印尼当局不得不对排华暴行作公开的谴责。总统哈比比在8月15日独立纪念日前夕向国会进行首次全国演说时，谴责五5月排华暴乱。他说：“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实在非常可耻，令我们国家名声受辱。”他声称：“我们要捍卫人权，表示我们大家都不分宗教、种族、肤色、性别或社会地位而尊重人的尊严。”

印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也表示，军方为无法阻止5月在雅加达发生的暴乱和强奸事件道歉。

印尼外交部8月14日发表措辞强烈声明，声称“已采取果断行动”彻查5月强奸华妇暴行，又表示会提供设施，让受害人及家属能寻求心理医生、法律学者及宗教领袖提供的咨询辅导。

声明说：“任何被判定与强奸暴行有关的人，都会面对法律的全面检控。”为此，印尼政府成立了联合真相调查小组，搜集有关5月暴乱的资料。联

合真相调查小组认为，需要3个月才可完成调查。

高官迫不及待地进行否认

印尼高级官员就对有组织强奸华裔妇女的暴行进行否认、狡辩、甚至恐吓。

调查开始不久，印尼资讯部长引述哈比比称，有迹象显示关于强奸暴行的报道，已“泛滥得太过分”。哈比比说：“有关强奸暴行的报道，更多却是内容失实，带有煽动和政治宣传味道。众多报道正令我们难以恢复国际信誉。”

8月24日，国家情报局首长莫伊托吉中将说，他派出的人员曾造访多个涉嫌有人被集体强奸的地方，也在市内多间可能治疗受害者的医院询问过。他与总统哈比比会面后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5月中旬发生过此等事件。”他指出，没有任何一位女士出来向治安官员报告自己曾经遭受强暴。因此，莫伊托吉认为有关报道可能是有人凭空编造出来的。

印尼总警长罗斯曼哈迪表示，印尼警方已成立一个以全国刑事调查主任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全面收集有关印尼发生的强暴事件资料和证据，包括印尼非政府组织的指控。而新闻部长大尼斯却表示，警方已对103宗怀疑强奸案进行了调查，但未有发现足够证据。罗斯曼哈迪进而特别警告，非政府组织必须提交5月暴乱时发生广泛强暴案件的证据，否则会将“造谣者”拘查问话，甚至提出检控。

印尼外交部长阿拉塔斯8月24日也试图向全球申明，雅加达政府正在积极调查5月于首都爆发的排华暴乱，同时他欲质疑海外持续不断的示威活动，根本没有必要。

印尼人权组织强烈批评政府。在调查小组未有正式报告之前就先作评论，复作恐吓，是别有企图。

民间组织批评政府别有企图

“人道志愿者”组织发言人阿贡坚决否认该组织散播谣言。她说：首先，“人道志愿者”搜集所得的所有资料，已呈交全国人权委员会；其次，我们已向由六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全国实情调查联合小组，呈交报告，并解释我们搜集数据的方法；第三，我们几名成员已会晤哈比比总统与其讨论这些资料。

由印尼政府委任，专责调查5月雅加达暴乱事件的特别工作组，8月26日

也批评警方。指他们不应怀疑暴乱期间曾发生集体轮奸事件的报道，并强调强奸指控千真万确。领导特别工作组的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达鲁斯曼说：此等言论只会损害我们的工作。工作组已完成了收集资料，现阶段正在“核实中”，料将会在3个月内完成调查，特别工作组分成3个小组，分别负责核实资料、听取证供，以及纪录受害者讲述的经过。

针对国防和安全部长维兰托8月26日发表的关于迄今还无法证实骚乱期间发生强奸案的谈话，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成员班邦说：“我们已经找到证据，并请求强奸受害者作证。”他同时希望政府相信委员会的工作。

印尼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受害人实情调查小组主席萨巴里纳·萨德利，8月19日批评印尼治安部门和一些政府官员试图在公众中制造5月骚乱中华人妇女没有被强奸舆论。她对出现这种情况表示非常遗憾。

萨巴里纳在接受《革新之声》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正在收集有关全部事件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警察部门和政府官员在政府成立的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和人道志愿者组织等完成其任务前不要发表混淆是非的言论。”

萨巴里纳说，一些人进行恐吓、威胁和施加压力，以使有关方面不把强奸案件的事实和真相曝光。她说：“现在实际上已有受害者要报告事件经过，但当听到警方和一些人的讲话后他们不再准备报告了，因为怕受威胁。”

台湾一个妇女组织，8月31日针对印尼官方声称找不到证据证明华妇遭强奸的说法进行抗议，呼吁雅加达政府不可乘机结束调查。他们还投诉在印尼的台湾商人，曾被印尼警方警告，不要谈论强奸事件。

印尼一个救助受暴华裔妇女的组织“妇女之友”表示，一名曾在暴乱现场负责煽动的男子向她们承认，他在5月暴乱的两个月前，曾在雅加达市郊接受“政府单位”的培训，专门在暴乱现场放火焚烧建筑物，当时亦有其他人接受强奸华妇的训练。

该组织负责人莉婭称，该名男子在一次暴乱中受伤，并被在场的义工救起而坦承错误。她说，此人目前正受到严密的保护及调查，必要时会指证策动暴乱的幕后黑手。

证人失踪传讯记录被盗

正当人权组织近日指有利益集团意图掩饰5月暴乱真相之际，印尼非官方组织“失踪人士及暴力受害者委员会”8月26日表示，两名相信是暴乱的主要

证人，现正下落不明。

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两名分别名乌汉巴利和纳西的受害者，起着决定的因素。他说：汉巴利在暴乱时曾在位于雅加达中部的格洛多克华人区，他被人看到很害怕地离开现场，又告诉街上的人说看到一些东西。

另一名人权律师穆尼尔表示，两名受害人均可能是主要证人，可以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暴乱是否有人策划，以及假如有人策划的话，策划者又是谁，所以委员会对他们的失踪，感到很担心。

据当地新闻媒体8月29日报道，印尼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日前就5月骚乱传讯雅加达特区省长苏蒂约索和雅加达军区前司令员夏弗里·沙姆斯丁的记录被盗。

据报道，实情调查委员会委员班邦·维佐揭扞和他的两位同事28日晚驾车到雅加达市的一家餐馆用餐时，将装有传记记录的文件包放在了汽车内。当他们再回到车上时，发现装有传讯记录的那个皮包已不翼而飞，而他的两位同事的皮包却安然无恙。班邦说：“车子没有被损坏的痕迹，车内的警报器也没有响。”他说，他的皮包是被一伙相当专业的盗贼偷走的。

据报道，这些记录包括苏蒂约索和沙姆斯丁回答调查委员会有关5月骚乱的记录。苏蒂约索在作证时说，他认为5月发生在雅加达的骚乱是有组织的，是有人煽动的。沙姆斯丁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

传媒伸张正义之声

中国官方传媒8月22日严厉警告印尼警察总长罗斯曼哈迪莫勿再敷衍塞责，应迅速行动把犯下排华暴行的凶徒绳之于法。

北京英文《中国日报》在社论中表示：“全球华人都盼望正义得以安息。”

该报批评罗斯曼哈迪只懂责骂非政府组织夸大强奸事件，甚至威胁会以散播谣言的罪名控告他们，反而不肯积极地发掘暴行的证据及追缉凶徒，这种做法只会加深强奸受害人的创伤，令她们不敢挺身作证。文章又指责印尼警察多番否认收到强奸的报告，对血腥的图片及证供置若罔闻。

社论警告说，“由於被奸的受害人往往难於向警方启齿举报该类罪案”，印尼警方对人权组织的指控，“只会为受害人带来恐惧，令他们不敢提出证供。印尼警方的不当立场，只会阻碍调查进展，延误惨剧获得妥善解决”。

亚洲金融风暴强力冲击印尼30多年独裁统治，结果苏哈托下台了，印尼人民却陷入贫穷境地。8月31日，联合国发表一份报告，指每三个印尼人中有两个人明年可能会生活在赤贫之中。印尼当局要整顿及发展经济，现在首要是稳定社会秩序。掩盖排华暴行，怂恿暴徒，不得民心，而且只会令社会更加混乱，阻碍经济复苏。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10月号)

义工遇害 公义荡然！

尤莲娜 张弓

华人妇女强奸案救援小组的义工王静丽惨遭杀害，警方定为谋财害命案，但舆论坚信是政治命案。纽约人权组织呼吁印尼政府必须彻查。

年华似锦的王静丽，对未来充满憧憬，也应该拥有诗与梦般灿烂的日子。然而，印尼五月暴乱却为她带来身心创伤，不过，她仍振作起来，与邪恶的势力搏斗。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个法治不彰及暴力充斥的国度里，她终于被打倒了。王静丽是5月暴乱及强奸案救援小组义工，上周在寓所被杀害，警方把它定为谋财害命案，但人权组织及舆论坚信这是政治命案。

10月9日，现年18岁，又名伊达的高中女生王静丽因身体不适没有去上学，父亲王清元（印尼名李奥）和母亲郑冬云照常到雅加达东区去做家具生意，姐姐爱薇也上班去了。当他们下午回家时，发现王静丽遇害死在房间内，身上被砍十余刀，喉咙被割。

雅加达中心区警长伊曼在事发当晚表示，死者房内财物没有损失。后来警方于第二天开记者会，宣布已抓到凶手，是死者的邻居乌当，一个现年22岁的无业青年。警方又于第三天开记者会，出示证据说是被凶手抢去的一批人造手饰及凶器，两次记者会都由雅加达总警长努格罗荷主持。

王家境况小康，王清元出生于东爪哇，已不谙华语，妻子郑冬云则来自南苏门答腊的楠榜，仍稍懂华语及客家话，婚后住在出事地点已20多年，育有2个女儿。王静丽在一家基督教学校念书，性情沉静，甚得人缘，学校教师及邻居都说她是个好孩子。自5月暴乱后，她常精神抑郁，不时缺课。据其亲人说，王最近补习华文，计划到马来西亚的砂朥越州的古晋读书。其亲友透露，王于5月暴乱中曾被强暴。

王静丽的母亲郑冬云是一位虔诚佛教徒，自5月暴乱及大量华人妇女被强奸案发生后，与女儿积极投入对受害者救助工作，已办好旅行文件，将陪同4名强奸案受害者前往美国作证。她在女儿灵柩前对亚洲周刊说：“为什么对这么善良的孩子下毒手，这个社会太残酷了。”她说，事发后已有100多名记者来访问，

案子正在处理中，暂时不愿多谈。

警方列为普通刑事案

案发前一天，由哈比比政府下令组成的5月暴乱调查团宣布，结束两个月的调查工作。该团团长玛朱基·鲁斯曼指出，警方把该案定为普通刑事案，未免为时过早，案子是有组织的高手做的。联合各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救援工作的善迪阿宛神父说，这起谋杀案是对救援小组成员作出恐吓的一个高潮。

由宗教界及各阶层热心人士组成的救援小组自5月暴乱展开活动后，属下成员遭到各形式的恫吓与威胁。妇联与人权领袖卡尔丽纳与善迪阿宛神父，周前向全国人权委员会投诉他们前后的遭遇。

印尼法律界及人权分子皆认为，凶杀案不是个别案件，从王静丽的死状看来，是职业杀手干的，死者久已受到监视。职业律师鲁胡德说：“这不是普通命案，做案的人没有拿走财手，只要死者的命，而且在白天行事，邻居没有听见死者的喊声，可见凶手是内行人。”

人权活动家阿都哈金·努山打拉认为，此案将使5月暴乱受害人及救援小组成员更提心吊胆，政府应该保护他们。他又说：“这个国家真可怕，致力伸张正义与公道的人却遭杀，我在哭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

社会各界对王静丽之死深表同情，大批社会活动分子前往吊唁，独立报章接到许多读者致哀的电话及传真。民运与人权组织领袖努尔夏合妮说：“传媒常报道救援小组人员受恫吓的消息，但治安当局无动于中，极令人遗憾。”就在该命案发生后翌日，雅加达西区一位回教信徒义工阿妮纳·沙林夫人也遭电话恫吓及暴力威胁，有人凌晨去破坏她的家。当她打电话报警时，警方要她亲自到警局报案。

伊联主席瓦希德谴责暴行

该案也受到在野领袖极大关注，最大回教团体伊斯兰教士联合会（伊联）主席阿都拉曼·瓦希德，于日前举行的一项近十万人群众大会上演讲时谴责有关暴行，并敦促政府撤查该案。前环保部长、压力团体国民阵线首脑沙尔禾部长指出：“这是权力文化对小民一种残害，但不要把它当作是针对某一个集团。”

各界纷纷质疑警方作出的结论，伊联另一位领袖、也是5月暴乱调查团成员

沙益德·阿基西拉说：“我怀疑这是普通刑事案的说法，我更相信她是因为要出国作证才被杀死。”印尼人道与法律援助协会主席亨达迪也表示：“我不相信警方的话，因为疑点极多，警方必须进一步撤查。”

对于警方于24小时内破案，甚多评论家发出讽刺的声音。民运分子拉特娜·沙隆八说：“当我在报上读到凶手被捕的消息时，只感到好笑，我们的警察真了不起呀！”执业律师鲁胡德表示：“如果被捕的是真凶的话，那真谢天谢地了，这是警方的极大功劳。”

被苏哈托政府停刊4年，周前刚复刊的《时代》周刊报道，雅加达首都专区警察总部对该案别重视，刑探大队长科利斯·美列上校于案发当晚，“亲自到国立中央医院去取验尸报告”。为使公众确信凶手真的抓到了，警方特意两次安排乌当与新闻界见面，回答问题。

分析人士认为，不管王静丽命案真相如何，她的死已再度引起世界对印尼人权状况的关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呼吁印尼政府，必须保护强奸案救援小组成员，并且全面调查这宗谋杀案。香港市民再度前往印尼总领事馆抗议示威。

王清元夫妇指责警方在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下，在死者房间搜走所有东西，没有留下收据。法医穆因向新闻界透露，死者未遇难前曾遭到性暴力，但后被警方否认，说穆因已收回该谈话。在死者未送往医院验尸前，警探向其邻居散布各种不利死者的消息，说死者曾与人进行不正当性行为。

王静丽火葬后第二天，姐姐爱薇在警方的陪同下现身说法，否认妹妹是人道救援小组成员，并希望记者报道该案件时“笔下留情”。爱薇说：“我爱这个国家，我还要在这个国家住，但愿新闻界不要报道与本案无关的事，本案纯是一件刑事案件。”同一天，国家警察总长鲁斯曼迪在记者会上发出警告，若有任何人就该案公开发表不实的言论，将受到起诉。他说有人故意藉机渲染这起命案，把它政治化。

鲁斯曼迪两个月前向发表强奸案报告的非政府组织领袖恫言，如果不能提出证据，将被绳之以法。他的恫吓导致原来打算出来作证的受害者退缩不前，某些亲官方的回教团体也乘机反驳5月暴乱中曾发生的大量华裔妇女被强暴的说法，警方开始传召《雅加达·雅加达》周刊负责人，要他对强奸案的取道作出交代，一些国会议员也呼应，一时之间，似乎强奸案是无中生有的事。

世纪大冤案或长期掩埋

《时代》周刊的复刊号以强奸案为封面专题，其中报道了华裔回教徒、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安顿曾救助八名受害者的经过。该刊作出结论说，暴乱期间确实发生了强奸案，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受害人本身或曾向受害人伸以援手的医生出来作证，该刊认为，如果这样下去，这件世纪大冤案将会长期被掩埋。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10月19日——25日)

三日“风暴”我们受困在新村里

云 文

1998年5月13、14、15日在雅加达发生的暴乱事件爆开了！平时热闹、繁华的首都忽然变成黑暗恐怖。凶残、灭绝人性的暴徒像火山爆发的岩浆，从GROGOL TRISAKTI前面开始向西区华人密集地带席卷而来。他们焚烧车弧捣毁商店、银行、大厦、抢劫东西、钱财及将其建筑物烧毁。

这是我有生以来不曾看过的惊心动魄的一件事，也是印尼首都史无前例发生的爆乱事件。首都是祖国的心脏，在许多外地都发生爆乱时，我们首都一向是平安无事的。

从12号开始，首都在城区GROGOL一带就乱成一团；自TRISAKTI大学生运动遭到当局镇压并开枪打死了6名大学生开始，我就想到这个情势不妙，这会引来更大的民愤，尤其在金融风暴下，物价飞涨，近来政府又宣布汽油涨儿使人民生活陷入更大的困境中。

从电视上我们看到大学生运动，看到许许多多全副武装的警察，看到暴乱的场面，死伤的惨局。血，手指一般的子弹，真像电影中所看到的镜头，可怕极了。

我们家里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形；老伴去上班不能回家，孩子们出去营业也回不得家。

我在家里一直打电话联络朋友，问他们外头发生的事，听他们说，暴乱分子在GROGOL一带行动，一直蔓延到二角桥、三角桥、五角桥、万灵岸、伊拉岸、伯辛……甚至首都中心的苏迪曼街，最后消息传来，在DAANMOGOT，珍加连、又听说在BOJONG的巴刹……

我们新村居民从13日晚开始自发性守夜，大家拿起木棍、铁条来自卫。平时大家因各自忙碌极少相互来往如今因着这共同的灾难而紧紧团结起来；有的煮些点心、咖啡给大家提神，有的菜馆还煮一大锅米粉丝免费给守夜的人们吃宵夜。

观看、追踪电视新闻广播成了大家生活最重要的一环；我们不敢出门，最

多只在巷子里走动，不敢远离各自的屋子，深怕暴徒忽然袭击村子。从电视上，我们目睹一大群暴徒抢劫店屋，男女老幼光天化日下把商店所有的东西抢走，然后又放火把大厦焚烧。

风声很紧，我们被困在村子里，在自己的屋里，不敢走出村子。遥望天空，有好几处烟雾弥漫，东一团西一团，有人说那是伊拉末的一排店屋遭烧毁，有的说那是城区各洛朵。

风声传来，说我们新村不远的百货公司TOPS被暴徒进攻了，所有东西被抢劫一空之外，还被放火烧毁了；这一切我们只在电视里看到。

我们都在紧张戒备着，为了预防暴徒忽然袭击，我们把一切重要证件收拾好，像面临战争似的，随时准备逃荒。新村里，没有见到一辆汽车行走，除了巷口一簇簇守候、备战的人群外，偶尔有一辆电单车或脚车驶过。

所有东西被抢空，听说守护的村里人要求暴徒别烧毁它，可是到了隔天我再去看，那一整排共11间店屋已变成废墟。

我们新村的小型百货公司LISTA及BLOK H的两间小MINI MARKET也无法逃过暴徒的魔掌，当外来的暴徒强行破坏店门后，附近村民就去抢劫，暴徒们说：现在来拿东西是免费的，明天你要这些东西就须用钱买。就这样，我们新村居民眼巴巴的看着一群来自村外的群众纷纷涌来，然后又眼巴巴的看着他们浩浩荡荡的扛着东西走回去，他们似乎没有一点犯罪感，就这么“光明正大”的掠夺别人几十年辛辛苦苦挣来的财物，这些丧尽天良的人们实在太可耻！太可恶！

（原载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华人资料》第73期）

一位印尼华人青年的控诉

常 虹

29日下午在市府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一位逃离印尼，亲眼目睹了印尼排华暴行并亲身经历了暴徒抢掠家人的印尼华人青年声泪俱下，控述了5月间印尼首都雅加达暴徒光天化日之下烧杀掠抢的暴行。这位青年在记者会主办者的要求下隐去了姓名，出现在电视节目中的画面也进行了技术加工。其叙述如下：

“回忆印尼发生的事情是悲惨的。多年来以华人为替罪羔羊的事件一直在发生。我的父母、我自己都亲自经历过。在小时候，有人常常向我家中抛石块，我不懂人们为何这样做，就不理会，保持沉默。

5月28日暴乱期间，有人暴力般地敲我家大门，有6个人，其中还有人拿着一把大刀，要我们家人给钱。我害怕极了，透过窗户，我把身上所有一万印尼盾给了他们，可是这些人要10万盾钱。我没有办法，就向母亲和兄弟收集足了钱交给他们。这些人断了我家的电，不能做饭，我们也不敢出门。通过收音机知道外面大乱。因为我家附近是印尼人的房子，我家才免于—炬之下。形势越来越糟，我送母亲去了其他城市，让兄弟躲在朋友家。我则得到一张机票逃离家园。在机场的路上，到处火光冲天，都是烧毁的房屋，如地狱一般。一路上非常不安全，有人大喊大叫，打砸掠抢，我曾在家里打电话给警察和军方，他们却让我们自己顾自己。我们没有钱来保护自己。现在理解了，我们华人是替罪羔羊。”

（原载美国《侨报》1998年7月31日）

恐怖的日子

蓬 花

早就听说印尼各地发生烧、抢事件，许多华人财物被洗劫一空，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雅城虽仍平静无事，但人心惶惶、谣言纷纷，大家都感到也许不久灾祸就要临头，我也听从儿女们的劝告，无事不出门，以免家里人牵挂。

但雅城是印尼的首都，一向防守森严，我万万没想到竟然也会发生烧、抢事件，而且比其他各地还闹得更厉害，更严重。

5月13日那天我因有要事与外子到城区，不久就听到人声喧哗，说葛罗克尔区某处被火烧，我也跟着别人向着火烧的方向看去，果然火焰冲天，浓黑的烟雾弥漫在晴朗的天空，我心慌了，赶快与外子坐计程车回家。其时路上也挤满了赶着回家的各种车辆，途为之塞，无法前进。好不容易到达乐西区十字路口，不幸路上已有军警把守，所有车辆不能继续往前走。我们只好下车。许多市民都围在路上观看，心想怎么办呢？因惦记着出门的小儿子不知是否已回家，只好跟着许多步行的市民往前走。望着烟雾弥漫的前方，心里好紧张、好害怕。走到葛罗克尔特利抄克蒂大学附近，看见一群暴徒正闹得凶，他们见车就烧，用石头丢掷守卫军警，破坏两旁的建筑物，打碎所有路灯，他们疯狂地呼喊，吐出难听的话咒骂军警。我看见一辆没人驾驶载满群众的大卡车被暴徒推向旁观群众，卡车撞死了两个人后，又撞上人行道路基才停下，暴徒们将它推翻立刻纵火焚烧，一时火烟冲天、秩序大乱。军警开枪示警，暴徒仓惶后退，围观群众四散奔逃，我与外子也随着赶路回家的印尼人东奔西逃，深怕中流弹。情形实在恐怖极了。

我又紧张又害怕，两眼发软，火热的太阳又晒得我头昏脑胀、汗流浹背，我全身乏力，口干唇焦也不敢买水喝，害怕那些小贩恐吓、敲榨。我累得实在走不动，但却不得不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奋力向前走。可是基亚依打巴路通往达安摩葛的路口排满军警，我们无法通过，有好心的印尼老伯告诉我们应走小巷才能通过，于是我们慌慌张张地走进小巷，又弯弯曲曲地走过一条小巷又一条小巷，结果却走进了死胡同。我心里想：完了！怎么办呢？其时除我和外子

两个华人，周围都是印尼人，耳边又听到有几个印尼人大喊大叫！“支那、支那！那是支那！……”吓得我差点心脏停止跳动！唉！糟糕，我们一定被他们打死！

在惊恐万状中，我们冒着危险挤过人群冲出小巷，几经走进走出，等暴徒们被军警吓退后，我们跟着几个赶着回家的印尼人一起取得守卫军警的同意，才通过十字路口逃向大路再钻入小巷。才走不久，军警又追赶一群暴民，我们也拼命地跑，唉！真是惊险恐怖极了！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地回到家里。我全身发烫、双脚酸软、心口发闷发痛、昏头昏脑地一屁股倒在沙发上……。

回想那天情形，真是心有余悸，再也不敢出门。那些是暴徒猖狂了两天两夜，把许多超级商场、银行、办公大楼、华人店屋、住宅都烧光、抢光，雅加达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次空前暴乱，暴徒针对华人，华裔生命、财物损失惨重，我在都市旅馆下面的摊位也被烧光了。往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那些有钱的人都往外跑，没钱的人只能守在家里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事发后，外子参加村中人组织的保安队，早晚都拿着木棍、铁棍或大刀集体防守自卫，至今仍晚晚守夜。一有风吹草动，就把我吓得心慌意乱，心脏蹦蹦乱跳，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有看香港华娱电视的“心连心”节目，越看越心慌，许多人都向住在外国的亲人求助逃离印尼。我的邻居就有几家人逃到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等国避难。夜里静悄悄，风声呼呼，真是“月黑风高杀人夜”，好恐怖、好凄凉、好悲哀！

因为邻居们都各自逃跑，守夜的人就少了，为什么大家不一起留下来呢？如果大家不走团结起来，人多力量大，也许想闹事的暴徒们就会望而却步。有钱的人能一走了之逃过这场灾难，而没钱的穷人，有脚无路走，困于反华的“地狱”里干着急，胆战心惊地度日如年。白天时我提心吊胆，没东西吃也不敢出去买，而且商店的东西早就被暴徒烧光、抢光了；夜晚苦坐到天亮、不敢合眼睡觉！印尼华人遭到如此的厄运有谁同情、有谁为我们说话？我们是海外孤儿，永远受人欺侮、践踏、永远是替罪羔羊！想起来多么凄凉！

据说在雅城的暴乱中，除了许多华裔的财物被抢光、店屋被烧光，也烧死了一千多人，许多华人少女被轮奸，甚至五55岁的老太婆也不能幸免！还把她们丢进火中活活烧死！这些暴徒残无人道、灭绝人性、令人发指！但是，他们还以为很光荣，很了不起，丝毫不感到羞耻！

很感谢香港的朋友们打电话或写信慰问我们,给在傍惶中的我们很大的安慰和温暖,这表示还有很多朋友们在关心着我们;其他国家的华人团体也纷纷发言,谴责这次印尼的反华暴乱。

我们华人奉公守法,安份守己,也已把印尼当作自己的祖国,为当地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为什么他们总是仇视我们、排挤我们?

现在灾难总算过去了,但全国各地仍不时发生反华烧、抢事件,局势并未完全平静。许多华人数十年辛苦奋斗建立的基业都付之一炬,他们的店屋和财产都被烧光、抢光了,华人的生命安全也仍无保障,今后如何生存下去?各地反华浪潮能否平息仍是一个问号。

(原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 《华侨华人资料》 第 73 期)

来自棉兰的血泪报告

沉 冤

5月4日印尼苏北棉兰揭开了另一回合的暴乱，一连数天，暴民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残酷、彻底地摧毁华人经济，反华暴行以烈火燎原之势扩敌。TEM-BUNG、BATANG KUIS、TANJUNG MORAWA、LUBUKPAKAM、PERBAUNGAN SIALANG BUAH、SUNGAI BULU、BEDAGEI、KAMPUNG PON、SEI RAMPAN、TEBING TINGGI（丁宜）、TANJUN BALAI（亚沙汗）PANGKALAN BRANDAN 伙水山）等各中小乡镇先后遭到损失之巨、惨况之烈，令人毛骨悚然，闻之丧胆。

离棉兰82公里的火水山市的一名姓邱的受害者说：5月7日上午10时，先是一群十多岁少年乘车绕市乱掷石块，华裔慌忙关店。而后大群暴民拥上街头，华人打电话求援，来了两车军队驱散暴民，但暴民去而重返，向军人抛石，抛了不到5块，军队就上车逃窜，转而站在附近“守护”，掠夺从11时开始持续到黄昏，暴民工具齐全，坚锁着的铁门都能撬开撞破，3辆车川流不息地把“战利品”载走，就像是大搬家。搬不动、不值钱的全部捣毁，军人偶尔会催促搬快些，卖电子零件的邱先生损失了七、八千万盾，另有一笔要买的橘子■，约好当天交款的六千万盾也完了，邱先生气愤的说：火水山的华裔刚捐赠给印尼人民900公斤米粮及油糖等粮食，想不到吃饱了，有力量了，就来扛我们的货物了，好心没好报啊！

另一位家住棉兰郊区TEMBUNG的妇女哭诉：这些暴民比强盗还凶还狠，杯盘汤匙，连扫帚都不留下，连她抱着的婴孩口中含着的奶头也抢走，家中自来水管被敲破，天花板被戳破，观音雕像被砸碎，还挖地敲墙，搜查镜框、壁钟背后，连水井、香炉里的香灰等可能收藏美元、黄金的地方都搜遍，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滴遗不漏，她逃出时还被搜身，证件撕毁，钱财劫走，只剩身上衣一套，她逢人便哭诉，每逢地震水灾，她必慨慷解囊，可是，现在谁来给她解释呢？离棉兰80公里外的丁宜市则更惨，一对夫妇被迫亲眼目睹，他们的两个十二、三岁的女儿，被十多个暴民轮奸，做母亲的发疯般的冲上前，也被

脱个精光,百般羞辱。事后,一女重伤入院,一女自杀未遂,母亲则痴痴呆呆,连一滴泪也流不下,做父亲的则指着自己的手臂说“十天前,我刚响应政府的号召,捐了250cc的血。”这类绝灭人性,百死莫赎的暴行,不仅发生在雅加达,还发生在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小乡小镇,不仅是一起,十起,而是百起、数百起……

又有一位TANJUNG MULIA村的62岁华裔说,32年前的排华浪潮,把他从亚齐省赶来苏北。当时,他身无分文,32年的奋斗才挣来了堪能糊口的家业,如今眼看又要被洗劫,又要从零开始,他可不会再有一个32年的奋斗,因此,他宁愿把这条老命豁出去,全村的前亚齐难民皆有同感,于是大家拿起刀剑棍棒与来犯暴徒拼斗,打退了暴民两次进攻,保住了家园。

惨案过后,侥幸未被掠夺的华裔,每天须缴付高昂的保护费、各种募捐,流氓敲诈,无日无之。白天,大家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关店。每个店铺都尽量减少存货,大家都心中有数,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一个小时之后,大家都会只剩下一套身上衣。晚上,不管是金店老板或杂货店主,大家都在店铺前,马路边,带了棍棒席地而坐,守夜到天明,就像是丐帮的徒子徒孙。

在这维护人权的呼声响彻云霄的今天,在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建国五基之一的国度里,竟发生了如此绝灭人性,比禽兽还不如的暴行。而且这暴行不仅发生在棉兰,十天后又发生在雅加达,梭罗,5月27日又在离棉兰170公里的亚沙汗重演,然后是爪哇的TE-GAL……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没有严惩暴民,没有一声谴责,世界上人口最多也最强盛的中华民族,在印尼的地位比狗还不如!肯定的,惨剧并未结束,好戏还在后头,华族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在印尼的华族被残暴地蹂躏欺凌到这种骇人听闻的地步,可是标榜与高挂着维护人权的各国人权组织与联合国怎么却一声不吭,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些人权组织给受害者伸出了什么援手?尽了什么力?它还配称得上是一个维护人权的组织吗?人类的尊严何在?天理何在?

所有华人,所有全世界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各族人民,所有真正的人权组织,马上行动起来,谴责印尼暴民的暴行,援助受难的华裔,尽一切力量,制止此类暴行越演越烈!

人权必胜!暴行必灭!

完稿于1998年6月16日

(原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华人资料》第73期)

暴徒把我的家抢劫一光

小 翁

印尼因政治、经济危机，反华暴动在各区域频频发生，一时人心惶惶。5月初在梭罗、棉兰以及在中、西爪哇各地发生排华暴乱，华人损失惨重，许多人无家可归。我们从本地电视台可以收看到。排华之风暴紧接着在首都雅加达发生，而且是空前绝后悲惨。暴徒除了抢劫，放火焚烧住家、商店以外，还做出强奸、侮辱妇女之暴行。6月11日印度尼西亚日报写道：约有1216名华裔投诉了他们身受的不幸遭遇，包括他们的商店住宅被焚烧与捣毁，以及身受强奸直到酿成命案。总统的声明显示，那种行径是属残无人道和不可容忍的暴行，身受其受害者的心灵创伤是难于弥补的。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见证者说，他们强奸和侮辱华裔女孩，还把她们的乳房切掉，损害他们的生殖器官；暴徒如此泯灭人性，丧心病狂，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次排华暴乱，暴徒把我的家抢劫一光，还放火烧屋，我该向谁申诉，难道就这样罢了？暴徒逃之夭夭？一把无情的火，烧毁了家，也烧毁了所有美好的回忆。也让我经历了无顶的窘境！无家可归！5月14日那天是一场恶梦。

那天早上，我们听说暴徒要烧所有华人区，就提高警惕，把所有重要证件放进一个大皮包里。我们打开收音机，广播员报导暴乱群众去向所在，雅加达西区是最大目标，包括城区班艺兰一带，北区是加甫一带，还有东区、南区，当提到中区新巴刹时，我心一跳。

莫非暴民会来骚乱？女婿也在这时候匆匆忙忙赶回家来，他催我们赶快收拾东西离开，为了安全，我们没有考虑的余地，这些日子来，人人提心吊胆，随时随刻都准备逃难，因为暴徒曾扬言要杀清华人。我们藉着祈祷，求主带领保守，除此别无他法。我提文件包抱着一岁多的孙儿和其他家人迅速下楼去，女婿立刻开车接我离开Krekot Jaya住家区。据说当我们离开不久，暴动分子就开始出动，他们首先的目标是破坏商业中心新巴刹，但是那儿已经有“雇佣军”把守，不得逞，暴徒老羞成怒，转攻向Krekot Jaya汽车零件商场进行大扫荡。发生事件的经过是由一位住我家不远的原住民教友露茜姐妹向我诉说的。那天

暴乱份子排山倒海的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最少有 100 多人拿着武器，他们大喊大叫，要杀华人。露茜说，华人都走光，围观的都是原住民，路上连一个治安人员、军警都没有。

暴徒妄作非为，拿起铁锤敲乱铁门，打破窗户，打破玻璃窗。铁门被砸坏破开，暴徒像走火入魔一般，一窝蜂冲进屋子里，大抢东西，露茜亲眼看着暴徒抢走我的电视机、电冰箱、电脑机、缝衣机、录影机、煤气炉、照相机、衣服等等。他们还从窗口把被褥、桌椅、食物抛掷下来，暴乱分子疯狂抢夺，附近的村民也加入抢劫的行列。每一家，每一店都被抢劫一空。剩下的笨重的东西抬不走就被暴徒连屋子用火烧尽。30 多年的劳动果实，毁于一旦！

最使我伤痛的是：他们烧毁了我的纪念照、结婚照片、孩子们的结婚照、丈夫生前的生活照、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纪念品……这些东西多年来带给我美好的回忆。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如今已经失去，那一份不甘、那一份不舍、那一份无奈，撕心挖肉的痛楚，是暴乱后遗留下来的伤痕。骚乱后的家园，到处是汽车残骸，4 排房屋被火烧焦（总共 30 多间房屋），财物被抢空。

离家前曾在匆忙中与邻居电话联系，他们也都逃过这次灾难。不过听说前排 B2 住着的梅姐与女儿，丈夫和儿子，当暴民踊过来时，他们都还在三楼，认为事情没那么严重，在家躲一躲，只要不碰见他们就没事。谁知道暴徒这次最残忍，下手无情，他们用啤酒瓶缠上绵布然后淋土油点着火之后就掷到窗口（玻璃窗口早先已被他们用石头击破）然后在屋周围又淋土油燃烧……在紧急关头，他们只好用绳子吊下来，被吓得全身发抖的梅姐与女儿降到半空拿不稳绳子，结果两人跌断了脚骨。在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来了几位善良的原住民，把梅姐与女儿送到医院。由此可见大多数的印尼人民都是善良的。

希望印尼政府严格追查暴动分子并严厉惩罚之！以免后患。

1998 年 6 月 29 日

（原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华人资料》第 73 期）

致哈比比总统的公开信

钟喜甲

今年五月暴动使印尼华裔蒙受最严重的一次挫伤。在掠夺抢劫、烧杀强暴后，国家经济源泉——华裔弃走他乡，投资者却步，导致民不聊生。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残暴行径，半个世纪以后竟然在一个非战争环境下的印尼重演。

本文作者追忆他的家族五代经验，向印尼总统哈比比陈情，掠夺印尼资源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印尼华裔。作者建议哈比比该补挂勋章来表彰华裔先贤对当地经济的伟绩。

尊敬的印尼总统阁下：

我是在印尼生活了五代的华人后裔，现在在北京安度着幸福的晚年。对于今年5月份在印尼发生的掠夺、抢劫、烧杀及强暴华人妇女的事件深感震惊。三个月来心情很不安，沉重和愤怒。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德国法西斯在欧洲干着被全世界人民痛恨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行径，半个世纪以后竟然在一个非战争环境下的印尼重演这种悲剧，真令人痛心。

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勤劳、勇敢和善良的印尼人民的过错，更不是为了印尼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英勇拼搏、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甚至于生命，完完全全奉献出来的印尼华人应得的报应。

这是荷兰殖民主义，日本法西斯占领时期和你们印尼当权者历年来的错误政策，以及只顾统治阶级利益的养痍成患的做法，产生的后果。

我出生在邦加岛，离开印尼快50年了，离别和思念，使我永远忘不了这个第二故乡。邦加和勿里洞两个盛产锡矿的岛屿，锡储量极为丰富。由荷兰殖民主义者驻巨港的东印度公司，分别于1710年和1850年发现。

1823年荷兰总督 V. D. Capellen 发布了对锡矿开采和贸易的殖民化命令，所有的锡矿变成了荷殖企业，从而长达几十年“用黑人奴隶开矿的美国模式”

的辩论终告结束，出台了“本地土人不适于重体力劳动，应由中国劳工进行开矿”的不成文规定。

这规定加强了当时和美国贩卖黑奴同步增长的贩卖中国“猪崽”（编按：南洋称之为卖猪仔）的活动。19世纪初，从闽粤沿岸受骗的中国劳工源源不绝地被贩运到邦加和勿里洞。

我的老太公（我祖父的祖父）就是受骗从新加坡被装进荷兰船转口到邦加去的。老祖宗和同伴们到了矿山受到非人的待遇，劳苦一辈子也赎不起自己的人身自由。许多人跑到邦加的原始森林里躲起来。

岛上警察都有权开枪打死他们，这使“猪崽”的来源越来越紧张，矿山劳力紧缺，使统治者恐慌。

1880年出笼惩罚条例（*Poenale sanctie*），对劳工严加限制和虐待。劳工们忍无可忍，于1903年爆发了震撼世界的“苦力暴动”（*Koeli schandalen*）事件。

从19世纪下半叶，两个岛屿的锡产量已达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一，收入有八分之五进入荷兰皇家国库。

难怪1898年Wilhelmina女皇加冕时的舆论中也不得不承认，除了巨港的石油外，邦加、勿里洞的采锡业是荷兰政府金库十分固定和非常丰富的摇钱树：“锡盆子”（*een vaste en rijke bate voor de schatkist: "tinpotje"*）。这棵摇钱树是用数不清的中华劳工的血肉浇灌出来的。

我含着眼泪来回忆以上的历史事实，就是要告诉总统阁下，邦加这个美丽、迷人的原始小海岛，那里有着我祖先的辛酸泪、血汗史，埋葬着我祖先的骸骨和忠魂，更有我祖先开天辟地所创立的丰碑。

有了千千万万华人“猪崽”的无私奉献，和当地人民一起努力，印尼独立后才能从荷兰统治者手里接受过效益极佳，可以充实国库的许多锡矿。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看出，掠夺当地资源的罪魁祸首不是华人而是殖民主义者，印尼华人和印尼原族人都是他们剥削的对象。邦加的椰树林子埋葬着我们数不清的当“猪崽”的先辈，他们静静地躺在异国他乡土地下，野草丛生，默默无闻。

总统阁下，你们实在应给他们补挂勋章，来表彰他们对当地经济的伟大功绩。

当“猪崽”的老太公死了才赎回了身子，我的阿太公开个小小的亚弄店糊口。这时代，就是印尼的社会经济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时期。

荷兰的殖民地政策规定华人是印尼市场经济的网络细胞,本地人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印尼华人没有。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印尼本族人和印尼华族人的社会分工早就在本世纪前由荷兰总督 van der Coen 定下来的。印尼独立了 50 多年了,哪一位印尼当权者对这种法规做过任何变动没有?

怎能怪罪印尼华人只会经商不会种地,当店主的大多数是华人,怎么就该被抢、被杀、被烧、被强暴呢?

说到我祖父,他继承了这个亚弄店,去广州盘货,乘坐小帆船,往返一次最快要半年到一年时间。日夜在海上飘泊。我祖父去了三个来回,最后一次回来途中,不慎落海。为了求生,把身上衣服两头系紧大扣,吹满了气,在海面漂浮,终于侥幸被救上船,死里逃生。

船到了邦加靠了岸,他第一个跳上岸,跪下来,面对大海磕了 108 个响头,发誓以后不再上船。

祖父重重地答谢了船主后,把不易挣来的钱做本钱,几年后他成功经营了橡胶、椰子、胡椒园、烧砖、瓷器等各种小厂,并鼓励大家一起发展农业、商业、小工业和运输业。

我的祖父,一个老华人,为了振兴当地的经济,努力拼搏,舍身忘死,他的作法,近代人称为筹集资金,投入工农业建设,怎能把这样为本岛谋利的功臣叫做吸当地人血的吸血鬼呢?

祖父年纪大了,退到一香蕉园里度晚年,我父亲接受了全部产业的经营权,并在当地开一家运输公司,把全岛的锡砂和大型货物运输全包下来,当时从美国进口的福特卡车就达几十辆。

邦加岛的繁荣和发展,就是靠千千万万热爱居住国,有拼搏精神的四五代华人血汗和生命的无私奉献和许多当地土著人民并肩战斗的结果。

二战爆发,日寇占领印尼,华人的财产被没收,被抢光,汽车被征用,工厂倒闭,田园荒废,无人管理。巨大损失得不到赔偿,父亲也别无生计,携带全家陆续回中国,1980 年在北京逝世,地无一垌、房无一间。

总统阁下,我们五代人,共经历 150-200 个春秋,对当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别无所求,只求安安定定的生活,把印尼当作自己的故乡。

我留学国外也有准备学成返回印尼参加建设。不料印尼执行了错误的排华政策,把对印尼经济建设有用的自己人当作敌人。对世代居住在印尼的华

人后代，不给起码的人权，随意让流氓和不法分子的烧杀、强暴，不加制止。

你们的错误政策究竟对印尼有什么好处？只能给全世界留下印尼是个“野蛮”、“惨无人道”的国家的坏印象。华人被逼逃难，投资者心有余悸。印尼的恐怖让人胆战心惊。

半个世纪以前，日本人的侵略，对印尼造成极大的破坏，华人损失很大，但是当时印尼获得了独立，这次亚洲经济危机对印尼的经济影响也很大，印尼华人首当其冲，在经济上的损失，精神和肉体上伤害更是无法比喻，这将在政治和国际形象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我还要告诉阁下，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少数民族存在。中国有五十多个，印尼也有一百多个，他们也拥有各种宗教信仰。

历史成功的国家领导人，首先把国内这两个基本问题（多民族、宗教信仰）解决好，这样一来团结了全国人民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才能把国家建设好。

世世代代在印尼生活的印尼华人是建设和繁荣国家最可靠和忠实的社会力量，千万不要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我们希望印尼各族人民，包括印尼族华人，团结一致，携手并肩，重建家园去迎接更加辉煌的21世纪。

钟喜甲敬上

（作者是广东蕉岭人，现居北京，早年在印尼万隆荷兰工科大学肄业。）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0月18日）

告全世界同胞书

5月13日至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大暴乱，是印尼有组织反华集团，针对华裔侨民抢劫、屠杀、纵火焚烧房屋、商店，当街示众强奸华裔小女孩，最小9岁至55岁的老妇都不放过，被这些人面兽心野蛮无人道的暴徒集体轮奸，裸体绑着殴打，毫无人性地摧残身心。有的妇女敢于跟暴徒反抗或挣扎者，被轮奸后用铁条刺她们下体阴部，然后抛入火坑中活活烧死，惨不忍睹。在48小时的暴乱期间，印尼当局无派遣军警到现场维持秩序，保障人身安全，而更痛心的是，一些官员或名流还认为这是华人的过错，浓厚的反华意识，流露无余，令人质疑印尼政府当局参与其事。在目前众所提倡人权民主的国际社会里，竟敢严重地侵犯人权，惨无人道的行为，天理何在？人权民主的卫道下可以放任无视吗？根据雅加达印尼人权和妇女援助组织整理的报告，5月13日至5月14日，两天两夜动乱中，仅仅雅加达市就有300多名妇女和女童被强奸，全印尼各省城市暴乱中受害的华裔妇女和女童大约有一千名左右，她们有的被绑票、杀害、掐死烧死、强奸轮奸至死者无数。这次印尼全国大动乱，华裔族群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印尼政府至今未有表态责任，如果我们华裔发动示威抗议政府放任暴民抢劫、纵火焚烧华裔住家、商店、强奸妇女，一定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放任排华暴动事件，会重演1967年政府为了剿共，从容放任西加里曼丹省达雅族群向乡镇居住的华人大屠杀，当时西加省几百个乡村杀尽烧光，血流成河，造成十几万华人难民，流离失所，全部华人财产因而荡然无存，这是西加省华人血泪史（31年前历史可以见证），32年后离苏哈托下台前六天，雅加达再次爆发5月14日排华暴动事件，我们华裔在印尼没有政治地位，无路可投诉，叫天不应，人地无门，惟有向全世界华人社团、公会、祖国同胞、台湾同胞、香港同胞、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呼吁！因为你们与我们同是华夏子孙，我们千百万印尼华裔正处在水深火热，被有组织有计划的印尼排华集团任其屠杀抢劫，强奸暴行做出强烈的抗议，希望全世界华人社会向印尼驻各国使馆为我们印尼华裔抗议申冤，更希望你们转告世界人权机构要求主持公道，同声谴责印尼当局，挽救华裔在印尼生存的权利，我们千百万印尼受难华裔人士感激不尽，谢谢！

印尼雅加达华裔受难族群

（原载香港《星岛日报》1998年7月22日）

还印尼华人一个公道

——我们的一封公开信

最近，印尼的局势引起了本港媒介、专家学者的关注，纷纷出来品题一番。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有些言论身居印尼的华人和华侨是很不公平的。由于这些不公平的言论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因此引起我们的不安和遗憾。

一、“印尼华人的处境，对那些爱拿外国护照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说这种话的人心态，不知是隔岸观火。幸灾乐祸，抑或借此机会，扳起嘴脸教训华人、教训港人！不然，就是对印尼华人、华侨历史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

中国人移居印尼诸岛，始于汉代，大量移居则是唐朝以后，尤其是1840年以后。他们或被卖猪仔做苦工，或迫于生活而离乡背井，或为躲避战乱。早期离国者，更被当朝认为是“叛国死罪”。

海外孤儿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例如：荷兰殖民者1740年在巴达维亚（今椰嘉达）市一条河畔屠杀一万多与原住民联手抗荷的华侨，血流溢河床，至今河畔马路仍叫“红溪路”。

50年代，周恩来总理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期间他鼓励当地华侨要落地生根，争取归化入籍，遵守当地法律，融入当地社会。就如张家的女儿嫁到李家做媳妇去了，她就要遵守李家的家规，成为李家的一员；当然“血浓于水”，我们还是亲戚嘛！实际上，这既符合中印（尼）两国的情，也符合华侨自己的切身利益。真不明白怎会被演绎成“爱拿外国护照的人”的“一个很好的教训”？

二、“华人占印尼人口3%，却控制住70%的社会财富。”

这个数据何时得到，其现实的准确度如何，实在难以考证。但是，科学的数据，是需要科学的统计，切忌人云亦云，以讹传讹，遗害人间。毫无疑问，这个简单的数据最具煽动性，成为某些政治野心家，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者拿来煽动排华反华的最佳理据。

50年代。荷兰势力撤出印尼。原住民经济处于萌芽阶段，稍具基础的华侨工商界趁此空档，力求发展，在薄弱的印尼经济中注入一线生机。但好景不

常，当政者一声“剪钞”，华侨身家立即缩水一半。

到了60年代，原住民经济初具眉目。而六五、六六年大规模的反华排华暴乱中，为数不少的华侨被杀害，大量的资金被冻结没收，华文学校也被当作敌产而没收，华侨不准拥有不动产，不准做工商业的东主等等。大部份的华侨已经破产或濒临破产，涌现大量贫穷，甚至于赤贫的阶层。由于这次暴乱，印尼当政者对华侨一直存在一种猜忌怀疑的心理。为了争取生存的空间，此后，不少华侨力争归化入籍，成为印尼籍的华人（即华裔印尼公民）。

稍后的30年，印尼社会呈现稳定，华人经济休养生息，有了新的发展。如果排除偏见，华人经济实际上已经是民族经济的一个环节，与整体的印尼民族经济是共荣共进的。但是华人并非如屡见报端的所谓“控制住70%的社会财富”，他们风光不再，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真正富有的华人只占少数，大部份的华人是贫穷的，甚至于是赤贫的。在这30年里，发展最快的是国营经济和凭籍背景的官僚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控制印尼经济的许多关键部门，他们才是印尼经济的主导力量。华人要想发财就必须设法和他们“合作”。“合作”层次越高，发财的机会越大。而绝大部分的华人工商界并无此“福气”，他们只能开“哇弄”——小杂货铺、商小贩，他们擅长的就是这种小本经营。同时，这30年里，国际财团（主要来，自日本、星马、台湾、美、德等）大量投资印尼，并占据了一个主要的席位。

华人在印尼，始终是一个处于弱勢的族裔，虽然他们在经济上至今仍占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去保护自己的经济地位。不排除某种经济势力，利用这个简单数据：“3%”的人口，却“控制70%的社会财富”，去煽动盲目的狭隘民族情绪，打击华人经济，以便取而代之。最后受害的不仅是华人，印尼的民族经济和广大的印尼人民同样也受到伤害。

三、“华人不融入印尼社会，目前处境是华人咎由自取。”

不同民族（或族裔）往往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传统、道德观、信仰、语言、饮食等等）的种种因素，都会存在种种矛盾和冲突，世界各国几无一幸免。有些为政者基于平等和人权，设法化解矛盾，取得民族（族裔）的和平相处；但如果为政者利用民族（族裔）的矛盾作为巩固其经济地位的工具或手段，势必为民族（族裔）矛盾火上加油，受害最深就是处于弱勢的民族（族裔）。何况，任何民族（族裔）的矛盾各有历史缘由，不可能用一句话作出简单的判断。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轻易下结论，武断地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不公平的，甚

至有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之嫌。

印尼华人历经反华排华的打击，为争取生存空间而归化入籍，取印尼文姓名，读印尼文学校。年轻一辈的华人已经不懂华文，不会讲华语（少数人在家中与长辈交谈中，略识一点点祖籍话：如客家话、闽南话等）。不少华人希望通过通婚，信仰印尼回教，争取真正融入社会。但事实上，种种积极主动的争取努力收效并不是很大，而这并不是华人的责任；当政者对华人有猜忌心理，华人除了经济活动有些空间外，要从事军政活动，那是绝对免问的，一些著名大学的重要学系，华人子弟也被限制报考。最不幸的是华人在政治上只能是一片空白，完全无力自保；更甚的成了政治集团斗争的牺牲品，成为转移人民不满情绪的最佳宣泄对象。评论者不了解印尼华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而横加指责，这样公平吗？

“患难见知交”——在这次暴乱中，许多华人得到原住民邻居的救助，他们站到华人居所门口，大声疾呼：“这是原住民住的，不准你们抢掠放火！”使这些华人居所免于被夷为废墟。还有华人躲进原住民邻居家产避难呢！这些善良的邻居，有的还是回教的“阿訇”呢！这不是可以证明华人和原住民和睦相处吗？

印尼华人是印尼的公民，他们应对自己国家尽到公民义务，也应享有平等的、全部的公民权利。印尼的兴旺和崛起，只能建基于各民族（族裔），包括华人在内平等协商和合作，取长补短，共尽公民义务，共享公民权利之上。

印尼华侨，如果取得中国护照，便是中国侨民，他们有充分的理据要求自己国家的保护。最可悲的还是有一群被遗忘的华侨，他们多数是老年人，而且多数是贫穷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他们之中，或筹不到一笔钱去办理入籍，或不懂为什么要归化入籍，更不懂要取得中国护照才能得到中国领事馆的认可和保护。在他的手中只有一张“居民证”，国籍一栏注明是：“无国籍”。因此，动乱来时，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坐以待毙，他们还有基本人权可言吗？

四、“华人令印尼社会贪污更严重。”

持这种论调的人是因果颠倒，也不明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就算你把印尼华人全部消灭，现阶段的印尼社会仍然会存在严重的贪污。社会发展是有其阶段性的、不可跨越的。当封建社会崩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此时，社会的封建道德观也崩溃了，但社会仍未形成规范人们言行的完善的法规法则，

或者无视新定的法规法则。由于资本的发展，金钱散发出极大的魅力，人人都想赚多一点钱，有的人更不择手段去挣钱，例如利用手中的“权”去变“钱”，这就出现了贪污。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阵痛”，不同的国家的社会发展速度不同，阵痛期也长短不同。只有当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力量强大到足够去实行完善的法治，铲除贪污，阵痛也就结束了。一些先进的西方国家已经走了“阵痛”期这段路，而包括中国、印尼在内的不少东方国家还正在走这段路。这是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角度说明贪污现象的客观因素；而人性的贪婪和自私，则是贪污现象的主观因素。贪污受贿绝非华人的注册专利！（有人致电台给电台主持人，认为凡有华人之处都有贪污受贿，中国如此，印尼华人也是如此。几乎把华人都打成贪污受贿的罪魁祸首。如此谬论，不禁使人嗤之以鼻！）

印尼社会公职人员（特别中下层人员）的薪俸，普遍偏低，要求“以优养廉”，几乎不可能。因此不少公职人员把老百姓给的小费（饮咖啡钱）当作“薪俸”的一部分，因此，造成贪污风行，“大有大贪，小有小贪；不贪不贿，寸步难行。”惩处贪污受贿的法律并非没有，不是束之高阁便是拿来作特殊用途。如果说作为弱势的族裔的华人，竟有力量去左右社会贪污现象，使之日复严重，不仅言过其实，更令人怀疑是在煽动某些人在反贪污的群众运动中，抓华人来祭旗——做替罪羔羊！

五、印尼华人的基本人权应受到尊重！

我们是从印尼回国的华侨，我们和印尼的华人，在法理上，已经属于不同国家的公民。但是在情理上，我们和印尼华人却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他们是我们的父兄亲友，同窗砚友，邻居同乡。他们世代相传，胼手胝足，克勤克俭，与原住民和睦相处，为印尼的民族经济的兴盛繁荣，作出了一份贡献。在动乱中，他们的财产商品被一抢而光，居所店铺被焚烧，有人被烧死，打死他们根本连一点的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的基本人权，遭到粗暴的践踏。看到这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华人，我们心如刀割。

但是，我们更无法容忍的是在香港，这拥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地方，有某些专家学者，摆出一副“公平”、“客观”的面貌，对印尼华人的处境不是寄予同情，而是发表一些不公平的评论和指责，令人深感遗憾！我们这一群印尼归侨，我们的经历令我们对基本人权遭受践踏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于长期生活在基本人权备受尊重的香港人，你们能体会到什么是“无根的一群”，什么是“东方吉卜赛人”吗？

追求民主，争取基本人权，保护基本人权，已经成世界的强大呼声。它已经打破种族、打破疆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诉求！只有那些独裁专政的国家，民主继续遭到扼杀，基本人权继续被践踏。

印尼华人是一群处于非常弱势的族裔，他们除了经济范畴内有活动空间外，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什么民主诉求，连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的能力都没有。我们希望印尼当局真正尊重各民族（或族裔）的平等权力，保护印尼华的基本人权；并希望本港评界还印尼华人一个公道。我们特别期望本港和海内外为民主和人权而斗争的人士，特别关注和声援印尼华人争取基本人权的努力。

一群印尼华人

（原载香港《明报》1998年6月15、16、18日）

请听我们的呼声

——致纽约国际基本人权组织

尊敬的“国际日报”、“侨报”两报编辑先生：

我们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将我们的“呼声”刊登在贵报，让我们的呼声在欧美传播。又，请您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连同原稿转交给纽约的国际基本人权组织。并且还可能的话分发给有国际影响力的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等，以便公国际听到我们的呼声。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知有谁在乎我们的命运？因此，我们只能向您们——远在美国的亲人们求助。

对于您们无比宝贵的支援，我们谨此表示万分的谢意与崇高的敬意。

顺祝

编安！

印度尼西亚一群受难中的炎黄子孙后裔

1998年2月24日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来，在印度尼西亚28个大小城市，频频发生反华人的骚乱事件，暴徒们针对华人的商店、住宅、工厂、银行、教堂、庙堂等进行肆无忌惮的破坏、焚烧与抢劫，使数不清的华人几十年来用血汗积累的财富毁于一旦，许多人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一切都完了，在个别城市还发生了杀人与强奸妇女事件，暴徒们进行砸、烧、抢的时间十分充裕，短自数小时，有的竟达三、四天之久，连住在偏僻小巷里的华人也不放过！尤其是最近几个月以来，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印度尼西亚的盾市兑值泻得最惨，物价飞涨，怨声载道，这个风暴也使华人受害不浅，无数华人企业破产，但是，有人蓄意将这个金融危机归咎于华人，对华人的骚乱变本加厉，几乎天天发生。

必须指出，在那28个大小城市的骚乱受害者，全部都是奉公守法，与当地人民世代友好相处的中下层华人，他们世代辛勤劳动，对印尼的经济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骚乱发生时，他们被逼离开自己的商店或住家，双手不可带任何东西（包括文件在内），然后暴徒们肆意抢劫所有的财物，抢光了，便将

建筑物烧毁。

在勿容班堂 (UJUNG PANDANG! 旧称锡江), 1979 年 9 月 14、15、16、17 日一连 4 天发生的骚乱中, 被毁商店 1496 间, 住宅无数, 天主教堂 1 间, 庙堂 1 间, 汽车 77 辆, 摩托车 158 辆, 银行 3 间, 夜总会 8 间, 被杀华人 6 人, 被奸妇女无数。

在答锡马来亚 (TASIK MALAYA 旧称斗旺或打横), 1996 年 12 月 26 日发生的骚乱中, 被毁商店 89 间, 旅馆 3 间, 汽车 221 辆, 基督教, 天主教堂 13 间, 银行 6 间, 被杀华人 4 人, 被奸妇女无数。

在西都文罗 (SITU BONDO) 1997 年 10 月 10 日发生的骚乱中, 被毁的天主教、基督教堂 24 间, 庙堂 1 间, 孤儿院 3 间, 天主教学校 2 间, 天主教宿舍 1 间, 商店无数, 有一位牧师及其 4 个家人全被烧死。

劫难后, 逃难中的华人处于极度恐惧中, 完全丧失了安全感 (特别是妇女), 久久不敢回自己的家。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惶惶不可终日, 财产乃至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更遑论生活安定。华裔公民完全丧失了作为合法公民的基本人权, 丧失了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自由与权利, 任人蹂躏, 任人宰割, 我们不知道要向谁呼救? 向谁求助?

我们谨此希望国际基本人权组织与全世界人民能够听听我们的呼声!

一群受难中的印度尼西亚华裔公民

1998 年 2 月 24 日

(转载自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编《华侨华人资料》第 73 期)

呼吁与控诉

——印尼华人向安南详述苦况

印 华

我们已在印尼生活了半辈子，有的甚至已经几代生活在印尼。我们都是印尼籍民。

我们和其他的印尼原住民一样，都能够讲很流利的印尼话，相处得相当好。基本上我们感觉到印尼原住民是善良的，只是容易冲动和被煽动。

在前总统苏哈托的计划中，我们不可以进入政治、军事、文化领域内，基本上，我们只能从商，或工业等经济领域，或在体育界发展。印尼的第一面和第二面奥林匹克金牌也是印尼华裔取到的。

由于华裔秉承中华民族艰苦工作的精神，且量入为出，经过数十年的刻苦经营，除了极少数印尼华裔是靠与前总统苏哈托勾结而成为暴富之外，以及一部份人因为某种原因而生意失败成为贫穷家庭外，一般华裔都成为小康家庭，少数一部份成为中产阶级家庭。我们必需再一次解释的是，除了极少数与前总统苏哈托勾结的华裔外，大部份的华裔都是靠勤劳和刻苦的工作取得今日的成绩。

但是，由于前总统苏哈托把我们当成是维护他的独裁、贪污统治的挡箭牌，为了使每次人民的反贪污反独裁运动迷失方向，每当人民的不满运动达到顶点时，他就会利用新闻界、电视台、无线电台及印尼原住民对华裔在事业上的成就所产生的妒嫉之心，以及极端分子盲目仇视的心态，煽动他们烧、杀、抢华裔财产甚至强奸华裔妇女。每次发生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之后，印尼原住民对前总统苏哈托的恨意就会下降，印尼人民反对前总统苏哈托的统治的压力就相应的减轻了。这样，就达到前总统苏哈托继续统治印尼的目的了。以华裔作他的挡箭牌以及高压铁腕手段使他的独裁统治成功的延续了32年。

印尼原住民普遍性的特性是善良，但由于政治知识水准不太高，加上民族性属于容易冲动和被煽动的民族，再加上前总统苏哈托的安排，32年来印尼电

视台、无线电台、报纸、杂志铺天盖地，不停地把他的贪污罪行说成是华裔剥削了印尼原住民。我们华裔可以说是睡在定时炸弹旁的人。我们的处境就像南斯拉夫的回教少数民族以及现在定居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随时随地会被烧杀抢以及强奸！南斯拉夫的少数民族得到联合国的关注后，已经受到保护，我们也要求联合国关注我们的命运。

我们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拯救我们，向印尼政府交涉：

1、我们印尼华裔基本人权和生存权利必须受到保护。根据印尼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发生在1998年5月13日到5月15日的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是由一个“有组织的黑手”在背后组织的。

2、我们在印尼的华裔没有权利学习自己的语言。在印尼，民间可以开办英文报刊和学校，但就是不可开办华文报刊和学校。他们美其名要我们同化，但同化应该是让被同化的民族心甘情愿的同化，而不是在枪口下被逼着同化。被同化的民族有权保持原来的语言、宗教。在印尼，有华人色彩的佛教不被政府承认。

3、我们要求我们的合法族名恢复原来的称呼，在印尼文来说应该是“Tionghoa”。前总统苏哈托在我们的无力反对与不情愿下，把我们的族名改成“Cina”。他继承已经被联合国公审的穷凶极恶的日本战犯侮称中华民族的称呼，来称呼印尼华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4、我们要求印尼政府谴责1998年5月13日到1998年5月15日的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到今日为止，印尼政府非但没有谴责该事件，甚至在印尼电视台1998年6月20日的特别报道时，制造舆论，认为该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是印尼华裔不肯同化的结果。他们把责任推到华裔身上。

5、我们要求联合国监督印尼政府“调查”谁是该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的“有组织的黑手”。因为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烧杀抢以及强奸事件，如果印尼政府要调查谁是“有组织的黑手”其实是不很难的。问题在于印尼政府肯不肯查。我们要求联合国监督印尼政府把“有组织的黑手”控上法庭，并根据法律处罚。这样，才能避免以后再发生同类事件。对受损失的印尼华裔给予适当的赔偿。

6、印尼政府应向联合国保证不会再发生同样事故，要是再发生同样事故，根据联合国秘书长在1998年6月15日到1998年6月17日在意大利召开的关于人道罪行会议时，提到种族蹂躏首次被列为“如对扣留犯或其他平民的暴力行动那样的战争罪行”（《印尼日报》，1998年6月18日第4版）。因此我们要求联合国正告

印尼政府,如果他们纵容军队或平民进行对印尼华裔种族蹂躏,印尼政府将被控于战犯法庭。

7、假如印尼再发生同样事件,而印尼政府已经尽力但仍然无法保障印尼华裔的安全时,印尼政府答应将所有的印尼华裔送到一个容易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安全地区。以避免华裔进一步被杀害,来回遣送费用当由印尼政府负担。

我们华裔并不是反对印尼政府的族群,我们只要求我们的合法权益以及基本人权受到保护。我们只是要求能够合理的生存。我们完全无意和印尼政府作对。

印尼总统哈比比先生建议我们华裔,万一再发生骚乱时可以进行自卫,为了不束手待毙,我们要求印尼总统不要让我们以拳头自卫,以便让我们能够生存(印尼现政府哈比比总统在巡视雅加达华人区烧杀抢以及强奸现场时表示华裔可以自卫)。

恳切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够拯救印尼华裔,关注我们的人身安全,以及生命财产的安全。

(原载马来西亚《光华日报》1998年7月6日)

一个受害少女的见证词

微微安

我的名字叫微微安（译名，下同），今年18岁。我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们一家住在一个应该算是比较“安全”的公寓楼上。

1998年5月14日，我们的公寓楼四周围了很多的人。他们厉声叫着：“杀死那华人！”“把那些猪猡吃了！”“咱们好好开开心吧！”我们家住在七楼上。三楼的一个邻居打电话告诉我们说，那些人已经冲到二楼了，有人甚至追着楼上的居民到了楼上。我们害怕极了，不断地祷告，把一切都交到了上帝的手中。这时已经无法下楼逃脱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房间，来到了顶楼15层的朋友家里，我们惊讶地发现，楼外的一些人已经乘电梯先于我们到楼上。我们赶忙冲进朋友家，把门锁了起来。

这时，我们听到那些人在用力地敲一些人家的门，还听女人和孩子的尖叫声。我们的房间里充满了恐惧。

我们意识到，这些人有可能会到我们的房间来。于是我们的房中分散躲起来。我们听到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大声叫：“妈妈……妈妈……妈，妈疼啊！”当时还没看到那个小姑娘正在被人奸污。半个小时以后，叫声消失了，我们壮着胆子到外面去察看。那景象真是无法描述。好多女人，有些还是孩子躺在地板上。“天啊！怎么回事啊？”看到这些，我们大叫起来。我的小妹妹芬尼紧紧地抱住爸爸，发疯一样地叫着。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和我们的朋友，一对新婚夫妇一起，我们往楼下走去。

到了10楼，我们听有求救的呼声，声音非常清晰。于我我们决定下去看一看。可是我们刚一转过弯，就看到好多好多的人。我看到一个20岁的妇女被4个男人奸污。她想反抗，可是她被人按得死死的。

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危险境地，我们拼命地跑。不幸的是，那些暴徒抓住了芬尼。我们试图解救她，可是我们无能为力。他们有60多人。他们把我们——我、妈妈、爸爸、芬尼、宕尼、多迪叔叔和我的微拉阿姨，都用撕开的床单绑了起来，拉到一间房子里去。多迪叔叔问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他们一句话也

不说。

他们看上去真的像凶神恶煞一般。有一个人粗暴地抓住芬尼，把她拉到一个沙发前。我意识到，芬尼非常危险，就拼命地叫喊。一个暴徒使劲地抽我的脸。我爸爸也大声地呼叫，却被人用木棍打昏了过去。我只有不断地祷告。

多迪叔叔试图用给他们钱的方式制止他们的暴行，却毫无结果。最后，5个暴徒奸污了芬尼。在奸污前，他们每人都要说一句“Allahu Akbar”（阿拉伯语的伊斯兰祷词“阿拉是伟大的”）。他们是那样的凶残和暴烈。

过了不久，9个人进来拉我。我还看见他们在拉扯微拉阿姨。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一切都成了空白。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我才苏醒过来。我的头很疼，我发现自己身上一丝不挂。我哭了，发现我一家人还在这里。爸爸搂着妈妈和弟弟岩尼，多迪叔叔躺在地板上，微拉阿姨伏在他身上哭着。我又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躺在布鲁依特医院，爸爸妈妈都在身边。我不顾浑身的疼痛，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是芬尼？妈妈？”说话时我感到针扎一样的疼痛。我的脸都肿了。妈妈又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爸爸则强忍着泪水对我微笑。

经过4天的治疗，我的情况有所好转。那时爸爸才难过地告诉我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我昏过去以后，7个暴徒奸污了我。当时爸爸被人用木棍打了，什么也看不清。他们反复地奸污我。后来爸爸说：“微微安，芬尼去了。”我懵了，叫道：“为什么，爸爸？”爸爸无法回答。他告诉我好生休养，我离开了病房。我哭啊哭啊，觉得我的生命失去了任何意义。一个星期前，我出院以后，才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芬尼被奸污的时候，她一直在反抗，也不不断地被那些奸污她的人扇耳光。最后芬尼用唾沫啐到其中的一个人的脸上。那人感到被人冒犯了，就找来一把刀，在芬尼的肚子上扎了一刀又一刀。芬尼死时，浑身上下都是血。爸爸说，多迪叔叔也是那样被人杀害的，被奸污了的微拉阿姨目睹了这一惨状。她现在在她的父母家里。经受了这样的打击，她面目呆板，茶饭不进。我和妈妈无时不在哭泣。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切。那些暴徒真是魔鬼。

（原载北京《中国妇女报》1998年8月5日）

梭罗的劫数

佚名

今年五月，印尼雅加达、棉兰、梭罗等城市连续发生有组织的大暴乱。华裔工厂、商店及住宅等被掠夺、烧毁，如今只留下满目疮痍的废墟。悠悠梭罗河的河水，洗也洗不清这排华污点。在这场大浩劫中，超过千人罹难，一名劫后余生的印尼华裔林心声，在中爪哇梭罗目睹了当地华裔在大暴乱期间蒙受悲惨的遭遇，令人感到痛心。

这是林心声的心声

今年5月，印尼各地大学生要求改革的呼声响彻云霄。梭罗河畔平静的城市——中爪哇梭罗市，也卷入了这巨浪中。

5月上旬开始，几乎每天都有大学生示威，但都只限在各大学校园内举行，不得离开校园，进入市内。

14日中午约2时，市西郊的大学生，从离市区约五六公里的校园向市内进军。一些不负责任的暴徒乘机行事，“参加示威”，混水摸鱼。

首先是在大街上焚烧旧轮胎，接着开始砸碎沿街房屋的玻璃装饰，把汽车、电单车拿到街上焚烧，随后是掠、抢、烧，迅速地蔓延到全市。

华人商店全部遭殃

四方八面都冒起了浓烟，顿时全市变成火海，对象多是华人经营的汽车行、电单车行、银行、超级市场、自选百货公司、鞋店、米糖油商、小亚弄店等。

骚乱连续了两天，华人都躲在屋里应变，住家没有后门的疏散到容易转移的亲友家暂居，以防万一。有的来不及转移而家被焚烧者，则攀墙由邻居帮助避难。

有一对夫妇，家被焚烧，为了求生，从三层楼跳下，结果女的坠地死亡，男的跌伤脊骨。有行动不便的老妇，看到对面的房屋被烧，竟能爬树逃生。

许多几十年辛勤劳动累积的财富，瞬息间化为乌有。

有的甚至单身逃生，到村里印尼人家避难，甚为悲惨。

想不到在这文明社会中，竟会出现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

有的地区，善良的印尼村民，组成了捍卫队，把守交通要道，在街口安置重重障碍物，防止暴民侵入，幸免于难。体现了印华人民友好的精神。

当地华人三四天后才敢出门，看看劫后废墟，满目疮痍，象经历了一场大战乱。

这次最彻底和悲惨

梭罗市经历过好几次灾难：1942 年日寇侵占。1948 年荷兰第二次侵略战争，印尼人实行焦土抗战，焚烧物质、机关，并没有抢掠。1965 年政变后 10 月 22 日红帽军入梭，掀起了掠抢烧大暴乱。1980 年又一次大骚乱，华人房屋的玻璃装饰被砸碎，都没有这一次的彻底和悲惨。

这次的浩劫，是苏苏胡南王朝迁都梭罗以来的两个半世纪中，华族受到的最惨重的一次灾难。倾悠悠的梭罗河的河水，也洗不清这污点。印尼文《梭罗邮报》5 月 16 日报道，这次动乱，被抢掠烧毁者共 446 家，车辆包括私家车、公共汽车、载货车 287 辆，电单车 570 辆。但这和确实数字颇有差距，被抢和烧的电单车，最少有 1000 多辆。以梭罗市的面积和人口密度与雅加达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最惨重的地区。暴乱后至今已三个星期，时有传言，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局势尚未安定。若要恢复常态，尚须时日。

盼各地华族舆论支持

印尼华族，仅占印尼人口约 4%，比例悬殊，处境奇难，为东南亚各地华族所难理解，非麻木不仁，娘家不便干预婆家事，只盼各地华族舆论在道义上支持，则感幸甚。

（原载美国《侨报》1998 年 7 月 3 日）

血之控诉

——致世界华人组织的感谢信与反华暴行的控诉书

尊敬的《侨报》编辑先生：

敬请您们将我们《血之控诉》刊登在贵报，并请转交给世界华人组织。

对于您们的支持与帮助，我们谨此表示万分谢意与崇高敬意。顺便说明，前此一篇呼吁书即《听听我们的呼声》已见电脑网络。我们也在表心道谢。

印度尼西亚一群受难中的华夏子孙后裔

1998年6月24日

闻悉世界华人组织紧急呼吁全球华人同胞声援印尼受迫害同胞，强烈抗议印尼暴民，向印尼当局施加压力，并联合开展全球华人签名运动。对此，渴望着得到世界人民声援，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我们，感到无比的感激、安慰与鼓舞。

在震惊世界的雅加达“五一四”暴乱前几天，即5月4、5、6、7日一连4天，在棉兰市及附近市镇也发生针对华人商店、住宅的砸、抢、烧暴乱，5月14、15日梭罗市商业区被烧成一片废墟：雅加达暴乱后，5月27日又在北苏门答腊的丹容巴来市、6月15日在中爪哇的直葛市（特卡尔市）发生同类暴乱，抢烧几百间人商店、住宅，烧得极惨，我们不禁要问：针对印尼华人迫害，何时了？！印尼华人暗无天的日子，何时尽？！

在雅加达“五一四”暴乱中，根据被缩小了的官方报导数字，被砸毁、抢劫、烧毁的大百货公司、超级市场40间商店兼住宅4000多间，住宅1000多间，办公楼近400间，银行120间……等等，但是，完全没有报导华人被强奸被残杀的事件。

毫无人性的兽性大发的残暴的暴徒们在砸、抢、烧的同时，又强奸和杀害了不计其数的华人。由于不少受害者及其家属还在外地避难，又由于印尼华人的保守思想，为顾及自己、家人及家族的声誉，绝大多数受害者及其家属不愿或不敢向有关当局提出控诉，使我们很难确知其人数。根据《行动周刊》(AKSI) 6月22日的报导，被奸人数至少200人以上（有人估计达千人），失踪华人700人。大部分奸杀事件的控诉者，是受害者的邻居、朋友、印尼原住民

目击者，他们向人权委员会、记者投诉，还有事发时在场的记者本身的报导，以及少数受害者本人向教会牧师的哭诉（但不让牧师投诉当局），遭奸污的妇女年龄从10岁至55岁，她们一般是在其家属或在大路上大众面前被七、八人甚至十多人轮奸，被奸后有的被烧死或被残酷虐待。还有不少遭奸污的妇女，尤其是少女跳楼、喝杀虫剂含冤自杀，以下是几个例子：

●雅加达西区是暴乱中受害最惨的地区。该区有一座名为“海洋之友大厦”（MITRA AHARI）的二十八层公民公寓中每一层楼的妇女都惨遭众暴徒轮奸，有的甚至在被奸后淋上汽油活活烧死。

●暴乱过后，一些原住民看见马路上有不少血淋淋的奶头，那是被轮奸后的华人妇女被暴徒割下的奶头，割下奶头后暴徒们将她们丢进熊熊大火里烧死。

●有10岁与9岁的姐妹俩从在家中遭暴徒袭击，姐被奸，妹惊恐欲逃，被暴徒一刀刺死。

●有一华人妇女从外面回家，正发生暴乱，一位善良的原住民邻居急忙把她接进屋里避难。她从窗口往街上窥视，见有一辆汽车被拦，暴徒们从车里拉出一些华人男女，女的被剥光衣服并遭轮奸，男的被打得半死之后，扔进燃烧中的汽车，与车同毁。

●有一位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被暴徒轮奸，然后又亲眼看着她们被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她在半痴半疯的情况下向人权委员会提出无比悲愤的血泪的控诉（印尼的人权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前官方人士或退休军人，该委员会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

●有一年幼女孩，在其父母面前被剥光衣服，暴徒一边嘶叫：“你是支那人，该死！”一边将一个瓶子插入少女阴部，少女当场惨死。

●有一华裔女学生正在等巴士，被4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说是为了安全，被劫去机场附近的一个荒地，在汽车内被他们奸污，女学生怒道：“你们是警察，理应保护我的安全！”其中一个奸者道：“不，因为你是支那人！”

●一位名叫海鲁（CHAIRUL）的华裔男子向人权委员会控诉道：“我的商店和住家都被烧光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全都被烧死了，我现在一无所有、孤苦伶仃，彻底的家破人亡，叫我如何活下去？！”

我们万没想到，已经站起来近半个世纪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华夏的后裔，却在今天全球天天叫喊维护基本人权的今日，又重沐“红溪惨案”与日寇南京大屠杀的腥风血雨（“红溪惨案”是1740年荷印殖民政府屠杀巴达

维亚——今雅加达——万名华人之惨案)！

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绝大多数的印尼人民是善良的、是友好的。暴乱过后，许多印尼原住民的有识之士（包括教授、宗教领袖、社会名流、学术权威等）一般市民都谴责该暴乱，有的还要求政府彻底追查暴乱事件的组织者与主谋者，例如一位名为阿利尔·赫尔延多（ARIELHERYANTO）的原住民教授、人类学者，6月12日发表在《罗盘报》（FOMPAS）的一篇评论中，除了替不计其数的被奸杀的华人伸冤之外，还揭露了32年来苏哈托政府的反华暴行，他们也使印尼成了世界上唯一禁止华文的国家，竟然把华文与毒品、爆炸物、猥亵读物并列为入境禁品，该评论还指出，在暴乱中的强奸者，行动一致、强奸方式一样，显然是经过训练的被指挥的有组织的暴徒，不可能是一般市民。

还有一位名叫罗摩·善地亚宛（ROMOSANDYAWAN）的原住民牧师，是第一个揭发暴乱中华人妇女被奸杀的人，他及其领导下的救助自愿小组向政府提出揭发暴乱事件真相、对政府及治安人员之不保护其公民要负全部责任、立刻取消所有种族歧视政策、所有的种族歧视行为必须以法律严厉制裁等四个要求。其他如印尼第二大回教组织MUHAMADYAH的领袖阿敏·来伊斯等也提出类似的声明，等等。

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从1996年底的打横反华暴乱到几天以前（今年6月15日）的直葛、展玉反华暴乱的一年半时间里，前后有30多个大小城市发生了反华暴乱（有的城市重复发生）。几乎都有一个共同规律，即在暴徒砸、抢、烧、奸、杀之时，军警只是持观望态度，放任暴徒肆虐，到了尾声，才来收拾。雅加达“五一四”暴乱亦如此，暴乱发生在5月13、14、15日一连三天，军警15日才迟迟去“收拾”，所谓“收拾”，是抓了一些暴徒与市民，但暴徒大部分又被释放，只留下一些跟着暴徒抢劫的小市民，判以两三个月监禁轻刑，草草了事，作为向世人之交待。从未揭发过暴乱事件之组织者与主谋。我们不禁要问：这个共同的规律，说明了什么问题？

罗摩·善地亚宛牧师向报界透露：他从一个受伤的暴徒的口中了解到，暴徒们在芝朗卡（CILANGKAP雅加达亦区）受过两星期的训练，暴乱那天，他们带着汽油和莫洛托夫汽油弹有计划有分工地行动，指挥者骑摩托车和驾着汽车。然而，政府当局一口咬定，死赖着说：“这是民众自发性的一场骚乱。”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每次改朝换代、每次政治动荡、每次印尼人民不满政府的情绪达到高潮时，反华暴乱就必发生，华人就必血溅岛国，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

据知情者透露说：雅城反华行动是有一黑司令部在指挥、训练。那三天中他们被命令，分为三大队出发，一是专门负责焚烧，二是专门抢劫财物，三是专门出动奸杀的。我们不禁也要问：这黑司令的后台又是谁在内呢？

我们不能永远沉默下去，永远任人宰割。我们不能不在此向全世界人民提出血之控诉，我们衷心地希望国际，特别是有关人权之国际组织，坚决要求印尼政府彻底追查所有反华暴乱的组织者与主谋，追查失踪的华人与被奸杀的华人案件，严惩野兽般的策划者与主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反华暴乱事件，维护华人谋生与生存的正当权益，平等和友好地处理华人与其他族裔间之关系。

我们再次大声疾呼：我们要生存！我们要真理！我们要人权！严惩兽性暴徒！

印度尼西亚一群受难中的华夏子孙后裔

1998 年 6 月 24 日

（原载美国《侨报》1998 年 7 月 14 日）

爱玲小姐的公开信

仍在疗伤的爱玲透过本报，向公众发出封公信，原文以印尼文写成，本报记者将翻译成中文，内容如下：

现年十九岁的华裔少女爱玲，亦于7月初被3名印尼暴徒强闯入屋内，企图以铝枝插入其阴道内，幸而她极力抗乱，暴徒的暴行未能得逞，但最终其腰背及胃仍被铝枝刺伤，尿道亦因而被弄穿需重新接驳，复原遥遥无期，爱玲通过本报强烈谴责暴徒的行为是野蛮的，促请国际法庭公开审判罪犯。

7月初，现年就读于大学二年级的爱玲，趁课余时间，担任在耶加达市内兴行的一项活动的执行员，希望赚取些少书簿费，有鉴于此，爱玲便在市內租了一房间，方便工作。

可是上天并没有眷顾爱玲的苦心，7月初的某天中午，爱玲正房内小睡片刻，好梦正酣之际，噩梦却降临在这个只得19岁的少女身上。

不知从何而来的三个暴徒，不由分说地冲入爱玲的房内后，说时迟那时快，立刻将爱玲从床上拖下，随手将床上的枕头拿来，蒙着爱玲的面部，再将爱玲的双腿大大的拉开，另一暴徒手持用以挂窗帘的铝枝，企图插入爱玲的阴道内。

爱玲眼见形势不妙，极力抵抗，最终虽然避过此厄运，但暴徒却由于暴行不得逞，实行以铝枝乱插爱玲的下体、胃及腰背以泄愤，结果爱玲的尿道惨被铝枝刺穿，其他部位亦留下多条伤痕，当场流了2000CC的血，十分恐怖。

不过幸而爱玲被及时发现且送医院抢救，由于尿道受损，目前仍随身携带尿袋。

之后，爱玲再次收到恐吓电话，暴徒声称要杀死她的全家，令这个本来活泼开朗的少女，坠入怕恐的边缘，爱玲希望能尽快出国。

爱玲身世十分可怜，她9岁时，父亲便逝世，母亲随后改嫁，留下爱玲与哥哥与弟弟，所以自小开始，爱玲由叔叔抚养成人。

19岁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本应是美好年华，可谓青春无限好，但谁料到7月初的一场噩梦，将爱玲的笑脸夺去，换来的却是终日愁眉苦脸。爱玲的容貌实际更要年轻，一副娃娃脸，看上去还以为只得15岁，走路时步履轻飘飘的，

可是并不令人感到有丝毫轻快的感觉，相反却令人担心她会随时倒下，尤令人心痛。

记者一行三人老实不客气地登堂入室，只见爱玲睡在房地地上的“榻榻米”，房内黑漆漆的，爱玲辛苦地爬起来与记者打招呼，揭开上衣，一条长长的疤痕深深印在她的肚皮上，针线还见新痕！

爱玲的叔叔把她引荐记者时，她很礼貌地与记者握手，但亦在此时，记者发现她的另一个伤痕。

由于在抗敌时，她不甘受辱，以纤纤玉手握紧着铝枝，阻止暴徒将之插入其体内，故右手的食指及拇指均受了伤，弯弯的，只能以余下三只手指轻轻地与记者握手罢了！

对爱玲来说，每一个动作都要花费颇大气力，就连说话，也是有气没力的，声音既轻又细，记者也要侧着耳才能听到。

表面上看不到她的伤痕，可是据其叔叔说，经过这次伤害后，爱玲的体重骤然下降下十多磅，整个人也消瘦了，且经常于晚上夜阑人静时，偷偷饮泣。

（原载香港《东方日报》1998年8月1日）

雅加达日记

李明欢

1998年8月26日至9月1日，得到福特基金资助，我前往雅加达参加“国际亚洲历史学会第十五届年会”。与会期间，我两度前往雅加达五5月暴乱的“重灾区”，就印尼5月暴乱、尤其是“华人妇女被强暴案”的有关问题，多方走访有关人士：既听到了血泪控诉，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当无数问题盘旋於脑海而今我彻夜难眠时，我决定将自己在雅加达一周记下的见闻，不加评论整理出来。

8月26日 星期三

傍晚飞抵雅加达。按会议安排，人住位于雅加达千中心的“印度尼西亚旅馆”。

从机场到旅馆，搭乘出租汽车约一小时，收费七万印尼盾，按今日的汇率大约七美元。一路车水马龙，秩序似乎还正常。刚才出去转了一圈。街上人来人往，在路旁闲坐的人也不少，以青少年为多。在街上可看到一些独来独往的女青年。遗憾的是夜色中难以分辨她们中有没有华人女性。雅加达已恢复了平静？

给XX的电话打通了，希望能协助安排走访雅加达华人社区 Glodok。

8月27日 星期四

第十五届国际亚洲历史学年会上午在雅加达皇宫举行开幕式，印尼总统哈比比主持开幕式并讲话。开幕式后，全体代表转往MILLENNIUM旅馆，不同专题的演讲、讨论正式开始。

早餐时，来自澳大利亚的R教授带来今天的《雅加达邮报》。头版头条消息是：“政府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五月强暴案的证据”。文中说，印尼武装部队司令Wiranto将军昨日正式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警方对103个举报的强暴案进行调查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些强暴案真的发生过。报上还说，一

个来自台湾的11人调查小组在离开印尼前也说他们没能找到有关强暴案的直接证据。

下午会议间隙，徵询了两位与会印尼学者对事件的看法。

G先生认为：“不要相信那些说法（指强暴华人妇女的案件）。我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和华人相处得很好。我们很同情那些受害的华人（指遭到抢劫者），抢劫、烧屋是令人痛恨的。但是，不只华人，其他印尼人的店、屋也有被烧、被抢的。因为华人开店的多，他们受害也比较多。你不要担心，印尼现在虽然经济还有问题，但你在雅加达是安全的。”

L女士说：不相信会有那样的事件发生。“我们与华人相处得很好。我自己有许多华人朋友。我们之间没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编造出那么可怕的事件。我不相信。”

8月28日 星期五

今日的《雅加达邮报》继续报道：有证据证明，在5月发生于印尼全国各地暴乱事件中，有些人显然是“有组织的煽动者”。但是强暴华人妇女的事件显然被大大夸张了，“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发生过强暴事件，但绝不像有些社会组织所说的那麼严重”。

由于伊斯兰教的周五祈祷，今天的会议从10时半起休会4小时。利用这一间隙，走访了雅加达的GLODOK。走进该区，明显感到一股令人压抑的气氛。入口处一座高楼，据说原先是个旅馆，如今只留下被烧得乌黑的外墙。一座连接GLODOK与对面街区的人行天桥，被彻底破坏。在区内，四处可见被烧得只剩断壁残垣的店屋（楼下为店、楼上为家的小楼）。浩劫已过去3个多月了，但GLODOK区仍是满目疮痍。问起这些楼主们的去向，随行的朋友言：“有办法的出国；有亲戚的投亲；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搭个棚子也得过日子。”可以看到有些人家已在废墟处开始重建住所。

再往里走，是GLODOK市场区，这一带看来破坏较小，时值中午时分，市场仍很拥挤，蔬菜、水果、海鲜、家禽，以及各类日用百货看上去还相当丰富。市场上大多是华人，但也看得出有不少是印尼人。中午与同行的朋友在GLODOK中心区一个由当地华人经营的大排挡吃了印尼餐。

饭后去了C先生的公司。C先生的公司离GLODOK不远，在5月暴乱时

未受到未受到破坏。C先生知道我想了解印尼华人的情况，约了几位朋友来办公室座谈。C先生认为：重要的是要教育印尼华人。“我们受害太多了，可从来没有真正接受教训。尤其是六十五年以来，我们很消极。改印尼名、入印尼籍，总是逆来顺受，心中想着能赚钱就行，手中有钱就安心。结果呢？5月又给了我们一个血的教训。

C先生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印尼华人是属‘鸡’的。谁都知道，‘鸡’怕‘人’，只会‘鸡斗鸡’，在‘鸡食’中相互争抢；遇到‘人’要杀‘鸡’，除了伸长脖子挨宰，一点办法都没有。”C先生认为，苏哈托为维持其统治而刻意把华人与印尼人分隔。“我们应当与印尼人民融为一体。我们应当参军、参政，应当成为印尼的爱国者，到那时，就不会再有甚麽排华事件发生了。”

C先生还认为：当统治者在西伊里安、东帝汶、亚齐制造暴行时，华人不在意，“事不关己”。即使打到我们华人身上了，那些没有挨打的人还只是庆幸自身的一己平安，印尼的反暴志愿人员中华人是极少数，90%以上是印尼人，这个问题得深思。5月华人受害事件不是孤立的，是全印尼国家、民族问题的一部份，需要全盘考虑。军队强暴妇女的事件，早已发生在帝汶、亚齐等地，华人应当关心其它民族的正义斗争。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据C先生介绍，近几个月内印尼华人已先後组织了三个政党：中华改革党；殊途同归党；印尼同化党。C先生本人也正积极联络各方人士，筹备组团结社。

Y先生谈到，华人总是希望有个“好皇帝”。苏哈托下台前，99%的华人认为他是个“好皇帝”，是印尼华人的“保护神”。没想到最后却被这个“保护神”害惨了。华人自己不团结，不斗争。早晚还要再遭殃。

在座的A先生是一位义工，目前在佛教团体中工作，帮助5月事件受害人，但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受害人。问及华裔妇女受强暴案时，他说：“我们的援助人中有一位是遭到强暴的妇女，她不是在5月，而是在7月，被印尼人强奸了。她很痛苦、也很愤怒。经过朋友和义工的劝说，她终于同意去报案。她按要求去了警察局。可是，那些人像听故事一样要她把整个受害过程的细节详详细细地反复述说。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他们还用讥笑的口吻问被受害者感觉很好吧？很舒服吧？这位被受害者无法忍受这种人格的侮辱，再次被要求去接受调查时，她坚决不肯。她说去做证的感觉完全是又一次遭到当众强奸。可警察局说，不按规定去做证就不能证明发生过什么强暴案。”

临离C先生办公室时，传真机发出信号。取下一看，是台湾“关怀印尼受暴妇女访查团”严正抗议印尼《指南日报》的谬误报道。文中郑重声明：“根据本访查团在印尼5天的访察，我们确定印尼妇女自5月的暴动以来，受到了很大的人身威胁，部分妇女尤其是华裔妇女更遭到不明的非人强暴对待。”

8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雅加达邮报》有一篇报道：5月暴乱迫使一位生于印尼、长于印尼的已经67岁的华裔商人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原已不放在心上的种族背景”，第2版上有两篇涉及“强暴案”文章，一是该报的专稿，指出由政府委任的调查组迄今未得到有关强暴案的确凿证据，不过有关调查人员仍在继续努力，希望他们的工作不要受到干扰。另一是读者来信，信中说：近日的报道表明有关强暴华人妇女的案件证据不足。此类事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然而，更重要的是，无论其真实与否，我们应当首先考虑所谓“强暴案”对印尼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影响。由于所谓强暴案被大肆张扬，结果引起亚洲及全球各地华人社会的强烈抗议，有的甚至指责我们是“野蛮人”、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与此同时，尽管印尼政府已开展对事件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复对印尼政府发出各种警告。我认为，这一切都起源于那些非政府组织及志愿人员的不负责任的报道，这些人应当想一想其所作所为对印尼国际形象造成的严重危害。

早上刚到会场，来自瑞典的一位学者主动来打招呼：“我太太昨天去了GLODOK，她说太可怕了，烧了那么多房子。真令人难以相信。”

W教授是研究海外华人问题的知名华裔学者，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特地讲他谈谈对5月印尼华人受害事件的看法。

W教授认为：印尼华人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绝不像其他国家的一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5月暴乱事件发生后，尤其是8月以来，香港、台湾、欧美等地的华人纷纷示威、游行、抗议。可是，他们了解印尼华人的处境吗？他们过去关心过印尼华人吗？更糟糕的是，有些游行示威的口号带有十分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比如有的痛骂回教徒，有的指责印尼民族是个没有人性的民族。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只会刺激印尼政府，激化宗教情绪，甚而伤害广大印尼人民的情感，后果是极其有害的。他还说印尼华人已经是印尼的国民了，他们的问题只能在印尼内部解决，谁也帮不了他们。

当问及华人妇女遭受强暴的问题时，W教授认为：华人妇女被强暴的案件

是不容否认的。新加坡医院就接受了遭受强暴的印尼华人妇女。问题是怎么办，印尼政府已经成立了调查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少受害的华人妇女会公开走上法庭做证。因此政府就说没有证据，有的还对印尼的非政府人权组织施加压力，甚至进行恐吓。这些人权组织和志愿人员的处境很困难。外面的华人不断抗议，印尼政府就不断对这些组织加压，结果呢？也许可以逼出几位受害妇女出来做证，但政府还可以说，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多啊。而且，这些妇女做证之后在印尼的处境将会如何，外面的人为她们想吗？

8月30日 星期日

会议组织与会者前往雅加达以西约100公里处，参观印尼16至17世纪万丹王国的遗址。对古迹印象一般，但是，对当地周围农村的贫困，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简陋、破旧、狭窄、肮脏、内中几乎空无一物的高脚屋；中午吃饭时亲眼见到等着捡食、不，是抢食剩饭的饥饿的孩子们。印尼的自然条件很好，沿途满目清翠，田里水稻长势也不错，但人民却在饥饿中。

与澳大利亚的R教授交换有关对印尼华人问题的看法。近日他也一直在搜集有关资料，并计划组织有关的研讨会。R教授不同意W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如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印尼发生的事件，引起全球华人的关注和声援是理所当然的。“印尼华人的问题只能由印尼自行解决”的看法太狭隘了。认为中国政府应当保持沉默的看法是过时的，因为目前的形势与65年前已完全不同。

T教授是印尼知名的学者，旅行途中，请他谈了对印尼种族关系的看法。T教授指出，印尼人与华人的关系，曾受到过三次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一次是荷兰人统治印尼后实施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华人被列为高于印尼原住民的二等公民。第二次是本世纪初，印尼华人受中国本土革命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建立中华社团、中华学校等，与当地民族隔阂加深。第三次是50年代，大批印尼华裔青年返回中国。不过，近30年来，华人与印尼人相处的情况应当说还是不错的，但是有些华人与苏哈托家族关系特殊，牟取暴利，引起社会公愤。但T教授也承认，那些与苏哈托家族有关系的华人显贵，早就逃离印尼，真正在暴乱事件中受害的多是华人的中、下层店主。

在谈及华人妇女受害时，T教授明确表示否认：5月强暴案显然是被大大夸张了。也许有，但那是个别的，不可能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的事件。在INTERNET网上传播的那些所谓“强暴华裔妇女”的照片已被证明是假的……

在车上时，与邻坐一位印尼大学的女教师谈起强暴案，她明确表示：“不可能，没有那样的事。印尼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华人，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我们相处得很好。我们都是朋友。”车行途中，看到一座被焚毁的高楼，我问：“这是华人的产业吗？”她回答：“不是。5月时那些人任意放火，并不是只烧华人的楼房。”不过，两天前经过此地时，Y先生（印尼华人）曾明确告诉我这幢楼原是一个印尼华商开设的超级市场。

8月31日 星期一

第十五届年会今日正式结束。（略）

访问了一位台湾来的商人L先生，在万隆开设纺织厂已有10年。他认为：目前印尼最为严重的是经济问题，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还有许多人失业。抢劫案在雅加达时有发生。万隆的情况好一些，因为那里的纺织业还有生意，工厂还能开工。作为台湾商会的负责人，L先生已多次组织台商为印尼社会福利捐赠钱物。“我们前些年在这里赚了钱，现在理应拿出一些钱来回报社会。有些商人看到经济不景气，就关厂走人。这是不负责任的。老板走了，工人怎么办？工人的一家怎么办？我们是生意人，不做亏本生意。但是，工厂关门，工人生活不下去，社会就会乱，到头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据L先生介绍，印尼盾贬值后他已给本厂工人提薪20%（超过政府关于提薪15%的规定），目前该厂非技术人员每月大约可得20万印尼盾，这在印尼工厂中可算是最高的了（据报载，有的工厂仅在开工时付给工人日薪2000盾）。可是，现在市场上的米价一袋（30公斤）就要10到12万盾。每月工资光买米供一家人吃饭都有问题，怎么生活？

晚上与一位印尼大学教师谈及5月暴乱问题，她说：那几天街上很乱，纵火、抢劫太可怕了。我们都不敢上街。上楼前遇到一位参加会议马来西亚华人，他今天下午刚去过GLODOD，他说：“那时的情况比我原本想象的要好得多！有些消息看来过分了。”

果真如此吗？尤其是那些引起世人公愤的强暴案，真如T教授所言，是个别案件在传播中被渲染、夸张了？可惜未能找到五月事件的直接受害人进行访问。

晚11时许接XX先生电话，告知已为我安排在印尼最后一天的节目：上午先去著名的茂物植物园，尔后去雅加达迷你公园，下午去购物。雅加达之行看来将在欣赏印尼文化风情的行程中结束。

明晚就要离开印尼了，时间过得真快！

9月1日 星期二

此刻我已坐在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上，回想今日一整天的所见所闻，百种情感，千层思绪，交织心中……

清晨6点半，C女士准时来到旅馆。她将开车带我去参观茂物植物园。可是，就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我意外地从随意的交谈获悉：C女士是一位佛教徒，本人正积极参与援助5月事件受害人的工作。而且，尽管时间很紧，但如果我有此愿望的话，她可以帮忙联系访问受害人及义工。于是，我立刻决定放弃所有旅游计划，改去拜访有关人士。

先到了H夫妇家。N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义工。他们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援助五月事件受害人的计划：从心理上的慰藉到经济上的支援。他们分头打了几个电话，想要联系几位受害人，可惜没能联系上，其中两人去了新加坡“有办法的谁不想走啊？”N先生说。C女士建议我去看看已在5月暴乱时烧为废墟的红溪街，H女士正参与佛教团体援助该街区重建的计划。

这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1740年荷兰殖民者曾经一手制造了野蛮屠杀巴马达亚（今雅加达）侨的“红溪惨案”，近万被害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城内一条名为“红溪”的河流。258年后的今天，这条红溪街又在一场以当地华人作为主要攻击目标的暴乱中惨遭洗劫！目睹整个街区已成满目废墟，耳闻C女士介绍暴乱当日的恐怖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义工A先生接到H女士的电话后。立刻赶到红溪。他带来了四、五十张照片，全是在洗劫发生后不久拍摄的。A先生从中选出16张照片送交给我：这些都是历史的见证！

拐过一个街角，在一片废墟中有一家装修一新的眼镜店已开张营业。我们走入店内不久。华人店主B先生即匆匆赶到。B先生祖籍广东，本人生于印尼。在5月暴乱时，B先生的两家设备先进的高档眼镜店均被洗劫一空，损失在20万美元以上。他说：“5月13日下午4点左右，我从外地回来，到了街对面就过不来了。那里的熟人也不让我过来，他们说如果你过去就没命了。我看到一些人围着这一带，有人领头高声喊叫：赶走支那人打死支那人！6点左右有人开始撬我商店的铁门。因为铁门有两层，不容易撬。大概到8点多他们撬开了，开始乱抢，9点多有人放火，这一片全烧起来了。有的店主认识这里警察局的

头，平常关系不错，一见情形不对立刻去打电话，请求派警察来保护，对方答应马上派，可根本就没派。结果是直到半夜12点多才有军人来，但有什么用？全都烧光了！我30年的血汗积累，全部被烧光了！”

B先生介绍，现在的店面，屋顶是由佛教慈善团体资助修建的，底层是由天主教慈善团体援建的，自己卖了一辆汽车，用卖车的钱进了一些货。虽然明知道有危险，但我们一家人得吃饭，得生活，不做生意怎么办？”他说。

B先生认为：华人与印尼人的关系历来有问题，这是印尼当局有意制造的，他们一贯传播对支那人的仇恨。我们华人是他们的出气筒。有一点事就拿我们开刀。我们赚的全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可有人就是眼红，妒忌。早在5年前就传说要把华人抢光、烧光、杀光。但我们总希望那只是谣传而已。结果呢，不幸的事真的发生了。我们很多华人都曾经相信过苏哈托，希望他保护华人，我现在明白了，他是笑里藏刀。我们华人被他害苦了，我心中明白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可是，去哪里？不知道。30年前，为了生存，我入了印尼籍，可是，当局从来就没有当我们是印尼人。暴徒更是狂叫要赶走我们这些华人。”

离开B先生的店，去了一个华人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住宅区，那里基本没有受到破坏，但可以感到气氛不正常。家家户户紧闭，少有人出入。据E先生说：“我们现在每月要向这里的警察局交保护费400万盾，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尤其是很多人的店都被抢、被烧了。警察局收了钱，派3个警察在我们这个街区巡逻。虽然我们不知道如果真有事发生的话，他们能不能保护我们，可我们不敢不交钱，因为不交钱可能更糟糕，5月事件发生时，华人毫无准备。哈比比前不久来视察时说，你们可以自卫。但怎么自卫啊？现在不少华人家中准备了刀子什么的，可我们是平民，是商人，从没受过什么训练，打起来根本就不是那些暴徒的对手。我们很担心，如果再发生什么事变，后果不堪设想。”

在受害人D先生的家里，拿出一个大塑料袋，打开后，里面是他女儿的照片。他说：“财产被抢光、烧光，我认了。对我个人的生命，也无所谓了。可是，我有三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两个上中学，这是我现在最大的心事。我把她们的照片全收起来了，不想让外人看到，怕有坏人闯进来做坏事。我不知道怎么保护她们。我想把她们送出国，可是我的财产全没了，无法负担她们的费用。你从中国来，我希望你能帮我们向中国有关部门或学校反映，能不能为我们受害人的女儿提供奖学金，或是减免学习、生活费用，接收她们去中国上学，帮帮我们。”

在一位义工家里，听介绍说 I 来自中国厦门，对方显得十分激动：“你是

中国大陆来的吗？啊，中国大陆终于有人来关心我们了！当北京向印尼政府提出抗议时，我们真高兴啊！我们几个人都流泪了，我们哭了……我们接待过来自美国、日本，还有台湾的代表，今天中国大陆终于派人来了！我们知道大陆正遭受严重水灾，这时你们还派人来看我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方的声音哽咽了。那一刻，我的心被强烈地震撼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来访问受害者，是出于自己的良知、良心，还有作为一名历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感。我既不受中国政府派遣，更没有担任任何政府职务，可是，我能忍心这么说而令对方失望吗？我历来对从政不感兴趣，只愿在学术海洋里自由遨游，可在那一刻，我突然从心底里痛感自己无能：我恨自己什么也帮不了他们，我恨自己无法对他们做出任何承诺……

整个下午，先后与好几位义工交谈，对方都直接参与教会组织的援助受强暴华人妇女的工作。以下是谈话的综述：

现在有人极力否认发生过强暴华人妇女的事件，这怎么否认得了呢？5月底刚听到那么残忍的强暴案时，我也不愿相信。6月初，在神父的带领下，我参加了帮助受害妇女的工作，亲眼见到了受害人，她们的情况真是很可怜。3个多月过去了，部分人的身体逐步恢复了，但内心的伤害仍然很深。现在政府要求受害人必须出庭做证，道理上是如此，但做起来太难太难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比如三姐妹中两个妹妹被强暴后又被烧死的案件，那位大姐姐现在已去了美国；受强暴中那个年龄最小的9岁女孩，现在还在保护中心，每见到她，我们义工总忍不住要流泪。实际上不幸的事件还有很多很多。

5月事件后，我们教会设立了热线电话，让受害人与我们联络，我们愿意上门帮她们。一次，一位17岁的女中学生打来电话，说她被强暴了，很痛苦，希望我们帮帮她。我们约好下午两点去她家。可是，当我们的义工到她家时，却听说她已经自杀了，而且尸体已送去火化。那位痛不欲生的母亲告诉我们：知道女儿被强暴后，父亲觉得女儿的前途全毁了。当知道女儿要向外人报告自己被强暴的事后，做父亲的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就去买了一瓶杀虫剂给女儿……有一位遭到强暴的妇女，原是一公司的职员，在我们保护中心住了一段时间后情况已比较稳定了，可是，当她得知自己怀孕了的消息时，再也无法忍受，第二天就自杀了。我们义工都哭了，我们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点意识到、并阻止她……我们是华人，知道要公开说出自己被强暴的事有多么困难。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事怎么办。按政府的要求，我们必须列举受害人的姓名、身份等详细情况，还要介绍被害过程，要

被害人到医院接受检查,要有旁证等等。我们义工也受到各种威胁,还说要控告我们编造谎言。可是,你想想,这么悲惨的事我们能编得出来吗?而且,我们义工很多都是家庭妇女,我们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编造这些谎话呢?

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地都有华人在声援我们,我们很感谢。65年前有50万华人被杀害,那时没有人敢为他们说话。现在不同了。有人说中国政府表态、海外人声援会使问题更复杂;但事实是,北京抗议后,我们处境并没有更困难。而且,正是北京说话后,正是全球华人广泛抗议后,哈比比才公开道歉的。

Internet网上的照片的确有假的。我们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现在有些人就抓住这一点,一直攻击我们(指印尼的非政府人权组织),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

我们认为,大家应当共同呼吁“揪出主谋”,决不能让事件的主谋逍遥法外。我们目前的处境十分困难。有关当局想掩盖事实;许多印尼人也愿意“相信”没有发生过如此丑恶的强暴事件。我们华人义工不容易。我们的印尼义工朋友更困难,受到的压力更大。他们的精神真的十分令人敬佩。我们希望声援者注意,不要攻击、谩骂印尼人民或回教徒,要知道,全印尼志愿参加“印尼人权及反暴力义工组织”工作的有377人,其中70%以上是印尼原住民,很多华人还是不敢站出来。可以说,出来为华人伸张正义的,更多的是印尼原住民。很多受害的华人妇女当时也都是靠印尼原住民救护的。暴乱发生时,华人很少有人敢出来,如果没有印尼人援助,那些受害人很多可能根本就活不下来。

10月15日是印尼政府规定的公布调查结果的最后期限。尽管目前调查、取证工作困难重重,我们最近甚至发现有人受指使伪装成义工去恐吓受害人,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破坏。但是,我们非政府人权组织正努力工作,一定要在10月15日拿出确凿有力的证据,为受害者伸冤,将罪犯送上审判台。

6时许,为了赶8点的飞机,只得匆匆结束访问。临别时,一位被访者说道:我们以人格担保我们所说的一切全是事实。不过,由于我们目前的处境,请不要对外人提及我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朋友们,我理解你们的处境,我更由衷地敬佩你们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而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你们的名字将同你们的事迹一起,广昭天下!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11月——12月号)

社工惨遭凌迟唤起5月阴影，恐怖魔爪还在伸延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一

曾秉钧 陈华芝

若世界真有轮回，就让一切的罪恶在这里终止好了，不要再让我女儿被奸杀的惨剧，继续在印尼这个国家上演……

这是10月9日被暴徒杀害的18岁华裔女社工王静丽的母亲，所发出的最沉痛悲唤，但是，已唤不回被奸杀女儿的年轻生命了！

王静丽的印尼名字叫做依达玛塔迪娜塔，在当天下午6时，被下班回家的父亲发现惨死在房中，其家人和非政府组织相信，依达死前曾遭受变态性侵犯，惨遭奸污和鸡奸，再遭杀害。

从一宗接一宗的零星案件看来，印尼暴徒在5月动乱中对印尼华裔妇女进行的冷血奸杀仍未停止，印尼华妇仍然活在恐怖的阴影中，泪还在流，血还在溅，魔爪还在延伸……

每寸肌肤都被刺戳

我们这次远赴印尼采访，无意中碰上这宗惨绝人寰的悲剧，就在案发翌晨，我们在当地社工黄伟强的安排下，到死者位於雅加达千百家布爹（Cempaka Putih）钻石路的住家进行实地采访。

依达的尸体用白布包裹着，摆放在客厅一角，只露出面孔，明显可见其脸部和嘴唇一片瘀肿，还染有已变成黑色的血迹，其露出一截手腕，也看得到已变黑的伤痕，双眼微张着，似是死不瞑目。

死者的母亲威温苏丽亚迪娜塔红着眼睛，指着楼上的房间对我们说，依达就是在睡房里被杀害，门前还可看到血迹，房门右侧的神台摆满了佛像，但满天神佛仍然消解不了女儿的劫难，威温一时无语问苍天。

忆起那血淋淋的一幕，死者的父亲里奥哈约诺也忍不住流下男儿泪，心有余悸的说：“在我发现她时，血泊中的依达，胸、腹、心脏下侧和双手不知被暴徒刺戳了多少刀，最可怕的是喉部几乎被切断，暴徒简直就是要置依达於

死地。”

威温也流着泪，悲愤的说：“从依达的死状看来，我们怀疑依达死前曾遭受性侵犯，不但被奸污，更被鸡奸！天呀，依达的身体几乎被刺戳得没有一寸肌肤是完好的，我不晓得暴徒为何如此残暴，何况依达和他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威温告诉我们，在7月间，附近有另一位华裔少女被奸杀，而且死得比其女儿更惨，丧尽天良的暴徒用铁枝把内衣从受害者的下体直贯喉部，再从嘴巴里穿出，而事发地点距离其住家不过约500米。

威温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自从依达在5月暴乱中第一次被强暴后，就积极参与辅导受害者的工作，她本来打算在本月20日携同其女儿及另几位受害者，一同到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供证。

虽说爱女的遇害对她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但这位勇敢的母亲却声明不会就此退缩，她拿着一本佛教小册子对我们说：“假如世上真有轮回，就让一切的罪恶在这里终止好了，不要再让我女儿被奸杀的惨剧，继续在这个国家里上演。

“我也祈求，依达若再转世为人的话，能够好命一点，不要再遭受那么多的苦难，还有千千万万和我女儿年龄相若的少女，也不要再遭受魔爪的凌辱和杀害。”

她说，她会到全国各地去分发传单和弘扬佛法，以广布慈悲，让一切罪恶的事不再发生。目前，她唯一担心的是大女儿伊比的安全。

依达事件再次在印尼社会引起很大的震撼，事发后印尼的非政府组织又再把矛头指向“幕后策划者”，而印尼社工的安危也开始敲响了警钟，因为依达之死意味着社工开始流血和牺牲。

印尼妇运组织“妇女之友”领袖妮妲娜迪亚接受我们访问时，也不讳言，这显然又是一宗经过策划的命案。

她不排除社工的生命正受到极大的威胁，社工服务今后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今后行事须更加谨慎；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扮演压力集团的角色，制止不人道的事件继续在印尼发生。

人权斗士罗莫圣迪阿旺神父也不否认，依达之死对社工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相信社工不会因此被吓倒，会继续揭露5月风暴众多受害者的遇害真相。

印尼新兄弟协会秘书长杨金山受访时,表示政府 和军方不应再坐视和否认此类案件的发生,须采取行动保护人民的安全。

即将前往美国供证

一名不愿名字被引述的社工甚至义愤填膺的说,现在是印尼社会拿起武器来反抗的时候了。

印尼舆论权威《罗盘报》在本月 12 日的社论中,评论非政府组织所发表的看法是可以理解和合逻辑的,尤其是受害者参与志愿工作和即将前往美国供证,依达之死也提供印尼社会对 5 月集体强暴案更广大的 思考空间。

印尼警方则极力否定非政府组织的论点,并非议 非政府组织把这件事政治化,甚至恫言对付散播“虚假报告”和把问题政治化的人士。印尼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首长维兰托将军,日前在 一项集会上再次否 认 5 月集体强暴案的指责,并声称政府没有这方面的 证据。

这种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的形势使局面更加混乱,非政府组织的指责是否确有其事,由政府与非政府 组织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公布调查结果时,可能就会 有一个更明确的答案。

挺身辅导受害者走出暗夜，华人羽球员心在泣血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二

“华人在国际羽球坛上为印尼出了那么多力，争取了那么多的殊荣，无奈印尼华人还是摆脱不了代罪羔羊的厄运！”

王莲香是印尼最受欢迎的女运动员，也是印尼最家喻户晓的人物，在5月暴动和集体强暴惨剧发生后，王莲香虽然没有受到逼害，但她却也感触良多，而说出了以上百般无奈、万分矛盾的话。

更何况，她已怀了7个月的身孕，与印尼羽球男健将魏仁芳的爱情结晶就快出世了，宝宝呱呱落地时，却偏逢印尼最黑暗的乱世，王莲香哭了，她为印尼的现状而哭，也为下一代的茫然而掉泪。

羽球天后多次痛哭

印尼发生的暴动和强暴华裔妇女事件，激起印尼华社的公愤，越来越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加入志愿工作队，包括多位叱咤风云一时的印尼羽球好手，其中“羽球天后”王莲香对被强暴的女受害者最为关心，不止一次为她们而痛哭。

目前，魏仁芳和王莲香夫妇以及60年代羽球天王梁海量，是为“文明与人道组织”（Team Kemanusiaan & Beradat）工作，另一位羽球名将林水镜则加入一个非政府组织。

印尼国家羽球队心理辅导医生安顿英特拉再也告诉我们，虽然王莲香已怀有身孕，在5月集体强暴案发生后，她还是与丈夫魏仁芳马上投入扶助和辅导受害者的工作，经常抽出时间到各地去慰问受害者，并亲自进行辅导。

“王莲香的出现，的确给了这些受害者很大的鼓舞，因为她是印尼最受欢迎的运动员。”

安顿医生语重心长的说：“为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是当前急务，因为很多受害者因为抹不去那一段惊恐的记忆，而陷入歇斯底里或精神崩溃的状态，我们迫切需要更多这方面的专才，并希望通过各方面的通力合作，给受害者带

来更大的希望。”

不只是印尼羽球天后王莲香，台湾《暗夜 幸存者》作者徐璐以及在 70 年代以一首《醒来吧，雷梦娜》红透半边天的歌手李亚萍，也成了被强暴的印尼华妇的“精神支柱”！

为了帮助许多陷入歇斯底里状态的受害者走出阴影，印尼社工群费尽心力，包括一位年轻社工黄伟强最近把台湾女记者徐璐出版的名著《暗夜幸存者》，翻译成印尼文，分派给所有受害者阅读，作为受害者走出暗夜的指引。

安排秘密疗养地点

黄伟强说：“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邀请徐璐亲临印尼，与这里的受害者分享她‘走出暗夜’的心路历程。我对徐璐被强暴的经历深感震撼，并希望印尼这边的受害者从中得到启示和激励，从而克服心理障碍。”

一位当地华商廖瑞辉也向社工们建议，邀请台湾 70 年代歌后李亚萍来印尼，给予受害者精神支持，李亚萍早年也曾受到强暴，不过当时她的爱人 70 年代红歌手余天还是与她结为连理。

事实上，印尼社工群连月来就不间断的工作，除了为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带她们去进行医药检查之外，还得悉心安排秘密的疗养地点，包括送她们出国避难和疗养，目前已有不少受害者被送到大马、泰国、菲律宾、台湾、澳洲、澳门甚至美国，一方面还得搜集证据和带她们去供证，工作非常艰辛。

搜集证据面对大压力

“尤其是在搜集证据方面，我们面对很大的压力，我们和政府的冲突日益尖锐，其实有不少证人和受害者都愿意出来供证，可是政府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由於发现政府诚意不足，许多非政府组织已退出联合调查小组分头行事，只留下善迪阿宛神父的志愿工作队在里头。”

华人社工池美容对我们说：“其实政府没有必要掩盖事实，发生这样的事印尼已经丢尽脸，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如今，随着 18 岁女社工依达被奸杀，社工群已面临更大的困扰且身陷险境，但池美容却斩钉截铁的说：“那么多铁铮铮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到现在还能够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是我们不怕，如果调查结果出来，当局仍否认有

强暴案的发生，我们会揭露更多的内幕。”

徐璐和李亚萍都曾经是“暗夜幸存者”，他们都已克服心理障碍并且找到幸福，然而，印尼的“幸存者”要走出暗夜，恐怕还得费一番很大的工夫。

看来夜还很长，“幸存”更不易为。

避免在暴动时受攻击，华商利用政改作护身符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三

由印尼大学生在5月带头发动的政改运动，虽然成功把一代强人苏哈多总统拉下台，拉开了印尼大时代的帷幕，但也把印尼推入了动荡不安和腥风血雨的年代，一片乱世之象。

自5月事变以来，爪哇岛即笼罩在杀戮四起的恐怖阴影中，一宗接一宗的奸杀案，不时发生的大小暴动和劫掠，以及横行东爪哇的神秘屠杀案，令人不禁怀疑印尼的法制是否已崩溃，印尼是否已处于无政府状态？

而饱受排华浪潮祸害的印尼华人，在一片兵荒马乱中人人自危，走与不走，留与不留，剪不断理还乱，惟有以不变应万变，苟存于乱世之中。

我们一行3人在雅加达采访期间，就碰上几件大事：第一，由在野党组成的国民阵线限时政府下台；第二，印尼武装部队庆祝独立53周年纪念；第三，由反对党红人梅嘉华蒂领导的民主党在巴厘岛召开大会；第四，1994年被禁的著名时事杂志《时代周刊》(Tempo)复刊。

整个印尼几乎沉浸在炽热的政治浪潮中，那边厢民主党的“红色浪潮”席卷而至，这边厢学生和野政党天天走上街头反政府示威，把独立53周年的气氛都掩盖了。

一位年轻政治领袖塔斯林对我们说，哈比比总统和曾经令印尼人引以为傲的武装部队的威信，空前低落，人民骂声不绝，换政府的呼声也空前强烈，印尼人甚至宣称人民力量大过政府，这是过去30年来前所未有的事。

塔斯林曾经出任民主党副主席，据他解释，贪污腐败的旧政权受到人民的唾弃是可以理解的，倒是曾经令人民引以为傲的武装部队的“双重功能”也开始受到质疑。这件非比寻常的事，目前军政分家的呼声已经响起。

“现时人民力量似乎比政府更为强大，人民天天骂政府，大学生天天示威，要哈比比下台的呼声不绝于耳。总之，“政改”大过一切，人民坚信只有通过彻彻底底的政改，才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才有希望。”

可以这么说，由大学生发动的“政改运动”已被印尼人民奉为“第一信仰”，到处可见政改的布条和字眼，人人都把政改挂在口中，不管是“真政改”

还是“假政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商家（特别是华人商家）和人民都利用“政改”作为护身符，在商店或住家门前写上“支持政改”或“完全政改”的字眼，当然，他们是否真的支持“政改”就不得而知，但这么做便能避免在暴动时受到攻击。

现时印尼的言论也空前自由，许多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冒现，一些言论大胆而被封禁的刊物如《时代周刊》(Tempo)，也纷纷自我解禁，而且着墨的课题大多是有关政改或倾向於揭露5月风暴真相。

大学生发动的“5月起义”也带来了血腥的一面，自5月事变以来，整个爪哇岛就沉浸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其中最骇人的莫过于东爪哇过去3个月来发生的150名巫师和宗教传教士被屠杀事件，令印尼朝野皆震惊。

据说，他们是被装扮成忍者的神秘人杀害，其中许多被刺死或喉咙被割开，一些尸体甚至被肢解吊在树上，这些神秘谋杀事件现已蔓延开来，一时闹得人心惶惶，尤其是宗教温和派份子，更担心自己可能成为杀手下一个目标。

另外，也是华人社工的安顿英特拉再也医生向我们揭露，雅加达在10月初再次发生大规模挖坟事件，这一回是发生在城南40公里的加东山，逾百个华人坟墓被挖掘，一些尸骨甚至被弃置路旁，暴徒行为令人发指。

另一位不愿名字被引述的华人社工沉痛的说：“从5月事变至今发生那么多的屠杀、奸杀甚至烧尸案件，印尼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

他悲观的说：“在这里，人命和财产已经没有保障，生命朝不保夕，也许明天我已经横尸街头，甚至尸骨无存也说不定那些人已经丧失人性！”

在现阶段，最令印尼华人担心的是大学生和在野政党的强烈诉求，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类似5月事变的大风暴。

一位姓林的老华裔颓丧的说“如果劫数要来，谁又挡得住？毕竟华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张开耳朵、睁开眼睛，大家发挥守望相助的精神，多多交换资讯，也许可以把局势看得清楚一些。”

雅城的街头，许多在动乱中被焚毁的建筑物仍未重建，站在这些残垣断瓦面前，令人触景伤情，不期然想起那一个黑色的5月。也许这些建筑物正是最好的明证，那一场血腥的见证！

许多在5月间被暴民掷石头，玻璃千疮百孔的大厦也未重修，这是因为当

前的局势仍然动荡不安，业主不愿出钱维修，以免动乱再起，赔了夫人又折兵。

黄昏中的雅城，阳光依旧温暖，但我们却感到不寒而栗，心中涌起一股强烈意念：印尼啊印尼，你究竟受了什么诅咒？

伸出头来给人砍？华人参政披荆斩棘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四

印尼5月暴动演变而成的排华事件，是印尼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无数华人被血洗、劫掠和强暴，然而却也一乱惊醒梦中人，令印尼华人惊觉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不能再逆来顺受，不能再忍辱偷生，必须站起来为自己的命运斗争！

印尼华人参政的主张和呼声已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在今天，印尼华人普遍上相信只有通过参政一途，才能自救自强。

然而，政治觉醒固然是有了，但对于参政之道，印尼华人却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集体和明确的大方向！有人认为必须组织华基政党，有人却悲观认为此举无疑是“伸出头来给人砍”，有祸延华社之虞，因此也有人主张以“天女散花，遍地开花”的方式，鼓励有志之士积极参与各政党。

华族命运转折点

在这当中，马来西亚的政治体系备受推崇，大马多元种族共荣共存的治国之道，被印尼一些学者引为典范，更被推举为印尼未来新政体的模仿榜样。

无可否认，在5月事变之中，印尼华人再次成为“代罪羔羊”，牺牲了不少人命，但也为华人带来新的契机，唤起了当地华人前所未有的政治觉醒。

华社也普遍认同，此乃“扭转印尼华族命运的历史转折点”，必须趁此言论空前自由、改朝换代呼声空前强烈之际，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自己民族的命运斗争。

目前，印尼华社正在热烈谈论参政的主张和自强自救之道，也有不少热血之士挺身而出，为华社讲话和统率政治运动，就在哈比比政府开放党禁之后，3个由华人组成的政党已经诞生，即中华改革党、同化党及大同党，同时一个称为印尼民主社会团结的论坛亦已成立，以实现民主社会及尊重人权为斗争目标。

然而，成立华基政党并没受到印尼华社看好，华社普遍上认为华族人口太少，未战已先败，而且种族色彩过於浓重，极可能反而使到种族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化，形成更严重的冲突。

多年来成为印尼华社发言人的前苏哈托幕僚林绵坤，在接受我们的访问

时，便一针见血的道出其中症结：“搞华基政党不成气候，是因为没有群众力量，印尼华人虽有700万之众，但却散居各地，而且比起印尼的2亿人口，简直不足为道，即使赢得一两个议席又有甚么意义？”

因此，他反而主张印尼华人积极参加各政党，不管是什么政党都好，以收“天女散花，遍地开花”之效，使印尼华人在各政党都有代表，占的议席就比较多，力量也更大。

军、政必须分家

“今次5月暴动的排华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华人已经受够了，华人不能再做沉默的羔羊，是华人必须站起来为自己命运斗争的时候了。”

他也认为自独立以来便主导军、政的印尼武装部队，也应该进行改革，不应再以“独立革命军”自居和干预政治，毕竟现在时代不同，是军、政分家的时候了；“我觉得武装部队的当前急务是恢复国家安宁，同时回到保卫国家主权的职务上。”

“试想，一个武装部队首长上电视的机会比总统还多，而且还在电视里唱歌，并且允许军人参加政治运动，这成何体统？”

对于华人参政，泗水私立大学校长安顿普里加诺教授也有一套看法，他受访时说，华人若想在政治上占一席位，必须要有一个“合乎印尼多元种族国情”的政体和政治纲领。

根据他作出的研究和观察，他觉得大马的政治体系可能适合印尼，因为大马多元种族的社会结构与印尼有雷同之处，而大马也已证明这个体系是成功的。

“换言之，印尼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并且还政于民，改由人民投票选所有国民议会和地方议会代表，不再像现在从中央领袖到省长，几乎都由军方垄断。”

华裔文化工作者林兆英也主张华人以个别人士的身份参政，毕竟过去的一些例子证明，华人参政多没有好下场，遭到当权者的排斥，因此若组织华人政党，无疑是“伸出头来给人砍”，恐怕还有祸延华社之虞。

据这位印尼华裔父老分析，华人从政其中一个最大的致命伤，是欠缺一个有领导能力的领袖，因此无法凝聚华社力量，而且基于过去的禁制，印尼华人没有参政经验，这是印尼华人吃亏的地方。

林兆英说的对，当前的印尼华社虽有参政热诚，也有不少热血之士，但却犹如一艘没有舵手的船，不知航向何方，前路依然茫茫！

交出民脂民膏，苏哈托还能救国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五

一提起苏哈托，印尼人民的眼睛像要喷出火来，32年来惨遭苏哈托排华政策逼害的印尼华人自是没有好话，连印尼人本身也恨声不绝，在他们眼中，苏哈托是“掠劫印尼财富的强盗”，是印尼的千古罪人。

苏哈托，你错了！

虽然苏哈托已经下台6个月，可是印尼人民还没有忘记他的错，今天的印尼社稷有倒悬之急，政局动荡不安，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印尼落得这样哀惨的下场，一切都是苏哈托造的孽！因此清算苏哈托的呼声才会到今天仍如此强烈。

但矛盾的是，在大多数印尼人民眼中，却也认为只有苏哈托才能挽救印尼今天的经济，为何会这样？原来，印尼人民的看法是，只要苏哈托及其朋党们肯交出富可敌国的财富，印尼便能起死回生。

可是，时至今日，看来苏哈托并无此意，一点也没有！

我们在雅加达一带行行走走，所接触过的人，上至政、商界人士和文化工作者，下至贩夫走卒，一谈起印尼为何那样乱，为何那样糟糕，人人都把矛头直指苏哈托，一切都是苏哈托的错。

早已种下败因

就连苏哈托的一名前幕僚林绵坤，也向我们大曝内幕，指印尼的衰败并非始于15个月前的经济风暴，而是早已种下败因，经济风暴只不过加速印尼的溃败而已。

林绵坤在其办公室接受我们的专访时透露，苏哈托在执政的首20年，尚且励精图治，把印尼带上欣欣向荣的道路；也许那时苏哈托还没有什么财富，儿女年纪还小，对幕僚也言听计从。

但在后 10 年，苏哈托却变了，可能是因为他的权力太大了，大到他以为可以为所欲为，而且他的儿女也羽翼渐丰，身边围绕的都是权贵，苏哈托变成一个“残民以自肥”的专制政权！

“这时候的苏哈托已是忠言逆耳，不听任何人的话，终日只顾着与他的朋党们‘做生意’，敛聚财富，终导致印尼国势衰败……可能是他的权力太大，在位太久了。”

一手毁掉印尼

林绵坤承认，苏哈托上台后采取的排华政策，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即使是当年曾经最接近苏哈托的他，也不能独善其身；“当年我曾经为苏哈托当上印尼总统而展开斗争，为他策划学生运动，但最终仍躲不过‘飞鸟尽，良弓藏’的命运，在苏哈托的排华政策下，他不想有华人留在身边，逼使我决定在 1974 年离开苏哈托从商去，直到 1987 年，我又放弃担任了 20 多年的国会议员职，完完全全退出政坛。”

“我完全认同苏哈托是个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是他一手把印尼带起来的，但也是他一手把印尼毁了，使到印尼在 32 年后的今天，再度爆发另一场政改运动。”

林绵坤认为，这次由大学生带头发动的印尼政改运动是正确的，这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虽然未竟全功，但至少成功把苏哈托拉下台；“可惜，政改运动最后却演变成暴动和排华浪潮，印尼华人再次成为当权者的代罪羔羊，以转移人民的视线。”

而哈比比则是政改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哈比比能够当上总统应该要感谢大学生，而不是怪罪大学生，因为那是一场纯反贪污、反腐败政权的运动，并没有任何不良意图。

不过对于哈比比政府，林绵坤也没有好言，他觉得哈比比缺乏忧患意识，不能改变现状，不但平乱无功，对重振经济也表现得一无是处，搞到街上哀鸿遍野，人民没有工作做，没有饭吃。

排华带来破坏

更严重的是，人民不信任哈比比政府，因为哈比比是苏哈托的继承人，是

苏哈托的义子，是既得利益者；人民要哈比比把苏哈托带上法庭，但哈比比不敢，人民只有期望新政府，并且肯定不会放过苏哈托。

另外，根据泗水天主教大学校长曾云来的看法，如果不是苏哈托及其朋党贪污敛财，印尼不会在经济风暴中伤得那么重，严格而言，印尼的情况应该像马来西亚，而不是像现在的奄奄一息。

印尼华人老作家黄东平也指出，苏哈托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不该排华，更不应该封禁中华文化的发展，如果撇开经济风暴不谈，印尼的经济成就不止如此。他希望排华事件在这里终结，让华人能够真正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我们与数位“德士”司机和酒店职员交谈中也得悉，他们并不希望国家继续乱下去，政府也不应该再排华，因为那只会破坏国家经济，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失业，这一切都是因为苏哈托当年太贪污，太腐败了。

据他们指出，5月风暴后，除了巴厘岛之外，印尼其他地方的游客已近乎绝迹，如果印尼要重振经济，如果印尼还要发展，开放政策是唯一出路。

他们也一致认为，苏哈托及其朋党们不应抱着敛聚的财富不放，而是应该交出来，救救这个国家，救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大企业掌控经济，富有华人不到5%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六

“你们华人只穿了一条裤带来印尼，现在你们个个都腰缠万贯，我们却连一餐也吃不饱，穿着你们原来的裤带滚回去吧！”这是印尼每次发生暴乱时，必定挂在暴民口里的叫嚣。

印尼种族间的贫富悬殊问题，纠葛争吵了数十年，谁对谁错仍然理不出头绪，而且公婆各说各有理，不过每逢社会动荡不安，华人总是一面倒的成为“代罪羔羊”，总是躲不过被逼害的浩劫。

印尼人经常对外控诉说，80%以上的国家经济是装在占人口不到5%的华人口袋里；华人则辩称这是妄加之罪，至少60%的印尼经济操控在国营企业手中，加上“皇亲国戚”瓜分掉的比例，确实由华人掌控的部分其实所剩无几，大概只有几巴仙！

某些政客和传媒经常引述一些数字，来说明华裔大企业集团如何支配国家经济，印尼商业资讯研究中心最近便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指印尼现有300家企业集团的财富已达227万亿盾（约1164亿零吉），占印尼国内生产总值约70%，在这些大财团中大部分是华人掌控，其他还包括苏哈托的“皇亲国戚”。

有钱是否就该死

华人到底是不是都很有钱？有钱是不是就该死？这次我们深入雅加达和泗水，一探其中虚实，从多方面的探讨得出的结果是，真正有钱的印尼华人只有少数几个，像林绍良、黄奕聪之类，一般华人不是很有钱，但却比印尼人宽裕，分别在此而已。

然而，虽然华人极力驳斥控制80%印尼经济的说法，但这种观念早已根深蒂固遍植于每一位印尼人脑中，印尼人这种“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华人的奴隶”的熊熊妒火，最终一发不可收，成为暴乱的根源之一。

说起贫富鸿沟经常被挑起成为印尼排华的藉口，印尼人尚可把华人当成发

泄对象，但华人饱受压迫的满腔怒火又该向谁诉？于是，我们只好暂时扮演“最佳听众”。

华裔企业家林绵坤便痛斥华人控制80%经济的说法，他说：“真正有钱的印尼华人不上5%，即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的几个朋党们，其余95%的华人皆非权贵，而说得上有经济能力的华人顶多占20——30%而已，华人控制印尼经济80%的说法不过是政治伎俩，印尼的大部分经济是操控在政府、银行家及大企业手里。”

印尼华裔吴达尼说：“像林绍良这般有钱的华人，左算右算也不超过印尼华人的万分之一，其他顶多属于小康，还有更多贫困的华人以务农捕鱼为生，华人的成就比印尼人好，完全是靠自己双手打拼回来的，难道这也有错？”

虽说大多数印尼华人并非大富大贵之流，但无可否认，在苏哈托统治的32年里，把华人局限在经济领域发展，确是使华人度过了比较安逸的32年，虽然间中发生一些排华浪潮。也许正因如此，5月风暴使华人措手不及，惊惶失措。

印尼华人最近集资出版了一本《印尼华裔血泪史》，书的内容详述华人在5月暴乱期间蒙受的各种迫害，其中一篇文章说道：“所谓只有几巴仙的华裔人口控制了印尼80%经济，这种反华怪论，不过是有心人数十年来惯用的阴谋伎俩而已。”

“如果说印尼华裔的二、三、四盘商，控制了印尼零售市场的80%，还有点说得过去，但是连笨蛋都知道，占零售市场的80%和控制印尼经济的80%，完全是两码子事。”

“这正好说明了绝大多数华裔在印尼的身分和地位，这些中小商人，他们起早摸黑，日夜辛劳，他们促进了城乡交流，繁华了都市，他们也让农村和城市的劳动人民都过了几十年安定的日子。”

政府未对症下药

反观印尼人的经济却在原地打滚，财富集中在少数当权者手里，彼此距离越拉越远。我们这回深入雅加达和泗水探访，确实发现从大商场到小店铺，从一般店铺到高级餐厅，老板大部分都是我们熟悉的黄皮肤脸孔，每间商店都雇用了数十名，甚至百名以上的印尼工人，即使是一间普通的小食馆，也有10

名以上的工人，这些工人每月领取不到15万盾（约80美元）的工钱。

在雅加达开了一间鸡饭档的阿成便说：“我从早上8点就开店，一直到晚上11点才关门，其实我可以不需要请那么多工人的，但是看到满街的印尼人没有工作做，我又不忍心的多请了几个，我每个月给他们每人9万盾薪水。”

9万盾有多少？在年初印尼盾兑美元溃泻至1万6千盾的时候，9万盾还不超过25美元，即使现在印尼盾回升至7千盾水平，9万盾也不超过50美元。在只有华人光顾的大餐厅里，吃一顿饭至少也要10万盾以上，足见印尼贫富悬殊的严重性。

印尼种族经济鸿沟越拉越大，难道印尼政府未曾对症下药？并不，根据泗水私立大学校长安顿普里加诺教授向我们分析，在苏哈托执政时期，曾两次实施过类似大马的“新经济政策”，可惜最后却背离了原轨，而大马显然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比印尼成功。

此外，他也认同民族性是造成印尼贫富悬殊严重的关键原因，他说：“印尼人必须逐渐培养经商的头脑，尤其是从基本的教育领域着手，像我的大学里，经济、管理和工程等科系75%学生是华人，此消彼长，鸿沟只会越拉越大。”

“当然，历史因素也是关键，从过去荷兰政府到今天的印尼政府，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把华人局限在经济领域发展，使国家财富无法均衡分配，种下祸根。”

安顿教授也认为，印尼要走出经济漩涡，就必须像大马一样实施新经济政策，而且必须由始至终的贯彻，印尼才有希望，然而，大马费时20年才取得一些小成就，至今仍在延续着，印尼要重头来过，摆在眼前的，肯定是一条漫漫长路。

最大华人贫民窟，文登支那世代耻辱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七

人人都说印尼华人很有钱，像林绍良，像黄奕聪，谁人不知，谁人不晓。但世人只看到印尼华人风光的一面，仿佛印尼没有穷华人。其实印尼到底有没有穷华人，不用走很远，只要到离开雅加达30公里的当格朗（Tangerang）乡区瞧一瞧就知道了。

当格朗旧尔文登（Benteng），这么一个靠近雅加达的地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乡僻壤，踏入这一片贫瘠的土地，犹如时光倒流40年，像是回到50年代的马来亚，又像是错身於中国的乡区，而住在这里的是几乎不像华人的华人。

印尼人称这里的华人为“文登支那”（Cina Benteng），一个充满屈辱性的称呼。一提起这个名称，印尼人马上翻起白眼，华人也露出不屑的眼光，只因为半个世纪以前一段屈辱性的历史……

文登惨案阴影

在印尼，“支那”（Cina）已被视为是个具有污辱性的字眼，它显示印尼人对华人的歧视，甚至不少印尼华人也视之为“有伤尊严”，而宁愿不以“支那”自居。而“文登支那”，更被视为一等华人贱民。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片贫瘠的土地，在半个世纪前曾发生过一宗惊天动地的“文登惨案”。那时印尼甫宣布独立，举国仍然沉浸在独立运动的浪潮之中，一些反独立份子却把印尼的红白旗取下，换上荷兰国旗，而与印尼人发生冲突，结果数以千计的华人惨遭杀害，无数华妇被强暴，被印尼华人引为奇耻大辱。

虽然这数十年来，间中也有发生排华浪潮，但文登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直到今年5月风暴，文登市再次遭到暴民攻击，不少妇女被强暴，再次唤起文登华人对“文登惨案”的记忆。

至于文登的来源，印尼文意为“城堡”。据说过去当地土王曾在此兴建城堡，以抵御荷兰殖民主义的入侵，因此得名。至今名称虽改，民间不少人仍习用旧称。16世纪荷兰人未入侵巴达维亚也就是今天的雅加达时，曾在经营距文登约100公里的万丹港，繁荣多时，大批华人就经历丹港到文登定居，不少人还与土著通婚，至今大部份当地华人都是5代以上土生土长。

我们一行3人在雅加达一位华裔女社工刘幼珠的带领下，深入这个鲜有外人探访的乡区。就我们的观察，文登是个结构奇特的地区，它本身是个繁华的市镇，车水马龙，商店林立。然而，走出市区，环绕在其四面八方的，几乎都是华人农村，而这些农村都出奇地贫困，若说是雅加达最大的“华人贫民窟”，一点也不为过。

一眼望去，这些农村都是建立在烂泥地上，屋子大都破旧简陋，不是茅屋就是用竹片搭成的屋子，什么是家徒四壁，什么是一贫如洗，在这里马上体会到。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世世代代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再不然就是沿河而居，自成一个村落。那些沿河搭起的密集木屋，令人不期然想起在马来西亚的外来移民村。这里不但毫无基本设施，而且因为贫穷，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八、九岁的儿童都没有上学。

他们饮用是自己挖的井水，而门前的河流就是村人冲凉洗衣的地方。他们多以种菜为生，但因没有能力购买肥料，所以种出来的都是天然菜。猪肉和鸡肉对他们来说是奢侈品，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饲养三几头猪，只有等到过年过节时才宰杀。

文登华人几乎都不会讲华语，只能用阿拉伯字母歪歪斜斜的拼出自己的名字，只有少部份人尚会讲简单的客家话。一来因为没有受教育，二来有很多与当地土著通婚，早已同化了。他们那黝黑的皮肤和样貌，看上去简直是像印尼人多过像华人。

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华人的传统和风俗，譬如祭祀祖先、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清明节、中秋节等仍有庆祝。最教人惊异的是，这里的婚礼仍保持中国古俗，新娘穿上清朝时代的礼服，新郎的服装和帽子则宛如古代兵士，这恐怕是印尼华社独一无二的现象。

在这个地方，印尼人反而比华人更有钱，举个简单的例子，印尼人尚有电单车代步，华人却一无所有，即使有充其量只是一辆“老铁马”。

我们信步走进一所亚答屋，一个中年华妇坐在门前的木床上打瞌睡，床下

躺着一头母猪和两头小猪，屋里简陋得连地板也没有。她见到刘幼珠的到来，欢天喜地得如见故人一般，甚是亲热。

无奈面对歧视

她用一口纯正的印尼腔指着刘幼珠对我们说：“她是个大好人，乐善好施，帮了我们村里很大的忙。你看，我穿的衣服，也是她的教会送的，我的3个孩子能够上学，她也帮了很大的忙。”

我们问她是否懂得自己的中文名字，她用力的点头，用印尼文拼写了两个歪歪斜斜的名字：Lioacin和Ongonio。后者是她的丈夫，他们除了种菜以外，丈夫替别人卖点心，如果生意好的话，一个月的收入有1万2千到1万5千盾之间。

年方27的潘英可，在亲戚家的一角搭起自己的小天地，屋顶千疮百孔，每逢斜风暴雨，一家6口只好挤在铺上塑胶的床上避雨。虽是小斗室，但她却苦心经营，年前她还把别人用剩的地板搬回来铺设，家才比较像样一点。“没办法的啦，只好一步一步来。”她无奈的说。

现年51岁的郭庆荣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说，乡下的生活虽苦，但村民早已习以为常。虽然5月风暴文登市遭到排华浪潮的冲击，包括很多妇女被强暴，但乡下却平静如常。他原是加里曼丹人，早年在苏加诺时代还上过学，所以还懂得中文。至於“文登支那”这名称，他无奈的说：“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名称，但又有什么办法呢，生活还是一样要过。”

印尼华人对自己的命运是那么的无奈，一如文登华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们所背负着的历史包袱，而穷困的日子仍在延续。即使有改变的一天，那也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求神拜佛受迫害，华人宗教夹缝中求存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八

印尼“建国五原则”中虽然明文规定各民族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华人宗教在印尼，只能在夹缝中苦苦求存，神明也得看政府官员的脸色行事。

许多华人神庙和佛堂被迫“偷偷摸摸”躲在偏僻角落里，默默庇佑着苦难中的印尼华人。

过去30年来，有不少华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敏感身分”而改变宗教，但是在最近的暴乱事件中，暴民对华人的凌虐，却是只分种族，不分宗教。

前民主党副主席塔斯林说：“华裔■教徒在5月风暴中同样饱受迫害，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改变宗教并不能使印尼华人逃过排华浩劫。”

神庙大门迫改黑漆

我们在雅加达浏览数天，不见有任何华人庙宇呈现眼前，心中颇为纳闷，一名华商告诉我们，雅加达的神庙佛堂大部分都隐藏在一些建筑物的夹缝中，要不是有当地华人指点，根本不易为外人发觉。

在他的安排下，我们终于在一排拥挤的店铺夹缝中找到一座小庙，据说这里的主持人是一位精通命理的风水师父，在雅加达颇负盛名，神庙一名管理员用印尼话说：“5月风暴后，政府官员要我们把大门漆成黑色，不能用太显眼的红色。”

“我们当然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只是要收取贿赂，可是为了生存，我们只好照做，把大门外部漆上黑色，内部则保留传统的朱红颜色，当然免不了要给些红包，打发这些贪得无厌的官员。”

中文是华人宗教传播工具的文字，但数十年来华文在印尼被禁止使用，导致华人传统宗教中的许多内涵，只能透过口耳相传，或以翻译成印尼文的方式传承给下一代，当中难免有原义被扭曲的现象出现。

尤其是当地道教徒供奉的神明更是千千万万种，且每位神明背后都有本身

不同的历史背景，要翻译成印尼文着实不容易，因此，华人只好不停往官员口袋里塞钞票，希望他们能够见钱眼开，网开一面。

“金德院”是雅加达最大的华人神庙，建于大清光绪年间，占地约1公顷，算是雅加达比较像样的华人神庙，另外还有3间小庙沿着金德院毗邻而建，其中一间叫“惠泽庙”，庙里供奉的是福建泉州一带传过来的“惠泽尊王”。

庙祝周振锥无奈的对我们说：“你看，庙门对联写着‘山仰凌云五叠神兵拔宋室，庙连金德无边佛法济众生’，虽然只有22个中文字，可是要翻译成印尼文，解释清楚来龙去脉一本书也写不完！”

中文匾额收藏起来

“为了避免受到骚扰，我们平时只敢静悄悄膜拜，逢年过节香客较多时，也是官员收红包最勤的时候，为了减少麻烦，我们只好忍痛把所有中文匾额藏起来，把神牌拆下来，对我们华人而言是非常不吉祥的，可是活在别人脚下，我们又能怎样？”

不过，当地的佛教和孔教都已经把大部分经典译成印尼文，在信徒间广泛流传，印尼文也成为这些宗教仪式中的主要语文了。

印尼孔教会1912年在梭罗成立，当时已把儒家的四书五经译成印尼文，印尼孔教会订有信众必须遵守的《八诫规箴》：诚信皇天；诚尊厥德；诚立明命；诚知鬼神；诚义孝思；诚顺木铎；诚钦四书；诚行大道。

有趣的是，由于教会创始人多是福建人，上述8条戒律皆以印尼话根据闽南音来音译，许多信众虽勉强死背，却未必能尽明其义，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佛教界，形成了印尼华人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50年代时，孔教会在印尼的势力逐渐扩大，在各城镇都设有会馆，并逐渐形成宗教组织，制定各种礼节及祭拜仪式，在苏哈托上台时，为笼络华人，特别允准孔教成为印尼6大宗教之一，与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兴都教享有同等地位。

不过，到了70年代末，苏哈托决定禁止孔教公开活动，孔教发展蒙受沉重打击，最近苏哈多的下台又为孔教制造重生契机，哈比比新政府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大为开放，被打压了20多年的孔教会在信徒不屈不挠的争取下，在今年7月重获宗教部批准恢复合法地位。

位于文登的孔教总会一名负责人对我们说,“孔教在全国有89个分会,总会将趁此良机重新整合各分会,加强彼此的联系。”

除了以华人为主的宗教经常受到压迫外,基本上其他印尼主流宗教都能够在相当自由的空间发展。

教堂遭受更大破坏

天主教和基督教透过布施慈善,救济穷人的方式深入印尼民间社会,信徒日众,例如在文登,许多穷苦的华人和印尼人,因为经常获得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的援助,纷纷改变信仰,在穷困生活和混乱的政局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不过,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信徒异常强调人权的维护,在5月风暴期间,有不少教堂遭暴徒刻意破坏,倒是一般华人的庙宇佛堂没有受到暴徒的劫掠。

现在过度的宗教自由其实在印尼造成许多严重冲突,尤其是最近极端回教徒在东爪哇戮杀温和派传教士的暴行,使印尼重陷5月风暴时期的血腥帷幕。

在过去数月,东爪哇和邻近省份已经有150多名温和派回教徒被怀疑遭打扮成“忍者”的极端教徒杀害,最近几天,印尼政府处理此案的暧昧态度引起温和派教徒的愤懑,他们选择采取私刑处死那些被怀疑是“忍者”的杀手,结果,当然是乱上加乱,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印尼这一年多来遭遇的祸劫,几乎到达天上神佛都打救不了的境界!

掀起学习华文热潮，封杀 32 年回头寻根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九

印尼5月暴动，让在苏哈托政权下深埋32年的印尼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也重燃生机！

这一场风暴，让印尼华人痛悟同化政策此路不通，纷纷回头寻找失落已久的“根”，造成印尼华社掀起学习中文热潮，华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冒现，有些家长更把孩子送到中国、大马、新加坡和台湾学习华文。

但是印尼华社最大的愿望，还是一旦明年大选新政府上台之后，能够采取开放政策，允许复办封禁已久的华文学校，像上述几个国家一样能自由学习母语和发扬中华文化。

血的教训文化觉醒

5月暴动对于印尼华人来说，是幸也是不幸。“不幸”已是既成事实，流了那么多血，牺牲了那么多人命，至于“幸”未到最后还是个未知数，但在现阶段至少它已唤起印尼华人对自己政治地位和文化的醒觉。

印尼华人普遍上认同，印尼当前的政治局势是危机也是转机，虽然华文禁令未除，但在一片混乱的局势中已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现在至少比苏哈托当政时有更自由的空间。

印尼文化界老前辈林兆英在接受我们专访时，就形容这是一种机遇，如果华教和中华文化要获得重生，32年来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据这位老学者披露，在5月风暴中大梦初醒的印尼华社，如今已纷纷回头寻“根”，不是回到中国去祭祖和追根溯源，而是掀起学习中文的热潮，现时的印尼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冒起，不少有经济能力的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往国外如中国、台湾、大马和新加坡学习中文，连被同化了的华人也开始学习中文了。

“其中，中文补习班并非始於今日，而是从苏哈托掌政后期便已兴起，那也脱离不了政治议程，全然是苏哈托为了与中国打交道而允许开设的，这是苏哈托对印尼华社唯一积存的阴德！”

他强调，印尼华社的意愿并非如此而已，而是要从根本上做起，即复兴华校，让印尼华人也能像中国、台湾、大马和新加坡那样，能够自由学习华文。只要在明年大选过后上台的新政府采取开放政策，华校的复兴便指日可待。

印尼的华文教育和文化发展能否重见天日，就要靠印尼华社今后的共同努力，林兆英相信只要有人带头发动，必然一呼百应，因为一路来所承受的逼害，无形中使华社形成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大势。

当头棒喝同化政策

他也披露，虽然在过去32年来华文被封禁，不过，印尼文化工作者并没有因此死心和轻言放弃，反而默默耕耘，期待寒冬过后破土萌芽的一刻。“不然，我们岂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出版了一本《印尼华人血泪史》，把华人在今年5月所遭受的苦难编成史册，让后世记取和保存真相。”

我们在雅加达也拜会了印尼最具代表性的华人老作家黄东平，这位在东南亚文坛甚具地位的老前辈也不否认，印华的文艺复兴重现生机，但他认为复兴文艺比复兴华教的道路更难走，因为要复兴印华文学，须先复兴华教。

据他指出，苏哈托的高压政权，已几乎使华教衰亡，年轻一代的印尼华人，已与华教脱节，大部份都不懂得中文，虽然当今的印华文坛有一些具有潜能的作家，如柔密欧郑、茜茜利亚等，但因为残酷的政治大环境而成就受到限制，但也证明中华文化的传承始终不绝。

“若非苏哈托的强权政治，我相信自己的成就也不止于此，现在我已经老了，没有多大作为，只能寄望年轻一代不会被埋没。”

在苏哈托上台之后宣告解散的华团，也放眼东山再起的一天，华青领袖林作衡告诉我们，只要情况许可，华团随时从历史的帷幕中重新走出来，名正言顺的扮演文化传承先锋的角色。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报道的，5月风暴一乱惊醒梦中人，对于许多过去支持同化政策的华人更是犹如一记当头棒喝，惊觉今是而昨非，连心都给砸碎了。

苏哈托的前幕僚林绵坤就沉痛的说：“我以前是在荷兰学校求学，因此不

懂中文，我的儿孙连中文名也没有，可是那又怎样，他们还是把我们当作华人！”

他不否认，苏哈托掌政的后10年，与许多华裔大企业家来往密切，虽然被指朋党主义，但也塑造了一个假象，让华社自我陶醉了好一段时期，自以为同化是灵丹妙药，自以为印尼政府已开始接受华人……其实并非如此。

一位在5月暴动中商店被摧毁的华商受询时，痛苦的说，一直以来他以为同化了，也就没事了，但最终还是躲不过“肤色的批判”，一切不过是自欺欺人，这是印尼华社最大的悲哀。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而印尼华人苦苦等待的“春天”会来吗？也许只有时间才能给予他们一个答案。

期待大选改变命运，华人冀结合民主力量造新格局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十

今天的印尼，该何去何从？历劫的印尼华人在这个国家还有前途吗？代罪羔羊的历史会不会再周而复始的上演？这一连串的问题不只海外华人深表关心，也是过去几个月来一直缠绕在印尼华人心头的切身问题。

无可否认，5月暴动和集体强奸案确是给印尼华社一个很大的省思，并对自己在印尼的地位和前途重新定位，然而，要在这个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已是个大问题，更何况要在兵慌马乱和千头万绪之中找到一个明确的方向。

印尼兴衰还看今朝

我们在印尼的整整10天，也深感印尼当前的政、经局势，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已使印尼这个国家和民族，走到一个前进或落后，兴隆或颓败的关头。如果印尼人民无法解决这一场危机，危机便会解决印尼！

32年前，印尼出了一个苏哈托，缔造了印尼新秩序；32年后的今天，新秩序崩溃了，印尼谁主浮沉，谁又能再创造历史，缔造另一个新印尼？印尼是浮是沉，也许明年举行的大选，会有一个答案。

印尼人民也显然不肯坐以待毙，不管是印尼人还是华人，求变意愿都空前强烈，继5月政改运动成功把苏哈托拉下台之后，印尼人民现已蓄势待发，期待上演另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缔造真正改朝换代的历史！

在一片危机深重的气氛笼罩之中，难能可贵的是，绝大部份印尼人包括饱受排华浪潮祸害的华人，仍然乐观相信，燃烧的灰烬犹有余温，只要有余温就还有死灰复燃的一天，在他们眼中，印尼还是有救。

明年正月举行的大选，对印尼人来说，含有改变历史的重大意义，印尼华人也视之为期待已久的“扭转华族历史和命运”转折点。“要吃新米饭，须待新主来”，正是印尼人民的心声写照。

一些华社领袖甚至大胆预言，明年正月大选过后，不管由哪一个政党上台

执政，只要不是旧政权，华人必然能取得更舒适的地位，甚至缔造印尼有史以来最多华人政府代表的历史。

苏哈托前幕僚林绵坤在接受我们专访时，就预期明年正月的大选，是改写印尼新页的开端，一个由多政党组成的史上第一个联合政府将会诞生，同时按照他“天女散花，遍地开花”的概念，未来的新政府将是拥有史上最多华人代表的一次。

“我们期望在新政府诞生后，华人会获得更好的对待，我相信并了解现有的热门总统候选人梅嘉华蒂、阿敏莱斯和阿克巴丹绒，都远比苏哈托开放，都比苏哈托更能接受华人，换言之，不管他们之中谁上台执政，都会接受华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至于他预期中的联合政府，预料由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女儿梅嘉华蒂领导的民主党，以及反对党领袖阿敏莱斯领导的回教组织将同获20——25%支持，而由苏哈托创立的专业集团则占20%，其余则由其他政党瓜分。

“也只有在新政府诞生，大局已定之后，印尼才有可能着手结合全民的力量，集中火力重振国家经济，印尼才有浴火重生的机会。”

华社倾向梅嘉华蒂

按照现时的局势，看起来是梅嘉华蒂领先一个马鼻，她不但赢得印尼知识份子和中下层人士的鼎力支持，甚至印尼华社看来也较倾向梅嘉华蒂，因为印尼人普遍认为，阿敏莱斯是个宗教极端份子，阿克巴丹绒是旧政权的继承人，而夹在中间的梅嘉华蒂显得比较温和，因此自然左右逢源。

印尼华人之所以支持梅嘉华蒂也不难理解，一切全是“苏加诺情意结”使然，因为至少苏加诺没有关闭华校，解散华团，禁用华文。

据私立泗水大学校长安顿普里加诺指出，印尼地大物博，天然资源极其丰富，只要励精图治，物尽其用，必然成就无可限量，岂是东南亚诸国所能比拟。

“以印尼天然资源之丰富，没有理由会输给大马或新加坡，只可惜，印尼的天然资源不是被享有特权者瓜分，便是被滥用，再不然就是没有去开垦，这是印尼的悲哀。”

为了避免“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而再的在印尼上演，他主张采用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即限制总统的任期，顶多2至3届。

雅加达华裔领袖林作衡就说，并不是所有印尼人都是坏人，一如并不是所有华人都是好人，在他眼中，90%印尼人是善良的，要不是苏哈托在任后期只顾着敛财，没有照顾到中下层印尼人，印尼不会有那么多暴民。

然而，也有人悲观的认为，5月风暴只是印尼乱世之始，真正的劫难还没有到来！虽然这场暴动唤起印尼人民的政治醒觉，而民间要求改朝换代的呼声也似乎势不可挡，但没有人排除它不会引发更大的冲突和劫难。

像年轻的政治领袖、前民主党副主席塔斯林就认为，32年前的学生运动，是反已故苏加诺总统贪污腐败的运动；但32年后今天的学生运动，除了反贪污腐败的苏哈托政权之外，还加插了现已奄奄一息的经济危机，以及分离主义的兴起，这一场危机确是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严重。

据塔斯林指出，分离主义的出现源自于爪哇人的民族优越感，一如二战时期的日尔曼民族（德国人）。印尼的独立和兴起，爪哇人自以为居功至伟，而印尼独立以来，主体发展几乎都集中在爪哇岛，加上苏加诺和苏哈托两位总统的搜括民脂，自然引起其他族群的不满，如果分离主义没有受到制止，印尼实有解体之危，像80年代末的苏联一样。

而印尼即使改朝换代，危机未必就自动解决，新政府必须重头来过，重拾破碎的河山，换言之，印尼实是前途未卜！

再说，在这一场民主运动过后，民主会否只是昙花一现，继而产生另一种专制，一如苏加诺和苏哈托时代交替时那样？可是，印尼人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特别是华人，一切希望只有放在明年大选，希望本身这个小族群在这片大地上，真的还有明天。

政经利益受到威胁，两因素排华 200 年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之十一

很多人都以为，印尼的排华历史始于印尼独立以后，其实不然，而是早在 200 年前就已开始。1740 年荷兰殖民地政府所采取的排华政策，就牺牲了逾万华人，酿成印尼史上其中最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史称“红溪惨案”。

在印尼人自己当家以后，对华人的逼害变本加厉，尤甚于荷兰人。每逢改朝换代，华人总是逃不过代罪羔羊的宿命。自 1945 年宣布独立至 1949 年从荷兰人手中接掌政权，至少有 3 千华人遇害，这期间最严重的是 1946 年 6 月 6 日“文登惨案”，逾 600 华人被杀；1946 年 9 月“巴颜阿比事件”，200 余名华人丧生；1947 年 1 月“巨港事件”，250 名华人被杀；1965 年 10 月政变后，东爪哇、棉兰、雅加达和西加里曼丹的连串排华事件，也导致数百华人丢命。

1998 年 5 月 13 日至 15 日，由印尼大学生发起的政改运动演变而成的暴动，又导致逾千人丧生，无数华人商店被洗劫和焚毁，数以百计华妇被强暴，形成过去 30 年来最严重的排华浪潮。

基本上不太排华

印尼是东南亚最多华人的国家，却也是华人处境最凄惨的地区。印尼华人历史，是由一宗接一宗排华事件串连起来的血泪史，不管是荷兰殖民地政府，还是印尼政府，对华人的逼害皆是罄竹难书。在无数大大小小的排华事件中，以荷兰殖民地时代的“红溪惨案”，印尼宣布独立之时的“文登惨案”及今年的 5 月风暴最为严重。

印尼人真的那样排华吗？在今年 5 月风暴之后，又在印尼华社引起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印尼人基本上并不那么排华，甚至印尼人基本上也认为不应排华，所谓排华不过是当权者的“精心杰作”。

然而，从那么长远的排华历史看来，自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其历史和政治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印尼华人日后能否打破这个长达 200 年周

而复始的宿命。在听了那么多印尼当地人的看法之后，本地人又有什么想法？

本地历史学者李业霖接受我们的访问时不排除，印尼贫富悬殊的现象，是造成印尼人基本上有排华心理的原因，但也不能因此一竹竿打翻整船人，因为也有很多印尼人不排华，排华在更大程度上是印尼当权者为保政治利益的“最后一着”。

据他分析，总结印尼过去200年来的排华历史，不管是荷兰殖民地政府还是印尼当权者，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排华，其一是当华人的势力或人口膨胀到威胁他们的经济利益；第二，当权者的政治利益受到威胁时，作为转移视线的“杀手锏”。

他以1740年“红溪惨案”为例，就因华人人口日益膨胀，经济发展威胁到荷兰人的经济利益，引起荷兰人的恐慌，遂演变成荷兰人对华人展开大屠杀行动。到了苏加诺和苏哈托时代，到了紧要关头，又未尝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向华人开刀！

而今年的5月风暴，虽然是在苏哈托下台之后发生，但迹象显示，似乎又是政治既得利益者的精心杰作。李业霖妙喻印尼华人就好像一棵树，当越长越大，越长越茂盛之时，就把它斩掉，始终不让它真正的成长和开枝散叶，华人手无寸铁，又无法律保障，自己又不团结，正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其实，翻开印尼历史，在荷兰人还没有入侵印尼之前，印尼的排华事件并不如近代那样强烈和显著。那时，印尼群岛甚至曾经出现过由华人统治的国家，那是在乾隆年间广东梅县人罗芳伯在坤甸建立的“兰芳共和国”。另一位华侨张杰诸，潮州人，也曾在龙目据土称王，定法制，改刑律，与众共守，以荣共繁，至光绪七年始遭荷兰人所灭。

作一个很好考量

李业霖说：“如果把过去的历史和近代史作个比较，印尼排华的根源何在，正好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量。”

“其实，印尼华人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血泪，开出了满园的花。印尼华人文化工作者应把印尼华人对这个国家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编写成印尼文，让印尼人了解华人所流过的血泪，并向印尼人伸出友好之手，多与他们交流，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马大前校长兼皇家教授翁姑阿兹受访时对《南洋商报》说，印尼正面临历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危机之中也存在很多契机，只是看你如何去运筹帷幄，扭转大局而已，因此他觉得“危机”两个字很有意义。

据他看来，同样的，印尼华人也可利用当前的危机，为自己的族群寻求最好的出路，把危机化为转机。“不管是参政也好，复兴华教或中华文化也罢，这绝对是个转机。

据印尼唯一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不久前刊登的一则新闻，在印尼民族独立斗争史上，记载着华族“黄金笔划”的历史记录，即华族参与起草及决定印尼建国5大原则“班察西拉”，这些先贤包括林坤贤、陈恩华、黄鼎瑞和黄忠豪。他们是苏加诺和苏哈托领导的印尼独立筹备事项研究机构的成员。

在接下来成立的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员会，又有另一位华裔成员，即叶泉明硕士。

一些印尼华社领袖如印尼新兄弟协会秘书乌斯曼·艾芬迪认为，华族参与印尼历史包括印尼建国史是“不能分开的历史事实”，这包括许多英难事迹，如“红溪惨案”中的洪万瑞就与回教组织会合抵抗荷兰侵略者；邦卡岛华族矿工顽抗荷兰公司；西加里曼丹罗芳伯对抗荷兰；1945年独立运动萧国传与翁达恩罗摩、哇尔特尔慕吉西迪在玛卡沙尔一同维护红白旗壮烈牺牲……

而华人与印尼的渊源，有近2千年的历史。根据最早的记载，后汉书卷六《顺帝本记》云：“永建6年12月南徼外叶调国遣使贡献。”所谓叶调国即今之爪哇，永建为东汉顺帝之年号，而永建六年则为公元131年，距今1860多年。

但华人真正开始旅居印尼，始于公元924年五代后唐时期，颇多中国人为避黄巢之乱而避居巴林邦（今巨港）。后又有元世祖忽必烈出兵远征爪哇，以及明朝三保太监七下南洋，不少士卒和商人因爪哇地方富庶，谋生容易，留其地未归。

后来的满清人入主中原、国共内战至中日战争，又有不少华人逃到南洋诸岛包括印尼避难。至17世纪英、荷势力的入侵，当时的华侨已有数千人，在华人的努力下，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辟出运河，开出商港，市肆繁荣，至18世纪初，华人人口增至七、八万人，不意却引来荷兰人的敌视。而今天的印尼华人人口，已达至整一千万。

别再当代罪羔羊

——《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报道结束篇

高玉梅

本报特派记者前往印尼实况采访之系列报道《印尼华人，何罪？》，已告一段落，然而，这一篇紧接一篇令人几近不忍卒读的文章，对读者所引起的回响、悲恸与震撼，恐怕许久不能平息。

本报是在苏哈托下台及爆发了惨绝人寰的5月暴动后，于今年5月底特派两名记者吴国平及王俊明前往印尼采访，第一时间报道了《雅城泣血》系列。今年10月，本报另3名特派记者曾秉钧、陈华芝与王耿炎，再次进入水深火热的雅加达城，针对印尼华人的悲惨命运，写出了《印尼华人，何罪？》系列文章。

在这之前，雪兰莪华人大会堂民权委员会也曾向印尼驻我国大使馆提呈抗议书，过后国内华社大小社团也纷纷提出谴责。今年8月中旬，民权委员会特派四名委员前往雅加达以进行实地考察访问，足见我国华社对印尼华人妇女惨遭强暴以及人权受践踏的悲剧，深表关注，并以行动表达了抗议。

本月3日，本报特邀请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印尼考察团的成员黄秀辉与张济作，与报道了《印尼华人，何罪？》的本报记者进行交流与对谈。本报采访队与民权委员考察团访问印尼的切入点与关怀面虽然略有差异，但两者对于当地华人社会，特别是华人妇女所面对的不人道遭遇所流露的关切与忧患，也是相通的。

这次的交流与对谈由本报副刊主编陈和锦主持，在对谈中大家除了交换各自的观察、感想与思考所得，都对印尼人权状况与民主化进程深表关心。

“印尼华人，何罪？”针对这一点，双方在对谈中也都认同，此次5月暴动中最大受害者的印尼华人，完全没有罪，他们只是被幕后主谋者精心策划出来的一场恐怖暴动的“代罪羔羊”。5月暴动的背后完全是可耻的政治动机，而可恨的是，真正的主谋却仍然逍遥法外。

制造恐惧不安

民权委员会考察团的唯一女成员黄秀辉指出，从表面上看，5月暴动是冲着华人而来，不过，在阐释这场暴动的因果时，我们必须小心，以免采取一种“种族主义”的立场。

她说：“当我们为筹划这次考察而进行内部讨论时，起初的心态是觉得这是华人和印尼人之间的种族问题，不过，在检查了印尼多次迫害弱势族群的历史资料后，才发现应该以人权和女权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事件。”

张济作指出：“民权委员会考察团决定到印尼去，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检验这暴动是否确如报章及国际网络上的照片所显示的，是一宗‘排华’事件。当我们到了印尼，接触到的当地非政府组织成员，他们都对我们说，他们非常感激海外华人对当地人处境的关注，不过，他们一再地强调，这不是‘排华’，华人妇女只是代罪羔羊吧了。”

他也说，据妇女组织Kalyanamitra的社工分析，在印尼社会里，有五大课题经常是被印尼当权者，特别是军方，一再地利用来制造恐惧与不安，进而达到分裂社会、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五大课题是：共产主义、回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妇女，以及劳工阶级课题。

这就好像是统治者手中的五张王牌，在5月的暴动中，他们恰好是打出“华人+妇女”牌。如果华人社会及妇女团体也采取种族和妇女的角度来提供援助，那不仅是不够的，可能还是危险的。

一名身为印尼华裔后代的政治学博士道出他的忧虑，他说：“这种‘华人支持华人’的行动，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使到原本就已经紧张的种族关系更形尖锐，使暴动事件中的种族成分被强化。这样一来，华人在印尼的权益争取就难上加难了。”

印尼华人在处理这件事上，都共同地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海外华人在发出声援或提供支持时，必须对此具有敏感性，小心地抛开种族主义，以免掉入一种被刻意设计的种族仇恨陷阱里。

本报专题作者曾秉钧表示：“我们所接触的各界华裔人士都有同一看法，觉得5月暴动是冲着华人而来的，因为有一些华人在屋前挂上牌子写着‘Pribumi’以求自保，却仍然不能幸免。甚至一些外貌长得像华人的印尼土著，也同

样被强暴。可见这场暴动是有其种族针对性的。”

他说：“从荷兰殖民地时代的‘红溪惨案’到独立运动期间的‘文登惨案’再到苏加诺和苏哈托执政期间发生的连串血案，牺牲者清一色是华人，这一次的5月暴动主要攻击的对象也是华人。当然，这不单纯是出自种族缘由的‘排华’，而是阴谋家制造分裂及嫁祸的结果。”

贫穷线下华人

当本报刊出《最大华人贫民窟——文登支那世代耻辱》一文时，许多读者都感到震惊不已。没想到在人人都以为华人控制印尼80%经济、华人家庭都有好几个仆人的谬误之下，真实情形是在印尼，真正富有的华人不到5%，而且还有不少华人是活在贫穷线下，一贫如洗。

本报经济记者陈华芝说：“印尼经济的确是操纵在一小撮人的手中，而这一批苏哈托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有一些正是华人，但是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地说，印尼经济是由华人所控制。”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印象太根深蒂固了，在印尼，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看待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恐怕民间的力量显得太微弱了。”

的确，即使是我国华社，一般上也对印尼经济社会结构存有刻板的印象，认为华人经济条件优厚，生活奢华，而印尼人则大多贫穷，为华人家打工，要购买日用品就得到华人商店去。

实际上，根据本报记者以及民权委员会考察团的观察，在印尼的经济结构中，每一阶层都有各种族成员。这也说明了，若只是以种族肤色的单一角度来分析，可能显得过于单纯与草率。这个观念上的谬误，在本报系列以及民权委员会考察报告中，已被一针见血地刺破。

国家恐怖主义

制造恐惧、不安与动乱，是政治手段控制人民的一种手段，也并非印尼独有的现象。妇女团结组织一名社工形容这是印尼政治利益斗争白热化后被组织而成的“国家恐怖主义”（State Terrorism）。同样的模式已经发生在东帝汶、泗水、梭罗、巴邻旁、棉兰、亚齐、伊里安查亚等地。根据调查报告，自印尼于1975年侵略东帝汶，已有成千上万的东帝汶妇女被印尼军人性折磨及强暴。此

外，苏哈托倒台前也发生了一连串的严重违反人权事件，如：绑架民运人士、枪杀特利萨蒂大学生等。

本报摄影主任王耿炎说：“在印尼，一眼望去，谁是印尼土著，谁是华人，相当难以分辨，如果不是有人在进行监视与策划，只洗劫华人家庭，只认出华人妇女来施暴，并不那么容易办得到！”

“我们所接触的当地华人，他们大都视印尼为永久的家园，他们说：一棵大树，把它移到另一个地方栽种，未必能够活啊！他们与印尼土著住在同一个住宅区，都相安无事，彼此之间也没有仇恨的心理。”

他说：“我们遇到一位印尼裔司机，他在暴动期间，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的华人老板载送到机场去逃命。”

陈华芝说：“从这种充满流血与暴力的演进模式看来，我对印尼前景感到担忧，说不定在下一届大选中，又会有另一批弱势族群遭受迫害。”

（原连载马来西亚 1998 年 10 月《南洋商报》）

激情与 危情共舞

丘启枫

改革！印尼文是 REFORMASI，这是由英文 REFORM 一字转化过来的，近日的雅加达到处可以听到这个响彻云霄的政治辞汇。国立印尼大学校园3个多月的前开始高喊“改革”■号、全国大专学生5月18日占领国会广场。

不过，几万大学生在国会广场只渡过三个夜晚，苏哈托便辞职下台。

5月16日下午，我从香港飞往雅加达，朋友先将车子停在特利刹蒂大学旁的高架公路上。四天前，军警就在这里的桥栏上，居高临下射杀示威后回到校园的大学生，造成6人死亡。第二天丧礼过后，雅加达发生大暴乱，许多华人店铺在无政府状态下被暴民洗劫纵火，尽成灰烬。

我凝视着30多米外围墙上哀悼学生的花圈，花架的蓝底白字写着 REFORMASI。这场印尼全民改革运动在首都和爪哇其他大城市蔓延，却在华裔创办的特利刹蒂大学酿成血案，再演变为反华大暴乱，各国纷纷撤侨，数以千计的旅客涌向机场，轮候机位逃离这个危城。

带着同事和朋友的祝福踏上“征途”之后，才发现空中巴士A-340班机上249个座位只有35个乘客，其中两个是航空公司职员，另有空服人员14人。后来见到从吉隆坡赶来的特约摄影记者甄伟达，他的班机被取消，下一班波音747客机也只载了22人，空服人员18人。

林绍良酒店面目全非

雅加达接机的朋友问我：“怕不怕？为什么要来？”

说不怕是骗人的，说怕嘛，又不知道怕什么。车子先去“巡视”重灾区，印尼全国最大的电器中心，一天交易量逾1000万美元的华人区草埔巴刹大厦，和印尼首富林绍良的城市酒店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余烬还在冒烟。数以百计的旁观者正等待时机进去捡拾财物；海军陆战队在坦克上戒备，在战车旁悠闲地抽烟，装甲车穿梭街头；外国记者云集，竞相要求和官兵合照。

这是苏哈托缩短行程从开罗回国后的第二天，饱经忧患、余悸犹存的华人

无助地怅望自己的心血、财物在两三天在无政府状态下付诸东流，眼前现场犹如电视上见过的贝鲁特、撒拉热窝（塞拉那佛），局部地段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我站在闹市华人区草埔广场前，听着愤懑多于哀伤的华商说，暴民抢了货物，又拆货架门窗，砸了再纵火。东区一家购物商场低层抢完后暴民放火，后来涌到二层以上的暴民反而逃不及，葬身火海二、三百人。一名华商说，这些暴民自作自受，可谓不得好死。

傍晚回到酒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酒店总经理致房客印尼文及中、英、日文信，指出收到有关方面消息，市内“将会发生不稳定局面”，要房客提高警觉，避免晚间外出等。

5月17日访问了多位华裔，他们表示“当然都支持改革”，然而他们还没看到改革成果，却成为政争中最大受害者。首都雅加达的华裔，更遭逢独立建国以来最悲惨的苦难。

华裔百姓投诉无门

当全球媒体竞相报道改革浪潮与苏哈托总统的互动，西方大国与两岸三地传媒都把撤侨当成重大新闻的时候，棉兰、泗水、雅加达的华裔不但财产被枪被砸被烧，还受到暴民攻击，当地传媒不闻不问，外国传媒也忙着追逐学生示威与军方坦克大炮画面，这些数代家园与毕生财产被掠夺烧毁的无助华裔，得不到国家赔偿，官员慰问，也呼无不应，投诉无门！

“我们是印尼公民，可是我们也知道自己永远是二等公民，每天提心吊胆地生活，不知道哪一天会排华，可是，怎么也想不到会在首都地区发生”，几代世居雅加达的中华裔说，这次大暴乱“肯定有幕后政治阴谋”，因为这是明火执仗的打劫，军人可以开枪阻吓。今年2月，棉兰军队便射杀无法无天的暴徒，这次适逢苏哈托人在开罗。华人区事后获悉，“位高权重的总统府要员”反对格杀暴民；两天多的无政府状态中，华人见不到一个军人，连平时勤于向华商需索的警署也空无一人。

“怎么可能？”一名华裔妇女对我说，她在劫后问一个军官，为什么他们不能保护受害者，军官坦言，他没接到命令不能开枪。

另一位华裔举证说，苏哈托集团害怕大学生，所以选择在一所华人的贵族式大学开枪，又纵容暴民反华，来转移视线，使民怨转向华人社会。

他举例说，两年前军方罢黜在野民主党主席美加华蒂，回教徒上街示威抗

议，任何地段都被强大的军警压下去，“为什么这次军警都不见了？”

虽然有媒体指大暴乱涉及印尼武装部队本身派系分裂，但是军警失职已令华裔彻底绝望，一名华裔沉痛指出，暴民大包小包抢，物品掉下来，竟然有军人捡起来交给他！

暴民也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设路障抢劫或殴打华人，一些华人躲在送殡的棺材车上逃亡，也有人躺在担架上，由开着警示灯的救护车开去机场。

华人尸体遭放火烧毁

原住民与多数华人的地区，华裔在门口用青布写上“百分之百原住民”的字样，华人区的麦当劳被烧毁，另一区的麦当劳用青布将招牌盖住，写上“属于原住民”，结果安然无恙。

医院本来是安全的避难所，一些华人要求医生开证明，暴乱期间睡在医院。

虽说死者为大，一家殡馆5月13日晚上还是有暴徒冲入，在停尸间搜不到财物之后，竟将一具尸体拖出，拳打脚踢之后，放火烧死，“比希特勒残暴一百倍”，一个商人沉痛他说，整个事件是令人发指，人神共愤的大阴谋，“这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为什么不易地而居？

虽说危邦莫居，乱邦莫入，但是，700万华人之中，能走动的不到1%，这些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华裔公民又能去哪里？为什么大学生要政治改革，华裔却成为政争的代罪羊？

受访的华裔都深信，这次杀大学生纵容反华暴乱是有预谋的，难怪大学团体发表声明说，早知如此，他们宁可不要改革。

一名文化工作者认为，暴乱的黑手目的有三：一、转移视线，嫁祸大专学生；二、挑起中国与印尼之间的矛盾；三、破坏华裔经济。印尼原住民为什么周而复始的反华？来自中爪哇的一名专业人士说，印尼的教育体系有问题，中小学只讲建国五大原则，却不重公民。道德、精神教育，不了解中国，视中国为潜在敌人，从而产生仇华情绪，一经煽动便反华。

暴民背后另有主谋

今年5月的反华暴乱首先在棉兰爆发，不过，来自亚齐现居丹戎穆利亚村

的难侨村却奋起反抗，保住家园，印尼各地华裔遂群起效法。老华侨说，“九州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曾派船撤侨，但只两次便中断，100多户华侨仍留在当地。他们起早摸黑，克勤克俭，才让生活安定下来，当然要加以捍卫。由于村中备有警钟，这次暴民来抢时，华人奋起抵御，军警赶来后，活捉两人，讯问之下，对方但承有不明人士以一万盾代价雇他抢劫，抢到的物品归自己。

自卫队是黑社会点子

雅加达地区的文德村，75户华裔都从西加里曼丹迁人，他们出钱雇原住民守卫。一个村民透露，组自卫队其实是黑社会的点子，因为店铺被抢后，黑社会便收不到保护费，便提议共同打击暴民。因此自卫队良莠不齐，一名村民偷偷指着一个彪形大汉说，此人相当于里长，拿了华人的钱，几年前也曾趁火打劫。

自卫队能使华裔安心吗？“还是不行”，一位文字工作者说，他们家雇了原住民防守，但她丈夫仍彻夜不眠，一有风吹草动，便抓起木棍冲向大门，白天也睡不着，精神都快崩溃了。

酒店成避难所

5月18日起，酒店每天向房客汇报局势。当晚，一个印尼原住民向我打招呼，交谈后才知道他叫里卡都，皮肤黝黑却是华裔，在一家国际货运公司任行政总裁。他姓陈，不懂中文，他一再强调“我更像原住民，不像华人”。

他说，前几天客房爆满时，酒店大厅挤满一房避难的人。每天在餐厅都可以看到穿拖鞋、打赤脚、拖男带女的人，还有原住民女拥抱着华人的婴孩，在这个普通客房日租一百多美元的酒店里避难。

里卡都说，原住民可以从他的眼睛看出他是华人，我联想到“观其眸子，人焉廋哉”，不过，我无法从他的眼神中，找到应该被歧视的理由。他又从宗教谈到民族性，诉说身为华裔的苦楚，我再三想要告辞，他却一再拦着我，“再听我讲5分钟”、“再给我3分钟”。

当然，不是人人都来酒店里避难的。第二次早餐时，我见到一个像华裔又像原住民的中年人，他好像志不在吃，只顾看印尼文报纸，但自始至终却只望着封面，那是我到危城之后，第一次微微感到害怕。

百万人示威及时煞车

19日，传言次日的五二零民族觉醒日会有军民大冲突，局势紧绷到极点。当晚，我和甄伟达第一次准备“逃亡计划”——和衣而睡，收好护照文件，日用品就无法照顾了。凌晨4点多，一个同业电话来报喜讯，说回教领袖阿敏宣布停止“百万人上街行动”，以避免造成军民冲突的流血事件，原本可能出现的火爆局面，顿时缓和了下来。我们在天亮后走向国会，只见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呼喊高叫进驻广场，群情激昂。21日，在苏哈托下台的消息传出后，同一个广场上的场面简直像是嘉年华一样，欢声雷动。

除了REFORMASI，雅加达这阵子另一个常用的社交语是DAMAI，意思是“和平平安”，素昧平生的人也可以此问好。动乱是那么可怕，最近到过雅加达的人，才知道何谓“和平是福”。直到5月21日，大家才得到暂时的“和平”。不过，对数百万华裔来说，自卫队只是消极而短暂的解决方法，他们长久的疑问是，如果政府权力不能保卫全体人民，他们该怎么办？朝代可以改，政权可以换，但要让华裔真正向心，要看何时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和平。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5月25日——5月31日）

五月暴乱真相大揭秘

萧曼殊 章云

印尼《王冠》杂志揭露5月暴乱是特种部队及雅加达首都军事司令部联系策动。军方否认并称将诉诸法律，杂志坚持报道真实，官方背景的组织亦表支持。

雅加达及梭罗等地5月中旬的大暴乱已过去4个月，但阴郁仍笼罩着整个印尼华人社会，被烧被抢的商店及住家仍满目疮痍，极少修复，市民平时的谈话及媒体报道还经常提到这次印尼建国以来最大暴乱。哈比比政府成立的独立调查团积极开展工作，调查对象包括当时负责首都治安的军警首长，如已解职的雅加达首都军区司令夏弗里·三苏汀少将，但得到的是闪烁其词的分析 and 说明。

涉及绑架民运人士案的前总统苏哈托二女婿、前陆军特种部队指挥官及陆军战备后备司令部司令帕拉波禾中将将被革除军职后，是否提交军事法庭审讯，正考验着倚赖军方支持的哈比比政府的决心。被绑架的民运人士至今仍有14人下落不明，枪杀特利萨克蒂大学4名大学生的真正凶手，以及5月暴乱和华人妇女被强奸的主谋，仍然逍遥法外。

夏弗里难辞其咎

5月暴乱时，雅加达治安完全失控。首都军区司令夏弗里·三苏汀少将在暴乱前8个月就职时，曾向雅加达市民保证，任何地方出现暴乱，治安部队可以在20分钟内赶到现场。但当暴乱在5月14日达到高潮时，军警却没有及时制止暴乱。由独立组织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暴乱始于军人模样的人进行的爆破，但夏弗里称暴乱是自发性的，至今未查出任何团体或组织涉及这事件。

雅加达出版的《王冠》(Tajuk)双周刊一连三期以“百日后的证词”(Saksi-saksi setelah 100 hari)为题，刊载揭露五月暴乱背景的报道，其中一篇报道一名陆军特种部队成员供认参与暴乱阴谋的始末，首都军区司令部等单位联合策动的。这项石破天惊的揭秘不但令舆论大哗，军方也难以招架。雅加达军区司

令部发言人纳罗威表示，将“尽快”起诉《王冠》杂志及要求6000亿印尼盾（约合6000万美元）的赔偿，因为这些报道纯属捏造，该杂志也没有向军方求证。但《王冠》负责人坚持刊登的内容均有根有据，准备在对簿公堂时公布。有政府背景的印尼记者公会雅加达分会表示，将聘请法律专家，在官司中向《王冠》杂志提供支援，这在印尼是颇为罕见的。

《王冠》引述那位特种部队成员说：“暴乱计划早在两个月前就已拟好。在3月1日一次点名仪式上，我们受命去首都军区属下部队及陆军战略司令部属下部队各一连已在等待，与我们总共三连部队组成在场的军官中包括帕拉波禾及夏弗里。”

夏弗里首先讲话：“你们被召集来是执行保卫国家的特别行动，你们全穿上平民服装，身带武器行事，这是苏哈托总统要大家做的，因为国家正处于危急状态中。”这三连部队要执行两大任务：“绑架大学生与异议份子，对不理睬当局警告的大学生格杀勿论。”

假警察射真子弹

这名队员还详细道出5月12日特别利萨克蒂大学事件的始末。那天，特别行动部队的一批人坐摩托车到该大学附近，把车子放在附近的雅加达西区军分区司令部，穿上警察制服混在警察一起，警察以空向示威学生射击时，他们发射真弹，任务完成后就撤退。

关于华人妇女在暴乱国中被强奸的实情，这名队员说也是有计划的政治行动，旨在帮助帕拉波禾控制整个武装部队，强奸者不是军人而是军方召集的流氓。他说特种部队在两个月前就招兵买马，从东帝汶、西伊利安及南苏门答腊的楠榜等地派来数百名已经训练好的人马，再加上雅加达及茂物等地的流氓，在暴乱其间强奸及抢劫，事后可将劫掠所得带回家，所有的计划部属周全，结果顺利完成。

5月暴乱时，距离雅加达30公里的文登镇多座现代化购物商场也遭浩劫，大火烧死了几百人，包括抢劫者及不少中小学生。报道中这名特种部队成员所说的话，也是对儿子在此惨案中丧生的一名老人说的。这名队员称惨案是他们一手导演的。

“那天我们的行动目标是文登镇卡拉瓦芝的力宝卫星城，从下午两点开始，

我们在现场大声喧哗，煽动群众投掷石子和抢东西，把力宝商场烧掉后，暂时留下美佳购物商场大厦，因为当时有穿制服的军人看守。其实是一个陷阱。下午6时，属于我们这一班指挥的流氓撤回雅加达后，再运来4卡车军人。他们一到现场就命令群众伏倒，否则开枪，多数人逃窜，军人将伏倒者带进美佳商场，朝他们中开枪，再将桶装煤气搬进商场，开枪射击煤气桶，爆炸后锁上大门，几百人就此葬身火海，而军人则在检查枪枝后坐上卡车迅速离去。”

他说，特别行动部队的任务到此结束，回首都各自原来的单位，如同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参与者不论来自何种部队，以后的行动都受到监视。

《王冠》杂志表示，曾派人到这位特种部队成员所说的惨案发生地点去调查，一些目击者所说的与他讲的内容相差无几。暴乱后传媒及其他方面所揭发的事实显示，五月暴乱是军方某些人物精心策划的大阴谋。虽然雅加达地区军警首长一再否认这是有组织的暴乱，但越来越多人敢挺身出来说出真相，“可见谎言最终会被揭穿”。

政府调查报告十月公布

近月来，雅加达国防部大厦前继续出现抗议军方暴行的示威活动，民众要求平反过去32年来军队屠杀无辜平民的各种冤案，军方穷于应付。观察家认为，5月暴乱也是军方长期干政的恶果之一。官方7月间成立专责调查的暴乱的小组也告诉政府，根据二手证词，雅加达确发生过强奸等性侵犯事件调查报告将于10月2日公布。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9月28日——10月4日）

印尼华人里外不是人

丘启枫

几百年来，中国人逃避战乱、饥荒、苛政与迫害而落脚荷属东印度群岛，也就是今天的印尼。这些被明清政府视“天朝弃民”的移民，并未在异国他乡找到桃花源。荷兰殖民者是排华的始作俑者，早在1740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荷兰人便大肆屠杀中国人，再将他们集中一地，出门得有通行证，到本世纪初才解禁，可是荷兰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将白人、有色人种（华人与阿拉伯人等）和原住民分为三大类。

一位来自北苏门答腊首府棉兰，年逾古稀的华人文化工作者认为，荷兰人抬高华人地位，使华人不能与原住民打成一片，欲是为了本身利益，一如当地原住民所说的，原住民锄地，华人挑农作物，荷兰人集中收购，造成华人与原住民贫富差距加大。

国籍问题也带来不少后遗症，荷兰交出政权时，与印尼临时政府协议，华人可以自动成为公民，保留中国籍须向法院申请，华侨入籍印尼者少之又少，加上入籍后不能念中文，华侨更不愿放弃中国国籍。1955年，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来到万隆出席亚非会议时，向华侨提出“三好”宣示：

选择印尼国籍，很好；保留中国国籍，也好；回到中国，同样好。

老先生说：当时多数华侨举棋不定，周恩来其实不便鼓励华侨入印尼籍，因为多数华侨寄望一个强大的中国，周不能伤千千万万华侨的心，如今大家有后见之明，可是为时已晚。

他说，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能一味怪罪华人（不忠心于印尼）他又举例，大马首相马哈迪说过，华人有五千年文化，所以不能同化他们，只能团结他们，印尼当局却要用同化华人的方式来解决问題。

印尼官方的“同化”手段包括：不准讲华语、不准过农历新年、有的小地方甚至不准买红包，“舞龙舞狮更不必说了”。

老先生表示，数代以来，他们奉公守法，在夹缝中自下而上发展，却始终受歧视，心中又怎能平呢？苦水太多，“主要是受到不公平对待”。他透露，当

印尼官员向中国官员投诉，说当地华人取得印尼国籍，是为了保护自身财富而非效忠国家时，中国官员曾反问印尼官员，有没有自我检讨？

“如果是自愿性的同化，那是可以的；如果是强迫性的，我认为不应该。他解释，所谓强迫性不外两途。一是宗教都皈依回教；一是婚姻，华人只能和原住民婚配，因为宗教与婚姻是“人权中的人权”，他强烈质疑，为什么多元民族的印尼，华人却不能成为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呢？为什么其他少数民族可以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维持其部落式风俗习惯，雅加达当权者中的“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却要对华人步步进逼？

他举例说：荷兰本土、南太平洋的喀里多尼亚和南美洲的苏利南，都有一些荷兰人带去的爪哇人，几代后仍维持爪哇人的风俗习惯。苏利南一个爪哇族的外交部长到雅加达讲爪哇语，印尼朝野喜不自胜，认为其族群几代移民外国仍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大可以呢？世代居住雅加达的年轻华商不平地问：荷兰白人演爪哇戏，爪哇人引以为荣，华人为什么不可以演华族戏呢？为什么邻国都可以，独有印尼不可以？为什么要视华文如洪水猛兽呢？

出身印尼大学、在政治与社会学院讲师的曼梭·阿尔法里西告诉亚洲周刊，这是苏哈图政权一手造成的，因为1965年“九卅政变”后，政府再三强调，非法的印尼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有紧密的联系，以致中小学教育也把华语和共产党划上等号，当局以“反共”为名镇压异议人士，也使许多原住民产生仇华情绪，以致“讲华语就是中共印尼共党同路人”的意识深植人心。“九卅事变”后的局面改变了印尼华侨的命运，政府封杀中文学校，禁止中文书刊入口，加上印尼与中国外交关系全面冻结，未入籍的华侨面对更大的困境。

同化几代亦难逃厄运

曼梭的老师，国立印尼大学教授黄福涵告诉亚洲周刊，印尼在“九卅政变”后加强宣导回教意识，回教又加强反共，却把印尼共党、中共与华人纠缠在一起，使大部分无辜华人成为受害者。他说，1945年的印尼人反欧洲人，九卅之后反华人，都是政治与历史造成的，屈指可数的华人富豪巴结总统家庭，日进斗金，一些华商与官方勾结，低价收购原住民土地，后者失去家园流落四方，便迁怒广大的中下阶层华人，华人成了代罪羔羊，这些年来，一些华人已彻底被同化，“干脆掩盖自己的华人身分”。

不过,即使彻底同化几代的华人,也难逃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厄运。棉兰的老人和印尼大学的黄福涵认为,只有印尼当局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才能初步解决华人频遭迫害的问题。

周恩来的“三好”似乎是面面俱到,但40多年后的今天,大家才领悟到,这当中是有优先顺序的。“很好”当然甚于“也好”和“同样好”,因为周恩来指出,选择印尼籍的中国公民,就像女儿出嫁,一年也可以回娘家一次。当时听众热烈鼓掌。但是当1955年的协议要在1960年落实时,多数华侨在“大中华意识”作祟下,真正下决心选择印尼籍的却少之又少,因为一入印尼籍,侨校学生来源便成问题,不管选不选印尼籍,华人都希望子女念中文,这也是华人不能与原住民打成一片的原因之一。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1998年10月25日——31日)

华人与印尼人有道鸿沟难跨越

梁东屏

印尼人保护华人的商店,是为了本身的利益;哈比比总统要华人回来,也是要利用我们。这样的中国人多惨,真是没有价值的中国人。世代居住在印尼西加里曼丹首府坤甸、目前在坤甸市区开设书店兼文具行的陈幸夫,提到印尼华人的处境时不免悲从中来,他既悲伤又略带愤怒地说:“我只能说我们不幸生为中国人,印尼华人的命很苦,我们的国家不看管我们,就好像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样,别人要打要骂,只有随便了。”

在印尼,有这种想法的华人其实很普遍。同样住在坤甸的王潮汉老先生就很感慨地说:“很多华人其实想离开印尼,可是去哪里呢?去到中国,中国人不理我们,新加坡、澳洲也不会接受我们,唉!不要把命运看得太重,算了。”

翻开印尼的华人史,那真是血泪斑斑。在印尼独立之前,荷印政府鼓励华人保持自己的族群身分,实际上就是采取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政策,华族民族主义虽然因之而兴起,但是也种下与印尼土著互相隔离,日后引起土著执政者采行排华政策的祸根。

印尼独立后,印尼土著民族主义矛头所向的荷兰人已不复在,原先的矛头转向华人。早先在苏卡诺执政时代,土生华人(Peranakan)还被承认为印尼社会中的一份子,及至苏卡诺下台之后,新政府就不再承认土生华人的地位,更遑论非土生的华人了。

苏卡诺政府虽然承认土生华人的地位,但是却颁布法令禁止外侨在乡村经营零售业,迫使华人大量涌入城市,同时有十余万华人失望地离开印尼。

苏哈托上台后,于1966年采行同化政策,颁布改名换姓条例,绝大部分的华人为了适应印尼的政治情况,不得不忍痛抛弃自己的华人姓氏,改采印尼文的名字;苏哈托也不鼓励使用华文、华语、于是华文学校被关闭、华文店招开始销声匿迹、华文报纸相继停刊、华人政、经社团先后解散。至今为止,全印尼只有一份由军方出版的华文“印度尼西亚日报”,勉强撑个门面;华文学校自1975年起就全被改为印尼学校,华族学童就只能就读印尼学校;至于华文店

招更是绝无仅有，以致雅加达的唐人街成为一个没有中文的唐人街。

白发苍苍的王潮汉说，“我们为了生存，只好把名字改了，当然会觉得很遗憾，但是如果去政府单位办事的话，‘中文名字就会引起很多刁难’”。

但是即使是如此，已经完全印尼化的华人仍然免不了被排挤的命运。雅加达的专业摄影师赖逸平虽然有一个印尼名字，也说得一口印尼话，但是他在暴乱期间前往现场拍摄时，一直自称是“日本人”，为的就是怕被认出之后遭遇不测。

苏哈托是精明的政客，他深知华人在商业方面比印尼土著高明得太多，所以就放松对华人在经济活动上的控制，他自己以及印尼掌权的军人，也都跟华商携手合作，狼狈为奸聚敛财富，形成一种金钱与权势结合的“主公制度”，虽然造就了不少华裔巨商，但是后遗症却是引起土著不满，每次一有动乱，印尼人就拿华人来出气。

在5月暴动中，暴徒在雅加达市区的唐人街及华人聚居之处烧杀掳掠，可是紧邻的印度区却毫发无损，就是最好的例证。印尼人权组织都看不过去，在今年8月间入禀雅加达中央地方法院，把总统哈比比、武装部队总司令威兰托及其他保安官员均列为被告，指控政府未在暴乱期间尽到保护华人的责任。

这个官司当然不可能胜诉，不过华人对人权组织所表达的正义还是心存感激的。

西方媒体每一提到印尼时，最习见的叙述便是，“印尼总人口两亿两百万，华裔仅占3.5%，却掌控著印尼的经济命脉”。乍看之下，好像在印尼的华裔每个都是横着走的大亨，事实上却并不尽然，因为在700万的印尼华人中，真正的巨商大贾其实是很少的一部份，绝大多数的华人充其量只是中产阶级，甚至还有相当一部份是很贫穷的，分散居住在爪哇岛、西加里曼丹等地，以务农、捕鱼为生。

当然，包括林绍良、郑建盛、李文正在内的华裔富豪，确实掌握了相当的资源，但是他们之中，有不少也是靠着苏哈托的庇荫，才能巧取豪夺成为大企业家，一旦苏哈托倒台，也就跟着垮了。前述3人之中，林绍良滞留在美国不敢再回印尼，郑建盛已经被限制不得离开印尼，面对着难以解决的债务，都是很好的例子。

而这些不由正路的华商，不但引起印尼土著的不满，也并不受华人的敬重。威京集团设在雅加达的代表吴荣森也指出，印尼从前的经济荣景基本上是一种

假象，因为根本就没有那样的市场需求，很多华人老板对印尼的局势也一直有种不安定的感觉，并不想作长期的打算，只是想尽办法捞钱，只要各方面关系打好，工厂就可以愈盖愈大，钱也愈借愈多。最后几乎都进了自己的荷包。因此印尼人普遍对华人没有好感。

根据不完整的统计，5月暴乱之后离开印尼的华人恐怕有10万人之谱，至今很大部份仍然滞留在外未归。

华人不愿再回印尼的一个很明显原因，便是印尼当局对华人确实不太友好，特别是新上任的总统哈比比在7月间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竟然说出“华人不回来，印尼并不会完蛋，他们的位置正好可以让原住民来取代。”虽然哈比比不久之后又呼吁华裔回国，但是华人基本上是对他没有信心的。

住在山口阳近郊上的刘锦添便指出，哈比比已经让原住民组成“公司”(Koperasi)，企图取代原先主要由华人经营的白米经销网，但是原住民在这一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与能力，再加上许多原住民根本就是在搞偷运白米出国牟利及囤积居奇的勾当，结果弄得白米价格节节上升，民不聊生。他说，“很多人都希望梅嘉华蒂能当选总统，她的手下有几位得力的华人助手，一定会有新的措施。”

那么，华人在印尼的境遇有无改善的可能呢？陈幸夫对此则相当不乐观，他认为华人与印尼人永远都有距离，华人是经济性的民族，印尼人则是艺术性的民族，前者专注于赚钱、存钱，后者则讲究享受、不事生产，所以经济愈发展，彼此之间的鸿沟就愈来愈大，永远无法填补，华人虽然在经济上占优势，可是在政治地位与人口方面，却永远居于劣势，一旦有事，自然就避免不了成为被欺压的对象。

(原载台北《世界日报》1998年10月8日)

在印尼，华人变成一种原罪

杨素雅

出生在印尼的第三代华人、29岁的黄种汉，他开车出奇的慢。

在雅加达开车很容易塞车，车阵停下来，经常就出现极壮观的景象，一群未成年的小贩，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他们兜售报纸、咖啡，或是卖畅销杂志的影印单张。或者他们什么也不卖，肤色黧黑、目光忧郁的小孩，成群拿着一片脏抹布，抢著擦玻璃；也有的弹著走音的吉他，等著车主递出约台币5元的印尼钞。

黄种汉不想给，又不得不给。因此，每遇红灯，他的车就像乌龟过街，黄种汉害怕在路口停下来，他说，这群小孩的抹布都藏着刀片，假如不给钱，他们就会割车窗。

开车的华人特别焦虑，十字路口，常见华人猛搜口袋，找一张零钞打发窗外饥渴的人群。相反的，印尼本地人有的给，有的若无其事，当作没看见。

华人地产集团的销售经理蔡咪咪说：“在印尼，身为华人已经是一种原罪。”

她说，5月暴动时，雅加达就如无政府状态，只要华人的店都可以烧、可以抢，华人的家都可以冲进去拿、去泄恨。

当时，蔡咪咪穿着一套衣服出走；更多人是穿着内衣内裤逃奔，一转头，几代的努力都被捣毁一空了。蔡咪咪说：“我到现在都还不敢上街，必须出门也都是头低低的，怕被认出是华人。”

暴动过后至今，印尼政府没有处理任何华人受害的案件，也没有追究刑责的行动。

6月初，一位印尼部长级官员，被电视记者拦到问及未来如何保护华人的问题，他轻描淡写回答说：“华人自己会照顾自己，政府不必多管。”

中下阶级的温顺泉一家，听到这些话，心都凉透了。温家的老友不只被抢，老友之妻，60多岁的人，在丈夫面前被羞辱轮暴，隔天喝杀虫剂轻生了。

印尼暴动，不止于雅加达，观光城市梭罗的华人区几乎已烧成废墟；华人最多的棉兰也损失惨重。

在印尼，暴动几乎已是家常便饭，6月中旬，东爪哇泗水、西爪哇的城市接连

都有规模不等的动乱。雅加达街头，公共场所四处有军队待命。

华人社会惶恐不安，天天有新的谣言传出，东帝汶独立示威刚结束；6月15日，华人相互通报，印尼全国要大罢工，不要出门。同时，雅加达又全面散出消息，新一波的攻击行动要对准前次未受损的华人椰风社区一带。

人人绘声绘影，华人住家将被画上蓝红黄三种记号，蓝色是抢、红色是焚烧、黄色是强奸。

活在这种日夕数惊的恐怖气氛下，华人的经济活动几乎停摆了。雅加达市中心属于林绍良产业的银行大楼，因为被挤兑，整座大楼是空的。

华人商业中心，高达（GLODOK）的楼宇四处是碎玻璃、瓦砾，入夜形同鬼域，连印尼人都不敢停留。

暴动后的印尼社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以雅加达为例，很多地区的商店或经济活动由华人经营，生活网络被破坏后，购物成本更高，穷人买不起东西，又助长犯罪机会，整体社会又加速混乱。

暴动的社会成本难以估量，印尼盾狂贬已至165000盾兑1美元，民间外债约800亿美元。富有的印尼华人逃到新加坡、香港等地观风向，资金当然也撤走了，只留下半毁的厂房由印尼工人看守着。

经营废铁加工的华裔女企业家 Maununah 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印尼人，这里是我安身立命的家，现在我却要被赶出去，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人了。”

这次暴动对落地生根的华人撞击最深。从外省到雅加达奋斗十余年的吴耀耀，一间刚买的新屋被砸烂了，他说：“假如再发生一次，我就要永远离开印尼了。”

“我们的痛苦不只是财物损失；是人的尊严被剥光了，一夜之间，变成社会的孤儿。”

华人受难，在印尼本地社会并未引起共鸣，包括传出华裔妇女遭受强暴，印尼人许多都以谣言看待。

印尼国土有一千多个岛屿，位处赤道两端，族群、宗教复杂，世界银行最近估计，印尼两亿人口，将达五千万人赤贫，两千万人失业。事实上，印尼媒体已传出，外岛贫民已有吃树皮的现象。

印尼人多，又特别喜欢听闲话，两个人吵嘴，就会引发围观者加入混战。历年来大大小小的暴动有的就因细小摩擦产生。

华裔变成暴动目标，目前被普遍认为是计划性的一项行动。

印尼有影响力的反对言论杂志“论坛”（FORUM），其总编辑诺卡指出，印尼

在1974年、1980年都发生过政府利用学生或回教徒对其他族群进行攻击。雅加达民间社会研究所的志愿人员桑迪亚旺神表示，印尼人个性冲动、文盲人口比例高，很容易被煽动与利用。

印尼排华也有其历史，从荷兰人占领印尼时期，华人活动、身份即被有意隔离。华裔领袖郭建义曾指出苏哈托的“新秩序时代”造就了华人的富裕，众多的印尼人却被抛在贫穷的一端。华人虽富有却形同散沙，华裔律师(Frans)表示，32年来，华人被刻意禁止参与政治活动，没有政治团体，这是华裔缺乏保障的主因。

华人领袖张锦梅说明，华裔社会保有独特传统，也有强烈的封闭性，和印尼人的融合并不容易，这也是遭敌视的原因。印尼司机布迪说，长久以来，华人都高高在上，对印尼人颐指气使，所以，华人在暴动中受害，印尼人都抱着幸灾乐祸或漠不关心的态度。

驻印尼的台湾贸易中心经理黄家诚指出，在暴动中，也有华人，包括台商，因为平常很注意回馈社区、照顾员工。当暴民攻打时，还是靠着本地员工解围。未遭到波及。

华人在受创下已有觉悟，一个新的华裔政党成立了。另一个以“杜绝种族歧视委员会”名义成立的团体，发起时成员有60人，包含商界、律师界人士。

发起人之一的律师Frans表示，他们将壮大组织透过选票，或以政治献金支持特定候选人来争取权益。

在这座骚动不安的城市，经济濒临见底，看守政府的能力面临考验。更大的浪潮隐隐而来，汹涌之势，难以预期。

黄种汉说：“不是每个华人都有能力逃走，我们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保持乐观的他认为，高技术人才跑了，或许他能捡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焦躁的雅加达，地摊公开贩售抢来的货品；台商子女就读的台北学校，高中班只剩一个学生，一位六年级的小朋友看到家乡访客，凑过来问说：“现在，台币升值多少了。”

深夜，五万户华人为主的椰风社区，包裹在刺网、拒马内，男性轮班持长棍、武士刀巡逻。雅加达东南西北的华人社区用铁网、铁窗把自己关得更紧。

张爱玲所说的“时代的破坏”的氛围笼罩在暗夜的城市，雅加达的华人在风中哭泣，他们将何去何从，黄皮肤真的是一种原罪吗？

(原载台北《中国时报》1998年6月28日)

全球评说篇

关注印尼华人命运

郭招金

1998年5月，印尼发生严重社会骚乱。人们对那里发生了什么具体事情并不十分清楚，但心里为华人命运而担忧。大约一个月之后，国际传媒将印尼华人在这场骚乱中的种种悲惨遭遇陆续披露，整个世界都为此感到震惊：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每个生命个体受到充分尊重的今天，居然还能发生公开抢掠华人资产，在光天化日之下集体强暴华人妇女的事件。实在令人不可思议！这是20世纪即将结束之前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上最丑陋的一幕！

印尼华人的祖先是来自中国沿海地区迁去的。中国人移居印尼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大规模的迁移活动主要集中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几十年间。

众所周知，这期间中国沿海地区贫苦农民大规模迁居东南亚一带，是当时全球性人口迁移流动的组成部分，但中国的对外移民与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坚船利炮到世界各地殖民不同，是一种以谋求生存为目的的和平移民。

中国人移居印尼之后，绝大多数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从事各种十分繁重的劳动，他们的劳动所得，有一部分寄回老家赡养家人，有些人致富之后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有所捐赠。但华侨在印尼劳动所得绝大部分留在当地发展，他们的财富是当地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印尼华侨对当地经济发展、对推动当地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包括印尼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学者对此已有定评。

到本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沿海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基本停止。留在印尼的华侨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已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大部分加入当地国籍，现在60岁以下的印尼华人，大部分在印尼土生土长，印尼

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熟练掌握印尼语言文字，遵守当地法律，和当地民族和睦相处。

据学者估计，目前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在500万至800万之间，其中保留中国国籍的只占少数，包括一部分台湾同胞和香港同胞。保护其在国外侨民的合法权益，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提供帮助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责任。世界各国莫不如此。今年5月印尼发生社会骚乱之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韩国、荷兰、加拿大等国都包专机或轮船，撤走该国在印尼的侨民。

我国驻印尼大使馆从今年1月开始就设立电话专线，联络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中国同胞（含香港、台湾同胞）。骚乱升级时，我国外交部指示驻印尼大使馆，全力以赴为滞留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同胞提供领事保护和帮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将继续密切关注印尼局势的发展和中国侨民的处境，采取适当措施，向中国公民提供必要的帮助。

对在印尼的华人，中国政府多次发表讲话表示关注：今年8月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香港对新闻界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印尼华人华侨问题立场的表示：强烈要求印尼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尽快采取措施，确保华人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对不法罪犯严加惩处。唐外长还表示：现在，我们正拭目以待印尼方面的调查委员会将怎样的调查报告，做出怎样的结论。我们也在密切注视印尼方面将采取哪些有力、有效措施，来确保印尼的华人华侨的安全和权益，杜绝再度发生类似事件。

今年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国务院侨办、港澳办、台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严正指出：中国对印尼华人惨遭暴徒袭击的严重事件深表关注，我们注意到印尼政府承诺将严肃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希望尽快落实，并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

今年11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吉隆坡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了印尼总统哈比比。在谈到今年5月印尼骚乱中发生的不幸事情时，江主席说，印尼华人加入印尼国籍后，已经成为印尼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印尼公民，其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他们应像普通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他说，我们注意到阁下本人和印尼政府多次表示要保障华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中国在华人、华侨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相信总统阁下和印尼政府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的感受和关注。我们认为，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

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我们两大邻国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哈比比总统当即表示，印尼华人都是印尼人，是多民族的印尼大家庭中的一员。印尼政府认为，5月发生的事件是一种犯罪行为，决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印尼将根据法律进行严肃处理。印尼华人是印尼公民，但如前所述，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国去的，至今仍有许多亲属在中国。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有许多印尼归侨回到中国定居。由于这些历史性原因，许多印尼华人和许多中国公民原来同属一个家庭或有千丝万缕的亲情联系。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关注印尼华人命运是合情合理的。

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关注印尼华人命运符合尊重人权的国际原则。联合国50年前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他见解、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所有人，都是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主体，从而使人权概念真正体现了人人平等的普遍价值。印尼华人是印尼公民，尽管他们和当地土著居民在种族、肤色、语言、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同，但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个人权利。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认同的尊重人权的国际准则。印尼华人在今年五月的骚乱中受到有针对性的骚扰、劫掠，甚至被集体强暴，当然要引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关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类似对基本人权进行践踏的事件，大家都应本着维护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予以关注，对受害者予以声援。

中国和印尼都属亚洲大国，两国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印尼今年五月发生严重社会骚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注意到，自1997年7月爆发金融风暴以来，印尼盾币值下跌了60%，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6%降到今年的负14%，通货膨胀率高达80%，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97年的1055美元下降到400美元。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印尼全国2亿多人口中，有一半人生活贫困，其中3000万为赤贫。赤贫者中也包括华人。

同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印尼的处境深表同情。中国在对印尼华人遭遇表示关注的同时，对印尼困境给予尽可能的帮助，希望其尽快走出困境。中国承担压力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是对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巨大支持。中国还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包括印尼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提供55亿美元（含香

港提供 10 亿美元) 的经济援助。这些行动说明, 中国坚持国与国平等相处的原则, 体谅邻国困难, 尽可能予以帮助。印尼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印尼经济及早走出困境, 从根本上有利于改善印尼华人的命运。对中国政府给予的真城帮助, 印尼总统哈比比表示: 两个国家不仅是朋友, 而且如同一家人。

印尼是国际文明社会的成员, 印尼政府也在积极维护社会文明秩序。印尼总统哈比比公开表示, 五月骚乱是印尼历史上的耻辱, 对在骚乱中受到损害的包括印尼华人在内的印尼人民表示歉意, 重申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发生。在这次骚乱中, 许多印尼人对受害华人提供保护, 对暴徒的暴行提供指证, 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清事实真相, 严惩凶手, 表现出人道主义的精神, 也说明印尼土著和华人虽种族不同, 但和睦相处仍是印尼社会的主流。

印度尼西亚华人问题症结何在？

梁立基

今年5月中旬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骇人听闻的种族骚乱，华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暴徒的烧杀奸淫，而军警却袖手旁观，熟视无睹。印尼华人遭到了空前的浩劫，但竟有人说“不少人能理解为什么老百姓会突然变成抢劫者”。有位著名的原住民大企业家说，当他听到民众的所作所为时很有感触，因而掉了眼泪，他说：“那表明我们的人民很穷。他们进行抢劫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在这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再也买不起任何东西了”。我穷你富，所以我可以向你抢劫，这是什么逻辑？为什么偏偏专抢华人（有许多是开小店铺的）而不去抢原住民？这显然是企图转移视线，把这次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归因于华人与原住民的贫富差距“日益巨大”，把少数为非作歹的暴徒说成是无法活下去的贫困原住民。然而，据印尼报刊的披露，这次种族骚乱完全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幕后有有权有势的人在操纵和指挥。当事情的真相逐步被披露后，全世界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震惊，对丧失人性的暴行纷纷提出强烈的谴责，并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出幕后的策划者和肇事的不法之徒，并绳之以法，向全印尼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做出交代。印尼政府也答应进行调查，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表示要彻底查清真相。这是值得欢迎的积极态度。

通过这个事件，人们提出问题：为什么印尼的种族骚乱会愈演愈烈，印尼华人始终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和替罪羊呢？这里需要找出其根本的原因，了解其来龙去脉和问题症结之所在。我们认为其根本的症结就在于“原住民主义”的华人观，而这又有其很深的政治历史根源和经济历史根源。

华人移居东南亚始于唐代

从历史上来看，华人移居东南亚大概始于唐代，到明代已初具规模。他们到印尼来，大都出于互通有无的经商目的，有的则出于宗教动机或其他原因。他们的到来一向受到原住民的热烈欢迎和悉心照顾，而定居之后便和原住民一道共同建设家园，为发展当地经济做出积极的贡献。《宋史》里有记载中国商人如何受到原住民的款待：“中国贾人至者，待以宾馆，饮食丰洁。”《岛夷志略》里提到原住民“尤敬爱唐人，醉也则扶之以归歇处”。明朝郑和下西洋时

期，马欢撰写的《瀛涯胜览》里有一段关于华人作用和贡献的记载：“于杜板投东行半日许，至新村，番名日革儿昔。原系沙滩之地，盖因中国之人来此创居，遂名新村。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各处番人多到此处买卖。其金子诸般宝石一应番货多有卖者。民甚殷富。”这段记载不但说明了定居印尼的华人数不少，而且能用自己的勤劳双手和聪明才智为当地的开发做出重要贡献，把一个不毛的荒滩建设成新村并使之成为繁荣当地经济的贸易中心。这里可以看出，华人与原住民相处融洽，不分彼此地共同发展经济和共同爱益。可以说在西方殖民入侵以前，原住民的华人观一向甚佳，对华人以亲友相待，从不分什么“原住民”和“非原住民”。

西方殖民入侵之后，印尼逐步沦为殖民地，中国也变成半殖民地国家，二者有相似的民族命运，都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压迫和剥削，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荷兰殖民者需要大力加强对印尼的经济掠夺，于是开始注意到勤劳而又不受保护的中国人可以为他们进行开发。1623年荷兰总督燕·彼得逊·昆离任前在给其继任者的备忘录中写道：“巴达维亚、摩鹿姑、安汶、班达等地区目前正需要很多工人去开发，世界上没有比中国工人更适合做这种工作。现在季候风正好，我们可以派遣战舰前往中国海岸，俘虏男女幼童以归。”这个时候中国也正处于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之中，于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的中国人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印尼。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时去印尼的华人大多出于谋生的目的或者被俘去当劳工，也有的是因反清复明活动而逃亡出去的。他们一无所有，全凭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拚搏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创业。荷兰殖民者，一方面要利用华人的劳动力去为他们进行开发，一方面又怕华人的经济力量会逐渐壮大并与原住民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他们的殖民压迫。因此他们对华人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和分而治之的策略，实行“居住区条例”、“通行证条例”和“警察裁判权”等制度，把华人圈在指定的范围内与原住民隔开，并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不同身份加以区别对待。华人作为“非原主民”不能拥有土地，所以华人只能当劳工或者从事商业活动。一旦殖民者认为华人的经济和华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已威胁到或不利于殖民者的利益时，他们便不惜采取最严酷的手段进行血腥镇压和迫害，1740年的“红溪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此事件中，备受殖民压迫的华人和原住民联合起来共同抗荷，谱写了两个民族共同反殖斗争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到了19世纪的70年代，为了适应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荷兰采取了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的新殖民政

策,把印尼从地方封建割据的自然经济逐步推向全国统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使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附属部分。这种经济上的大转轨是迈向现代经济的艰巨工程,荷兰殖民者知道,靠他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办到的。因为光有主动脉而无布满全身的细血管和微血管,市场经济是发育不起来的。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有遍布全国的商业网络和大大小小的流动渠道,而这要靠勤劳勇敢、不畏艰险、富有拼搏精神而又善于经营的人去开拓。从当时的条件来看,只有不依附于当地自然经济的华人最具这种素质。在这种历史和时代背景下,移民印尼的华人数量猛增,据统计在1860年印尼的华人不过22万人,到1930年已增到123万人,70年内增加了100多万人。他们披荆斩棘,走遍穷巷僻壤和人迹罕至的地方去开辟市场,建立商业网点,后来还向国外扩展,与国外市场接轨,为把印尼从地方封建割据的自然经济推向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这个时期印尼华人在经济上的最大作用和最大贡献,恐怕就在这一点上。而印尼华人的作用和贡献还不局限于经济方面,在促进印尼语言文化的近代化方面,同样其功不可没。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华裔马来语报刊和华裔马来语文学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被认为是印尼语言文学走向现代的发展链条中重要一环。这个时期印尼原住民的“华人观”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因为他们大都仍生活在自然经济的环境中,靠土地为生,与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华人还没有利益上的直接矛盾和冲突。但是荷兰殖民者实行的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分而治之”的结果和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华人)的距离逐渐拉大了,因而原住民的华人观也逐渐发生变化,为以后的种族矛盾和种族冲突埋下了祸根。

“原住民”和“非原住民”

20世纪初,东方开始出现民族觉醒。在印尼则出现两种被压迫民族的觉醒,一是印尼华人的民族觉醒,一是原住民的民族觉醒。由于过去的中国政府实行的是血统主义政策,而荷兰殖民政府实行的是出生地主义政策,印尼华人一直具有双重国籍的身份。在殖民统治和压迫下。大部分华人以“华侨”自居而认同于中国。所以华人早期的民族觉醒是与中国的现代民族觉醒直接相联系的,由此而产生的是“华侨的民族主义”。在同一时期里,原住民中也产生现代的民族觉醒,而由此产生的是“原住民的民族主义”。因此可以说,20世纪初在荷兰殖民统治下,印尼出现了双轨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即作为“华侨”

的华人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和原住民的民族觉醒和民族运动。二者之间，命运相同，目标一致，所以彼此之间能互相同情，互相影响和互相支持。但荷兰殖民者有意制造出来的“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界限已把二者从政治上隔离开来。从此原住民便以“原住民主义”为基础重新构筑他们的“华人观”，视华人为外族，排除在印尼民族和民族运动之外，只看做是原住民在反殖斗争中的“合作者”。而华人起初也还没有找到自己在印尼民族运动中的定位，他们大都从同情和关心的角度给原住民的民族运动以支持和关照。例如1990年成立的第一个现代华侨组织“中华会馆”就曾给1908年第一个现代原住民组织“至善社”的创立以积极的影响和帮助。华人办的报刊经常报道原住民的民族斗争，1930年苏加诺被荷兰殖民当局审讯时，《新报》就做了大量的报道，抨击荷兰殖民主义者，声援苏加诺的正义斗争，还不顾遭封闭的危险全文刊登苏加诺的辩护词《印度尼西亚的控诉》。现在的印尼国歌《大印度尼西亚》也是在《新报》周刊上首次发表，引起强烈的反响，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华人中有的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原住民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于是逐渐向原住民的民族运动靠拢并直接投身到印尼民族运动的洪流里。1932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亚中华党代表了这部分华人当时的民族意识。但是，原住民从民族运动初兴起，就抱着“原住民主义”的态度，把华人排除在印尼民族概念和民族运动之外，左、中、右的原住民政党都不吸收华人参加、后来情况有所变化，一部分华人向原住民的民族运动靠拢，原住民中也有人反对狭隘的“原住民主义”而主张以祖国认同为基础，把土生华人纳入印尼民族大家庭的范畴之内。后来有些原住民政党也吸收了华人参加，有些华人的民族主义也脱离了中国的轨道而与印尼原住民的民族主义并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印尼达三年半之久，华人和原住民一起遭受空前的浩劫。这使他们更加认识到，只有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枷锁，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才是民族的唯一出路。所以，当日本投降后暴发“八月革命”时，更多的印尼华人积极参加了捍卫印尼民族独立的战斗。例如在著名的泗水战役中，就有不少华人子弟与原住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侵略者。在印尼“共和区”和“共和军”遭到敌人严密封锁时，不少华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送去急需的生活资料和武器弹药。他们为捍卫印尼民族独立所做的贡献受到了共和国政府的肯定和表扬，有的还被授以独立奖章。印尼华人约翰李的英雄事迹最有代表性，他由于对印尼独立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而被提升为印尼的海军少将。但这个时期的华人大多数仍持华侨心态，尽管印尼共和国政府于1946年4月10日制订了国籍法，沿用荷兰殖民政府的出生地主义，规定在印尼出生的华人皆为印尼公民，但华人积极响应的不多。这时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破坏华人与原住民的关系，继续利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矛盾，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故意制造种族骚乱。他们一方面组织原住民的囚徒和暴徒对华人进行杀、烧、抢，一方面又派军警去进行镇压和假意保护华人。这样便给原住民以错觉，以为荷兰殖民侵略者是华人的“保护者”，而华人是荷兰侵略者的“同盟者”，从而大大加深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鸿沟，而荷兰殖民者则坐受渔人之利。

“原住民经济”和“华裔经济”

对印尼华人来说，1955年4月22日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签订双重国籍条约，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此绝大多数的华人便开始了从“华侨”转变为“华裔”印尼籍公民的历史进程。成为印尼籍公民后，印尼华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国民认同的问题，即从过去认同于中国转变为现在认同于印尼，从中华民族在海外侨民变成印尼民族的一部分，与印尼整个民族相融合。解决国民认同的问题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需要原住民放弃“原住民主义”的华人观，把华人当做自己人加以接纳，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但不幸的是，原住民中的“原住民主义”仍然根深蒂固，始终不把华人看做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他们提出“部族”的概念，认为现代印尼民族是由印尼原住民的各“部族”所组成，而华人不是原住民的一个“部族”，是非原住民的外来种族（其实原住民中的“部族”并不都属于同一种族），因此不能享有“部族”的同等待遇。苏加诺政府时期还给华裔公民以政治权利，有些华人还当了内阁部长。但当看到华人的经济优势不断增强而原住民的经济劣势日益明显时，“原住民主义”的情绪又重新抬头，先是阿萨阿特掀起排华这动，接着是1959年发布第十号总统令，把华裔从县以下的地区驱赶出去。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问题和华人同化问题又被尖锐地提出来。1961年通过的《同化宪章》提出：“所谓同化，是指具有不同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文化表现的不同集团，变成为和谐的和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社会整体，即印度尼西亚民族”。接着，对华人的同化还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对于‘华裔’印度尼西亚公民问题，同化意味着具有华裔血统的逐个加入和吸收为唯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躯体，以致最终原先的特殊集团不再存在。”其

实际含义是，要把华人彻底“原住民化”，使之不复存在，这成了印尼对华裔实行强制同化的指导思想。

原住民为什么要坚持“原住民主义”，这里还有其经济的历史根源。上文已提到印尼华人在把印尼从封建割据的自然经济推向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意味着华人大大早于原住民先进入市场经济，因而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更大的优势地位，华人的经济状况一般来说也就比原住民好。原住民则由于依附于自然经济而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所以原住民的经济状况一般来说比华人差。这就容易给原住民造成一种错觉，以为社会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为华人富而原住民穷（其实华人中富者是少数，而原住民中也有富者）。当20世纪初原住民开始出现民族觉醒并要求发展“原住民经济”时，他们在市场上直接面对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华人地方工商业者而不是控制印尼整个经济命脉的荷兰大工商企业主。新兴的原住民地方工商业者（其中不乏宗教界有影响的人士）在谋求自身的发展时，感觉到难于依靠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去同华人开展公平的竞争，于是他们想借助于非市场经济的手段去压倒竞争对手的优势，利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和宗教情绪，把本是市场经济中竞争对手之间的矛盾变成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种族矛盾，挑起种族冲突。1918年的“古突斯种族骚乱”开了这方面的恶劣先例。

独立后，原住民掌权，打破了殖民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但并没有改变原住民经济上的劣势。原住民有政治权力而无大经济势力，二者失去平衡，于是他们想凭借政治权力去摧垮“非原住民（华裔）经济”为优势，由“原住民经济”取而代之，以克服这种不平衡性。所以在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之后，他们仍不放弃“原住民主义”，不把“华裔经济”看做是印尼整个民族经济的组成部分，不把“华裔经济”的发展看做是印尼整个民族经济的发展，继续对“华裔经济”实行遏制、排挤、驱赶的方针，以便最后由“原住民经济”取而代之，实现“经济原住民化”的最终目标。60年代前后出现的从县以下地区驱赶华裔的浪潮，便是贯彻驱赶方针的第一次大规模行动。

“华裔经济”是印尼经济的组成部分

苏哈托政权成立后，印尼华人问题更具敏感性，因为受当时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的严重影响。苏哈托政权在对待华裔公民的问题上，不但继续执行“原住民主义”的方针，而且还大大加剧对非原住民（华人）的种族歧视政策。

首先在政治上完全剥夺了华裔的基本权利，把华裔完全排除在政权之外，使之处于无权无告的地位，然后实行强制、快速、彻底的同化政策，铲除华人的“一切特性”，要把华裔完全“原住民化”。在经济上，苏哈托政权则吸取了60年代初驱赶华裔带来恶果的教训，意识到要转向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必须有资本，有会管理和经营的人材，有连结国内外市场的经济网络等，而华裔在这方面的作用一时无可替代，所以他们改变了以往的驱赶作法，采取“控制和利用”的方针，在政治上实行严密控制的同时，经济上则利用华裔在财力和经营能力上的优势，让其充分发展，以便从中得利。印尼华人就是在这种政治与经济极不平衡的生态环境中，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业拚搏精神，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印尼私营经济部门的主力和国家最大的纳税户。印尼经济能以平均年增长率为6.8%而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能从最初的不到100美元猛增到1996年的1000美元，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能从最初的60%降到1996年的14%，“华裔经济”所起的积极作用和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抹杀的，也是举世公认的。

但是华裔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并没能改善自己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为了推行强制、快速、彻底的同化政策，各种误导性言论在不断煽动排华的种族情绪。首先是在华裔的“效忠”问题上大做文章，说非原住民的华裔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只忠于中国和自己的华人圈子，“就算在这里一千年，他们的心也不会热爱印度尼西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和中国——印尼关系破裂的时候，他们把华裔看做是“潜在的第五纵队”，不断加深原住民在政治上对华裔的不信任感。关于“效忠”问题，这里有必要做些历史的分析。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备受歧视和压迫的、处于“非原住民”地位的华人绝大部分不愿也不会“效忠”于荷兰殖民政府，他们持“华侨”身份而“效忠”于中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他们最初的民族觉醒是与中国的民族觉醒直接相联系的，但是，在经过长期与原住民同甘共苦和共同反殖斗争之后，他们逐渐看到历史潮流的趋向，意识到印尼才是他们的第一故乡。所以，当到了该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时候，他们便自觉地选择印尼籍，此乃必然的历史归宿。多年来，在实现国民认同之后，华裔中间实际上已经产生新爱国主义思想，即他们的爱国是爱印度尼西亚祖国，而对中国作为自己的祖籍国只怀有亲近感而已。这就是作为“华侨”的爱国主义和作为“华裔印尼籍公民”的爱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所以对印尼华裔来说，“效忠”问题应该是解决了。然而持“原住民主

义”立场的人却故意混淆这二者的本质区别,继续散布华裔仍“效忠”于中国而不“效忠”于印尼的言论。他们认为华裔的“效忠”问题无法解决,除非把华裔基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华人“一切特性”彻底铲除掉。所以苏哈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极端的做法,如强迫华裔改名换姓,在他们的身份证上加歧视性标记,封闭所有的华校华报,完全禁绝中国语言文化在印尼的使用和传播等等,企图通过斩断华裔与中国语文化的一切联系来铲除华裔的“一切特性”,实现华裔的彻底“原住民化”。

与此同时,在经济上则大造华人控制印尼经济的舆论,说什么印尼百分之七八十的经济被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华人所控制,有位西方学者更加耸人听闻他说:“海外华人控制除日本和韩国以外所有亚洲市场的中型和大型公司。”散布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夸大言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企图把印尼当前的经济危机归罪于华人,因为是他们控制了印尼的国内外经济。有位原住民的经济学家还为此大声疾呼:“现在的印尼经济需要有平衡者的力量去抵消一小撮控制大部分国家财富和机会的大私营经济经营阶层的影响。这是绝对必要的,用来铲除由于历史遗留下来所造成日益巨大的经济差距。”话里说的“平衡者的力量”显然是指原住民的工商业者,而“大私营经营阶层”是指华裔工商业者,言者是在公开鼓吹不顾市场经济的规律,现在就由“原住民经济”去取代“华裔经济”,以实现“原住民主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他们还把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归咎于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华裔)“日益巨大的经济差距”,甚至把政权腐败的问题也算在华裔的账上,好些本属社会政治经济的矛盾都变成了种族的矛盾,极力把祸水引到华人身上。就这样多年来对华裔实行的种族歧视和强制同化政策以及散布的各种误导性言论,使“原住民主义”的排华情绪不断升温。在印尼不管出现什么危机,都可以拿华人做出汽筒和替罪羊以转移视线。不管出现什么性质的骚乱,华人必定首当其冲,成为不法之徒烧、砸、抢和蹂躏的对象。这不仅是印尼华裔的悲剧,也是印尼整个民族的悲剧,因为华人遭大难之时,也是原住民受大害之日。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华裔经济”早已成为整个印尼经济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这次的种族大骚乱再次证明,针对华裔的骚乱结果,不但华裔遭家破人亡之恶运,原住民也受大去比失业之痛苦。现在印尼失业人数已达169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猛增到将近印尼人口的一半(1996年本已降至16%)。印尼华人问题如再不根本上加以解决,今后还会不断出现种族骚乱,而其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解决印尼华人问题此其时也

现在应该说是彻底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关键时刻和有利时机。首先，我们看到世界潮流的大变化，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和平和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流，特别是中国——印尼关系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正向好的方面发展。这就为解决印尼华人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大气候和大环境。其次，原住民中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种族歧视带来的恶果，指出把华裔“当成不公正的象征及社会嫉妒的对象是大错特错的”，主张把华裔当成“一个少数民族单位”，对他们一视同仁，和印尼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他们不是外人，而是自家人”。我们应该看到，坏人是少数，广大原住民是善良的，他们也反对种族暴行。这次骚乱中就有不少原住民挺身而出，主动保卫华裔办的工厂和华裔生命财产的安全，情景甚为感人。其三，苏哈托总统下台后，印尼政府面临重大的改革任务，这也为正确处理和解决华人问题提供良机。历史告诉我们，解决印尼华人问题的关键在于掌权的原住民必须转变观念，改弦更张，放弃不合时代潮流的“原住民主义”，对华人在印尼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和贡献予以正确和公正的评价，废除一切歧视性和强制性的同化政策，给华裔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印尼华裔的新爱国主义精神，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更自觉和主动地融入印尼民族大家庭里，和原住民一道克服危机，共渡难关，为国家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同心协力地实现建立繁荣公正社会的民族理想。

（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为北京大学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学者）

印尼华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李金珊

5月的印尼暴乱中，根据《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至少有168名印尼华人妇女遭暴徒集体肆虐强暴，连9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暴徒们不仅强迫受害人的家人在旁目睹，而且还在事后让受害人看受辱的照片。种种兽行，让人无法相信会发生在人类文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的今天。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情，终于由人权组织和避难海外的华裔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公开。而人权组织的深入调查，也使愈来愈多有关印尼暴民在5月骚乱期间涉嫌有组织强奸妇女的骇人听闻暴行逐渐曝光。

根据种种其他的报道，印尼的5月暴乱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而进行这次暴力行动的集团显然是受到有势力的军方派系幕后主使。参加暴动者不是当地人，他们都乘坐卡车而来，而且暴力行为如出一辙：当众强奸华裔女性、掠夺财物、纵火烧房。有报道说暴徒在施暴前都服过兴奋药，人性也因此丧失殆尽。而且，暴徒们无法无天的行径，事中没有受到军警当局的阻止，事后更没有受到对付。因此人们也更加相信，这种暴行，不可能是通常的反政府暴动，十分蹊跷，其中必然另有文章。

最近，人权组织提出新证据，指证印尼军人大规模地侵犯少数族裔妇女，不仅有华人妇女，也包括印度族和亚齐族。一些妇女组织认为这种强奸行为，以被用作“战争武器”，因此这些暴行也应列作战争罪。

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印尼总统哈比比终于在7月15日正式表态，谴责5月暴乱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强奸案，“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到目前为止，哈比比已下令成立了两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暴乱事件和强奸案。

实际上，单是以已经披露出来的一些事件和案件，已足以让人相信，印尼暴徒的非人行为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波斯尼亚发生塞族人对穆斯林的种族灭绝的惨绝人寰的暴行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鉴于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社会和政治地位，鉴于华人每次都成印尼社会政治甚至经济危机的牺牲品，鉴于印尼社会对华人的长期边缘化，更鉴于两个调查委员会中没有一个华人参与，没有人能知道调查委员会的调查能到什么

程度，怎样惩治那些暴徒，尤其是始作俑者和幕后主使者。而强大的国际压力，可以促使印尼政府不至于太敷衍了事。

罪行比前南国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

90年代初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种族灭绝行为，引起人神共愤，在美国的极力倡导下，国际社会特别设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审理所有在前南对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实行种族灭绝和违反人道的罪行，之后国际社会又设立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负责审理在1995至1996年间卢旺达当局的种族灭绝暴行。这两个国际特设法庭类似二战结束后审判日本和德国战犯的“东京法庭”和“纽伦堡法庭”。

“前南国际法庭”根据法庭条例，提控和审判四种罪行：种族灭绝罪（共有5项，包括“对某一族民造成身心严重损伤”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侵略罪。该国际法庭已经提出27份起诉书。被起诉的有波斯尼亚的塞族总统，也有集中营的守卫。本文仅举其中两例。

前南国际法庭的第四份起诉书指控了19个塞尔维亚人在波黑战争期间犯下的各种暴行。其中一人，名为雷迪奇，阿玛斯卡集中营的守卫军官，在1992年六、七月间，多次把集中营里的波斯尼亚穆斯林“A”带出强奸。国际法庭提控他5次强奸行为，每次都控以三项罪名：一、故意强暴“A”，使其遭受折磨，犯下国际法庭条例第二条中的“严重侵害罪”；二、用强奸虐待“A”，犯下战争罪；三、强奸“A”，犯下国际法庭条例第五条的“反人道罪”。

经五份起诉书起诉卡拉迪奇和拉迪奇。前者在1992年波黑战争开始至1995年底被控之时，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第一任总统，后者则是当时的兼塞尔维亚武装部队司令。指控卡拉迪奇和拉迪奇所犯的众多罪行中，第41、42项罪名是：在两人的指示和指挥下，塞族军、警及其他部门在非军事原因下，在所占领地区纵容或者直接，有系统地摧毁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的商业和住所；两人对塞族人非法破坏穆斯林和克罗地亚平民的财产视若无睹，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防范，事后也没有对暴徒进行任何惩罚。

只要借鉴一下以上两个例子，任何人都可以看出，5月发生在印尼的烧杀掠抢和强奸，比起波斯尼亚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国际社会会对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暴行同声谴责，尤其是阿拉伯世界，更是异口同声。为了伸张正义、彰显人性，还特别设立了国际法庭审理那些血债累累的凶手。

印尼华人境况还不及波斯尼亚穆斯林

然而，印尼华人受此等骇人听闻的残害，暴徒们不仅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戒，甚至连谴责的声音也几不可闻，华人妇女被强奸事件还在不断发生。希特勒压迫下的犹太人，波斯尼亚受残害的穆斯林，命运都极其悲惨，因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强大的母国可以声援他们。但最终，国际社会给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持。既然国际社会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主持正义，没有理由对发生在印尼的非人暴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应该敦促印尼政府深入调查，将那些涉案暴徒绳之以法。中国政府更是应该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受害的印尼华人表示“最深厚的关切”，抗议印尼政府对至今还在发生的迫害华人行为无动于衷。

许多人把印尼的5月暴行看成是违反人权的行为。实际上，这早已超出人权的范围，已是违反人道的罪行。基于这样的理由，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在联合国动议谴责那些用作战争武器的强奸和烧杀掠抢。

(原载香港 1998 年《信报》)

印尼排华是自毁国宝

郑赤琰

连日来香港有不少团体与政党发起了示威行动,向驻港的印尼领事馆提出抗议,要印尼政府终止暴民蓄意向华裔印尼公民公开施暴,并集体污辱他们的妇女,要求设立调查庭侦讯肇事者及犯罪者。香港传媒方面更是在报道这次对华裔抢杀放火奸污事件之余,还纷纷在舆论上公开声讨这种没有人性的暴力事件。

印尼政府、政党、论政参政团体、宗教组织,以及军警,更重要的是人民,都要认识清楚,外界的示威抗议,谴责与关心的行动,是关心与爱护印尼的表现,绝不应当作干预印尼内政来看待。说到底,凡是关心与热心争取印尼民主自由的印尼公民,都应该认识清楚争取民主权利是一回事,暴力行动又是另一回事,为了争取民主而不采取暴力只有把自己正义之举转化为恶行,这在全世界的政治发展史中已有了明确的教训。法国大革命杀人杀到发明“断头台”来大批残杀,杀到有识之士如罗曼罗兰为之惨叫。

1975年赤柬的暴力清城最后也把柬国变成“大屠场”。因此,印尼所有的人都要遵守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自己既然珍惜自己的民主、自由、人权,也要珍惜别人的民主、自由、人权;自己讲求民主权利,也要尊重他人的民主权利。否则,便会变成只有我讲民主,不许他人讲民主。如果不讲求这个政治游戏规则,便永远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与人权。一面抢杀他人的财产与生命,一面高喊民主,那是野蛮与无人性之举。

当今的世界已进入高度文明与民主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已不再被允许闭起门来自己做野蛮人,否则便不会有联合国公开声讨伊拉克,举世声讨纳粹罪行、日本军国罪行。印尼的民主人士更应该认清此事,他们在反对独裁腐败之余,更应该反对暴民的暴行,他们绝不可能有任何借口在他们的民主示威行动中,可以允许眼见暴力事件惨烈地发生,他们应勇敢而有识见地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不能排除暴民趁火打劫便不能强行去示威游行。只有这些基本的政治认识,印尼的民主诉求才能唤起世人的声援,否则便会变成被人声讨。

再说,港人以及世界各地的抗议之举不但是个正义之举,同时也为自己、为印尼的利益去考量的,不是吗?包括香港在内,区内仍有不少国家在印尼有投资、贸易等经济利益。既然印尼的华裔印尼公民是贸易、工业、金融业、运输业、零

零售业与批发、旅游等各种服务行业的主要运作者,一旦他们受到生命与财产的打击,整个印尼的经济运作便要陷入瘫痪境地,甚至陷入垮倒的命运。他们的经济与生命的损失,不但直接累及印尼国内的民生经济,将来整个印尼的经贸与投资环境也会令人裹足不前,影响所及,外界在印尼的经济利益也就受到拖累而告损失惨重,香港百富勤之宣告解体便是一例,其他台商与新商所受到的损失绝不在港商之下。为了本身与印尼的国家利益,外界的深切关怀,甚至呼吁印尼各方努力终止这种暴行,是合情合理的。

在暴动行动中,有一种说法被视为当然的事,如果华裔印尼公民因为拥有七成以上的经济势力便该受到暴民的烧杀抢劫与诸般凌辱的话,全世界不论是谁只要是拥有经济势力的便都可以人人烧而杀之,凌而辱之。如果这是必然该受到的下场,全世界便要回到蛮荒的野人时代,没有人可以再拥有资产,世界也就绝无文明可言,因为文明的建设,最基本的原则便是为了个人创造财富,个人的财富得保,社会的财富也就因此可以发展,因为社会的财富增长得靠个人去争取,个人财富不保,也就无人会有什么财富的进取心,若然,社会财富又从何而来?基于这个道理,人类发展历史显示,任何时候一旦出现个人财富不保的情况,其社会不但没法向前演进,反而要倒退自我消亡。

华裔既然成为印尼公民的一分子,他们领导印尼经济的事实,不但不应受到冲击,反而应受到珍惜才是。在过去百多年中,从荷兰殖民地时代的19世纪末,到独立战争,再到苏加诺下台的1965年,到现在的1998年,先后4次发生如此杀害华裔,针对华人商业劫掠的事件,但华裔都忍受过去了,重新为印尼作出各种贡献。最大的是经济的贡献,他们取诸印尼,用于印尼,他们不是外国人,他们赚到的财富不会搬走,尽管有投资外国的现象,但也为印尼赚取外汇。他们如此效忠印尼、效劳印尼,印尼不知珍惜,实是印尼之耻,印尼之失。

4次排华的惨痛经验与损失,已太多了,印尼举国上下应彻底反省,好好珍惜这批国宝!

(原载香港1998年《信报》)

谈印尼暴民排华与不干预内政

《星洲日报》社 评

印尼在今年5月发生的变天，一方面结束了苏哈多长达32年的高压统治，另一方面却也再一次触发残酷、惨无人道和法西斯味道极浓的排华暴动。

在雅加达、棉兰和其他华人聚居的大小城镇，暴徒非常有组织和有策划地带动不满现状群众抢夺和破坏华人的财产、伤害他们的身体或甚至加以杀害。

为何印尼每次发生经济与政治动荡华人都成为发泄与攻击的目标，其中说法之一是印尼华人只占总人口的4—5%，但却控制了80%的经济，因此，华人引起其他民族的印尼人嫉恨。

这种说法值得争议，因为，正如我国国民大学印尼问题专家苏密博士指出，控制印尼经济的只有30—40家华人富翁支配的挂牌公司，大部分的华人都是中下层的小商人与专业人士。

在暴徒疯狂地展开他们的暴行之际，过度突出与强调上述说法，其客观效应是强化他们的“良知根据”，造成他们摇身一变为“争取社会经济公正”的“斗士”。

无论如何，即使是“争取社会经济公正”，现代的文明社会也绝不允许暴力行动和针对单一族群展开暴力行动。

不过，令人感到更遗憾的是，在印尼排华暴行在先进的通讯与传播系统中广泛遭揭发与谴责之际，亚洲国家政府与朝野政党并没有站在人道主义和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立场上，采取适当的措施与对策，遏制发生在本区域的“波士尼亚式”或“科索沃式”的民族压迫暴行。

亚洲国家的政府只习惯和不加思索地援引“不干预他国内政”的陈旧国际关系教条。“不干预他国内政”在印尼排华事件或暴行中施用得正确和适当吗？

让我们审察其他地方的案例：

(1) 在1990年初期爆发的波士尼亚回教徒惨遭塞尔维亚法西斯民兵“种族清洗”时，欧洲各国与美国都在联合国旗号下派兵镇压暴行，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目前还在巴尔干半岛上派出武装力量协助联合国追缉塞尔维亚法西斯暴徒的首领，交由国际战犯法庭审讯；

(2) 在1990年初,非洲国家卢安达也发生种族屠杀事件,结果联合国与美国都出兵加以镇压;

(3) 最近,塞尔维亚的科索沃省(Kosovo)发生少数塞尔维亚人歧视和伤害信奉回教的塞尔维亚公民时,欧盟、美国和联合国都介入保护回教徒。

这3个当代的案例显示,“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的,而“不干预他国内政”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

上述3个案例反映出,人道主义与人权是大过国家主权的,也就是说,任何地方发生违反人道和人权的事件,其他国家与民众都有道义上的责任进行“人道的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或甚至“武装的人道干预”(Armed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以保护弱小和受压迫的人们。

事实上,“国家主权”的理论起源于1648年欧洲诸国在“30年战争”后缔结的《威斯伐尼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其中的重点是国家所垄断的武装力量如警察与军队等是一个国家内公民的保护者,而国家主权就是建立在这么一条契约上。

如果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能或不愿保护其公民的财产、性命与尊严,这一国家也就等于放弃了其主权。

换句话说,国家主权之论说是建立在国家维持秩序与安全及确保人道与人权获得保障的大前提上。

又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胜利的盟国,即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的纽伦堡设立国际战争罪犯法庭,公审德国纳粹党人,被证实涉及策划和展开屠杀犹太人的将领、兵士和政治决策人都被处决,获得应有的下场。

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指责盟国“干预德国的内政”,因为德国纳粹党人很多时候是根据当时的德国法律在德国的土地上行事。

这又再一次证明,世界各国各地的政府与人民,不分种族、宗教、文化与信仰都可以,也必须在人道主义和人权的立场上,干预不人道的事件。

事实上,在现代的防止家庭暴力法律中,所有人都获法律授权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就是说,某人打老婆、邻居介入或向警方告发,某人没有权利声称打老婆是他“家里的内政”,“不容邻居干预”。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也应向现代家庭暴力法律的方向发展。

当然,在干预例如印尼排华的事件中,政治的敏感性是必须受到考量,以免产生反作用。

在波士尼亚、卢安达和科索沃的案例中，种族敏感度当然不高，因为干预者都不是当地的纷争参与者，也与受压迫的社群没有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因此，土耳其干预波士尼亚受到提醒不可单方进行）。

在印尼排华事件中，亚洲各国及我们的盟国应该建立共识，并且设立应对的多边机制或Multilateral Mechanism，或向印尼政府施压，或通过各国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化解，阻止排华事件重演。

同样的，这个以人道主义和人权为共识的多边机制也应在有必要时过问东帝汶等类似的事件。

亚洲若要取得政治的进步，建设有文明与人道的社会，首先必须检讨“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教条，其次是设立多边的机制，互相监督与干预，防止不人道事件的爆发或重演。

（原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年7月5日）

她们被毁去自尊

《星洲日报》社 评

关于美国社会的自由程度，似乎不必引经据典详加说明。据说美国监狱里的囚犯比许多铁幕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人权和自由，这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也并非完全无稽。可是像美国这么讲究人权的国家，它的大部份监狱仍然保留着一种不大人道的“入狱仪式”。那就是每个囚犯在正式进入牢狱之前，都必须先通过的肛道检查。

就像在好莱坞或香港电影里所看到的，囚犯会被要求脱掉所有衣物，赤裸裸地站在负责检查工作的一个或更多人面前。接下来工作人员会戴上塑胶手套，再命令囚犯伏身……

这种“入狱仪式”的进行，主要是为了确保犯人没有私藏毒品或其他违禁物。与此同时，它也被视为一种合法而变相的“性侵犯”（虽然没有发生任何性行为），目的是要挫败犯人的尊严，让他们因为感觉羞耻而气馁。自卑、沮丧，变得更容易驯服。

有些狱卒甚至相信，犯人之间的强奸行为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所以有人认为狱方基于整体“利益”的考量，一直在默许狱中的“强者”向“弱者”施暴，借助这种集体的暴力行为来镇压大部份犯人，并把它当成狱方与强势囚犯之间一种不露言说的“交易”或协定，以减轻警囚双方的磨擦。

当这一幅监狱的图像被扩大和延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暴乱的国家。如果印尼华裔妇女被强暴的事件真的是一项计划性的阴谋，那么今天的印尼与上面所述的美国监狱又有何分别？那超过上千名被强奸的华裔妇女，不正是监狱镇压政策之下的牺牲品吗？

尽管军事科技日益发达，各种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惊人，可是至今仍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比“性”更能毁去一个人的自尊。当“性”成为暴力，它所加诸于人的不仅是皮肉的痛楚，还有心灵和精神的挫伤。“性”的暴虐总是随着战争和动乱而来，正因为所有军事家都知道唯有“羞耻”能真正让敌人一溃不振，而强奸正是令对方感觉强烈羞耻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印尼华裔妇女被强暴的事件不是单纯的女性或妇权的问题，除了人权组织以外，不应该只有妇女团体站出来为这些监狱镇压政策的受害者喊冤。如果今日的印尼正是美国监狱的放大图，那么被践踏了自尊的不仅是被强奸者本人，更多的是受害者的家人。

印尼的华裔虽然大多已被当地社会同化，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把那一批惨遭强暴的妇女当成“别人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来看待。因为她们之所以成为暴徒的目标，主要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她们是华人。如果暴徒在行凶之时存有此心，则被强暴的并不是一千个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女人，而是一个民族。

失去的贞操已经拿不回来，可是尊严和公道，总是要还的。

（注：本文原题为《强暴一个民族》）

（原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年7月20日）

挂羊头卖狗肉的“融合”

朴 萍

印尼哈比比总统视察雅加达被烧毁洗劫一空、如同废墟的唐人街，发表反对种族歧视的言论。这是印尼自1965年以来最高决策者首次对华族的公开表态。

但是，不能过分乐观。首先，这未必代表印尼政府。因为“内阁”中有不少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从未放弃其仇视华裔的观念和思想。其次，言论必须形成政策、条例，目前仍远远没有任何迹象，并没有在内阁中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然更谈不上达致共识。因此，不免又成为空炮。

1998年6月15日，《印度尼西亚日报》刊载了印尼融合党中央理事会的声明，表面上是支持哈比比和司法部长反对种族歧视的申明，认为应实施“反对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立即颁布”有关“条例规定”，呼吁“不在华裔印尼籍居民证上写上某种记号”，但接着提出了一系列打着反对排华旗号，实则是更为排华的荒谬建议和方法，居心恶毒。从中，我们可以看到30年来印尼的不断排华决非偶然，因为从上到下缺乏有识之士对华族的贡献和作用做出正确评估，而对“同化”做了歪曲和另解。融合党的声明附有呼吁：

一是呼吁华裔不能过着“排他主义而引起大众妒嫉之生活”。这种说法，实在颇为古怪。如果说反对奢侈豪华生活，以免脱离大众尚说得通，说“排他”纯粹污蔑。华裔只被人所排，岂有可能“排他”？印尼政府长期以来不进行国民教育，不认真执行建国五原则之一——人道主义，却将事端归咎于华裔生活是“引起大众妒嫉”之根源！这岂不是说华裔活该被抢被烧吗？因为你们太富有——事实是：华裔富者极少，大多数人胼手胝足，仅够温饱而已。

二是“反对建立华人式住宅区及不反映融合的商店场区之出现”。这个荒谬言论，居心叵测。一方面是为反华暴乱开脱责任，归咎于华人式住宅区的存在，另一方面为新的排华提供更为“合法”的理论根据。众所周知，唐人区、华人式住宅区的存在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除非用法令去铲除，否则它还会存在；至于“不反映融合的商店场区”也是莫名其妙的提法，除非不允许华裔

从商，这类商场就可以存在。融合党大约嫌5月暴乱烧得还不够，向印尼政府献策：干脆将华人区和华族开的商场全部收为国有或者辗平。这也是为5月暴乱制造合理借口。

最为离谱的是最后一条：“希望外国籍民在各公众场所不讲华语。”这统一语言的呼吁，与其说要求同化，毋宁说是蛮不讲理，将种族歧视推向更深一步。他们凭借的究竟是哪条王家的法律？所谓“融合”，最根本的基础就是互相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和文字。“在公众场所”如果“讲华语”，按照印尼融合党的逻辑就是“不融合”了，因而难免触发排华事件。这种奇谈怪论在东南亚国家中可谓闻所未闻。印尼的反华暴行如此严重，和一些党的领袖本身是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不无关系。需知讲华语、写中文只是华族联络感情、发表意见和从商的需要，也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印尼融合党打着支持哈比比的旗号，敦促国会和政府实施反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并颁布“配合”公约的“条例”，但从上述具体建议证实：此党的真正目的是进一步仇视华族，进一步限制他们，使他们处境更加困难。

我们不能不警惕这类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7月号)

忽然想到

夏之秋

当印尼发生暴乱，华人遭殃的消息传来，这本来是意料中的事，但是这次的严重性却令人发指，达到了法西斯暴行的程度，而且是有密谋和策划的，更令华人感到恐怖，难道华人真的会变成二战的希特勒魔爪下的犹太人么？由此，我忽然想到，有必要查找其原因，探究其历史渊源。华人遭殃，小的不计其数，大的连这次已是第四次了，它是偶然的吗？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如果不挖出根源，以后仍然会有人如法炮制，只有深挖其根源，才会使世人大彻大悟。

为此我回顾和查找历史记载，想起幼时在小学课本中讲到日本侵略史时，有一个“田中奏折”，是上书给天皇的，谈到了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大陆政策是侵占中国，海洋政策就是侵占东南亚（包括南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于是侵华之后，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南下，侵占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

1940年我住在雅加达（当时称巴达维亚）南郊红牌（Paal Merah）镇，因为在城里上学，经常在外边吃午饭，多数是在Pasar（巴刹）或Warung Kopi（咖啡店）买饭吃，那里吃饭最便宜，印尼人也最多，而且都是平民，经常听到他们私下议论，说Bapak mau datang（父亲要来了），还在背后骂华人China seperti bangsat（华人如同臭虫），还说China bangsat喝他们的血，赚他们的钱，替荷兰人卖命，是荷兰走狗等等，并说China来印尼时只有一条短裤，一根裤带而已，现在发财是剥削印尼人的，等等，这些谣言不胫而走，印尼人中到处传播。我当时12岁，已能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而且回到家中对父母和长辈们说了，大人们都将信将疑，感到困惑，大家通过分析，判断这个所谓Bapak，指的就是日本人，而开口China，闭口China，这种叫法，是和日本叫“支那”同出一辙。后来发生的事实证实了。

Bapak告诉印尼人说，华人的财产是属于你们的，bapak是来解救你们的，要把英、美、荷统统“击灭”，与此同时，关于rampok的宣传也多了起来，说

bapak 一来，大家都会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因此印尼人天天盼 bapak 早日到来。这就说明，bapak 的活动很隐蔽，也很猖狂，居然毫无阻拦地迅速传播开来，连当时同学的许多小学生也常听到这类话，当我们告诉大人时，他们没当一回事。后来证明，bapak 果然就是日本人，散布谣言的就是日本间谍，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派到了印尼四出活动。

为什么日本人要挑唆印尼人抢劫华人？道理很清楚：（一）日本和中国敌对，中国抗日，当然恨中国人；（二）日本人怕南进时，中国人会和当地人民联合抗日，必须先把中国人孤立起来；（三）制造印中民族矛盾，便于日军占领印尼后，能在日本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控制局势。这种挑拨离间，一箭三雕的恶毒阴谋，也只有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家才做得出来。日本人为什么没有在菲、马、新挑动 rampok，而是在印尼挑动 rampok 呢？这很耐人寻味，确实值得研究！日本间谍机关在印尼是做了长期调查研究的，充分摸清了印尼人的心态，容易煽动、蒙蔽和挑拨，而菲、马、新则不然，与华人并肩抗日。

珍珠港偷袭后，1942年初，日军占了菲、马、新，向印尼进攻，荷印政府投降，大概3月初一天，日军声称要在 Merak（孔雀港）登陆，荷印总督打着白旗去迎接日军，路上遭印尼民众嘲笑和唾骂，还有扔石子的，总督从上午等到天黑，不见日军来，便回城了，Paal Merak 是从 Merak 过来必经之路，印尼人都在路旁观望。夜里，人们都不敢睡，都在那里谈论局势，大约凌晨2时左右，街上有印尼人喊：Bapak datang！（父亲来了）许多印尼人跑到路上等候，他们对 Bapak 似乎有一种很难形容的心情，都想要看一看 bapak 什么样。大约三、四点的样子，印尼人已稀稀拉拉，这时日军先头部队出现了，骑着日本的矮自行车，从 Paal Merah 穿过，有人在喊 bapak，也有人在喊 Bangsai（万岁），自行车队过去，数了数只有200多名日军。大家正准备回去睡觉，忽然喊声大震，本来是灯火管制的红牌小镇，突然火马满街，印尼人奉 bapak 之命，明火执杖地开始出来 rampok 了。喊声、哭声、求救声震天响，我父母带着我，说：“快跑！”幸亏为了防空，细软和钱平日全带在身上，所以不用回家，拔腿就跑，乱烘烘中我与父母跑散了，于是我跟侨商叶汉杰先生逃到谷由兰（Kebayuran）途中历经惊险和艰难，3天后听说外界平静下来，才返回红牌，见面后如同隔世。后来听说各地都有抢劫。日本在印尼统治3年来，1945年8月投降，这时联军尚未登陆，出现无政府状态，bapak 埋下的毒根又长出了毒瘤，有谣言说，上一次 rampok，只抢钱财太傻了，这次只要杀了华人，财产都是你

们的。bapak 贼心不死，投降了还在挑唆。这次大人们对于谣言不再当耳边风，过去的教训使大家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和自卫团。这时我 16 岁，参加了自卫团，团里请了一位山东武术教练，姓向，我们都是徒弟，向师傅教我们中国武术，有的学得非常出色。由于歹徒放空气要“血洗”，华人约定信号，老弱妇幼都集中到学校，自卫团巡逻守夜，一位留日医学博士李志奋，当过日军翻译，从军部弄来一些枪支，正因为华人有了准备，歹徒虽然叫得很凶，却不敢动，只是在附近抢劫，因华人已躲到红牌，人身未受伤害。但是，这次抢劫范围仍然很广，蔓延全印尼，这是第二次 rampok，比第一次变本加厉，不少华人被杀。非常遗憾的是，有关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的间谍活动和反华排华宣传活动的资料几乎是“零”，连有关著作也找不到，日本人煽动东南亚各国人民和华人为敌，破坏中国人和各国人民长期建立起的友好关系，把矛头指向华人，妄图置华人于死地，难道日本的阴谋和险恶用心没有人看出，日本间谍真是神通广大，隐蔽得很？！Bapak 真有这么神秘？希望能把鲜为人知的内幕挖掘出来，澄清已到时间，不能让糊涂帐保存下去，让那些排华反华者的法西斯面孔公开亮相吧！

1998 年 6 月 28 日

（原载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华侨华人资料》第 73 期）

向印尼华裔进言

星 洲

对印尼华裔（下称印华）的悲惨遭遇，星洲日报作出了一系列的大篇幅的报导，包括好多珍贵图片，使我们得以了解真象。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文明的社会，没有教化、没有良知。

印尼暴民的暴行已逐步地曝光了，印华的确是一而再的面对了抢光、烧光、面对屠杀；尤其是妇女，从10至55岁，受到强暴、凌辱、或奸杀，或被推进火中烧死。看那10岁小女孩的被奸杀，再看那18岁小女孩的“家变”，自己被轮奸，16岁妹妹被奸杀，我们怎不热泪直流？印华仅有的屋子、商店被烧了，破产了，往后怎么办？

印尼暴民的兽行，的确是人神共愤！印华是公民，是土生土长，已失去了民族的根，却还受到如此遭遇，除了应获得合理的赔偿和建立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外，印尼暴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还有，国际舆论应群起声讨，包括设立国际调查庭，将犯下抢、烧、杀、强暴者绳之以法，甚至进行干预行动。当然，一些别有居心者和国际传媒的歪曲、污蔑的指导，也应受谴责和给予强烈反击。

什么是“本土”人？即土生土长也。因此，印华也是“本土”人。“本土”人纯不纯？不纯也。我们看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总是不断的变迁，移来徙去，混合起来又分，分后又合。时至今日，你在哪里生长，哪里就是你的乡土、你的国家了，建立起你的经济基础了。

谁是开发印尼大功臣？

说到开发印尼，华人应居大功。是华人，从汉、唐开始，尤其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时代，把农艺科技引进印尼，使印尼的农业不断地跃进，建立起文明社会来。因此，印华已是印尼民族的一分子。既是兄弟民族，印华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受尊重和发扬，大家应称兄道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本文要谈的是民族问题，因此，用印华和“本土”人类作区分。谈完了，

大家又归为“一家人”。我们要强调的是，要是当哥哥（多数民族）的不行，做弟弟（少数民族）也可以取而代之，掌管国家大事。

作为一个民族，印华的民族尊严的确是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作为一个民族，印华有绝对的生存权利。要是执政当局无法保障印华少数民族的生存权利，则印华少数民族有绝对的权利来保护自己，包括拥有某些“自主权”，甚至是“自治权”，以确保不一再的受到侵犯，这是联合国人权宣言所给予保障的。我们要告诉“本土”人和执政当局，欺侮弱小或少数民族是懦夫的行为！

不能以暴易暴

西爪哇军区首长说，为了自卫，印华可以打死暴民而无罪。这是很不负责任且危险的言论。印华一旦打死了暴民，后果将如何？印华能用枪炮来对付数千甚至数万暴民么？要印华以暴易暴，是要陷印华于绝境。这名军区首长的的心态令我们对印华的安危担心不已！

当我们说印华要某些“自由权”、“自治权”，不是要闹“独立”，而是要获得各方认同，给予印华保障。在过渡阶段，让属于少数民族的印华有一定的法定权利来保卫自己，来处理本身族群问题，再扩而大之，与“本土”人沟通、建立起兄弟民族的融洽关系，这完全是可以办得到的。

印华如何自救？

印华要自救，先决条件是要鼓起勇气，站起来、振作起来、行动起来，走向社会、走向国际；开口吧！学讲话吧！强烈的发出民族的心声吧！

欣闻印华组织政党了！果然是化悲愤为行动了。他们发出怒吼：“够了！不要再迫害我们了！”

印华要走怎样的路，应根据印尼的社会现实而拟定出决策，外人是帮不了大忙的。但身为马来西亚华裔，源自同一条根，且是邻居，我们较为关注印华的命运是很自然的事。因此，我们要向印华提供一些意见，以作参考，主要点如下：

（一）设立政治论坛

在初期阶段，先把政党当为政治论坛，让整体印华社会参与研讨，把各不同观点收集起来，然后加以整理、分析、总结，最后定出战略目标及在战术上贯彻、执行之。

（二）不对抗、不树敌、不勾结

这个政党是维护族群的利益，因此，必须避免引入思想意识的斗争，造成族群内部的分裂，也应避开与任何政党挂勾或对立，以免两面不讨好、两头不到岸。你亲“A”党，“B”党上台了你怎办？这个政党的原则是在本族群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声援，以证明与印尼独立建国五原则没有矛盾。

（三）设立历史资料研究中心

印华必须全面的、深入的收集历史资料，然后写出来，编纂成书，让“本土”人看清楚，是印华的远祖把农业科技引进出现了一个个的大小乡镇。说到近代史，印华也积极参与独立运动，赶走荷兰殖民地主义者，曾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包括“红河事件”，被屠杀者一万多人，使整条河都变成了红色。

在独立初期，印华积极的参与建国工作，打下了经济基础，稳定了社会秩序。

要告诉“本土”人，1965年的“政变”是与印华无关的，当时的纳苏顿、苏合多军人以对印华的屠杀、驱逐、迫害、文化消灭是极错误的。因此，要翻案，应获得平反，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包括建立纪念碑。

要告诉“本土”人，对印尼的近代经济建设，印华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对印尼所出现的“泡沫经济”，是与印华无关的，因为印华没有实权，不但没有决策权，甚至连参与权也没有；是印尼“本土”人所出“官僚买办阶级”推行了“官僚买办经济”所造成的。所谓“官僚买办阶级”就是由裙带、朋党关系组成；所谓“官僚买办经济”就是由裙带、朋党关系把国家经济瓜分了。因此，“官僚买办经济”是极富掠夺性、破坏性的，特点是政经挂钩、官商勾结，出现了官倒、贪污、滥权、腐败。在印尼，还出现了军区、军阀“地头蛇”，各自独霸一方，拥权自重，敛财自肥。

要告诉“本土”人，印华被隔绝于主流外，是极端错误的。他们又没有土地，为了生存，只好做些小买卖。他们经过了几代的、数十年的艰苦奋斗，省吃俭用，也只达到小本经营、小康之家，绝不是大富大贵。他们整个社区加起来的财富可能比不上一间外国工厂。他们做生意，绝大部分是服务性的，从中获取蝇头小利。所谓剥削、控制印尼经济是骗人的鬼话。

（四）突出法治、人权、民生课题

告诉“本土”人，他们要民主、人权，要民生，印华也一样需要。印华更需要法治，以保障生命、财产和民族尊严。穷，印华已挨过了，可以再挨，印

华所要的是最基本的尊严和生存条件，这是不容任何人所可加以剥夺的。

（五）突出多元民族性

告诉“本土”人，印尼是一个多岛国，由130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因此，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特征的国家。各民族应和平共处、相互扶持，以建立起一个丰富灿烂的多元文化、多元特征的国家。

没有支流的河大不起来，这条河的水不流动，是一条没有生气的死河。无数的溪流、支流汇集成一条河，这条河就大了，流动的水就波澜壮阔了。同样的，无数的民族融汇起来，就形成一个“大印尼民族”了，再让各自的文化“流动”，印尼文化还不波澜壮阔么？要达致这一目标，没有民族平等不行，因此，必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各民族好比是亲兄弟，家和万事兴。说到治理国家，不应分彼此，做哥哥的不行，让弟弟来治理有何不可？

（六）塑造出多元种族政治

告诉“本土”人，印华成立政党，不是在搞种族主义，分裂各族人民，或在搞“敏感术”，自我孤立。恰恰相反，印华成立政党，是要发出声音，要唤醒“本土”人认清印尼是一个多岛组成的多元民族的国家，是各民族所共有，包括少数民族，也当然包括印华，这就是社会现实，是不随着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因此，“本土”人必须容纳少数民族，包括印华，使他们融入于社会主流，参与建设国家。

印华成立政党，不会威胁侵犯任何人，只是要发出声音，制造舆论，以促成多元种族政治的出现。因此，印华所成立的政党，是欢迎有共识的“本土”人的积极参与。同时，也期望其他政党也能接纳印华的参与。

（七）强调科教救国

印尼还是一个半封建、半封闭的国家，民智未开。说到资本主义，印尼只是刚踏入门楣，还在摸索。一个资本主义初期的国家的特征是出现强人政治、独裁政权，出现官僚买办经济、政治、阶级。

要告诉“本土”人，这样的社会制度是难以面对新兴的帝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因此，印尼要自救，必须放弃最古老、落后、反动的、没有人性的种族主义，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加速经改和政改，加强科教救国，开发民智。

什么是科教？科者科学、科技也；教者教育、教化也。这两者必须平衡发展，不能失调。没有教化的科技，社会是要出问题的；没有科技的教化，国家、

民族是要落后的。

印尼要推动科教工作，印华可以作出积极的贡献。说到办教育，华人是“能”者，印尼当局应放手让印华去干，肯定会在短时间内学校到处林立，弦歌之声响彻全国各个角落、大小岛屿。说到经商、搞工业，印华也是“能”者，因此，印尼当局也应放手让印华去干，可发挥其与国际上的关系，把科技引进来，免受外国垄断集团的操纵、控制，使印尼加速出现商业化、工业化社会，一个有教化的社会。

（八）民族危机的隐忧

在现阶段，印尼社会还是种族主义的温床。印华既是少数民族，是不会也不可能主动挑起种族情绪的。但印华要注意言行，如喜制造假象、展示狂妄的“暴发户心态”、突出民族优越感等等；也不要放纵子女，使成二世祖、狂妄之徒；更不要搞“钱威”、搞“金”婚，金光闪闪，引来妒嫉。

要告诉“本土”人，尤其是有关当局，印尼不一劳永逸的消除种族政治，单方面的制造种族暴乱，无法无天，则印尼将没有前途，将永远的处于落后状态，难以与其他国家匹敌；各民族无法携手进入21世纪，走向国际舞台，与人平起平坐。种族主义是印尼民族（包括少数民族）危机的隐忧，大家不可不知、不可不防、不可不早日去除。

（九）发挥人权组织的功用

欣闻印尼有人权组织，印华应协助壮大之，尤其是经济上的支助。除了多和有关当局、政治团体（包括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军区首长）对话以寻求共识外，还要多和文教、宗教等团体对话，促进谅解。要多参与、支助慈善团体，尽量使善举透明化。

印华要善于制造、控制舆论，最好有本身的传媒，包括报馆，甚至是电台、电视台。要发挥人际关系，本身做不到的也可通过第三者，包括国际人权组织、国际传媒、投资者、联合国等以达到目的。

（十）还要走一条崎岖漫长之路

印华要明白，要维护民族权益，不能快速的、没有付出代价的一蹴而就，反而是一场持久的、曲折的、艰苦的，甚至是付出惨重代价的斗争，可以是三、五十年，甚至是百年的历经几代的斗争。我们所走过的路可以作为印华的借鉴，我们的一些前人的风范和事迹可作为印华的圭臬。时至今日，我们还有一段好长的路要走呢！因此，我们富有危机意识，时刻警惕自己。

星洲日报对印尼暴民的暴行和印华所受到的悲惨遭遇的一系列报导就是最好的控诉、最好的舆论声援，我们希望能因此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联合国，声讨印尼暴民的暴行。同时，对印尼当局施加压力，除了对暴民、牵涉的军、警、有关官员施以重刑和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外，还要确保不再发生种族暴乱，欺侮弱小，祸及无辜的事件发生。

要告诉“本土”人，维护民族权益一点也不敏感，绝不会侵犯到他人的权益。

印华要明白，维护民族权益一点也不可怕，无须屈膝求存。

印华所诉求的是民族平等、人权法治、社会公平而已，要有尊严的受尊重的生存下来，这也是各民族所共同追求的，有什么好怕？

东南亚华人应共谋出路

东南亚华人约有2800万人，他们不应去参与由一小撮“活得不耐烦”的人所搞的什么“世界华商大会”，去自我吹捧、极尽炫耀，样样都是“世界之最”，不但“露”之于九地之上，也“飘”之于九天之下，当枪靶子，祸及整个族群。大家应“藏之于九地之下”，商讨如何与“本土”人和平共处，争取合理的民族权益，建设各自的国家；再“动之于九天之上”，向犹太人、白人学习，学“金融资本主义”，学“梭罗兵法”，学“纸弹游戏”。

华人喜“骑着马儿、拿着刀枪、背着弓箭”去谈孙子兵法的“奇正”和三国演义的“权谋术数”，说来说去都是“假象”。犹太人、白人不和你“玩”，只好自己“玩”了。结果是玩完啦！玩“假象”者是会被“Boomerang”的，果然是“反弹”了！

华人要生存，就要学如何经营“经济据点”，更要向犹太人、白人学“金融游击战”、“金融持久战”、“金融歼灭战”，这才真正的是“不战”（没有炮火、人命损失）而屈人之“兵”（金融）啊！

（原载马来西亚《星洲日报》1998年7月22日）

印尼能调整华人政策吗？

乔之音

哈比比5月21日从苏哈托手中接过印尼总统大权时，曾经声称他领导的印尼新政府将“在各方面实行改革”，并在6月23日指示印尼最高评议院就印尼华人问题提出概念性思想方案。看来哈比比已将处理华人问题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

但是，哈比比面对三个严酷的现实：

排华骚乱仍在持续发生

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和印尼国内深层次矛盾激化的交相影响下，当地华人在动荡的政局中成了替罪羊。今年5月13日至15日雅加达发生攻击矛头主要指向华人的骚乱后，9月21日，印尼官方与民间人士组成的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向印尼政府提交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确认5月骚乱期间曾发生强奸案件。此前，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公布的材料已显示骚乱中有1200人丧生、5000多间房屋、商店被抢劫、焚烧。印尼“人道志愿者”组织7月14日发布的报告称：5月13日至7月3日期间，有168名妇女遭到强奸，其中20人死亡。

雅加达骚乱发生后，从印尼总统哈比比到印尼武装部队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多次作出“保护华人安全”的承诺，有些省份的军事长官甚至对抢劫者发出“格杀勿论”的警告，但是，抢劫案件无日不有，排华骚乱有增无减。据印尼警方统计，截至9月26日，全国一共发生23宗排华骚乱。令人担忧的是，排华骚乱狂潮已蔓延到一些相对安定的地区，如西加里曼丹省。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许多大城市如雅加达、梭罗、棉兰5月间发生排华骚乱时，华人占30%的西加里曼丹省比较平静，并因此被视为“安全岛”，住在爪哇岛的一些华人纷纷逃到该岛避难，有人甚至购屋准备定居。但是，好景不长。9月7日至8日，受到饥饿煎熬的印尼人一连两天抢劫西加里曼丹省首府坤甸及附近小镇的华人米铺、粮仓，闹得人心惶惶。

面对持续不断的排华骚乱，哈比比政府毫无办法，饥民、暴民根本不怕军警，印尼社会秩序失控现象非常严重。在这种“国无宁日”的情况下，哈比比

有多少精力来调整华人政策呢?

印尼华人持观望态度

在雅加达发生骚乱期间,华人纷纷投奔怒海,掀起印尼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逃亡潮,11万人逃到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澳大利亚等国避难,迄今绝大多数人视回国为畏途。

华人胡不归?据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印尼治安日益恶化,排华骚乱时有发生,华人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他们认为哈比比控制局势的能力有限,深感印尼不具备长期生存的安定环境,更谈不上回国重建家业;二是哈比比政府在调整华人政策方面能有多大作为,华人缺乏信心,持观望态度。

哈比比在华人问题上的言论自相矛盾,很难取信于华人。哈比比上台第6天(5月26日)视察满目疮痍的雅加达草埔华人商业区时,对华人许下“建立没有种族主义的新印尼”的誓言,接着在6月6日记者招待会上呼吁以穆斯林为主的印尼原住民不要迫害华裔公民。但是到了8月29日,他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却否认雅加达5月骚乱具有排华性质,认为骚乱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分配不公和社会差距太大的不满”。哈比比今天笑脸相迎地说,他与华人“亲如一家”,欢迎滞留国外的华人回国,明天又改口说:“你们不回来,印尼也不会完蛋。印尼企业家会填补你们的空位。”哈比比言论反复无常,华人能会相信他吗?何况哈比比在华人中口碑并不好,认为他有排华倾向。

随着大批华裔商人逃离印尼,印尼不仅失去一笔宝贵的资金,并且失去一批熟练的商业管理人员,这两点对印尼经济的复苏,至关重要。同时,华裔商人长期滞留国外,也使外国资本家裹足不前,不敢去印尼投资。一位美国投资家告诉新加坡政府驻纽约的官员,他正在留意印尼华人是否将他们的钱带回印尼,如果这些华人不这么做,他们将不会到印尼投资。

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穆斯林教师联合会主席瓦希德指出,在当前印尼多重危机中,未能使携带巨资逃亡国外的华裔公民回来,是哈比比的最大败笔之一。

中国的严正立场

中国与印尼1990年8月复交以来,冻结了23年的两国关系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因此,中国对敏感的印尼华人问题一向持谨慎的态度。但是,雅加达发生如此严重的排华骚乱事件,惊动了北京高层,迫使中国不得不站出来讲话,

从外交部发言人到外交部长再三表态,仅中国外长唐家璇在国际会议场合就与印尼外长阿拉塔斯谈了两次,一次在菲律宾马尼拉,另一次在南非德班。中国不凭民族感情用事,而是从政治层面考虑问题,基於人道主义立场讲话。

中国对印尼华人问题的最新一次表态,见诸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9月29日的一次讲话。钱氏在北京欢迎香港、澳门、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的国庆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在印尼的华人,多年来同当地人民一起为印尼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作为印尼公民的地位理应受到尊重,应当享有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人身安全和正当权益理应受到保护。

分析家认为,钱氏的讲话有两点新意:一,单独提印尼华人。这表明中国政府既注意区分印尼华侨与华人的界限,又不致因为绝大多数印尼华人已经加入印尼籍而对华人问题有所顾虑;二,提出印尼华人的公民地位问题。针对印尼华人受到歧视和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的现状,强调华人应当享有与印尼原住民同样的待遇和权利。

在中国政治架构中,钱其琛排在中国领导人之列。因此,他的讲话是有份量的。

尽管中国对印尼华人问题作出强烈反应,但中国还是把印尼视为友好邻邦,珍惜两国来之不易的友好关系,总希望印尼政府善待华人。对受到亚洲金融风暴重创的印尼,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向印尼赠送了价值300万美元的药品和提供2亿美元出口信贷,中国还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印尼的国际援助计划。有分析家认为,这是中国对哈比比政府软硬兼施。

哈比比能否改弦易辙?

在华人政策上,哈比比会做出根本性的调整吗?笔者认为:不可能。

哈比比上台后,对华人讲了不少好话,诸如印尼新政府要平等对待华人,要保障华人的安全,准备立法取消种族歧视,甚至自称是“华人的盟友”等等,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包括:取消华人身份证上的特别标记;新闻部长提倡对印尼华人的称谓由带有侮辱性的“CINA”(支那)恢复原来使用的“TIONGHOA”(中华);教育部长指示国立大学招收华人子女的限额由10%提高到15%;任命印尼富商李文正之子李白担任印尼驻澳大利亚特使;授予为发展国营企业和恢复印尼和中国邦交立功的华裔人士唐裕勋章。

这表明哈比比为了争取华人人心、顺应华人的要求,作了一些努力。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苏哈托政权遗留下来的华人政策。

苏哈托统治印尼32年期间,对华人实行种族压制和强迫同化的政策,华人的基本公民权利被剥夺殆尽。在政治上,禁止华人组建社团,除了个别人外,华人不能当公务员,更不能参军,完全把华人排斥在政治圈之外,使印尼华人成为政治上无权的弱势族群;在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封闭华文学校和华人报馆,禁止使用中文,连商店招牌也不准出现汉字,勒令加入印尼籍的华人改用印尼文姓名,禁止华人在公共场所举行中国民俗节日和中国宗教活动。

正如一位印尼华裔人士拉哈夷·拉那宁希赫(Rahayu Ratnaningsih)不久前在《雅加达邮报》撰文指出的,印尼政府歧视华人的政策,“在苏加诺当政时已露出了狰狞面目(指苏加诺1959年颁布“总统十号法令”,禁止外侨在县以下地区经营零售业,将大批华侨扫地出门——编者注),并在苏哈托在任的整个时期,更为变本加厉以及加以制度化”。作者认为,“这跟前南非政权所采用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异曲同工的。因此,印尼的种族主义是有系统的”。

对华人的种族歧视,在印尼官僚体制中根深蒂固。印尼士著社会对华人的偏见也很深。印尼权威学者尤努斯·耶哈耶(Junus Jahja)硕士指出,“在当地人民的眼中,他们(指华人)仍被认为和感觉为外国人”。即使哈比比总统本人对华人也抱有成见。他7月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一方面承认华人在雅加达5月骚乱中成了受攻击的目标,另一方面却说,“那些与印尼社会融为一体和肯协助别人的华人却不会遭殃”。言外之意,受攻击的华人咎由自取。这完全是奇谈怪论。

已有印尼公正人士指名道姓点出哈比比政府中有5位部长具有排华情绪。

如果善良的人们指望哈比比政府纠正苏哈托遗留下来的华人政策,那未免太天真了!

目前哈比比政府面临堆积如山的难题,诸如收拾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应付东帝汶、亚齐、伊里安查雅的分离主义运动,还有反政府示威连绵不断。更令哈比比伤脑筋的是,印尼粮荒非常严重,老百姓挣扎在饥饿线上。全国27个省中,有25个省缺粮,在爪哇岛有60%的家庭日进一餐。饥民铤而走险四处抢劫,抢米铺,抢粮仓,抢养虾池,抢咖啡园,抢洋葱地。相比起来,华人问题还是没有对哈比比的总统宝座构成致命的威胁。哈比比偶而提起华人问题,用意在于安抚惊魂未定的华人,只是一种策略罢了。

然而,华人问题毕竟是印尼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终究要公平合理地解决。

(原载《华声月报》1998年11月号)

印尼与印尼华人的噩梦

《大公报》社 评

推翻了被指为独裁的苏哈托后的印尼本该走上自由、民主繁荣之路。但从两个多月的情况看来，这还是相当遥远的事，对数百年来为印尼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当地华人来说，这更是一场新噩梦的开始。

5月下旬苏哈托下台前的一段日子，印尼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状态，暴民到处行凶，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目标明白地指向少数族裔的华人。这种过去只有在外国侵略的战乱中才会出现的大规模狂乱，竟会在“和平”（印尼并没有打仗）的社会中出现，是现代文明的巨大讽刺，是人类社会快要告别20世纪、步进新的千年之际留下的巨大耻辱。

令人更加震惊的是，这种兽性的暴行并没有随着新政府的出现而消失，反而蔓延起来。一段时间以来，印尼华人、印尼人权组织、妇女组织、国际各种关注组织通过各种媒体发出的信息，综合出一个令人不忍卒睹、不忍与闻的图景。强暴华人妇女的画面上了国际互联网，录影带在印尼公开发售。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炎黄子孙而有此愤慨，且因为身为灵长类中最有智慧动物的一员而感到羞愧。

虽然印尼领导人承认这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答应追查犯罪分子，但从印尼政府现时推行的政策看来，印尼华人所受到的迫害不仅是来自社会下层的无知愚民而已。

印尼总统哈比比最近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访问时明白承认，不满华人在当地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现状，他且不避煽动之嫌，把华人同荷兰人在印尼的350年殖民统治混为一谈。当记者问他如何保护华人的权益时，他却强调事件是社会差距所形成，又暗示华人应破财挡灾，自求多福。他现在正要以所谓反垄断法来对华人实行经济压制。政府内部还有人提出更极端的政策，有接近政府的经济专家甚至提出把华人资产收归国有。

哈比比上台之时，就有舆论提出要注意他过去对华人出言不逊的纪录，这

证明不是杞人之忧。苏哈托的统治有各种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他提倡的民族和谐是印尼经济在他统治下得以起飞的重要基础之一。自称把苏哈托当作父亲的哈比比，似乎把这忘记了。

印尼动乱至今，估计已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逃离这个千岛之国，其中有相当部分属于印尼华人。不但资金溜走，人也源源不绝地逃出去。华人在当地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是不待说的，从最大的跨国企业到每个小城镇的零售店铺，华人都是支柱。华人也构成专业人士、知识界中的主要成分，华人人才外流已影响到印尼一些行业的运作。当前世界各地都在强调发知识经济，它的主要构成，一是资金，二是人才。从这角度看，印尼暴乱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可能不只是几年发展时间的延误而已。

（原载香港《大公报》1998年8月5日）

印尼想建成一个什么样国家？

魏知

几年前，印尼一位有影响力的高级智囊学者曾对笔者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印尼其实还处于建国过程中，因此对种族问题很敏感。希望中国能对华人问题采取谨慎政策”。他是出于好意作出这样的提醒的。但这次在雅加达等地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排华事件，却在笔者脑海中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印尼究竟要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有组织的排华是不是官方政策的产物？

印尼的排华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印尼建国之初，就曾在印尼各岛发生大规模排华暴力活动。那时，参加独立运动的一些派别为了抵御荷兰的卷土重来，实行所谓“焦土抗战”，不少华人集居的城镇一夜之间烧个精光。一些暴徒假借独立战争之名，对华人肆意抢掠和强奸妇女。在此后的屠杀印尼共产党人的“茉莉芬事件”和“9·30”事件中，不少华人也被殃及。但上述排华暴行大多发生在外岛和首都以外地区。而这次事件却主要发生在首都雅加达地区，是中央政府眼皮底下的暴行，而且完全是有组织的行动。据受害人和目击者说，带头的竟是军人。而且不但维持治安的军警袖手旁观，连电视台也播出有利排华暴行的言论。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新上任的总统哈比比竟然对美国记者说，如果华人出走，“你认为我们会死吗，印尼华人的位置会由其他人顶上。”虽然事后哈比比为自己的“失言”作了补救，他会见华商代表，表示要颁布反种族歧视法例，保障华人生命财产。但是，这并不能消除人们对印尼政府政策走向的忧虑。因为不经意说出的话，往往代表内心的真实想法。

哈比比的主要智囊班子，是他在1997年初建立的所谓“全球化时代班子”。他就任总统后，其中有些人已出任内阁部长。这个班子的部分成员来自于哈比比于1990年创立的印尼伊斯兰知识分子协会。该协会在宗教上倾向于极端的伊斯兰教组织，而且其中不少成员都有老右翼政党玛斯友美党的家庭背景。玛斯友美党反共反华，60年代初被当时的苏加诺总统解散。“全球化班子”的一位

成员宣称，他们对哈比比提出的政策建议无所不包，从国际问题到政治、经济以及改革问题。从上述背景看，如果这个班子能更多一点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而不是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向哈比比出谋划策，那就是印尼华人的万幸了。

华人往往是印尼各派政治势力争权斗争的牺牲品。因为煽动种族主义情绪，一向是某些政治势力争取群众的一种手段。30多年来，印尼的政治结构是靠苏哈托的个人独裁力量维持平衡的。苏哈托一倒，原有的平衡瓦解了，新的平衡的建立需要一段时间。政党、军队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力量的关系，一定会经历一段调整过程。苏哈托“辞职”之后，国防部长兼三军司令维兰托很快就解除了野心勃勃的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的战略后备军司令的职务。战略后备军装备精良，实力强大，是苏哈托起家的老本，一向由其最亲信的人控制。维兰托任命约翰尼·鲁明丹将军（基督徒）接掌该军司令。

但是，仅18小时之后，就在军内外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烈反对下，被迫收回成命，改由查玛里·昌尼亚戈将军担任此职。这显示了印尼军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各方指证参与绑架反苏哈托的活动分子和有组织掠夺杀害和强奸华人的军人，许多是来自战略后备军，普拉博沃自然是最大的涉嫌组织者。

维兰托已将普拉博沃及其同伙武装部队副总监赫迪解除军职并由军方负责调查绑架及虐待反苏哈托民运分子的一个委员会对他们传召问话。但印尼官方至今尚未明确说明，是否也要对上述两人涉嫌排华暴行进行查证。这使人们对哈比比总统关于要制止再次发生抗华事件的表态，是否会做到言行一致，不能不产生怀疑。

（原载香港《文汇报》1998年8月6日）

金融危机对印尼华人的冲击

黄昆章

最近，笔者到印尼出差兼探亲，逗留了近一个月，目睹了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那些种族主义狂热者、不法之徒趁机嫁祸华人，多番挑起反华暴乱，各阶层华人惶惶不可终日，备受伤害。

严峻的形势

从1997年夏季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席卷了该地区的一些主要国家，在有关国家政府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下，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泰国相继走出了低谷、逐步摆脱危机带来的阴影，并开始渡过难关。

受危机冲击最严重的“重灾区”是印尼。到1998年3月，货币贬值达150%。危机前，3000印尼盾可兑一美元。此后，印尼盾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市值直线下跌。到1998年1月下旬，冲破1.6万盾兑换一美元的大关。随后是居高不下的高通货膨胀。各种食品、日用品价格平均上涨75%左右。750万人食品短缺。政府外汇储备只剩下180亿美元。积欠外债达1400亿美元，而且多为短期贷款。全国失业率98年将达10%，失业员工超过1000万人，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负5%。

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各地爆发了抗议物价飞涨、要求总统下台的政治、社会动乱。有的地方的学生运动还与警察发生冲突。今年3月，苏哈托第七次蝉联总统。新内阁组成后，局势有所缓和，但学生示威仍持续发生，反对派加紧倒阁运动，终于在5月21日迫使苏哈托下台。

造成上述严峻形势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社会上一直存在一股反对现政权势力，企图推翻已连任32年总统的苏哈托。加上总统家族利用权势积敛了大笔财富（约400亿美元），引起人民的极端不满。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日趋严重。政治危机加上经济困难，使局势更为险恶。第二，为帮助解决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印尼政府提出了进行经济改革的50项条件。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将直接冲击总统家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政府迟迟不

与IMF签署协议。IMF原来答应援助的430亿美元也就一直不到位。第三，自然灾害犹如雪上加霜。印尼是厄尔尼诺中心。去年与今年的两次森林大火损失数十亿美元。单是今年的东加里曼丹森林大火在3月份即已使20万公顷的森林被烧毁。此外，各地持续的干旱使粮食减产。西伊里安发生了饥荒。印尼必须进口350万吨大米才能解决吃饭问题。

华人社会受到的影响

这场金融危机使全体印尼人民、包括各阶层华人受到沉重打击和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货币贬值、百物价格飞涨使许多华人家庭无形中增加了生活开支，加重了负担，华人中小商店因担心商品涨价招致原住民不满而早早打烊，以免商品卖得越多亏损越大。出国旅游、探亲的人数剧降。

二、1997年11月初，政府关闭了16间银行。根据规定，几十万储户只能领回2000万盾的存款，余款等清盘后再说。这等于宣布余款将无法偿还。过去，政府号召人民不要存美元而存印尼盾。因为美元利息低，而印尼盾利息则达三成以上。许多人相信了政府。不少人依赖利息维持生计。没想到银行会突然关闭。巨额损失导致一些人自杀，一些人中风，一些人病情加重。棉兰苏多莫教育基金会主席林先生在被关闭的某银行存了4000亿盾。眼看血本无归，正在新加坡治病的林先生病情迅速恶化。笔者在雅加达时，社会上传闻还要再关闭一些银行。不少华人朋友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真不知如何是好。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放在家里担心被抢被偷，继续放在银行又怕它关闭而白白蒙受损失。日子真难熬呀！

三、在此期间，各地不断发生动乱。单是今年一二月间，就有爪哇、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等岛屿的20多个城镇居民示威要求降低物价。一些原住民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无辜的华人，乘机抢掠华人财物。2月8日，佛罗列斯岛的思德赫市有90多间房屋被毁坏。13日，西爪哇有10万居民的帕马努坎市的5000名肇事者摧毁了大部分属于华人的店屋40多间，10辆汽车被焚毁。其他发生动乱城镇的华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损失。暂时没有发生动乱地区的华人不知厄运何时降临，惶惶不可终日。

四、在金融危机袭击下，首当其冲的是65000家房地产业（九成以上为中小企业）。其中不少为华人所经营。笔者亲眼看到原来正在兴建的建筑纷纷下

马，人去楼空，一片萧条。数十万员工失业。依靠进口原料生产的纺织业、面粉业、圆珠笔业、养鸡业、汽车制造业、摩托车制造类等等由于生产成本涨价被迫减产或倒闭。纺织业员工超过200万人，1998年将有30万人被解雇。生产道林纸的纸厂1998年1月已有九成倒闭。由于纸价上扬，华人经营的《罗盘报》等报纸只好减少版面，广告收入剧减。

五、正在外国留学的华裔留学生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而纷纷返国。有些人失学，有些人转到印尼私立大学学习。

六、在1400亿美元的外债中，私人外债超过740亿美元。其中不少债务人为华人企业家。因还债期已到而又必须支付比原来高出几倍的借款。有些人被迫要求推迟还债期或以企业为抵押。印尼有249家私人银行，其中不少为华人所有。不少人依赖贷款经营。由于资不抵债或呆帐太多，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金融改革力度的加大，将有不少银行被关闭或兼并。

七、根据印尼政府的改革计划，将取消进口黄豆、面粉、蒜头等商品的垄断权，取消各种津贴，取消一些商品（如丁香、水泥、胶合板、白糖等）的销售独占权。凡是享有这些特许权的华人企业家将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许多人将手饰、轿车、摩托车等值钱物品拿去抵押，以换取急需的现款，当铺业营业额扶摇直上。

危难之中不忘济贫

尽管印尼华人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冲击，但他们仍不忘发扬团结友爱和扶危济困的精神，捐款捐物帮助更加贫困的穷人，协助政府共渡难关。

在雅加达，有六家华人姓氏宗祠及一些华人企业家在今年3月捐款2亿盾。一些地方的华人社团、企业家捐出粮油等生活必需品，赠送给贫民或以低价销售。万隆华人企业家捐出了210吨大米和70吨白糖。他们还筹集到500吊（一吊合一百万盾）作为基金，举办九大生活必需品的廉价市场活动。在棺榜、泗水等地都有类似的济贫行动。

无庸讳言，这次金融危机对印尼华人社会产生的冲击波是非常巨大的。华人已经并将继续付出高昂的代价，华人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有一批华人企业倒闭，更有一大批将萎缩。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印尼华人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有很强的生活适应能力和应变的能力。回顾五六十年代印尼排斥打击华人经济时期，他们遇到很大

的困难和阻力，但他们顶过来了。历次的排华运动也使华人遭到很大的损失，但他们也顶过来了。我们相信，华人经济有一定的基础，华人企业家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讲信誉，又有较广泛的国际网络，他们一定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经济结构，改进经营策略，把华人经济继续推向前进。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6月号)

不能忘却的5月

庄永康

在深重的经济危机当中，印尼5月间发生暴民骚乱，并演变为排华事件。印尼国内人权组织指出，迹象显示，暴乱和强奸是经过幕后策划的，是有系统、有组织的迫害行为，并且收集证据列出168名华妇被施暴的个案。在国际舆论不断揭露惨状之后，印尼总统哈比比上月间正式表态，谴责强暴行为，称为“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并下令找出真凶主谋，予以严惩。

目前事情并没有了结，因为真相仍未大白，谣言满天飞，印尼的华裔仍纷纷出国走避，没能力出国的华人则在余悸当中，某些地方有人还接获“消灭华人”的传单。另一方面，5月风暴引起了国际反响，美国和亚洲各城市的华人团体举行和平示威，北京发表了正式的谴责声明，台湾企业界呼吁暂停到印尼投资。

对于暴行，新加坡各族人士都有相当强烈的反应，妇女行动与研究协会(AWARE)举办了图片展和签名运动，并将把请愿书呈递给哈比比总统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事实上，印尼的事件也引起国人的警惕，深知种族和谐与社会稳定是得来不易的，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经济储备和国防，也更加值得珍惜。

不过，这样的事件也让我们感到，人口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地位是比较敏感和特殊的，有些人连兔死狐悲的感觉都不敢明言。最近便有位论者致函《海峡时报》，指北京对印尼华裔的遭遇公开表明立场，是个严重的错误，他认为这干预了东南亚内部事务，北京给印尼与本地区华人帮倒忙。

这位论者的意见随即被人反驳。回应者在报上指出，印尼暴徒的所作所为关系人权与人道，国际社会应予以谴责，保持缄默即表示认同。即使以国际现实来说，北京有必要公开表态。同样的，在现实底下，东南亚华人如果自扫门前雪，最后遭殃的也将是自己。

正如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准将所说，印尼华裔妇女的遭遇，引起海外华人强烈反应，是人类感情的自然流露。看来《海峡》上那位论者这么说，不只

显示他不懂国际政治，更显示他对起码的公道人心也无知到极点。如果东南亚华人害怕被视为对中国效忠，而连基本的人类同情心也不能表达，那才是令人心寒的。

人们要发出正义的呼声，并不是要丑化印尼，更不是以暴易暴挑起更大的种族不和。因为大家都知道，印尼要重回正常轨道，重建信心与经济秩序，首先便须摆脱这样的暴力阴影。对印尼华裔的遭遇，东南亚华人感到切肤之痛；对邻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新加坡人自然也感到切肤之痛。如果说，关注人权是干预印尼的内政，责怪出声的人“多事”，那无疑是颠倒黑白，棺材反装了送葬的人！

要是抗议行动有什么令人遗憾的地方，那就是抗议的范围应该由华人与妇女团体扩展出去。客观而论，北京以及海外华人的反应看来如此“激烈”，主要还是因为国际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冷漠。

比如在欧洲，人们就对波斯尼亚的种族清洗和有组织的强暴事件大声谴责，甚至设立国际法庭审讯暴徒。因为波斯尼亚是欧洲“家门”里的不幸，今天仍发生这样的事是文明的讽刺，是欧洲大陆的污点。东南亚是很遥远的。美国人注视的焦点在国内是克林顿总统的绯闻，国外则是大使馆被炸的消息。因而美国华人的声音，也应该被美国政府与联合国听到。

当然，归根究底，印尼的华裔问题毕竟是印尼本身的事务，因为当地华裔已落地生根，成为印尼的公民，效忠的对象是印尼。他们外表上与印尼本土人毫无分别，取印尼名字，说印尼话，大部分都不会说华语了，要不是身分证上注明，根本无从辨认。一到经济恐慌便排华，这是自从荷兰殖民地时代就留下的历史症结。印尼大富大贵的华人其实并不多，能够与当权者勾结的更少。但每到危难时期，便听到印尼华人只有5%，却垄断全国经济70%（有时夸张到90%）的怪论，历届政府对此也似乎不大理会，反而当作是对经济困难“方便”的解说，难免就留下后祸无穷。

显然的，华裔的生存与安全一天受到威胁，便一天都是印尼体内的癌。尽管哈比比曾说，印尼华人跑了也不要紧，经济真空有人填补，但大家都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个经济问题。因为我们要恢复世人的信心，便得告诉全世界，东南亚是个安定、和谐，值得投资的地区。

如果新加坡人希望印尼动荡不安，就不会捐出1200万元的血汗钱，给印尼贫困地区提供人道援助，也不会主动提出许多经济配套，力图挽回人们对印尼

的经济信心。新加坡人自然也期望印尼政府能彻查5月的暴力事件，把涉案的暴徒绳之以法，对受害的家庭做好善后的工作，并确保恶行不再发生。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23日)

为受害的印尼华裔妇女挂起黄丝带

孟 驰

拜信息高速公路之赐,美国华渊新闻网络公司日前在全球发起一个为在5月暴乱中惨遭蹂躏的印尼华裔妇女悬挂黄丝带运动。对此,我们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无动于衷。印尼暴徒玷污蹂躏无辜妇女,和当年日本侵略军的兽行如出一辙,一样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黄丝带运动当然是一种象征,象征着祈盼、关怀、想念、等待等等;也象征着我们对邪恶的鄙视、对残暴的憎恶、对无耻的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将它悬挂在阳光下,还是悬挂在心灵里,都一样弥散着忧郁哀伤的光彩,因为它还是良知与温情的化身。那一缕缕有形与无形的黄丝带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永久的,恒远的。

根据印尼政府机构国家团结发展局本月10日公布的资料,发生在5月中旬的以华人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大暴乱,不仅导致了有政坛不倒翁之称的苏哈托的垮台、1200多人丧命,而且还有168位华裔妇女被强暴,最年长的55岁,最小的年仅9岁。其中20位华裔妇女在强暴后或被殴打致死或被投进火海,化为灰烬。死者包括那名单纯的9岁的小女孩,由于她的阴部被歹徒切除,死于医院里。而印尼“被强暴妇女救助中心”、“妇女联系资讯中心”等团体则表示,由于政府推诿、犯罪团体恐吓以及受害者难以启齿等因素,被强暴的华人妇女的确切数字根本无法把握。也有人权组织估计,正确的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在短短几日之内,即有至少数百位无辜的、无助的华人妇女被凌辱,这是骇人听闻。试想,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朗朗岁月,正当理性在代替狂热,合作在代替对抗,世界文明在一个新的制高点重新聚集,就连印尼本身也在经受物质的剧烈蜕变和民主的冶炼,在这时刻,却有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发生。

如此大规模的以强暴方式达到驱离一个种族的目的,不只是人类的耻辱,也是对人类道德情感和公理正义的公然挑战。如果仅仅认为那是暴乱中的“偶然事件”,是一小部分愚昧无知、丧尽天良之徒的无恶不作行为是错误的,许多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基于民族仇视,有组织、有预谋的罪恶活动。

证据一:受害妇女90%以上是华裔,而华裔在印尼是少数民族,只占印尼总人数的3.5%;证据二:歹徒通常都是搭乘卡车结伙而来,以小组为编制,每

组四至七人，其行为特征与国家全部队成员类似；证据三：到达目的地后兵分两路，一部分人洗劫商店，一部分人攻击妇女，并且强迫受害人家属在一旁观看，案例大同小异；证据四：目标明确。一般来说，歹徒对受害人的家庭、身世都有所了解；得手以后，不忘抢走受害者的身分证、户口证。

他们公开提出的口号是，宁愿叫印尼倒退20年，也要把华人赶走。也有消息说，许多歹徒都曾在军事单位接受过训练，以执行纵火抢劫和强奸华人妇女的任务；他们每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可以得到2万盾（约2.5美元）作为报酬。

最近的一例发生数日以前，一位华裔女大学生惨遭三名男子轮奸。之后，还用铁器攻击其下体，致使该女大学生伤势严重，生命垂危。而在这宗暴行发生的前一天，印尼国防部长维兰托在回应舆论批评时还宣称，至今没有受害者向当局投诉。言下之意是并无其事。

当一连串华裔妇女被强暴事件被媒体披露以后，几乎引起举世共愤。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乃至美洲华人都纷纷通过不同方式表示愤慨。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印尼新任总统哈比比时过两个月之后才在国际社会谴责声中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之下，同意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有关暴乱和强奸事件。哈比比虽然承认那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然而却拒绝道歉。北京也打破沉默，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表示“关注”和“同情”。

“关注”与“同情”毕竟也是一种姿态，尽管这种姿态出现得不够及时，还是令我们感到欣慰。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一、在东南亚国家中，印尼并非华人最多的国家，然而华人的处境最恶劣，究竟是因为什么？二、在印尼历次政治斗争中，华人都是替罪的羔羊，国际社会尤其是海峡两岸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三、印尼华人循规蹈矩，对印尼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何以得不到社会全体的认同？

对上述几个问题的追寻，也是对民族尊严与历史责任的追寻。我们除了应对印尼华裔妇女的不幸负起道义、亲情的责任外，更应振臂一呼，代表受害者向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提出控诉，更应敦促雅加达政府深刻反省、彻查歹徒及其幕后策划者。印尼华人当然也要自我总结，汲取教训、团结互助、自强奋争，寻找自己的社会立足点和历史定位，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改善自身命运。但愿黄丝带运动能唤起国际社会对印尼华人处境的再认识和人类的亲情。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7月22日）

愿天聆听妇女祈祷

何文欣

雨天总叫人留在家里，不想外出。不过，上周四的雨夜，几百名妇女却不顾风雨地前往雅加达南部库宁岸的妇女大厦，为结束印尼多年来的暴力祷告。

这个名为“妇女的祷告”的祷告大会，是“妇女的决议”运动的一部分，也是当地妇女组织安排的第二个大型活动。

祷告大会把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聚集在一起，她们包括回教徒、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兴都教徒、佛教徒及印度教徒、巴哈派教徒和爪哇民间神话信仰者。

大家暂时都抛开了信仰上的不同点，特别为在印尼5月大暴动中，受害的同胞们祈祷。

其中，更有不少印尼华裔妇女。

名为安妮塔（假名）的印尼华裔在男友的陪同下，前往参与祷告会。她说，近来一连串针对印尼华裔妇女而发生的强奸案，仍让她心有余悸。

安妮塔说：“那些强奸案让我觉得很 unsafe，就算是在办公室内。我似乎感到自己与别人不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虽然她本身并没有遭人强暴，她却亲眼目睹了许多恐怖得令她难忘的事情。

她说：“我的一个朋友在她的家附近，当众被人脱光衣物。”

安妮塔的友人并没被强奸，不过，这个事件却让她饱受惊吓，更在她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安妮塔说：“我十分希望政府能采取一些行动。至少把那些强奸犯都捉起来，好让我们不必那么恐惧。”

对于这些强奸案，不仅仅是印尼华裔妇女感到愤怒，就连其他妇女也一样感到气愤非常。

一名与邻居结伴，从雅加达东部远道而来的家庭主妇库斯米娅蒂说：“我感到很恼怒，这简直太没人性了。”

她接着说：“我是名妇女，也是个母亲，我能深切感受到受害者的经历。不

论一个女人是否是印尼华裔，那些强奸犯都没有权利强暴她们。我在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些强奸犯的母亲、姐妹、太太和女儿身上，他们又会有什么感受呢？”

上周四的祷告大会不仅吸引了许多妇女，还引来了几名男士。他们有些是单身而来，有些则陪同心爱的人出席祷告会。

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专栏作家达哈那，特地陪同妻子前去祈祷。他说：“那些强奸案实在叫人觉得难堪。它让我觉得，身为印尼人是件羞耻的事。”

他补充道：“我非常同情那些受害者。政府应该极力找出真凶。”

妇女事务部长阿拉维娅并没有出席这个祷告大会。不过，席中却有不少名人及公众人物，包括了担任司仪的著名模特儿拉蒂赫及印尼歌手奥普皮。

祷告大会开始时，参与者齐声高唱慷慨激昂的《我看到我的祖国》。当灯火熄灭，转而以烛光照亮全场时，妇女们都静了下来，把精神都集中在各个宗教领袖所做出的祷告。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祷告，女权活动分子尤莉娅宣读了一份宣言，目的在于提高妇女们对女性权利的警觉性，并致力消除社会中对女性的鄙视。

祷告大会在话剧《玛西娜的控诉》的演出声中结束。话剧中的女主角玛西娜是名妇女工运活动分子。故事讲述她被谋杀后，久久未能找出真正凶手。

（原载印尼1998年《雅加达邮报》）

阳光下的兽行

——国际舆论谴责印尼五月排华暴乱事件

夏春平

这是一场全人类的悲剧。

当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巨轮即将驶入21世纪之际，在有“千岛千国”之称的印尼却上演了一场亵渎人类文明史的兽行。

最惨无人道的事件

椰风细雨声声泣，华妇心中滴滴血。5月13日是最黑暗日子。

雅加达及郊区发生暴乱，不但华人财产被抢被烧，最令人发指的是，数百名华人妇女惨遭强奸或性侵犯。

据来自各种传媒的消息称，截至8月上旬，华裔妇女在这场灾难中已确知有168名遭强暴，23人被奸杀；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仅9岁，最大的55岁，深入雅加达华裔族群跟踪采访的《亚洲周刊》记者张玉英认为，在发生一幕幕惨绝人性的事件后，大多数受害华裔妇女到今仍在暗处哭泣，生怕被人发现，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因而仍有更多的惨案未为人知。并且可能还在发生。

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的几例华裔妇女被杀的实录，实不忍卒读。

案例一：5月13日，一些陌生人破门而入，有人迫令受害人儿子奸其姐，接着又叫男佣强奸女主人，并把那对姐弟抛进火堆，其母见状也走进了火堆自尽。

案例二：5月14日，一批陌生男人闯进这间连地铺的屋子，把该名孕妇拖出来，脱掉她的裙子，欲上前阻止的夫惨遭案毒打，受害人遭人奸污后，赤裸身体逃走，但走到楼梯时不慎跌倒，脚断了，胎儿也不幸流产。

案例三：5月14日，数十人破坏房间连地铺的屋子，有人威胁说：“因为你是华人，所以你要被污辱。”这两姐妹随后被7至10人轮奸，房子事后也遭纵火。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埃·豪博雨在雅加达采访时引述印著名的神父

桑迪亚万的话：一些人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家庭有3个女儿，大女儿说，大火熊熊，她的两个妹妹被强奸，一个被扔进火中，然后轮到她遭侮辱。在一辆公共汽车里也有妇女被奸。有一次一位12岁的姑娘竟然遭到七八个男人玷污，她全身都被抓伤，真是禽兽一般”。

在国际互联络中，许多网友都看到了一封封发自印尼的求救信，他们大多是受害者的邻居、朋友、印尼原住民目击者。

以下是互联网上一份署名为“印度尼西亚一群受难中的华夏子孙后裔”的“血之控诉”中的片断。

有一位母亲，亲眼见自己的两个未成年女儿被暴徒轮奸，然后又亲眼看着她们被扔进火堆中活活烧死。

有一年幼女孩，在其父母面前被剥光衣服，暴徒一边嘶叫：“你是支那人，该死！”一边将一个瓶子插入幼女阴部，幼女当场惨死。

有一华裔女学生正在等巴士，被4个穿着警察制服的男人以是为了安全为名，劫去机场附近的一个荒地，在汽车内被他们奸污。女学生怒道：“你们是警察，理应保护我的安全！”其中一个强奸者道：“不，因为你是支那人！”

据《雅加达邮报》消息，奸杀华裔妇女的事不仅在首都雅加达发生，而且在泗水、棉兰、梭罗和巨港等地发生。

迫于印尼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印尼总统哈比比最近不得不承认，5月暴乱期间发生的一连串强奸行为，“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

华人内心永远的痛

发生在今年5月的排华暴乱，在给印尼华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同时更是还给他们心中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阴影。

据报道，许多小康家庭暴乱后变成一无所有的穷人，只能到救助中心领取救助金。滞留海外未归的华人估计仍有10万以上。如今，走不掉的印尼华人仍生活在恐惧阴影下，千方百计加强自卫措施。妇女出门必备利器防身。华人社区加筑围墙，畜养狼狗。不少条件甚佳的华人女孩通过网上徵婚，希望嫁到外国去。报章有大量的房屋求售和招揽外国移民的广告。《明报》在7月14日的一则报道中称：一名得以幸免的华裔妇女说：“过去的骚乱都造成经济损失，但只消几十年，华人就能将失去的重建起来。这次他们利用强奸手段，制造恐怖，

要华人感到印尼不是一个好住的地方。”

印尼华裔女企业家张锦美对前往雅加达采访的外国记者说：“海外的人一定要清楚上这里的华人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出门怕，在家也怕。我住的那一区有一天晚上10点停电，我心头一震不禁感到恐惧，因为不知是真停电，还是暴徒又要来。”她表示，华裔要的不过是免于恐惧的自由。

暴民奸淫华裔妇女还使不少受害者本人和亲属精神失常。据《亚洲周刊》记者尤莲娜等人在《华人女性惨遭性蹂躏》一文中记载：在雅加达养生院神经科病房疗养的一名中年妇女，入院至今一个多月始终精神恍惚；她是雅加达骚乱期间的受害者之一，两个女儿在暴乱中被暴民强奸后，来不及逃出被纵火的店屋而活活烧死，自此她便疯了。

类似报道中的这位中年妇女的遭遇相信不在少数。

近期，雅加达还出现一件啼笑皆非的事上这是号称现代、民主的印尼社会的一道独特而又滑稽的风景。

据《法新社》雅加达7月20日的一条题为《防强奸者性侵犯雅加达护身衣销量好》的报道称：刊登在雅加达多家报纸上的一则短广告说：“你是否希望免遭强暴？那么就须购买一件用人造革和不锈钢制成、外带号码锁的护身衣。”

阿亚桑贾亚因得到这种护身衣的专利而大发其财。这是维多利亚时期贞洁护带的新版本。阿亚桑贾亚对记者说：他去年7月中把这种护身衣投入市场后，只卖出几百件。不过，在发生了今年“五月悲剧”之后，护身衣的销量猛增，到目前为止，已卖出大约5000件。

被阁将军策动有组织的袭击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策划这场对华人烧掠奸淫兽行的是印尼军方。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7月21日）在题为《你是中国女人，所以该被强奸》的一文中引述在雅加达贫民区被人称为罗莫·桑迪的工人神甫桑迪亚万的话说：“无论是5月中大街上的游行，还是这些强暴行为，都不是偶然的。这是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犯下的罪行。”

桑迪亚万神父收集了有关5月12、13、14日三天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发生流血骚乱的大量材料。而“他的估计得到了人权委员会的赞同。”该文称：事情总是按照相同的模式进行。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往往剪了短发，一拥而上

进入华人开的商店。他们把一切打得粉碎。他们把在场的女子中较年轻的（往往只有10岁或者11岁）抓过来，当着其他人的面，在他们的母亲、父亲、丈夫和兄弟的面前施以暴行，3次到5次，然后放火烧掉房子。“你该被强奸，因为你是华人，而不是穆斯林。”雅加达华人商业区大街上有人这么说。

《亚洲周刊》（8月3日）以《被阉将军策动强暴惨案》为题，揭露了印尼强暴华人的真相。

该文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5月13日至15日雅加达空前大暴乱等事件的“肇事者”，是陆军特种部队（俗称红帽兵）人员；而幕后黑手，就是曾任特种部队司令、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民间传言他在同东帝汶作战时被阉割，故有变态报复心理；军方消息则指他想趁机兵变夺权。但印尼人权组织及政界人士认为，普拉博沃的真正用心，是制造混乱以争夺政军权力，打压异己和打击华人对印尼的信心，最终掌握大权。

6月11日的《纽约时报》称：人权事务工作人员和遭强奸者顾问认为，大多数强暴案都是一些集团组织所干的，这些集团在暴乱期间，煽动人们在华裔居住区纵火破坏。数伙暴徒带着汽油弹和其他武器分别同时赶到市内不同的袭击地点，并在那里发动暴乱。

印尼人权委员会的成员说，人权机构的工作人员与一名参加暴乱的人谈话，他说，他被征召后，有人向他下达了简单的命令，然后付钱给他，并被一伙人运到暴乱地点，他们提供给他和同时被召的人石块和汽油弹。

《明报》还通过长途电话访问了一个华人组织负责人陈先生（假名），他说：很多暴徒事前都曾在军方单位中接受过训练，以执行纵火抢掠和强奸华人妇女的任务。有消息还指暴民每强奸一个华人妇女，就能得到两万盾（约2.5元）做为报酬。他指出，事件除涉及军方外，当地一个恶名昭彰的黑社会组织，以及一个曾扬言宁可印尼回到20年前人人穿沙龙、甚至骑单车上班，也要把华人赶出国土的极端团体，据报都与暴乱有关。

官方默许暴民行径

雅加达神父桑迪亚万及其义工队在暴乱后一周内就搜集到集体强奸的证据，但当局不予关注。直至《纽约时报》首先报道，国际媒体大量跟进，事件才逐渐曝光，并在国际上形成风暴。而印尼治安首长及妇女部长都蒂·阿拉薇娅和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司令威兰托都曾多次否认。理由是没有受害者或家属

向当局投拆。全国人权委员会委员格列敏多说：“没有受害人报案，是因为人民对政府没有信心。”

印尼政府对这些暴行仍作护短式的强辩。例如：印尼合作部长阿迪沙梭诺宣称：“印尼不是反华，而是反垄断。”更荒谬的，则是总统哈比比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访问时，居然宣称“那些肯协助别人的华人，就不会遭攻击，也不会遭殃。”他的意思是说，对华人华妇的一切暴行都是有理由的。

难怪一位西方政治家叹道，当一国总统都已如此，印尼的国家远景不可能光明已可预见。

威兰托7月初还发表了与阿拉薇娅相似的谈话。但第二天，雅加达北区宋德村就发生一名华裔女大学生被乘坐吉普车的3名男子轮奸及虐待事件，一周后梭罗一名华裔被5名男子抢劫，其待婚嫁妹妹遭强奸。

妇女部后来设立了热线电话，才接到大量投诉。民间强烈反应及展开救援后，阿拉薇娅特地到《罗盘报》去求证强奸案的消息，接着才承认确有其事。

总统哈比比的妻子在亲自与3名被强奸妇女见面后，政府才决定设立调查小组彻查肇事者。哈比比发表声明，政府与全体人民谴责包括对妇女强暴的各种暴行事件，并说政府对暴力事件深表遗憾。

据悉，印尼回教最高组织“回教学者理事会”（MUI）每逢发生伤风败俗或有违宗教教义事件，都会发表谴责或批判的声明，但对这次同是印尼公民的遭遇则保持缄默。

印尼《短诰杂志》5月23日期号曾这么刊载：“不少人‘能谅解人民为何忽然变成暴徒’。”私营电视台曾播放资本家布罗波苏德佐（前总统苏哈托同父异母弟弟）对暴民的看法，他表示，因为贫穷才导致他们抢劫。前内政部长鲁迪尼也表示能够谅解暴行。这些言论令印尼华人感到心寒，因为这似乎证明华人在印尼是二等公民，而且可任由枪劫、凌辱。

国际社会同声谴责

印尼发生集体强暴华人妇女事件后，来自印尼雅加达和其他地区的华人，纷纷通过互联网、传真、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向全球喊冤求救，网络上也陆续出现了华人妇女遭凌虐的图片，血泪斑斑的创痕震撼人心，引发社会公愤。

驻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组织委员会已就印尼发生集体屠杀、强奸华裔妇女及残害华人事件进行调查。结果将公布并交印尼政府，要求印尼关注华人被迫害

问题。

美国国会在7月初和7月24日的会议上谴责印尼暴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已终止向印尼提供联合军队的训练。

作为印尼华人娘家的中国政府在各种不同场合向印尼官方表示了对事件关注的态度。

8月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香港对新闻界发表讲话，再次阐述了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唐家璇说，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多年来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地位理应受到尊重，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充分保护。他们应该像普通的印尼公民一样享受到同样的待遇和权利。我强烈要求印尼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事件，尽快采取措施，确保华人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对不法罪犯严加处置。

5月1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董建华在同泰国总理会谈时强烈地谴责了印尼排斥华人的做法，他指出：这是印尼“永远洗不掉的污点”。

此外，马来西亚副总统安瓦尔在7月28日表示“虽然印尼土著因贫穷而受苦的处境值得同情。但印尼华裔在暴乱期间遭受强暴及杀害事件必须受谴责。”

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媒体除连篇刊登揭露印尼暴民强暴华裔妇女的系列报导外，还纷纷发表言论，谴责这种兽行。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于8月3日发表了《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合法保护》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今年5月，印尼发生社会骚乱，成千的当地华人华侨商店受到洗劫，一些华人妇女惨遭强暴。对这种犯罪行为，中国人民和旅居海外的华人社团均极为关注。深表义愤。

据知，美国几乎所有华文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强烈谴责印尼暴徒惨绝人寰的行径。《侨报》社论的题目是《印尼华人不容再受凌辱》；《国际日报》社论题为《印尼应严处排华施暴事件》；《明报》（美洲版）社论题为《全人类共同声讨印尼》；《世界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为印尼华人伸张正义》。

日本的华文日报《时报》在8月6日也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提及60多年前中华民族在南京也曾受到的同样侮辱时说，这份耻辱至今还未受到清算，不想在20世纪90年代的今天，在堂堂的文明世界里，中华民族的子女再一次在异国他乡遭到他人的蹂躏。所有有民族正义感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会感到愤慨和仇恨。

进入8月以来美国广大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不分政治信仰。不分地域，

以满腔义愤发出共同的怒吼：从南端的圣地亚哥到北端的西雅图，各种以声讨印尼暴民为宗旨的新社团如雨后春笋级组织起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声援印尼华人人权联盟”、亚特兰大的“中国传统印尼华人基金会”、纽的的“华人抗议印尼虐华暴行联合会”、旧金山的“印尼华侨联会”、洛杉矶的“南加州大专院校联合会”……这些以声援同胞应运而生的新社团与原来的老社团凝成一颗心，拧成一股劲。他们在各自地区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签名活动，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声明。

在加拿大最大的华人居住区温哥华，“温哥华支援印尼反种族歧视组织”在华埠广场进行签名活动，希望争取要求加拿大政府透过外交影响力，促使印尼政府制止境内的排华事件。

在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许多华人社团和民间团体纷纷以游行示威、上书等形式抗议谴责印尼华裔妇女遭强暴的事件。7月18日，马来西亚国内77个团体，包括华团、非政府组织及回教青年运动，针对印尼华裔妇女被强暴奸杀的暴行，联合向印尼驻马来西亚大使提交抗议信。

7月29日，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会长张征雄率领代表两百多个社团机构的领导人，把不久前交给印尼使馆的抗议备忘录副本，转交联合国驻马国办事处；同时附上函件，分别转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7月29日，菲律宾慈善基金会及人权律师描牙星带领六60多名华人到马尼拉向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呈交公开信，要求向印尼当局施加压力严办元凶。团体又把副本呈交各国外长，要求印尼当局调查事件及向受害者作赔。

7月30日，约300多名菲律宾籍华人在马尼拉游行。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着：“印尼，你的人权在哪里？”和“不要反华的种族主义”。此时亚洲各国官员正在这里召开地区会议。

同日，新加坡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促请把强暴妇女暴徒列为战犯，并要求东盟讨论有关强暴罪行。

8月8日，近百名在日中国人自发在印尼驻日大使馆门前聚会谴责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暴行，并呈交了抗议书。

在香港，7月26日有1500多名抗议者在印尼领事馆前举行示威活动。同

日晚，香港市民还举行了烛光晚会，以纪念那些在暴乱中被强奸或折磨死的华裔妇女。

7月下旬，印尼华裔妇女遭暴民强暴杀害一事也在台湾岛引发全面反弹。据台湾中央社7月29日电，台湾工商界认为如果印尼不解决排华，就呼吁台商撤资。多个妇女团体也发起募捐、一人一信、上网络、向国际组织声援等活动。政府高层、民意代表、民间社团一致谴责印尼暴民野蛮的行为。

当局内各政党对此事也不遑多让。新党妇女委员会还赴台北印尼经济贸易代表处抗议，要求印尼政府道歉。

在印尼，具有正义感的民众也纷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蹂躏华裔妇女的愤怒。7月18日，雅加达的一群回教妇女、天主教修女和女学生到印尼国防部外示威，她们手持布条，上面写著“遭强奸者终生被恐怖的阴影所笼罩”，“印尼是一个恐怖共和国、强奸共和国”等标语。

改朝换代华人当灾？

纵观印尼现代史，人们会发现每逢印尼政局发生动荡或改朝换代，华人必成牺牲品。自1945年宣布独立至1949年从荷兰人手中接掌政权，至少有3000名华人遇害。最严重的如1946年6月“文登惨案”，有600余名华人被杀，包括妇女130人；1948年9月“巴颜阿比事件”，200余名华人丧生；1947年1月“巨港事件”，250名华人被杀。1965年10月政变后至1967年底，在东爪哇、棉兰、雅加达及西加里曼丹的一连串排华事件，有数百华人遇害。

人文社会学家、新加坡国民大学讲师阿力赫尔延多在印尼文《罗盘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这么严重的事件（指5月暴乱）没有引起印尼民众激烈反应，令人惊讶。他分析道，印尼种族歧视的历史，30多年来未将妇女和华裔当国民平等相待过。500万华人中有数十名是在经济领域中受惠于贪污、串通和裙带风。但同时，华裔在印尼历史上却遭受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迫害。至今，印尼依然禁止世上被广泛应用的华文，华裔也被强迫换掉自己原有的姓名，被禁止欢庆春节。甚至，在90年代中爪哇省长还禁止三宝瓏市贩卖年糕。

他认为，因为歧视的文化与历史，令强奸妇女的暴徒，以及数千名旁观的民众认为，受害者都是可以任人宰割的华裔，不用负任何责任。印尼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有如贪污一样，已经根深蒂固了。

印尼华裔社会学家黄建国先生普给华裔下了一个“传统替罪羔羊”的定义。而印尼少数民族问题观察家伊威波沃有同样的看法,他在今年内第44期的《侦探与浪漫》发表文章,认为暴乱行动是由拥有庞大人力财力的政治力量所策划,而且非常清楚华裔少数民族在种族主义事件上的脆弱性。他指出,具种族主义色彩的骚乱和枪劫事件这两年来已司空见惯,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传统替罪羔羊”是可以利用的必需品。

社会学家伊威波沃指出,30多年来,制造华裔是人民公敌的公众舆论,并将他们跟群众隔离是一个成功的“纲领”。种族分歧舆论很容易煽动群众的敌意情绪,一切自卫行动都被视为非法,就连华人社会也认为会危害集体。

“沉默的羔羊”不再沉默

伊威波沃最近在印尼报上撰文认为,印尼的改革运动还在持续。华裔的命运是否能够得到改善还是未知数。但在明确地尊重人类价值与地位的新时代里,同时也在这个动荡时期,组织自卫力量的概念应该引起大家关注。

文章称,随着改革之风的到来,暴乱也动摇了华裔不抵抗主义的信念。一些未能逃命国外的华裔公民,终于拿起木棍和藤条自卫。他认为不能将华裔的自卫行动看成是“蓝波主义”(RAMBO,美国影片,描述美国大兵在森林里以原始方式抵御入侵者)。而应看成是对不抵抗主义的挑战。

伊威波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少数民族的存在,从来都成为任何国家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少数民族不能让命运掌握在外人手里。虽然应与各界紧密合作,但首先必须争取自身的权益,由外来势力支撑的安定都是虚幻的。他认为,少数民族自主的组织力量,通过各种活动,这股力量将会对少数民族与各界的交流起桥梁作用,化解原有体制引发的猜疑。

过去一个多月,全印尼有更多华人出面研讨自救自强之道。政府开放党禁之后,3个由华人组成的政党已经诞生,即中华改革党、同化党及大同党。印尼著名华裔学者黄建国和法学家李祥胜等人成立了印尼民主社会团结论坛,以实现民主社会及尊重人权为斗争目标。

华社舆论也认为,华人所受的创伤不是官员三言两语的劝慰就能治愈。政府必须全面调整对华人的政策。因为为数700万的华裔已把印尼当作安身立命之地,他们希望获得工商业之外的其他活动空间,不再被当作是经济动物。

李祥胜最近上书哈比比总统，建议设立由政府、军方、知识分子、宗教界及华社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研讨解决华人问题的办法。他认为，在政策上不妨向马来西亚学习，以制止排华事件再度发生。他又建议，政府必须撤销过去订下的歧视华人、违反人权的多项法规。

5月暴乱事件后，印尼华人心目中都有了定见，那就是族群的命运必须操纵在自己手中，逆来顺受已经证明不能保障生存。对新成立的华人政党及团体乃至整个华社来说，如何重新为社群定位，如何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设法化解与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以建立更和谐的现代社会，都是一大挑战。

印尼华资加速外流

据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7月21日）和印尼人权委员会提供的材料，5月13日至15日，雅加达等地发生严重骚乱，烧毁五千多间华人商店和住宅，1200多人在骚乱中丧生，约有10万华人在暴乱中逃离印尼前往新加坡、香港、澳大利亚。

目前还无确切的统计数字显示，印尼华人在这场骚乱中经济损失的总数。不过，完全有理由相信上这将是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

业内人士认为这场排华暴乱无疑加速了华人在印尼投资的外流。

在华人商铺纷纷遭暴徒抢掠纵火后，香港和台湾商人纷纷考虑把资金撤出印尼。印尼当地的商人表示，由于印尼未来数年的经济前景仍然暗淡，许多香港和台湾公司都重新评价局势，部分已决定撤离。

据悉，港商投资印尼的金额高达190亿美元，是该国第四大投资者，的占当地外国投资的1/10。

一位台湾食品公司职员说：“印尼的天然资源令台湾趋之若鹜，排华暴乱却令台湾投资者信心尽失。”

“台湾国营食糖公司”同时宣布，在雅加达发生造成500多人死亡的暴乱后，该公司在印尼兴建糖厂的计划现已终止。

台湾投资者在印尼共投资130亿美元，是印尼的第6大投资者。

日本《产经新闻》驻香港的记者山本秀撰文分析认为：基于印尼形势混乱，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来自香港的中华圈地区的投资将加速撤退。掌握着该国经济的当地华人的资金也将流向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市场。如果混乱长期化，那

么，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为支柱的政策性“输血”就可能停止，而且，印尼实体经济的“贫血”状态也日趋严重。

另外，市场有关人士指出，流向香港、新加坡等周边市场的印尼华人的资金已在迅速增加。银行业界人士估计，动乱后印尼至少有 200 亿美元的资金被汇往新加坡、香港及台湾海峡两岸。

（原载香港《中国评论》1998 年 9 月号）

印尼华裔代代流不完的泪水

韩山元

华人最早到印尼可追溯到 2000 年前的汉代。但正式记录却是东晋时代（距今约 1600 年）的高僧法显从海路去印度取经时途经印尼。

五代十国时期（距今约 1000 年）开始有中国人定居印尼。15 世纪上半期，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下西洋（当时中国将南洋、印度洋以西统称为西洋），看到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地已有不少华人聚居。郑和的一些随员、水手也在这时候在印尼安家落户。到了明末清初，定居爪哇与苏岛的华人有增无减。

从总体来说，明清两代，由于中央政府实施“海禁”，闭关锁国，中国人只能冒险出洋，形成不了很大出国潮。但在 17 世纪中叶，明朝统治者一度海禁放宽，允许私商到南洋经商，闽粤商人（以闽商占多数）纷纷到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雅加达、万丹、占卑、亚齐与马辰等港口从事贸易。

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于 1619 年（明朝末年）占领了爪哇，急需大量劳工来开发这块富庶而人烟稀少的土地，他们看准了贫困、人口众多的中国，于是千方百计以利诱、拐骗、绑架等手段，将大批华人从中国引进爪哇。也有不少穷困的中国农民与小生产者、小商贩怀着一个金色的梦，冒险远渡重洋到爪哇，爪哇华人一度多达数万人。

荷兰殖民者掳掠东南沿海华人到印尼的罪行，这是千真万确的史实。在荷兰的官方记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1622 年 4 月 9 日，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政府授权到远东开拓殖民地的机构）在给远征厦门的司令雷约兹（Cornelius Reyereg）的训令中说：“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不能取得对华通商的权利，便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尽量掳掠中国沿海居民，不论男女老幼，一概劫持而来，以填补吧城（今雅加达）、安汶和班达人口之不足。”仅在 1622 年 11 月至次年 1 月，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有 1400 人被掠走。

从 17 世纪初到 19 世纪中叶的两百多年间，华人在印尼从事最艰苦、危险的垦荒、种植工作，他们为印尼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连许多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神父达夏德（Guy Tachard）1685 年路过吧城，亲眼

看到了华人的表现。他说：“中国人勤劳聪明，他们对于巴达维亚（即吧城）有莫大的价值，没他们的帮助，根本谈不上生活的舒适。他们耕种土地，而除了中国人外几乎就没有工匠了。”印尼作家甫榕·沙勒（BurungSaleh）也说：“中国人民虽受到各种压制，但以其坚韧不屈著称。很多中国人在1720年开小商店，他们也当菜农、渔民、裁缝、木匠、打石匠和舢舨船夫……作为货郎，他们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从一条巷子走到另一条巷子去叫卖。”

满洲人打垮明朝建立清王朝初期，为防控制台湾的郑成功反攻，一度厉行海禁。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统一台湾，次年，康熙皇帝宣布废止海禁，国门打开，又有大批华人出洋到印尼诸岛。

17世纪初到末期，华工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了印尼种植业的繁荣。尤其是咖啡、胡椒与甘蔗这几种价值很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给荷兰殖民者带来了神话般的财富。

然而，由于盲目开发，咖啡与蔗糖生产过剩，荷兰殖民统治者于1690年5月下令限制华人入境，1727年6月又将一批居住多年却拿不到居留许可证的华人驱逐出境。1740年7月，又下令将“可疑”的华人逮捕，凡不能证明有正当职业者，一律遣送到锡兰（今斯里兰卡）玉桂园当奴隶使用，从事无薪劳动。10月初，荷兰当局将一批被捕的华人押上船开走。几天后，吧城盛传许多华人在船上惨遭杀害，尸体抛到海中。一些从海上逃生回到吧城的华人也向同胞证实了荷兰当局的暴行，吧城华人无限愤慨与惶惶不安，有些人赶紧逃到城郊的乡村躲起来。荷兰当局派军队去追杀，造成大批华人死亡。

那时在甘达里亚（Gandaniaa）一家糖厂，有5000多华人聚集，准备自卫，荷兰当局以华人谋反、打算进攻吧城为理由，对吧城的华人展开长达一个星期的大屠杀，荷兰当局还怂恿印尼当地人加入屠杀与掠夺华人财物的暴行。在这场血腥的大屠杀中，华人被杀近万人。被焚毁与劫掠的华人房屋有六七百家。华人的鲜血染红了吧城的河流。这就是印尼历史上的“红溪惨案”。（按：也有一个说法是吧城有一条河原名就叫红溪Angkee）

惨案发生后，恶果很快就显示出来，吧城商业活动几乎陷于瘫痪，蔗糖生产停顿，经济大倒退，政府税收大减。大屠杀前的税收达13130银元，大屠杀后锐减至5530银元。荷兰殖民者自食其果。

进入19世纪，爪哇有一个短暂的英国统治时期，英国人实行门户开放与自由贸易政策，华人人数再次大增。19世纪30年代荷兰人夺回爪哇的控制权，一

度禁止华人入境，但很快发现要使经济活跃起来，不能不依靠华人，对华人入境的限制令只好废除。到19世纪中叶，单单爪哇与马都拉两地的华人就多15万名，其中吧城华人有五万余人。从那时起的100年间，华人对印尼的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到20世纪初，定居印尼的华人已超过100万。

1945年二战结束后，荷兰重返印尼企图恢复殖民统治，遭到印尼人民武装抵抗，当地华人给予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大力支持。

印尼独立后推行一系列的同化政策，在经济与文化上对华人诸多限制。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领导的军方将苏加诺推翻，同时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排华与大屠杀，至少有30万华人在这次血腥的排华行动中死亡。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0月18日）

天譴人怒的罪行

《联合早报》社 论

印尼总统哈比比说，印尼在今年5月间发生的一系列强奸案，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他誓言，这类事件将不会重演。哈比比的一名顾问过后说，他已下令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暴乱事件和强奸案。

哈比比总统公开出面证实印尼发生过大规模的对当地华裔妇女的侵犯事件，已把这件恶名昭彰的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说明在20世纪的文明社会中，竟然还有这种令人发指的践踏人权、褻渎自尊、集体强暴妇女、发泄兽欲的事件在受到纵容和包庇的情况下发生，暴徒的行径实与禽兽无异。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暴行。

当印尼在5月间发生暴乱时，当时整个事件为政治和经济因素所掩盖，世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尼政坛上寡头的较劲方面，未重视暴乱的实质。过后，消息逐渐传出，指暴乱的目标是针对当地少数的华裔，暴徒所到之处，无不奸、掳、打、砸、抢、烧，对华人社区进行有步骤的大清洗。在展开掠夺时，侵犯华人妇女的事也时有传出。到了后来，世界各地传媒和网际网络的消息经过多方的综合和并凑后发现，这些掠夺和强奸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如是这样，则在历史上，掠人财产，奸人妻女，这只有法西斯或野蛮民族才有发生过如此天怒人怨的暴行。

现在，由总统出来证实有强奸事件发生，而且要进行调查，可见事情的真相正逐渐曝光，并且成为国际上舆论关注的焦点，现在已不是采用掩盖和歪曲事实的手法所能赖掉的。哈比比总统只是承认有强奸事件发生，这和人们私下所议论和透露的有计划和有预谋的行动，又有很大的差距。不过，冰山的一角总算露出来了。我们认为，印尼政府应该严正对待这件事，务必进行彻底的调查，使到整个事件水落石出，同时采取严厉的行动重办元凶，这样才能减轻整个国家和民族所承担的罪责。

事实上，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进行绝灭、戕害的行动，这是不能饶恕的罪行，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违”即是如此。印尼发生这种集

体羞辱和强暴无辜妇女的事件,只能使它的民族蒙羞,这种污迹是清洗不掉的。现在它所能做的,是认真对待这件事,还给受害者一个公道。并且,今后应该以此为深刻教训,洗心革面,积极体现出民族的忏悔。

对于受到糟蹋的无辜妇女,她们所受的伤害已不是任何行动或补救所能弥补,任何同情的语言是治疗不了她们的创伤。我们在鼓励她们勇于面对未来的同时,对她们的积极期待,应是希望她们能勇敢的站出来,暴露凶徒的种种罪行。虽然这是异常痛苦的事,可是,也只有这样,才能收集到确凿完整的罪行资料,全面的把这人间惨剧暴露出来,作为惩戒的证据,也是保护她们的姐妹和下一代免受蹂躏的积极方式。

印尼目前正发生粮食短缺的问题,我国政府最近拨出1200万元的款项,为印尼提供人道援助。上星期间,本报也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在印尼发生困难的时刻,国际社会应该提供人道援助。对此,我们曾收到读者的反应,表示对此呼吁不表赞同。我们认为,为印尼提供人道援助,并不等于无视或默许某些人的种族绝灭和戕害无辜的行为。相反的,呼吁提供援助和谴责暴行是两件应该区分开来的事,大多数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印尼老百姓是善良的,值得我们的同情。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对印尼发生的践踏人权和惨无人道的暴戾行为视若无睹,我们应该严正指斥这种天理不容的罪行。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7月17日)

印尼应痛定思痛

《联合早报》社论

今天是印尼的国庆日。今天的印尼无疑是处在独立53年来最关键时刻。

在国庆到来前几个星期，雅加达及印尼各大城市就已风声鹤唳，谣传印尼将会在8月17日这一天再度爆发严重骚乱，华裔印尼人更是人心惶惶，那些能力做得到的，又都纷纷逃奔国外。虽然印尼政府及军方再三指出传闻毫无根据，军警也一定会力保人民生命与财物的安全，但在国庆前夕，印尼国内仍然布满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

作为与印尼最接近的邻国，我们真诚希望印尼不会再发生骚乱，而我们也理由相信，印尼社会在经过了5月事件的惨痛教训以后，一定会举国致力确保类似悲剧不会重演。8月17日的国庆，应该能像7月27日盛传有事而结果无事那样平静的过去。

但这类谣言一再发生，人们只要稍微觉得风吹草动就马上作最坏打算的现象，反映了印尼政府当前所面对的基本问题，仍然在如何恢复国内外对它维持社会法纪的信心。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信心都未能恢复，那对政府振兴经济的信心就无从谈起。

印尼老百姓，尤其是世代在那儿定居，各方面都与当地人无异的华裔印尼人的悲惨遭遇，是举世震惊的悲剧。但任何人只要深一层分析，就不难发现在那场悲剧中，华裔印尼人的遭遇虽是罄竹难书，蒙受最惨重打击的，却是印尼这个国家。不只是它的国际形象与信誉大损，国内及国际对于印尼政府维持法纪的能力，甚至对它执法的标准，都难免会有很大疑问。印尼政府要重振经济，就必须吸引资金，要吸引资金，就必须先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而维持治安与确保执法的公正，无疑是恢复信心的最起码条件。

哈比比总统在印尼国庆前夕发表的国情咨文，首次如此正式的谈到这些问题。他把5月间发生的事情，形容为“令印尼蒙羞的野蛮行为”。他指出，无论基于什么原因，这种野蛮行为都是文明国家所不容，必须受到法律的处置。他

也为那些残暴行为的发生，向印尼人民，尤其向受害者的家人致歉。

哈比比这番话，与他接任总统以来所公开发表的其他谈话对比起来，算是比较能够正视印尼当前问题之所在。但如果要在国内外产生真正令人安心信服的效果，那他本人及印尼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就至少有必要贯彻两件事。第一就是要有始终一贯的立场，不应一会儿谴责暴行，一会儿又表示这种事情查无实证，而且哪里都可能发生；一会儿呼吁留在国外的人回国，一会儿又表示没有他们，印尼人也不会饿死。这类反反复复的谈话，对于恢复印尼的安定与信心，肯定是弊多利少。第二件事情就是必须尽速以实际表现证明“每一个人，不论他是不是土著，都觉得他是印尼这个国家的合法公民”。如果哈比比政府能实现这个许诺，那就能使他有别于前两位总统，成为他对印尼民主改革的最大贡献，而目前显然是废除所有歧视华裔印尼人的法律与措施的良好时机。

世界各国都希望印尼早日摆脱当前困境。就以中国来说，它对印尼华人受到那样的待遇非常愤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中国在必须把庞大资源用来应付一场大水灾的救援与善后工作时，仍然主动向印尼提供300万美元医药品援助和总值2亿美元的出口信贷。这一切都证明各国都希望印尼在此关键时刻能以稳定为重，公平对待所有人民，使大家都能投身于经济重建。在国外，印尼则应更珍视各国对它的关怀，善用各国提供的援助。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17日)

国家恐怖主义把印尼推向暴乱深渊

阿里尔赫延托

5月中在雅加达及其他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应该说是种族化的国家恐怖主义，而非种族主义导致的群众暴乱。

令人担忧的是，尽管许多传媒对受害者及印尼前途表示同情，但他们却看不清两者间的分别，外国传媒在这问题上差错更甚。那些错误报道不仅加深种族对抗，更严重的是它使罪魁祸首逍遥法外。

国家恐怖主义是由国家策动的一系列行动。为了在广大人群中煽动扩大、强化恐惧感，国家恐怖主义至少包含3个元素：第一、政府人员或其代理人通过公开的，严重的暴力行动来制造恐惧。

第二、暴力假借代表大多数人之名，以一些个人及社群为针对目标。

第三，暴力行动以公开“演出”方式呈现出来，把杀一儆百的信息广泛传播开去。国家恐怖主义是要在更广大人群中制造恐惧，让大家知道类似的暴力事件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

目前我们并无明确证据指出谁应该为5月的暴乱负起最大责任。

广泛传言说，这事件具有国家恐怖主义的特点。而根据非政府机构的独立调查报告及目击者的陈述，证实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目击者所描述的暴乱煽动者，是一些体格健壮、剪短发及穿军靴的男性。一些受害者在货车中被强奸时看到车里有军服。这些证词虽然都是真实的，却不足以构成任何结论，必须有其他线索。

任何熟悉印尼情况的人都知道，除了国家机器之外，没有任何社会集团具有这般能耐，能在雅加达与苏拉卡尔塔如此有效地制造出两个月前那样规模的暴力事件。

在短短50小时内，人口1000万的首都雅加达内有27个地区发生暴乱，结果造成1198人丧生（其中27人死于枪下）、150名妇女被强奸、40座购物中心与4000间商店被烧毁，以及数以千计汽车与民房被纵火。印尼的任何族群，不

管如何狂躁不安，都无法有组织性地造成这般严重破坏，而且肇事者竟然没有与保安部队对峙或被起诉。

这次暴力行动实在执行得太完美，使到嫌疑者的身分简直呼之欲出。以下几点会帮助大家 against 问题有更好的了解。第一、在受影响地区中，没有任何民间团体有能力或经验策划这类暴动，反观武装部队，在政治动乱地区如伊里安、亚齐或东帝汶却有如此能力与经验，第二、5月的暴乱并非首次在爪哇发生，它是某种模式的重复。这个世纪内已经周期性地发生好几次排华事件，没有一起像是由当地其他族群里的愤怒、贫困的民众自发起来的行动。

1983年，有几千名罪犯在爪哇各处有系统地被残杀，他们都是在家人面前遇害，被肢解的尸体还在学校、商店和电影城等繁忙场所公开展示。

在这些事件中，国家恐怖主义昭然若揭。当地人都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传媒，尤其是国外传媒却选择视若无睹。针对5月暴乱事件的新闻报道、访问或专栏，多数集中在种族课题上，一再谈论华人移民历史，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及华人不成比例地掌控国家经济。

针对印尼暴乱的主要报道，都集中针对那些既贫困又敌视华人的“土著”，说他们是造成那次大规模破坏的的罪魁祸首。

评论者有的谴责土著，有的又为土著辩护。前者把华人描绘成无辜受害者，后者则重复念起那似是而非的符咒，说华人只占总人口3%却控制国家70%经济，两者都简单地把社会划分成只有好人与坏人。把罪名加在贫苦民众头上，不仅对他们不公平，也不知不觉地庇护犯罪者，助长国家恐怖主义。唱道德高调的新闻工作者与观察家，尽可自由发挥想象力，因为被指责者完全没有反驳的言论管道，面对外国传媒，他们更没有发言机会。为土著辩护者也难以自圆其说，他们把掠夺、纵火、强奸合理化，就等于承认是土著民众犯下罪行。

其实两者都没提到要害。把暴乱置于种族问题框架中，双方都在助长一种普遍趋势，把人民与人们的想法种族化。一方面有人高声疾呼在文化、艺术或政党政治中提倡华族的认同，另一方面的却在加深种族间的敌对。两者都使政府人员与其代理人免受责问或惩罚，难怪在5月暴乱中发生的轮奸事件竟然可以延续到6月。

一旦陷入种族框架中，许多评论者就把印尼情况与1969年马来西亚种族暴乱，以及1992年洛杉矶暴动相比较。这样的比较虽然有用，却与所呈现的情况

不符。发生在马来西亚与洛杉矶的事件，暴力冲突基本上是在公民社会里的族群间发生，种族色彩鲜明，印尼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在印尼，煽动者并不代表单一种族，他们也不是公民社会中任何群体的成员，他们虽然主要针对华裔肆虐，可是逞凶对象并不局限于单一种族。就这意义来论，这种暴力应该解释为种族化暴力，而不是种族主义引起的暴力。它除了具有父权政体的残酷之外，还加上种族色彩包装，可是背后真正动机却不是种族主义。

难怪所谓的土著也无法完全在暴乱中幸免。在暴乱期间与暴乱之后，许多土著向陌生的华人伸出援手时，也必须冒着生命危险。土著活跃分子也公开谴责国家，并展开协助受害者运动。而政府却迟迟才对轮好事件发表意见，使人们的疑心更重。

以上所说，并非在否认印尼存有种族问题，占少数的华人以及自称土著的大多数人之间，种族问题是肯定存在的。我想讨论的是，公民社会成员之间的种族问题不是引发最近这场暴乱的原因，也不是过去几次大规模排华事件的祸首。这样的种族主义，与种族化、军事化、男性主导的国家恐怖主义有实质上的差别，许多分析家却有意忽视这一点。

与其他地方人民一样，在印尼人日常谈话、玩笑、闲谈与私底下的争执中，常会冒出种族主义的字眼。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在5月事件中如野火般燎原，普遍存在的种族情绪当然是原因之一，可是它却不是造成纵火、强奸与掠夺的主因，它绝对没有如此神通广大。相反地，在父权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及种族化的传媒报道煽风点火下，平民的种族主义因此燃烧得更炽热。

作者是印尼女权杂志的新闻工作者
(原载印尼1998年7月15日《雅加达时报》)

印尼华人遭践踏 美国社会是否漠视？

阮次山

从7月中旬起，美国华人陆续发动抗议印尼华人遭暴民施虐的活动，这些抗议活动在上周达到高潮。

8月7日和8日，全美国13个城市同步举行谴责印尼暴民罪行的示威抗议活动，将近两万名华人群集各地印尼使领馆前，向印尼官员递交抗议信函，并举行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声势之大，可比美3年前的保护钓鱼岛运动。

但是，令人诧异的是，美国主流媒体对这一连串的示威抗议活动大多数都予漠视，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以短得不能再短的篇幅报道。

以8月8日的《洛杉矶时报》为例，该报只在这天的大都会版内页，以不到250字的篇幅刊登华人8月7日在印尼驻洛杉矶总领馆前的示威活动。更妙的是，在8月8日的洛杉矶各华文报章上，有的报道说，参与示威的华人有3000人，有的说有2000多人，警方则估计约有1000人，而《洛杉矶时报》则称有“将近500人”，在数字上，美国主流媒体和华人媒体的报道竟有如此差异，可见在“热度”上有如此“小”、“大”之别，也不足为奇。

主流媒体没有兴趣

事实上，为了争取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率先发动这次全美示威活动的旧金山华人联盟曾吃过不小苦头。他们从7月中旬起即前往旧金山区的第四频道电视台、《观察报》、《纪事报》等交流媒体，要求派人采访及报道华人示威的新闻，并要求这些主流媒体重视印尼暴民排华罪行，但是却都吃闭门羹。这些主流媒体所持的理由是，印尼排华的新闻发生在5月间，目前已无新闻性。

但是，美国华人在全国各地发动抗议印尼排华活动，而且参加的人数众多，这种活动不能说不是新闻，即使用美国“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传统新闻标准，这么多华人聚集进行的这种示威活动当然算新闻，否则，过去只有不到10个人的西藏异议人士在中国总领馆前示威何以就成为美国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

事件？显然，美国主流媒体在处理美国华人抗议印尼排华活动的新闻时，有着不同的标准。

然而，要说美国媒体完全漠视印尼华人所遭遇的劫难，倒也未必见得。以《纽约时报》为例，今年5月印尼发生暴乱之后，该报曾有四篇文章报道印尼华人在动乱中成牺牲品的种种劫难，其中，该报记者更在6月10日一篇近万字的报道中，详细描述印尼华人在这次动乱中所遭遇的不幸。

密集报道华人的遭遇

此外，在5月中旬印尼排华达高潮时，美国各大报、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及各主要电视媒体，都曾以显著的篇幅密集报道华人所遭遇的不幸。

因此，美国主流媒体在处理美国华人示威抗议印尼的排华活动的新闻时，也许真有其不同于华人的标准。

由于美国主流媒体的冷漠，美国社会一般民众对于美国华人的这项抗议活动似乎也反应冷淡，尽管华人社区过去两周对此活动极其热心，参与的人也不少，但是，本来就不关心国际大事的美国民众，对印尼排华活动更感漠然，据一位美国新闻界同行告诉笔者，美国民众对印尼排华情况之所以如此漠然，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印尼排华活动至少在表面上并非出自印尼政府的主导，因此，美国民众对于远在天边的印尼所发生的“社会暴乱”，也就显得并不关心。

不过，若要说美国社会完全漠视印尼华人所遭遇的劫难，那也是不公平的说法，至少，到目前为止，已有38位联邦众议员联名致函克林顿，促他向印尼政府施压力，要印尼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华人，此外，这些众议员并表示，他们将在国会举行听证会，针对印尼排华的暴行进行听证，并将邀请印尼驻美国大使到会说明。这些众议员并将要求印尼政府保证不再发生排华暴力事件，否则将中断对印尼的贷款。

修正法案要求惩凶

在美国政坛极具影响力的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女士更在8月6日发表声明表示，她除了致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要求国务院向印尼政府施压尽快调查排华的暴行之外，在参议院9月初复会后，她将在“1999年的外援法案”中提出修正案，促使印尼不得不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惩凶及防止今后再发生排华

暴行的要求。由于附带在法案内的修正案通常极易获院会通过，因此范士丹所提的这项建议，非常具实际力量。同时将提出类似动议的还有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戴玛拉。

因此，严格说来，美国主流社会的媒体、政客和民众倒不见得对印尼华人的遭遇心存“见死不救”的态度。

综合的分析，美国主流社会人士在对待印尼排华事件上的态度不如华人积极，最大原因除了印尼和美国社会的交流并不密切，印尼距美国仍遥远，以及这些排华暴行在表面上仍无政府主导的证据之外，印尼各使领馆在接见示威群众时都极友善，则承诺把示威者的意见转达印尼政府，以致示威活动都未酿成暴力冲突，这都是示威活动未引发美国社会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由于美国华人的示威，导致美国国会采取必要行动，进而促成美国行政部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壓力；只是在面对美国社会一般民众较漠不关心的情况下，这次行动在美国所得到的反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11日）

印尼华裔胡不归？

余文锁

今年5月，雅加达、泗水和梭罗发生排华大暴动，使许多印尼华裔女性遭受有组织的暴徒集体强奸和杀害，而受害者中不少人因此而受到刺激，以致神经失常，或者引起家庭悲剧。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正受到印尼国内外的人权组织和有正义感的人士纷纷谴责，并且要求印尼政府进行彻查，以便水落石出，揪出策划这件事的幕后主谋。

许多观察家都把这件事视为与曾经受现任参谋与指挥学院院长普拉博沃中将领导的特种部队有关。普拉博沃中将是前总统苏哈多的次女婿。他在担任现在的军职前是战略后备部队的司令。在哈比比上台后，他被调离司令军职。这项调动，加强了维兰托在武装部队中的地位，也使政治局势趋向稳定。

其中必有蹊跷

根据报道，这次暴动显然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而进行这次暴力行动的集团显然是受到有势力的军方派系幕后主使。这项看法是从暴动发生的情况来判断，因为参加暴动者不是当地人，他们都是乘坐卡车而来，并且暴力行动采取同一个模式：当众强奸华裔女性、掠夺财物、或者纵火烧屋。有报道说，这些暴徒都事先受过训练，并且在施暴前都服过兴奋药，因此改变了人性。结果有400多名（也有报道说是1000多名）华裔女性遭受这些暴徒的强奸或杀害。据报道，暴徒们无法无天的行为，事后没有受军警当局的执法对付，因此加强了人们的怀疑：这种暴行，绝不是所谓通常的反政府暴动，其中必有蹊跷。

这件事发生后，即刻引发大批华裔通过海空两路惊慌逃离印尼，到海外避难。根据本期的《事实周刊》报道，大约有11万名印尼华裔及他们的家属因为这次暴动而逃避海外，并且带走的资金，以1美元对15000盾汇价计算，达到200亿美元之多。

虽然哈比比5月24日上台后不久就到雅加达市区中心格罗都的华人商业区做亲善访问，并且发表促请华裔协助国家的谈话，但是他在劫后满目疮痍的情

景中，对于华社感到不安的暴动事件，却没有正面的谴责。因此当地华社仍然无法消除对于暴动的阴影。

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情，终于由人权组织和避难海外的华裔通过各种管道，向世界公开。那些处理受害者投诉的人士，受到不知来源的电话恐吓。尽管有这些黑色恐吓，有正义感的印尼社会人士和人权组织仍然出面，要求哈比比政府采取行动彻查这件事，而哈比比也终于在赢得了戈尔卡党选、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之后，正式表态，谴责这项暴行，并且宣布设立高层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个事件。

中国驻印尼大使表态

笔者认为，哈比比在大规模的暴乱之后历时整个月才公开表态，显示了有三个客观原因使他不得不如此做：其一是他在初掌政权时，政治地位十分脆弱，需要军方的支持，而这次暴动与军方高层争夺最高军权有密切关系，因此在军队内部权力斗争还没有解决之前，他不要轻举妄动。在维兰托释了普拉博沃的兵权，并且在军中展开“非普拉博沃化”行动（撤换亲普拉博沃的军官）之后，他才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具有信心，因此才对暴乱正式表态。

其次是国内外要求哈比比政府采取坚决行动对付暴徒的呼声日益高涨。印尼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哈比比不采取行动对付这些暴徒，那将很难取信于人民（包括华裔）和外国投资家。在一个法治的文明社会中，即使是一名女性受人强暴，也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对付，何况是数百名甚至整千名女性受到凌辱，更不用说需要采取法律对付了。

正当印尼国内外要求哈比比政府采取彻查行动之际，中国也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答复新华社记者的形式，对这件事表示关注和对受害人表示同情。其实在唐国强表态之前几天，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已经表态，对于印尼发生的暴行，表示遗憾，并且要求哈比比政府给予印尼人民，包括华裔印尼公民安全的保护。

根据本月7日《改革之声午报》电子版的报道，这位到任4个月的陈大使是到三马林达访问，探讨在东加里曼丹投资种植棕榈业和捕鱼业的可能性时，对记者发表谈话。这项重要的谈话没有受到传媒的注意。陈大使在哈比比出任副总统和接任总统时，曾经两次礼貌上拜会哈比比。他除了一般的谈论中印（尼）双边良好关系的客套话之外，也向哈比比表达今后印尼不应再度发生这

件事情的希望。

这位中国大使说：“印尼华社对这件事十分关注，我们对于发生在华裔社会中的事件表示关注。因此我们要求印尼政府彻查这件事。印尼华裔事实上已经与印尼人同化，但是他们依然在各种暴动中成为牺牲品。”他认为这次暴乱已经沉重地打击了印尼的投资气氛。他说，暴乱对印尼华社的打击深重，使华裔商家不易在短期内恢复在印尼的生意。

8万名华裔准备回归

中国从1965年9月30日的流产政变事件中吸取教训，对于印尼华裔社会这次遇到的困难采取谨慎和低调的处理态度。因此这位大使和唐国强两人的谈话，受到各方注意。

除此之外，哈比比之所以明确表态，也显示了印尼正在面对争取外国投资者对印尼投资的困难。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哈比比的派系赢得了戈尔卡选举后，决定再发放10亿美元援助和其他国家将给印尼65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外国投资者仍然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正在观察逃避海外的印尼华裔是否会携带资金回归。所以哈比比不能不对这次暴乱事件表态，以争取华裔回归。

但是哈比比为何在日前又再度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华裔不回归，印尼不会完蛋的谈话？显然这项谈话是他谈兴高而一时走嘴，不是他的愿意。他发表这项谈话，印尼盾汇市应声而跌，足以说明华裔对印尼经济的重要性。华裔不回归，将会使印尼经济复苏受到严重打击。昨天印尼政府宣布调查暴动委员会的名单和职责，应该视为哈比比纠正他谈话的一种间接表示。

根据《事实周刊》的专题报道，目前海外大约有8万名印尼华裔，准备在印尼政府做出安全保证和采取纠正各种歧视华裔的措施之后，回归印尼。因此哈比比设立的委员会展开的工作和哈比比政府采取的应对行动，将会对于争取华裔回归产生影响。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7月24日）

印尼的贫民与暴民

黄大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纷纷脱离西方宗主国，成为新兴独立国家。随着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涨幅惊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30年内增长了一倍。由于乡村适宜农地增长率远低于人口增长速度，乡村剩余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特别是首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城市内原有贫民区因而扩大及扩散，城市人口高速上升，然而工业却发展缓慢，只能吸收一小部分贫民区的劳动人口。大部分的贫民区劳动人口，得依赖低增值、劳力密集又生产效率低，收入低微的服务行业过活。

印尼雅加达是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印尼的首要城市，它的人口已由50年代的200万，增加到90年代的900万人。印尼70年代后采取了较自由的经济政策，雅加达发展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企业，象征现代企业的新型建筑物，与贫民区的简陋房屋形成一幅强烈的对照。

印尼大城市贫民是经济地位与物质生活状况处于社会最低层社群。其中许多谋生技能低、教育水平低落，收入不足以满足最低生活需求量，包括食品、衣着和住房等。因为印尼政府在过去30多年来并没有大力栽培中产阶层，城市贫民因而是最大的社群，成为人数众多、社会动乱的潜在地。

贫民本身组织能力不高，也没多远大的政治理想，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无助的一群。在社会稳定时期，他们中规中矩，对有权势的人毕恭毕敬，温文有礼，委屈求全，只求三餐温饱。

最易受政客煽动

然而，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城市贫民却是最易受政客利用、煽动的社群，因为动乱给贫民带来了转机，以暂时纾解贫困、物价高涨带来的困扰与生活难题。经济危机同时增加了贫民的失业人数，使另一些人进入半失业状态。贫民之中本来就有不少是城市的剩余人口，平时空闲时间多，经济危机无形中增加了剩余人口的数目，使贫民更容易变成暴民。

暴民的最大特征是犯罪属集体的行为，个人无须直接对犯罪行为承担后果。法律的制裁，往往只对付少数的领袖而已。在印尼，贫民当暴民还要少一份风险，因为攻击的对象往往是少数民族或少数社群。这些少数民族或少数社群在政府内部出现危机时，通常不受保护，好让他们成为社会不满的宣泄对象，作为代罪羔羊。

印尼华人人口 800 万，占全国人口的 4%，分布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作为一个少数族群，他们无真正的政治组织，集体力量微弱。除了一小部分与大官僚关系密切外，绝大部分是中小商民，受薪阶层，靠劳心劳力换取生活所需。由于印尼华人是少数中的少数民族，分布各岛屿，又相对地比当地印尼土著富裕，因此在政局不稳定时，最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攻击发生时，整个族群，包括属于非常贫穷的华人，也不幸免。

背井离乡的拓荒者

东南亚华人大多是十八世纪以后从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渡海而到东南亚的。他们背井离乡到东南亚后面临的环境比北美早期的拓荒者所面临的环境还要恶劣得多。

他们没有从本国政府获得任何保护，受着土著人的排挤，处在一种不安定的、充满危险的状况之中。因此，作为“弱者”的华人一边适应本地环境，一边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各种冒险，艰苦地创业。

由于在政治上得不到半点保护，享受不到一点权利，经济保障对他们来说意义极为重大。因此，他们不断地进行智力和物质上的投资，以求获取较大的利润，积聚一定数量的财富。企业家获得成功所必需的冒险精神也就深深地植根于华人的心目中，这为他们经营企业获得成功提供了精神支柱。

东南亚华人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在于他们继承了古代中国商人的传统，按行业、按地缘，甚至将行业与地缘结合起来，建立起企业网络。

华人通过这些网络，既可以相互帮助，提供商业机会，也可以将华人团结起来，与共同的对手抗争，这无疑增强了华人企业家的整体竞争能力。

进入 90 年代后，华人企业网络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趋于国际化和现代化。据统计，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有华人网络 3975 个，到 90 年代增至 9500 个，跨国华商网络达 60 个左右，每两年召开一次世界华商大会。1995 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开创了通过交互网络提供华人企业数据库的服务。

领先一步构筑全球性网络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对此做了一些评述：“当世界从单一的独立国家经济向网络经济转移时，华人已经领先一步构筑起最初全球性的种族网络。”“由于华人网络具有交互网络的特征，同什么地点联系都行，在什么地方联系也可以。因此，可以选择一个对此感兴趣的伙伴，例如可以与相同行业的企业，或者同中国、马来西亚或印尼直接地相连结。”

可以肯定他说，这种网络只会巩固和扩大华商在各地的地位和影响。

华人的投资意识和冒险精神，华商网络显然是土著印尼人所不具备的。更何况，华人控制着印尼70%左右的经济活动。滞留海外的印尼华商手中掌握着200多亿美元的财富，这更是印尼经济恢复和本源。

如果我们把印尼的国民经济比作一座框架式的现代建筑物的话，印尼华人并不是建筑物内可以任意搬动、填补的墙壁，而是建筑物赖以高高耸立的框架。框架不存在了，这座建筑物也就倒塌了。

最近一段时间内，哈比比总统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一再表示自己是印尼华人的伙伴、朋友，保证归国华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但是华人仍然疑虑重重，因为他们只听见打雷不见下雨，印尼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严惩暴徒，立法保护华人的利益。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9月10日）

印尼华人的空位任何人都可以填补？

谌焕义

印尼5月暴乱导致许多华裔逃往外国，没有了他们，印尼如何重建经济？他们的地位是否可轻易取代？作者从多方面分析这个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7月中旬，印尼总统哈比比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对逃离印尼的华人迟迟不敢回国的问题发表了“高见”。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如果华人因为不信任自己的国家而不愿回国，我不能强迫他们回国，任何人都不能强迫他们”；

二、“华人与土著印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属于社会性质的”；

三、“华人不回国，印尼不会完蛋”，“他们的空位将被其他人填补”。

稍有一点常识的人只要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哈比比总统的说法实在有失水准。对于印尼华人与印尼政府二者到底谁不信任谁的问题，人们只要了解华人反对荷兰殖民者所进行的斗争、华人为印尼独立所作重大贡献、华人为归化所作的努力，了解印尼历届政府对华人所实行的种族歧视与种族压制政策，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随着印尼民间组织及政府的调查机构对华人受害的调查的展开，华人与土著印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底是属于社会性质，还是属于政治性质的问题的答案也将不难得出。对于这两点，是用不着费一点笔墨加以驳斥的。

至于第三个论点：“华人不回国，印尼不会完蛋”，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华人的空位是否任何人都可以填补呢？如果由其他人填补华人的空位，印尼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进程会怎样呢？这倒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华人在东南亚获得经济上的成功的原因及印尼华人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恐怕就会得出与总统先生截然不同的结论。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9月10日）

真相尚未大白

——评印尼五月暴乱调查报告

赵子隆

正当印尼专责调查小组将于10月底发表五月暴乱华人妇女涉嫌被有组织施暴的调查报告之际，一名负责辅导受害妇女的印尼年轻华裔女义工、10月9日被发现伏尸于家中，身上有多处刀伤，据报在死前还曾遭性侵犯。对于首次有协助华妇强暴案受害者的志愿人员被杀，人权组织认为，案件显示有人意图掩饰五月排华暴乱的真相。

华裔女义工被杀

警方表示，17岁的死者王伊塔（中文名王静丽）是华裔学生。其父晚上发现她喉咙被割破、胃部及胸膛被利刀刺伤，王伊塔被送院后死亡。据验尸报告称，她死前曾遭人强奸。

王伊塔生前就读当地一间天主教中学，与母亲同是人权组织“人道志愿者”的义工。《雅加达邮报》称，她最少曾辅导4名于5月暴乱中被强暴妇女，母女二人还计划协助受害人人，前往美国，向国际人权组织揭露华妇强暴案的实情。

雅加达警察局长亚尤曼说，已逮捕一名20岁疑犯，他身上有假珠宝及衣服染有死者血迹。他的杀人动机是打劫。

许多人对已捕到疑犯的说法表示不相信，因为雅加达中心区警长哈尔亚特纳中校10月10日曾表示，房子没有失窃，打劫的动机已被排除。

人权活跃分子说，伊塔及她母亲原定于10月中旬到美国，就5月暴动期间华裔女子被强奸的事件，向国际人权组织作证，印尼主要人权事务律师哈西布安表示，他对警方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这次谋杀与她的志愿工作有关，其他宗教及人权领导人对警方的说法亦表示怀疑。对政府及军方可能参与压制目击者的行为表示震惊。

但是，印尼国家警察一名中将马上警告说，任何人将华裔少女王伊塔被杀事件政治化，以及散播虚假资料，警方都会对之采取法律行动。很明显，这是

一种威吓。

印尼人权组织“人道志愿者”的核心成员依塔称，印尼国内的人权组织数月来遭到各种恐怖行为的威胁和骚扰，包括恐吓电话、绑架威胁，甚至炸弹邮包，她说：“我们负责调查并协助5月暴乱被强暴妇女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常接到猥亵电话、口头污辱，以及声称要强奸她们的女儿等恐吓信息。”“人道志愿害”是最先揭露雅加达5月暴乱期间曾发生有组织轮奸活动的人权组织。其领导人、天主教神父桑迪亚万对记者说：“一个月前，我们为无家可归者开设的公开收容所，竟也受到暴徒袭击。不少在那里栖身的无家可归儿童被殴打。此类恐怖活动显然五月暴乱的幕后主脑有关。”依塔说，桑迪亚万神父的办公室更曾收到炸弹邮包。

暴乱实情报告问世

印尼官方，包括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多次坚称，未能找到证据证明发生过大量的强奸事件。在全球华人及国际社会强大压力下，印尼总统哈比比於7月宣布成立18人实情调查调查小组，调查5月暴乱。小组成员包括人权活动人士、高级警官、律师、政府官员和社区领袖，调查团对发生在雅加达等6个主要城市发生的暴乱，进行为期3个月的调查，并撰写报告。

11月3日，负责调查5月暴乱事件的联合实情调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交最后报告。报告说，5月暴乱是一场令人伤心的悲剧，给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威望与尊严留下污点，报告同时确认，暴乱期间共有80名妇女遭到强奸和侮辱。

这份长达27页的报告说，参与暴乱者由三种人组成：煽动者、积极参与者和消极参与者。煽动者受过训练，他们出头搞破坏、放火和煽动抢劫。积极参与者在受到煽动后进行范围更大的破坏，消极参与者开始是围观，后来也参与破坏和抢劫。

报告说，志愿者组织发现雅加达有1190人被烧死，27人被打死，27人受伤。警方说雅加达有451人死亡，受伤人数没有记载，报告发现有52人遭到强奸、另有28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10月26日，调查团成员班邦曾说，报告指出5月期间部分暴力事件是由军人煽动。一些证人表示，自击大批蓄军队发型的男子，乘坐货车徘徊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煽动市民参加暴乱，一些人手上更持有武器。不过班邦未有就印尼军人在暴乱中扮演的角色作任何猜测，部分反政府人士则坚称，军方是要藉

暴乱制造借口镇压异己，不过政府一直激烈否认有关指控。

因此，暴乱调查报告的公开，势将会使被指控前总统苏哈托执政期间严重侵犯人权、现正致力改善恶劣形象的印尼政府及军方，更感尴尬。所以实地调查组于11月3日向内阁部长提交正式的暴乱调查报告时，四名部长和两名政府高官全部缺席。

华人不相信当局会惩治真凶

军队总司令维兰托批评这个调查组织只进行分析，而不是坚持调查事实。他于11月4日反驳有关军队参与五月暴乱的指称。虽然暴乱调查报告指证有军人煽动排华暴潮，华人不相信当局真的愿意惩治元凶。而且，当局针对调查工作的暴力和破坏事件，至今仍未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当中自然包括华裔女义工一个月前涉嫌被奸杀的案件。同时，涉及绑架异见人士甚至可能与策动5月暴乱有关的苏哈托女婿布拉波禾将军，虽因为绑架案被解除官职，但军方迄今仍未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也令民间对暴乱得到真正彻查存疑。有分析指出，印尼政府展开调查，只是因为国际社会责难太大、雅加达有需要作出回应以挽回国家声誉，而不是真的追究真凶。在这种情况下，调查报告自然难以令人寄予厚望。

现在，印尼民间反对哈比比政府、要求彻底进行政治改革、限制军方干政的呼声愈来愈强烈，集中表现在大学生的抗议活动中。5月排华暴乱的真相能否揭露，真正的凶手及其幕后黑手能否予以惩处，恐怕也将取决于印尼政治改革的命运，而不能奢望于哈比比的善心或维兰托的“良心发现”。

11月上旬，印尼学生抗议运动由首都雅加达蔓延至全国，部分示威抗议行动后来演变为反华暴动，并触发军民冲突，酿成流血事件。

11月14日，数以千计的暴民袭击雅加达多个购物中心，抢掠商店并纵火烧民居和货物。当地华人又成为暴乱的受害者，不少华人想离开印尼去新加坡、香港暂避，但因通往机场的公路经常为暴动人潮所阻塞，或途中遭暴徒抢劫，无法离开，中国正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11—12月号）

我们受够了！

——一名印尼华裔的心声

拉哈瑜·拉那宁西赫 (Rahayu Ratnaningsih)

本文作者生于印尼，长于印尼，他跟当地社会共同呼吸、共享喜悦与分忧，可是五月暴乱却使他看清楚印尼华裔虽摒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化，跟土著印尼人认同，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岂知这场浩劫，他们却因肤色不同而被印尼人迫害，华裔妇女更惨遭奸淫掳掠。本文作者在万念俱灰下，发出无助、哀伤又愤怒的控诉。

当印尼绝大多数人民跟苏哈多那鱼肉百姓和贪赃枉法的政权对抗时，我跟他们拥有强烈的认同；当4名特里萨克蒂大学的学生被杀害时，我跟他们一起哭泣，并从不姑息只让某些有特权的人沾到利益的政风。

然而，至今我才恍然大悟到我正在备受一场重大的认同危机所折磨，这是许多与我同族的人所共有的，而且，这是以遭人遗弃的莫大感触浮现出来。

如今我想把在我体内所烫烧的东西给诉说个明白。我在体验着一种对于我所知道的唯一家园挥之不去的灰心沮丧，一种跟印尼其他的所有华裔子孙所共同拥有的经验。

对一个印尼人来说，或者较准确地说是印尼华裔，如今还剩下什么可引以为自豪的？简直没一件东西了。

我长久以来相信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能互忍互让的回教社会，其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结构蕴含着绚丽多姿的自然风采。如今，是同样这个国家，在一些人看来，却是另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纳粹政体，其华人正在顶替犹太人的位子。

许多逃离这个国家的印尼华人还是害怕回来。他们觉得最近所挨受的种族迫害是一个反复发作的病症，其根源可追溯到荷兰的殖民时代。它在苏卡诺当政时已露出了狰狞面目，并在苏哈多在位的整个时期，变本加厉地更为无处不在以及加以制度化。

许多人相信在并不太遥远的将来，迫害会再度爆发。那些目前在海外的有钱印尼华裔也许没什么可担心的，但绝大多数人并没有金钱可逃走，更何况他

们的财产在5月暴动中已大部分被焚毁和抢掠一空了。如今，他们必须在为下一轮暴动担惊受怕的日子里谋生过活。

过去的60天充斥着许多滔滔雄辩，讨论印尼华人在他们受迫害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仗着政府以及人口既庞大又占绝大多数的印尼国民那边厢骇人视听的沉默娓娓道来。

怀着把注意力从最近侵犯人权的严重性转移的企图，许多人诉诸于那听厌了的老掉牙的一刀切说法，指大多数华人是唯利是图、有钱到浑身铜臭、贪得无厌、较为不爱国、以及倾向于狼狈为奸。

教人惊骇的是，同样的辩解在最近一个题为《微型改革》的特别报道中通过国营的印尼电视台广播，这个波道基本上是政府的代言人。

它也播放了前宗教事务部长塔马兹·塔赫的评论；此人暗示说，印尼华人遭到迫害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力求与有权力者连成一气，而不是跟普通百姓交往。

我深信这个出版了一本关于印尼华人历史的书的人，在他标榜自己是这个国家种族关系的专家之前，必须进行更多考究，以核实他的说法。

那个节目的评述员以印尼华人应尽更大的力气融入其他的印尼人里头，避免建起有高围墙的豪华房子，以及加入社区巡夜更的队伍，总结这个报道。

当然，绝大多数有钱的马来人也建起豪宅，以及绝大多数的中上阶级的马来人从不加入巡夜更的队伍这个事实跟这个话题扯不上关系，因此是不值一提的。

虽摒弃了传统、语言与信仰印尼华裔仍受歧视

印尼政府最为荒谬可笑、惺惺作态和明目张胆的举措，而这事端是在苏哈多政权下发生的，是告诉华人背弃他们的根源以及薪火相传的文化，从而能更加快速地融入印尼社会。

在乖乖遵守每一道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政令之后——从逼令他们把姓名改换掉到摒弃他们的传统、语言与信仰——印尼华人仍然发现自己被有偏见的待遇所围攻。

结果冒出了困惑、迷失的一代，而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分子；这一代人有时为承认自己是华裔而感到尴尬，仿佛作为华人是一桩教人难堪的羞耻。

这一批人从不知道有别的乡土，绝大多数是讲印尼国语，在印尼被抚养长

大并接受教育，跟土著印尼人并肩工作、一起相处，然而，他们却因为自己的种族根源而仍然是一批不入流的外人。

教科书只字不提印尼华裔为国家的一分子

跟把自身描绘为将三个主要种族——马来人、华人与印度人——包容、融合为一个社群的马来西亚不一样，印尼学生虽被教导说他们的国家有缤纷不一的种族与文化，却没有一本学校教科书中提到华族是融入了印尼这一国家的一分子。

放着这些事实，尽管事实上他们是印尼共和国的正式国民，华人对自己的地位与处境仍然感到不确定，怎么会是咄咄怪事呢？

深感不属于自己的国家如何可被要求有爱国心？

就事论事，如果华人族群被搞到深感他们并不属于这个他们所出生的国家，他们如何可以被要求表现他们的爱国心？

根据我的记忆，70年代当华人传统的舞狮和舞龙仍被准许表演时，马来人和华人在这些文化盛宴上共同享受欢乐时刻。有些非华族甚至在这些表演中翩翩起舞。在那时节，文化关系是大大和谐得多。

我坚信，在一个说是为了大伙儿莫大好处的虚假推论下，逼使摈弃根源和自行剥除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应该在这一个自称为文明的国家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迫害。

这跟前南非政权所采用的种族隔离制度是异曲同工的。因此，印尼的种族主义并不只是关系到几个离群单干的带有偏见的人，而是有系统和有结构的。

苏哈托分而治之的政策为恐吓与刮财开了方便之门

跟政府有关族裔与种族纠纷的堂皇说法形成欲盖弥彰的对比，在这个国家把华人与其他的族群隔绝开来，是苏哈多政权通过其“分而治之”的政策所处境心积虑炮制出来的。

这个策略的第一个好处是，它让那些居于权位者可以从中利用华人从商的长袖善舞与政治上的不堪一击，这个巧妙组合为通过恐吓与勒索搜刮财富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个好处是，它让政府得以挡开了注意力，遮掩了它本身对于处置无权的华人是一筹莫展。这阴差阳错地使到华人族群为了求取保护而更为依赖政府，并提供了更多可资勒索的筹码。

通过禁绝所有的华族文化图像，苏哈多在国家的其他族群与文化团体当中撒下了猜疑的种子。

这延伸成为一种直觉，把有关华族文化的东西都看作是不友好以及灾难的潜在导火线，其中一个实例就是共产党的威胁。

就如我们所目睹的，去年和5月，当这个国家遍处皆有华人被强奸和屠宰时，苏哈多都始终保持沉默。由得华人去保卫自己，是他最为坏透了的政治罪行。

这种奸猾的掩人耳目的逼害，歪打正着地使到华人更为依赖苏哈多的政权。他们死心塌地地相信只有他的政权可以救他们脱离回教主流社会时常冲着他们而来的敌意。

当政者对华裔没半句道歉

苏哈多以他有关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的堂皇言论，得心应手地玩弄这样子的心理游戏。

如今，印尼华人的生意既已大部分给毁掉，人们开始感觉到它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印尼主流社会对于华人这少数民族欲送还迎的态度，如今已可非常清楚得看出来了。当他们一边抗议华人垄断经济的当儿，他们如今也已意识到，虽可对绝大多数华人的商业是经由与政府官员勾结而兴盛起来作出声讨，但没有了华人，他们又不能够重建经济。

揆情度理，对于马来商人来说，要重建经济并取代华人前此所垄断的领域，不应该是个问题。其实，这是他们证实他们可以像华人一样把工作做得好的一个大好时机。

因此，为什么还是有对携着金钱活着从动乱中逃脱出来的华人作出谴责的愤怒声音？

对于顶过了60天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好些非政府组织所施加的猛烈压力，从哈比比或武装部队首长那里仍没有哼出片言只字的道歉，我感觉好生讶异。他们的惟一姿势是呼吁那些去国逃难的华人回来重新开办他们的业务。多么方便的事啊。你不可以鱼与熊掌兼得的。在目睹了他们的家庭成员遭到凌虐以及

他们的妇女被轮奸后，华人社群如今被告知应依旧效忠国家和以国家为重。

这是我们说受够了的时候。我们尊贵的领袖们必须停止所有印尼华人应有爱国情怀的讨论，直到他们被赋予了作为国民所应得的平等权利。

进一步说，印尼华人不应该考虑重新开设业务，直到政府撤除了在过去32年由苏哈多政权所实行的种族主义政策，而且新的政府要能够确保他们的安全。

他们必须停止把华人社群看作是可以随意压榨的摇钱树。在华人那一边，他们应该停止给予其他印尼人卑下的称号，并对他们少点趾高气扬的态度。我们已经由一条沉痛的道路领受了被人看成一丘之貉以及歧视的感觉，因此，我们绝不能施诸于别人如此可恶的行为。

我想以自己作为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一刀切说法是多么地残酷。我是在印尼出世的，不会讲一字半句的中文，而是讲印尼语、巽他语（Sundanese）和英语、只有一个印尼名字、大多时是混迹在土著印尼人中并感到完全坦然自若，并且从未居住在华人与外隔绝的设备多样的住宅区里。

我在孩提时是和甘榜里的小孩玩耍，有时从他们的盘中舀食物来吃，并在他们的床上睡觉。我绝大多数的好朋友是土著回教徒。而今的我甚至再也没接触任何的华人传统了；对我来说，华人新年并没有任何显著意义。

贫穷的乡下华人与原住民鸡犬相闻地住在一块

在茂物我们所居住的人口稠密的甘榜里，几乎没有与外隔绝的华人群落。贫穷和朴实的华人跟原住民鸡犬相闻地住在一起。我的父亲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因为他的父母是那么地贫穷。我们远近亲族系中数以百计的族人里，有许多是从一个粗活转到另一个粗活，以赚取生活上的温饱。

我们完全没一点像许多土著以偏概全地把印尼华人所看成的那类货色：富有到一身齷齪的经济动物。我攻读大学时，国立大学所依据的定额政策下构成一小撮的华裔学生里，当有许多人，包括我在内是乘坐公共巴士的时候，我的许多土著朋友则驾车到校园去。

当然，我须承认，是有那么一批将金钱奉为神明、贪得无厌、藐视异族和伤风败俗的印尼华裔商人：那种以金钱主宰任何事务和任何人而为此感到称心快意的人。

当然，也有住在以高围墙与外头隔离开来的豪宅里的印尼华裔。然而，不也是有落入这一类别的土著印尼人吗？居住在孟登和“美丽村”的富有土著当

真就跟他们的邻居，更别说是邻近村民打成一片了吗？

有些人提议印尼华人不应建起宏伟豪华的房子，因为这会造成嫉妒。那么所有的有钱人，不论是华裔或其他族裔，都应避免这么做，肯定是一个更高一筹的建议。然而，这个贸然发出的呼吁可又真的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许多土著无法看出，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印尼华人也是有各式各样的。他们一路走来就是有不同面貌身段与不同的积习。

来自唐格朗的形貌与土著无从区别的印尼华人，跟那些来自棉兰的是完全不相似。同样地，来自中爪哇、在日常生活里讲爪哇语的印尼华人，跟来自坤甸的印尼华人是不相同的。

印尼华裔并非全都排外与歧视外族

诚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印尼华人跟土著间的融合是有着高低不一的程度；有些是比另一些更为排外。但把所有的华人一古脑儿说成是排外与歧视外族，则是荒谬的，就如我在个人以及专业的层面上自身体验所见证的。

作为一个代人网罗人才者，我遭遇过一个印尼华裔商人求聘华裔会计师的情况；同样地，国营的公司则从最佳雇员人选档册中把印尼华人给剔除掉。

而今，许多较年轻的印尼华人是专业人士或私人企业界里的雇员，就像我本身以及我许多的朋友一样。其他人则是知识分子、运动员、艺术家、教师或教授。

只是有个问题，我们是那么倾向于搞双重标准。当一个印尼华人由于涉及诈骗案而被捕时，他的华人身分随时随地就被媒体公诸于世；然而，当郭建义的、王福涵的、或者布迪曼的想法与才思被广为接纳，又或者王莲香的和梁海量的国际成就受到激赏，他们却被看作是异数。

绝大多数的印尼华裔都依从官员的每一个索求

他们的确是异数，就如瓦希德、马德吉和曼坤一样。值得大书特书的人永远都属于一小撮人，不管他们是什么种族背景。

然而，把一般的印尼华人统统说成是逐臭之徒，是彻彻底底地不公平。事实上，绝大多数是依从官员对他们所提的每一索求的唯唯诺诺的国民。

他们恭恭敬敬地把他们的名字换成了印尼式或阿拉伯式、静悄悄地庆祝华

人新年，或甚至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儒教改为5个被批准的宗教之一。每当他们要获得或更新紧要的文件，或替孩子报读学校，他们都毕恭毕敬地呈上一大叠从出生证明、国民身分证明到姓名更换证明都有的文件。

想象一下那官样名目：尽管事实上你是在印尼出世而父母也是印尼人、在这个国家受教育、只会讲印尼话，以及只有一个印尼名字，只要你看起来像华人，你就永远必须能够证明你是印尼国民。

即使你拥有了一张本就需通过冗长程序才可获得的身分证，或者是一本印尼护照，这种折磨，你仍得继续承受下去。

为掮客开拓了一个有油水可捞的环境

人们应该体谅到，在政治上既是一筹莫展，金钱是绝大多数印尼华人用来讨价还价的唯一工具。许多人，就如我父亲那样，为这些不公正的歧视与勒索感到懊丧与不胜其烦，以至到了他们再不愿跟官僚本身周旋而是经由第三者去办的地步。

这为“掮客”服务开拓了一个有油水可捞的环境，而这是在拥有有效公共服务和贪污处于极轻微水平的国家中所闻所未闻的。因此，简单地把在印尼肆虐的无法无天的贪赃枉法与官商勾结怪罪到人口中占4%的华裔头上，是荒唐可笑的。并不须用太多智慧就可看出这一论断是多么地愚昧。

有多少个印尼华人真的有门道与权力暗通款曲呢？在为数约800万的人口，权且说有8000人跟居高位的官员经常有商业联系，而这不过是相等于印尼华裔人口中的0.1%而已。

因此，说大多数华人是单靠与官府勾结以搜刮财富的心术不正的商人这个毫无根据的推断，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这些人可真的明白，当受困于几乎每道官设障碍，与土著官员周旋时，在金钱和感受上遭受压榨的滋味是怎样的吗？放着能在有进展和停滞不前之间作选择，他们依赖金钱去推动制度中难以计算的贪污齿轮，是不可想象的事吗？

授受贿赂是印尼人谋生之道

或许他们应思忖一下，如果印尼的华人拒绝朝口袋深处摸出钱来，那将会

发生什么事？授受贿赂是这里的谋生之道。华人与非华人皆一样被迫交出钱财以把事情办成，唯一不同的是华人所交出的比较多。他们必须得如此。是谁盘踞在公共服务与政府的职位上？是印尼的土著。

这又是个老问题，有关印尼华人是鱼肉印尼百姓的暴虐制度中的元凶这个作贼喊捉贼的诬称，是从哪里变出来的？

换句话说，种族主义、贪赃枉法和官商勾结都是相因相生的；它们跟制度是无法分割开来的。是这个制度应受到责怪。而排外性和个人主义是都市化社会所必有的特征，其成员在工作好长一天后只有少许的时间去交际。因此，我想，真正的症结不是华人与土著分庭抗礼，而是贫富之间的差距。

问题的症结是，在创设一个给予所有国民，土著连同非土著，平等机会的公正制度上，苏哈多政权交了白卷。

要是给了华人通向非经济领域的门道，他们就不会专心一致地只顾赚钱。要是他们被接纳出任政府职位，他们对于社会的贡献，在头脑单纯、一般的土著印尼人眼中，将是昭然若揭；这些人偏向于把任何印尼华人对经济所作的贡献拟想成仅仅是贪婪与物质主义的产物。

这些人看来是未曾意识到，没有了印尼华人欣欣向荣的商业，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垮下来，而这苦头的开端正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

有个英国朋友最近悲愁地忆述说，当他知道在格洛多克的其中一家他不时光顾的电脑店被焚毁与抢掠一空，他是多么地伤心。那华商店东是一个竭尽其所能为他的顾客服务的可靠年轻人。他就他的产品给予客人诚恳的意见与信息、合理的价格和顶呱呱的售后服务。他肯定跟有些土著印尼人在想到印尼华裔商人时所采信的一刀切说法：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以及搞分化不相吻合。

我非常肯定95%的华裔商人生意兴隆，是因为他们能锲而不舍地以合理和胜人一筹的价格提供良好与可靠的服务。他们门庭如市，是因为连土著印尼人本身，乃至外国，跟他们有生意往来可从中受惠。或许本身没意识到，在其内心深处，土著往往宁愿与印尼华人有生意的来往，多过于跟他们自己人。

这样的深得人心正是印尼政府为什么在建设国家的初始阶段给予华裔商人许多特许权的原因。毫无疑问，他们是国家经济的发动机。他们提供了人们所需要的服务。除此之外，他们为许多土著提供了生计来源，以至于当暴动者抢劫和发动攻击时，他们其实不只是在咬伤，还砍断了那些养活他们自己人的手！

如今，他们在经济上过于财雄势大，在他们和他们土著异族同胞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应受到责怪的，是挟着其拙劣的经济政策以及低素质官员犯错的政府。苏哈多轻描淡写地把一个与经济发展并行的同等重要的使命给忘了，这个使命叫建国大业。

概括来说，在印尼原住民当中对于印尼华人社群无所不在的成见，构成了印尼经已败坏不堪的形象中的另一个巨大缺陷。在此之前，世人感觉到印尼政府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为侵犯人权的，而如今，随着暴动的发生，社会的某些群体已经证实了，他们也同样是善于做出令人震惊的暴行。

印尼正受到世人注目，而随着遭洗劫的楼宇已灰飞烟灭，留给世界凝视的就是那种族偏见的污点。这是个深深渗透到了遍及全世界人类意识中的污点：从仍可在我们千疮百孔的商业领域中找到残存希望的潜在投资者，到大火狂烧与流血的新闻镜头把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岛屿遮掩掉的度假者，都看到了这个污点。

（译自印尼《雅加达邮报》，作者是驻雅加达的人力资源顾问）

华人应有信心在印尼长期生存

焕发

近一年来，遍及全印尼各大中小城市的排华大暴乱，特别是今年5月，棉兰地区、雅加达以及梭罗某城市的排华大暴乱，给印尼华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精神上的打击和心灵上的创伤都是前所未有的。直到现在，由於经济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印尼全国各地都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排华骚乱事件此起彼伏。于是，印尼华人不能不提出一个发自内心的问题：华人是否还能在印尼这块土地上长期生存下去？

为什么必须在印尼长期生存下去，难道没有别的去路吗？

别的出路多的是，可是能走得动，离得开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全印尼华裔总数近千万人，经济情况较好、能走的人数顶多是一成，九成以上的华裔还是要留下来，还是必须要在印尼长期生存下去。

回顾过去，我们的华裔祖先在1000多年以前就已来到了印尼。他们勤俭刻苦，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大脑，不但为自己扎下了根，建立了家园，也为印尼各方面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的处境并不是一帆风顺。他们经历了荷兰殖民主义者长期的压迫和残酷剥削。经历了1704年为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而遭到大屠杀的“红溪惨案”。1946年日本投降之初、因少数反华分子的煽动，他们又经历了数以千计华裔惨遭杀害的“文登惨案”。但我们的祖先毕竟熬过来了，不仅是生存下来，而且是不断发展壮大，华裔遍布于印尼各地。

如果说，我们的祖先当年在最艰苦而又孤立无援的条件下，只是靠了自身的团结及奋力拼搏而生存和发展下来，那么华裔今天的处境和条件优越於当年我们的祖先很多，我们有什么理由失去在这里长期生存下去的信心呢？

我们要正视现在。一个方面，历次反华排华暗流，只是极少数政治野心家和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所为，广大的印尼人民与印尼华裔都是非常友好和亲善的。就拿这次遍及全印尼的排华大暴乱来分析，也只是个别的政治野心家在幕后操纵、控制，绝大多数参与暴乱者都是被蒙蔽或被一时的私欲所驱使，与

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暴乱中华裔和印尼人民联手抗暴以及印尼人民在暴乱中如何奋不顾身去救出华裔的感人事迹。此外,在暴乱中几乎每个华裔家里的印尼佣人、工人、司机、职员等等与华裔主人团结合作,共同对付来犯的暴徒。

正视现在的另一个方面是:印尼华裔先辈在印尼上千年的辛勤劳动,已为华裔后代在印尼的经济基础扎下了根。遍布于印尼各大中小城市的华裔经销商、代理商、零售商,在引进外资及促进印尼国内的城乡交流方面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功劳;为稳定千百万印尼城乡人民的生活作出了贡献。像这样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对印尼的国家和人民是完全有利的。如果硬要加以摧毁,那无异於自毁长城,自取其咎。再说印尼华裔这一经济结构,是几百年打下的基础,就像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要把它连根拔掉就不是那么容易。纵使最后连根拔了,留下的空白也难以填补。

众所周知,印尼自然条件优越,整年风调雨顺,土地肥沃、还拥有丰富的矿藏和海洋资源,可说已占尽了天时地利,而缺少的都是最重要的“人和”。换句话说,今天印尼的经济破产和民不聊生,全是由于苏哈托政权32年来贪污腐败和独裁专制造成的。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苏哈托被迫引退,但是,苏哈托所指定的代理人哈比比却又是他一手提拔的同路人,而他本身仍在幕後操纵,令百孔千疮的经济每况愈下,越搞越糟。

当前,印尼好些地区都出现了饥民为抢粮食而发生的骚乱;大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游行示威,要求改变现状。一些华裔又如“惊弓之鸟”,担心5月排华暴乱卷土重来。各地骚乱还会零星发生,但是过去策动大规模暴乱的黑手已是强弩之末,大概成不了气候。

当前的印尼,最难熬的一刻相信即将过去。前路虽然依然曲折,但是经历了政治、经济上的伤痛,各族人民已经觉醒,民主运动必将不断推进,并促进社会多元化,种族关系趋向和缓,黑势力制造种族暴乱的图谋难以得逞。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11—12月号)

印尼排华运动的前因后果

吴金帆 林洛川

1998年5月，在地球的赤道线上，曾经以拥有优美的舞蹈、动听的民歌为荣的千岛之国的印尼，不幸发生了一宗宗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针对华裔印尼人的惨案。这一宗宗惨案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党、日本皇军的种种罪行、可谓“不遑多让”！暴徒们有组织有预谋的罪行，实际上已令国家声誉受损、民族蒙羞。

在人类即将步入21世纪，进一步冲破疆界地域、种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人为局限，进入一个更高尚、更文明和更和睦相处的新世界，竟会发生如此难以置信的惨案，岂不令人深思！人们有必要去探求其前因后果，找出制止的方法，祈求人类社会不再发生类似的灭绝人性的暴行。

印尼历次排华事件，往往把华裔和“原住民”对立起来，制造民族矛盾。因此，有必要探讨一下“原住民”这个概念的历史含义。

现在的印尼民族，有人考据其祖先是发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主要是云南省，和现在云南省的傣族是同一祖先。在历史久远的年代，傣族的祖先向南迁徙，先到泰国，即现在的泰国民族；再向南迁徙到马来亚，即现在的马来民族；再继续南迁到印尼诸岛，就是现在的印尼民族。

在这个民族大迁徙之前居住在印尼诸岛的真正的“原住民”，大都逃到更荒凉的深山野林，如今在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仍有他们的后裔。

因此，“原住民”这个属于民族学的名词，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一个民族（族裔）迁徙到某一新地方，最初应是“外来者”，定居下来后，世代相传，慢慢就由“外来者”变成了“原住民”——这是相对于再迟来的“外来者”而言。

早在汉唐时代，华人已经有迁徙到印尼诸岛的记载。现在为数众多的华裔印尼人已经是几代甚至是几十代居住在印尼的。他们中有很多人只知道自己是

华族而已，对于中国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还被当作“外来者”的“次等公民”呢？

随着社会的更加现代化，人权和民主已成为人类生活的空气和阳光，“原住民”这个概念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否定现代国家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他们坚持国家应该是单一民族（主流民族）一种文化（主流民族的文化）的国家。他们排斥和歧视其他少数族裔和这些族裔的文化——甚至不惜采取种族灭绝的“强制同化”政策。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类发展史去分析和驳斥他们的谬论。

人类的“迁徙”行动自古已然，今后仍然，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游牧民族的“逐草而居”是一种和平的集体大迁徙；古代部落战争、诸侯争霸，占领对方土地，统治对方，这是以武力为依赖的大规模殖民“迁徙”；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强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侵略扩张，更是以武力为依赖的大规模殖民“迁徙”。

个体的和平的“迁徙”移民，自人类有史以来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从未间断过的。这种“迁徙”不是以伤害原住民、侵占原住民利益为前提的。纯粹是一种民间的、和平的、以谋生为目的的个体“迁徙”。在居留地谋生活动，客观上也促进了当地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融入社会作出贡献。

华人的“迁徙”移民印尼诸岛，就是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一部分华人，如居于勿里洞和邦加岛等地的华人，则是当年在荷兰殖民时代，被整批整批的以“卖猪仔”的形式，被迫“迁徙”到当地开矿做苦工的穷人。世代相传，为数众多的华人从未有以武力去驱赶原住民，更没有任何统治原住民的意图。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荷兰殖民者曾统治印尼350年，日本帝国主义也曾占领印尼3年，他们当年如何以武力为依赖的殖民“迁徙”，建立专制的殖民政权的历史，现今年过70的印尼老人都有深刻的印象，历史上对这史实也有记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部落制度的崩溃，各种姓、各族裔，在社会这个大环境里杂居共处、和平交往，这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今社会由于交通和资讯的高度发达，个体的“迁徙”移民绝对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因此，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可能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单一一体”，而是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组成的“综合体”。想要回到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单一一体”国家，完全是逆社会之潮流、逆历史发展而行的文明大倒退。

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法西斯奉行的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是极端反动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荷兰殖民者从17世纪以来统治印尼350年。殖民统治者的统治手段不外乎分而治之和寻找统治者的代理人。确实有一些上层华人和上层原住民充当他们的代理人,但毕竟这仅仅是广大的华人和原住民中的极少数。因此,不能说有少数原住民做了荷兰殖民者的代理人,就说原住民都是殖民者代理人。

同理,不能说有少数华人做了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代理人,就说华人都是殖民者代理人。漠视这一点,认为华人都是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代理人,在逻辑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二

在荷兰殖民统治者和原住民中间,夹着大量从事小商小贩的华人。广大的下层原住民,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是和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华人,却未必看到红须绿眼的殖民统治者。他们直接感受到的是日常小商品价格越来越贵,农业土特产品的收购价格却越来越低贱。他们看不到在背后真正操纵价格变化、实行经济掠夺的是荷兰殖民者控制的大公司,只是凭直觉而得出错误的结论:华人操纵经济。

荷兰殖民统治者是乐见这种情况的,可以把反荷的情绪转卸给华人。实际上他们也不断地挑拨离间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可以分而治之,或让两个民族的力量互相抵销,以便其坐享渔人之利。因此,印尼华裔成为印尼政局从不间断的集团利益斗争的代罪羔羊。

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承荷兰殖民者的统治手段。在日本皇军“驾临”千岛之国前,他们早已经派遣了为数不少的间谍,渗透到印尼各地。日本间谍们很清楚看到,要让皇军顺利“进入”印尼,上策就是挑拨原住民和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他们到处散布华人是“支那狗”(印尼当局叫华人为“支那”(Cina)即始于此时),华人是“吸血鬼”;只有日本皇军才能“拯救”印尼原住民,只有日本皇军和印尼才能“共荣共进”。当然,原住民中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后来也觉醒过来,高举抗日义旗,还有很多华人也加入了这个抗日战争的行列。

无视这些历史事实,潜移默化地接受荷兰殖民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挑拨离间中散播的排华仇华论调,恰恰是中了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所设下的圈

套，对印尼民族和国家产生长远的伤害。

华人移民印尼诸岛时，本身都是“外来者”。他们没有土地，也没有像殖民者一样用武力去强占土地，因此不能从事他们熟悉的农业生产，转而从事体力劳动或经营小商小贩，尤其是后者。华人以其刻苦耐劳和惊人毅力，深入到穷乡僻壤经营小商小贩。主要是把日常生活必需商品送到贫苦农民手里，然后收购各种农业土特产品，运到城市卖给大公司，赚取蝇头微利过日子。

如果用人体内的微血管来形容这些小商小贩的经济活动是颇为贴切的。作为一个农业社会，这样的销售网和收购网是完全不可缺少的，对社会有其宝贵的贡献。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占领印尼时，印尼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商业网络尚未形成，有些地方仍存有物物交换的简单贸易方式。因此华人的营商方式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但是，当时夹在原住民和荷兰殖民者中间的华人，其地位是极其微妙的。一方面，他们提供了这个农业社会所必需的大部分的供求需要，自己也从中赚取一定的利润，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荷兰殖民者也通过华人的这个供销网络巧取豪夺印尼的大量财富。华人这种微妙的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他们的能力所能改变的。这也是荷兰殖民者所乐见的，决不是如有的人说的那样，荷兰殖民者给华人以特殊的“照顾”。

相反，华人如超出这个范畴，威胁到荷兰殖民者的利益时，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甚至进行大规模的屠杀。有人说：华人有当上荷兰殖民者的“买办”。不错，正如有原住民也当上荷兰殖民者的“买办”一样。但是，这是极少数人而并非全部！

如果因少数的华人当了“买办”就说华人全都是“买办”，这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而这种似是而非的犯了逻辑错误的论调，反复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一些无知者也跟风，乐此不疲，中伤华人。

1945年印尼独立，荷兰殖民者撤离印尼。华人经济曾有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但很快就面临剪钞和限制的新挫折。50年代，当时的穆罕默德·哈达副总统访问中国，向中国取经，目的是学习中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回印尼后他就大力推广类似的合作社运动，想去取代和排斥华人在乡村和县城的小商小贩的商业活动。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使这项“合作社运动”半途而废、无疾而终；另一方面，华人营商虽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凭藉毅力和耐力，诚恳友好的经商态

度而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克服各种困难，仍然得以坚持下去。

到了60年代，经过长期策划和准备，苏加诺总统颁布严厉的法令P.P.10，宣布严格限制华人商业活动的10条规定：禁止华人在县以下的所有商业活动。强制华人结束小商小贩的生意，并必须离开县以下地区，由此而掀起了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排华反华浪潮。

华人不得不涌向大城市，生活顿失依据。其中一部分就愤而离开印尼回到中国；中国政府也多次派船接侨回国。可是绝大部分华人仍然只能留在印尼挣扎求生。此后为争取生存空间，大部分相继归化，入印尼籍，成了华裔印尼公民。

受到P.P.10条例打击的，首当其冲当然是广大华人。同时印尼整体经济实际上也受到很大伤害，其后果就是商品、产品难于疏导，物资交流困难，使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之境，广大人民特别是县以下的农民，生活更加困难，怨声四起。

60年代中期，印尼进入了苏哈托执政的年代。除在政治上继续严厉对待华裔之外，在经济上他却要借助华裔来恢复百废待兴的印尼经济。因此他放宽了华裔营商限制，包括允许在县以下的营商活动。于是华裔商业活动再次活跃起来，物资交流迅速改善，整体经济大有转机。

在这个阶段，苏哈托政权以种种有利的“保护”藉口和专利经营权，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逐步取得经济上的主导作用。少数华裔上层人物能够和皇亲国戚、当权官僚取得“合作”关系，因而可分到一杯羹，但绝对不是所有的华裔都可以分享到的！

实际上，华裔经济在整体经济内所占比重，是越来越小；全印尼主要的商品和行业，例如石油、矿产、林木、各种土特产、粮食、城市房地产建筑、银行金融等，都被有背景的特权集团所垄断和控制。据估计，单只苏哈托家族集团所掠夺的财富就达数以百亿美元。所谓“占不到人口3%的华人控制70%以上的财富”，所谓“华人掌握印尼经济的命脉”，只是捏造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而已。

何谓“控制经济命脉”？这是指某个社会经济力量（或财团）控制这个国家的关键性的经济部门（或方面），其力量足以影响政权的决策能力。他们可以在建制内派遣或寻找代理人，甚至直接加入建制，或用自己控制的经济力量，去逼使政权就范，以制订有利自己或保护自己的经济王国的各种法规和法令。

反观印尼华裔的经济力量，能有这些威力吗？如果有的话，也不致遭此悲惨下场了。利用民族之间某些矛盾或个别事件，猜疑妒忌的心理，把华裔描绘成“掠夺者”、“吸血鬼”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以这样的谎言，捏造的藉口，去煽动广大的贫民的排华情绪，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谋私利的政客们惯用的下流手段和卑鄙伎俩，藉以掩盖造成人民穷困的真正原因，转移广大平民对现实不满的目标，把灾难转嫁给华裔印尼人。

事实是华裔经济已经是印尼民族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荣辱盛衰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精明的当政者应该认识到华裔经济的作用和贡献，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对待华裔公民，善用和发挥华裔经济的长处和优点，来促进印尼整体的民族经济。

三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投降。此时，印尼共和国在苏加诺领导下宣布独立，设临时首都于日惹市。荷兰殖民者仍幻想重温旧梦，继续统治印尼，一场争夺战就此爆发了。在联合国支持下，印尼正义之战获得胜利，从而结束荷兰长达350年的殖民统治。在交战期间，出现了较闻名的民族革命者，如苏加诺、穆罕默达·哈达、苏多莫等领袖人物。他们每天利用广播电台演讲，制造舆论去唤起民众抵抗荷兰殖民军队。

然而最令人失望的是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的苏多莫，在他每天长达三、四个钟头的演讲中，花大部分时间都在谩骂华人，攻击华人，譬如今天专题讲卖花生的华人，来印尼时只穿一条裤子和一件背心在街头挑卖，不久之后就会由印尼人来挑担子，华人走在前面叫卖；再过不久，华人就租小店铺，雇印尼人做，自己则当老板。到了次日，他专题讲卖布的华人如何如何；后天再说卖面的、卖杂货的华人……

他利用电台广播之便大肆煽动排华仇华情绪，向印尼人灌输所谓“所有华人的财富是搜括民脂民膏得来的”。不从正面教育人们要刻苦耐劳、勤俭持家、积少成多、改善生活。而是在字里行间充满嫉妒、仇恨、侮辱华人，给纯朴的印尼人民在心中留下排华、仇华的错误观念，日复一日，在脑海里造成了深刻的烙印。

当时最显著的变化是在青少年学生中间广泛地流传以“支那”代替“华人”（Orang Tionghoa）来称呼华人。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迅速蔓延到全印尼。更

有甚者，受影响的教育界甚至把这个排华仇华的思想意识当成是“民族主义”的教材内容之一。苏多莫这样具煽动性演讲的结果，最后竟演变成反华排华的社会基础之一。

诚然，在对抗外来殖民侵略者的斗争中，用民族主义的口号作宣传内容是一种最能迅速发动群众的策略。但是矛头要对正，否则会伤及朋友、伤及无辜。或者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发动下层人民大众，就拿与基层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华人来祭旗。这无疑是在这个国家埋下了民族矛盾的“地雷”。

经过二十多年的渲染，这种排华仇华情绪的社会基础日益加剧。到了1965年，已由意识形态发展到具体制定政策性条款的阶段。在苏哈托夺取政权前夕，又一次利用掀起排华浪潮：在赶尽杀绝印尼共产党分子的同时，印尼华人被打成“印尼共产党同情者”而广泛地遭到迫害和打击，当局以此为藉■推行更彻底的排华政策。

原以为双重国籍问题解决后，华裔印尼公民可以世代在印尼安居乐业，为印尼社会的繁荣作出贡献。然而事与愿违，美梦破灭，华裔印尼人真正成了无依无靠的“非原住民”孤儿，成了统治集团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筹码和代罪羔羊。

苏哈托夺取政权之后，为谋使经济摆脱困境，在经济上虽然又放宽华裔的经商限制，在政治上却对华裔实行一系列更加严厉的“强制同化”的政策。扼杀作为印尼公民的华裔在其他领域的权益，扼杀其平等的公民权。

例如：禁止华裔参政参军、关闭华文学校、限制华裔进大学、严禁使用华文；华裔要放弃华文姓名，用印尼文改名换姓，并在华裔居民证上打上“非原住民”（Non Pribumi）记号等等。他们公然违背联合国关于人权的宣言和公约，严重侵犯华裔的基本人权，进一步把华裔族群与其他的族群对立起来。

自从苏哈托上台以来，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多起排华事件。由于苏哈托政权的基础未动摇过，所以每次排华事件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手段而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扩大以致动摇其政权。目的达到后就平息下去，之后又利用华裔搞经济。在苏哈托执政三十多年期间，广大华裔对之习以为常，感到麻木了，并没有意识到被扼杀了的公民权益，早已潜伏着关系到自身生死存亡的政治危机了！

今年4、5月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印尼经济迅速陷入困境，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苏哈托政权面对前所未有的如火如荼的“反贪污、反独裁”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学生运动。苏哈托又重施故伎，指使亲信有组织有计划地挑起

更猛烈的排华浪潮。用意非常清楚，即把要求政治改革、挽救经济危机打击下的国家的学生运动，与抢掠烧杀、强奸轮奸的排华暴乱混为一谈，达到转移目标嫁祸他人的目的。

然后在“适当”的时机“名正言顺”的展开镇压，又可再次“巩固”其政权。

这次排华暴乱，苏哈多集团又一次利用排华仇华情绪的社会基础。今年年初，当学生们开始酝酿要求政改、反对贪污时，社会上也就开始出现煽动性的反华排华传单，内容不外是“从华人手中抢回祖先的遗产”、“消灭华人”、“赶走华人”等等。到5月初，学生运动越演越烈时，排华行动也迅速加温升级。反对苏哈多政权的骚乱，很快就被有组织有预谋的针对华人的抢掠烧杀、强奸轮奸华人女性的排华暴乱所取代了。

但是，苏哈托这一次遭遇“滑铁卢”了。排华暴乱越演越烈，场面完全失控。原因是他的一个亲信野心勃勃，想乘机混水摸鱼，取而代之，因此决心要把事件搞得更不可收拾，以有利自己“用武力收拾残局”后问鼎宝座。结果内外交困的独裁者苏哈托“玩火自焚”，终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迫黯然下台了。

四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因此民族之间出现差异甚至矛盾也是难免的。一个多元民族“综合体”国家的政府对此必须一视同仁，通过宪法制定法律和教育的措施来协调那些差异和矛盾，决不能用贬低某个族群的素质水平去解决差异，而是应该通过公民教育和各种训练途径加强各族群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水平来缩小差异，化解矛盾。

这是对一国家的繁荣富强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美国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另外离印尼最接近的邻国——新加坡，人民在社会交往中可体会到，不管是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或其他族群都以自己是新加坡公民为荣。这也是政府在处理各民族和谐和团结问题上卓有成效的例子，值得各邻国借鉴。

印尼是一个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综合体”国家。这个国家完全具备发展经济，促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的各种条件。

只不过历来的当政者执行的是一条违反历史发展潮流的极端民族主义路线。特别是对待华裔公民，素来采取的是歧视和排斥的手段，特别是苏哈托当政时制定了一系列强制同化的种族主义政策，无视联合国关于人权和反对种族主义的宣言和公约。目前世界上只有印尼政府竟然会将源远流长的华文和戕害身心的毒品相提并论！这一切都大大地阻碍了印尼的繁荣和发展。

我们期望印尼的繁荣和发展，期望印尼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和民主的国家。因此，我们期望印尼有一个干净的、开明的和有远见的政府，真正建立起各民族平等协商的制度，各民族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集各民族的长处，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上求同存异，把各民族都团结起来，携手并进，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为此使各民族产生由衷的归属感、真正热爱印尼。唯有这样、印尼总有一天可以自豪的列入国家富强、民族和睦、经济繁荣、社会文明、政治民主的先进国家行列。

为达到这样的伟大目标，首先必须彻底铲除所有的种族主义的强制同化政策，废除区分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政策；改弦易辙，宣布印尼境内的各民族都享有完全的、真正平等的公民权，各民族都是印尼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同时要改革教育，废除极端民族主义的教育，代之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睦的公民教育，从根本上铲除排华仇华的种族主义社会基础。用善良、和睦、团结和合作代替凶残、误解、仇恨和对抗教育后一代。

印尼的华裔人数远超600万，其中称得上富豪的只有那几个，中产阶级充其量也只是三几十万，仍有几百万属于中下阶层、甚至是赤贫的，和其他族裔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的。华裔作为很大的少数民族，却散居在各大城市乡镇，甚至穷乡僻壤。华裔老一辈虽重视子弟的教育，但自从华文学校被封之后，年轻一辈的教育水平普遍低下。

印尼为什么每一次排华事件中，华裔都是任人摆布、任人欺凌、甚至任人宰割？除了百般的无奈和以泪洗脸外，到底还能做什么呢？华裔本身必须深深地反省，自强自救。当然一切要以印尼民族和国家发展为依归。

华裔除了由祖宗遗传下的优良传统之外，还有不良“传统”造成的劣根性——害怕官府、畏惧衙吏，对政治冷感、漠不关心，甚至受到不公平待遇也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自私自利，一盘散沙，难于团结，大都只顾自己赚钱谋生；由于教育水平低下，有些年轻一辈更不知所为，讲究排场铺张浪费，炫耀财富，盲目地以为自我“优越感”，令人侧目和反感。

如果华裔族群希望世世代代在印尼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必须克服这些劣根性，和所有族裔团结在一起，为争取自身的基本人权、平等的公民权而共同斗争。

华裔要明确自身的政治定位——“华裔印尼公民”（或印尼华族）。既是“公民”就要尽自己做公民的义务，要热爱自己的国家——印尼。同时要力争真正平等的公民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团结、自强自救。“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

在大力宣扬建国五原则（Panca Sila）的平等精神的同时，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对印尼民族和国家造成的危害，铲除产生排华仇华情绪的土壤。财富取诸社会，反馈社会，要为建设一个富裕的国家、搞好社会福利、纾解贫困作出自己的贡献；多兴办学校、办好教育是头等大事，大力提高包括华裔子弟在内的全体国民子弟的素质和教育水平。要提倡华裔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反对铺张浪费、奢侈排场的陋习、反对盲目的“优越感”，平等待人。

华裔自强自救的道路是艰辛和漫长的。只要不懈地努力，社会进步，文明必胜！

一个各民族团结、平等、和谐的美丽的印度尼西亚一定会实现！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0月20日—10月23日）

印尼排华动乱根源：文化上的失策

郑赤琰

据报载，印尼总统哈比比已下令终止印尼华裔的“身份”，即印尼不再像过去那样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法律定义，去把华裔公民与非华裔公民区分出来。这是一项进步，最少在表面上如此，但离开真正能解决所谓“华人的问题”这个政令是远远不够的。诚如印尼传媒的即时反映是：文化上的，社会性质的，对华裔的禁制令仍然有效。即华裔人士，不理睬他们是否在印尼土生地长，即使是生而成为印尼公民，一概不许在他们的身份证明文件中，采中文名字，甚至在日常的社交中，都会被认为对印尼不认同，就有不忠之嫌。华裔拥有的店铺，一概不许采用华文招牌，华文报刊，华文学校都在被禁之列，即使是旅客随身带入■的华文报刊，也一概不许携入，连华语的录像带也然。这种视华人文化如洪水猛兽的禁制令自独立后已逐渐实行，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政治社会实效？可不可以达到禁制令的目的？这样做有没有反效果甚至是恶果？

只会给予不法之徒借口

为什么这个禁制令非除去不可？因为它不但解决不了印尼政府所担心的所谓“华人问题”甚至恰好恶化了华人与非华人的政经与社会关系。正所谓：错误的政策，不但本身不可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制造了问题。更何况所谓华人的问题是不是因华人有华人文化而引起？或是由其他问题引发出来，是很值得印尼朝野考虑的！以下且就各点讨论。

第一，华人之存在于印尼，他们的文化生活根本就不造成印尼政府所谓的问题。一向以来，印尼政府之所以强制执行上述的文化禁令，是因为政府相信之所以出现对华人生命财产造成严惩伤害的暴动，是因为华人不肯放弃其文化生活，因此被人视为对其他人的文化不认同，因此被敌视。也因此易被人辨认而攻击！

正是因为政府的这种排斥华人文化的政策，给舆论界一个藉■去排斥华裔。

因为要改变一个族群的文化生活与特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一来便可提供长期的机会让这些不法之徒去冲击华人，因为他们大可以因文化的问题来诬告华人不肯放弃他们的文化，不肯在政治上、文化上认同印尼，不合作，该打！

受冲击与文化没关系

单是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验已足以证明：华人与其文化教育生活与物质，不但不构成他们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问题，恰好相反，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文化物质与生活，使他们更容易融入当地的经济与政治生活，与其他族群共创国家财富，为国家繁荣进步而作出巨大贡献。最明显的例子是马来西亚，华文虽非官方语言，但《宪法》152条却赋予华文可以在私立学校当作母语来教学，华文报刊、华人名字、店铺等都可以采用华文，其他的一切华人文化生活也受到尊重。

这不但不妨碍他们对该国的贡献，事实上，他们在所有重大的国家政策上，都尽力支持使其成功进行，最杰出的表现是他们支持政府推行“新经济政策”，使这政策能成功扶持了马来族群的经济力量的成长，依照政策的方针，与巫族合作经营各种企业，使华巫在经济上的差距愈来愈缩小，为政治的安定制造了好条件。与此相反的是印尼，虽有禁止华人文化的条例，却始终没法达到预定的效果：以为这可以消除华人受到暴力的冲击。由此可见，华人即使情愿放弃他们的文化生活的特质，即使情愿学到与人无异的印尼语文，学习当地的风土人情，尊重他人的文化，但一样受到冲击，为什么？不是文化问题，是别有原因，非要探讨不可！

再说，印尼除了华裔之外，仍有其他不同的族群，即使是同族的，都有他们不同的文化。在一万多个岛屿中，存在着不少不同文化生活与特质，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受到冲击，由此可见有人有不同的文化，并不构成他们的问题，为什么华人不断受到冲击呢？可见这问题与他们的文化没关系！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东南亚期间，对于这个文化问题也曾有过一番的挣扎，最值得比较的是英法的不同做法。法国在印支，以为要好好统治越南人、柬埔寨人与老挝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文化消灭掉，以法国文化取代之。结果政治长期陷入动乱，经济也因此无法发展。

文化政策迟早要纠正

法国人的文化失策，正好由英国的殖民地文化政策得到证明。一般而言，英国不会去干扰殖民地族群的文化，顶多是在一个城市地区把他们的语文教育介绍进去，对于他族的文化也不敢因为要推介自己文化而加以压制，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缅甸与马来西亚的当地文化，在英国结束其殖民地政策时，仍然保持不变，相对来说两国的政治都远比印支安定得多。

由上述的论证，本文的总结是文化政策针对华人文化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反而是累及华裔，对印尼的安定繁荣不利，应迟早加以纠正，不能再存在着这种歧视华族的政策，否则会给予不法者有借口去冲击华人。

(原载香港《信报》1998年11月2日)

印尼华人的生存之道

——痛定思痛后的探讨

桑 尼

印尼“5月暴乱”之后，围绕着印尼华裔何去何从的生存之道，存在着一些争议。尘埃暂时落定，在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是痛定思痛的时候了。谁都不敢保证，半年过后的大选，其前其后，会发生些什么？排华暴行既是印尼新旧政权交替时的“例牌菜”如果没有事发生，是“异数”，历史又重复，则很正常。

印尼不是越南

许多人说印尼不是越南。经历几十年战争的越南早已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大批越南难民逃外，“越南难民”成为了国际性的叫每个国家头痛的难题；印尼不然，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然景观美丽。数代华人衍生作息，早就扎下了根。尽管遭受无数次排华，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扎下了根，又活下去了。几代华人早就适应了印尼的生活环境，不大可能像越南人那样“投奔怒海”。哪怕一时为了逃生，逃避到国外，最后还是要回来的。

不久前，印尼总统呼吁逃外的华人回印尼来。华人中不少有识之士也认为家园迟早必须重建。两者其实是不同的。前者，摆摆姿态，并没有做出什么有关华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证；后者，却是涉及华裔的根本、长远生存之计。

700万入了籍的印尼华裔，当然不可能全部放弃印尼，逃到外国。纵然在暴乱期间，能逃到国外的，也仅仅是极少数。有人估计是10万，也仅占百分之14%。从财力上来说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下700万人口之众。从国籍上来说，700万华裔已入了印尼籍，并非属于某国侨民，要进行历史性的的大迁移，是不可能的事。印尼政府当然也明白，华人充当着城乡物质交流的吃重角色，一旦缺少了这一环，势必进一步陷印尼经济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印尼华裔唯有争取到“印尼公民”的合法权益，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我们分四个方面来探讨。

自救 自强 自律

自救、自强、自律乃是最根本的生存之道。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取得生命财产的安全，要靠自救。此次暴乱，以椰城、梭罗、棉兰情况最为严重，损失也最惨重。棉兰华人和当地民众一道组成自卫队，有效打退了歹徒的多次进犯。非常时期需要用非常手段，此举也得到政府的默许。既然如此，为何不利用合法手段组织起来？每一个民族中都有贱民、亡命徒，这类人欺软怕硬，对于早期的白皮肤殖民者，他们心有余悸，不敢动其一根毫毛；而我华人则长期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结果被视为软弱可欺，终在这次暴乱中吃尽苦头，多少华人女性惨遭施暴。如果这一怯弱形象不改变，大祸临头仍是不回击、不出声，悲剧还会重演。但如果华人都是少林子弟，推手破墙，跺脚地震，一扎马两三个人都扳不倒，女子都是花木兰，一瞪眼就将对方吓得屁滚尿流，试问那些暴徒还敢这样杀人放火掠劫吗？我们当然也宜自爱自律，包括不奢华不铺张，红白二事尽量简化，物质享受适可而止，衣着车子力求随便而不讲究，凡事不张扬不惹眼、不浪费，这就有利于减少差异，减少不满。

谋生与福利并行

第二是谋生和福利并行。外界对于华人是“经济动物”的批评是不对的。这种没有研究造成这个状况的背景的说法对华人不公平。正因为苏哈托政权对华人的种种限制，才造成大多数华人只能单一地往商业发展。既然在其他的方面已无路可走，华人一直从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造成“一枝独秀”，并非自己的过错。如果印尼政府明智，除了解除党禁之外，还应解除中文禁令，让华人在文化、教育、公务、新闻、出版等等方面有更多更大的选择。这是对于政府一方面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人遭“5月”之痛，有的已破产，有的必还可以储积力量、东山再起。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福利事业尽管已在做了，仍做得不太多，并未造成广泛的影响。零零星星的福利措施，并没有在全国形成网络化、组织化和经常性。一些极端富有的华裔，目光短浅，只顾着个人家庭生活的改善，而不明白“唇亡齿寒”这句话的含义。在印尼这样的非常国家，看来更应树立“能活着已是一件乐事”的思想。这个国家如今是这样穷！你能吃到两餐，就等于香港人吃三餐了。因为大多数印尼人连吃一餐都艰难啊。唯有将福利事业普及化、经常化，做到深入人心，华人的生活问

题自然而然就会获得解决。这不但指送米送糖，还包括学校的兴办、各种益群措施的实现。

注意从政组党策略

第三是要注意从政组党的策略。因为没有从政，议席上没有华人的声音，因此华人就没有地位，不受重视……这是大家的共识，当无异议。不少人看到了马来西亚华人在政府中当部长、遇事可以据理力争的情况。但国情完全不同。首先是华人人数的比例远远在印尼华人之上，其次是印尼华人这30多年的历史，在政治上是一片空白，不像大马争取了数十年如今才开花结果。说来说去，从政组党，我们都赞成，只是一定要看到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说到底，华人从政组党的目的，如讲究实效，迟早要在议会上取得一些席位，发言声音才够响亮。如果只是处在马路上摇旗呐喊的角色，虽聊胜于无，作用毕竟还是有限的。希望有关者认识到从政组党要获致成功，非一朝一夕的事。要看到其道路的艰巨崎岖。新政府开党禁，但又声明反对由清一色一个种族组成，大概有其理由。如果为了策略，不妨分几步走。一是让有志之士融合到另一些反对党中，二是未必由华人出面，成员应不分种族（不分华人和原住民）都吸纳。印尼自苏哈托下台，政治局面由一党专政、独裁渐趋向多党制发展，已向民主迈开一大步，应是好事。

“慕·阿敏”效应

第四，重在团结、和睦，关键在于教育。这次排华人暴行，有些原住民妇女、小孩都出来在混乱中抢劫，这令不少华人伤心，且对印尼民族感到绝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这些普通民众，完全是受人煽动的，长期的隔阂令他们对华人缺乏感情和误解；另一方面也要总结原因，那是缺乏教育工作所致。如果政府是由极端排华分子所主持，主流便是排华的大方向，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自上而下做什么工作。所谓教育工作是由低层进行和开展的。不要以为暴乱时各大城市都一样，像万隆这样的大城市，就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烧抢事件。据我所知，阿敏先生的“西爪哇伊斯兰联谊会”就发挥了重大作用。慕·阿敏先生和当地政、军、报界、伊斯兰长老等都保持友好的关系。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当主席的组织就和伊斯兰长老在报上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烧抢，起了关键性的遏止作用。这个组织能起作用，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致，他们用了十数年的

时间，不断加强华裔和原住民的和睦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其实就是教育工作。所谓教育，并非是上对下或“上课”，教育就是行动上的和睦和友好，并形之于日常的、经久的福利和各种加强联系的活动。全印尼能仿效万隆的“慕·阿敏”效应岂不是可以安定下来，渐渐走向美好？

大森林有森林法则，但环观地球宇宙，洪荒时代的大恐龙因不能适应环境而灭亡了，也有小如蚂蚁、蜗牛的小动物，至今仍能在风雨变更中生存；我就不信，聪明的华人在百痛中寻觅不到一条可赖生存的“生存之道”！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10月号）

印尼种族主义的来龙去脉

(澳大利亚) 萧忠仁 原作

(北京大学) 孔远志 摘译

译者说明：1998年6月萧忠仁先生用印尼文写了一篇长文，题为《改革与解决（华人）少数人集团问题》，对印尼的种族主义和华人的出路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值得一读。萧忠仁是印尼著名华人领袖萧玉灿之子，现定居澳大利亚。译文小标题为译者所加。原文由萧忠仁的姐姐萧群提供。

为什么种族主义能在印度尼西亚迅速滋长、日益猖獗呢？种族主义实际上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产物。荷兰殖民者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旨在维护它在印尼长达350年的殖民制度。他们始终把华人当作对付愤怒的印尼人民的挡箭牌。于是在人们心目中产生这个印象：华人受到荷兰殖民者的“保护”和“宠爱”。事实究竟如何呢？

华人与土著有和睦相处的传统

早在公元7世纪，印尼就有了中国人。16世纪荷兰人抵印尼后，土生华人就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中国与印尼、印度与印尼以及印尼与其他地区贸易中的中流砥柱。在印尼国内，他们在商品流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内地的土产能流入城镇，城镇的产品能销至内地。那个时期，华人与原住民能和睦相处。他们相互帮助，没有种族偏见。

虽然爪哇的华人中有一部分人经商，但大多数则从事木工、制作家具、零售业、开设饭馆或在饭馆打工。在外岛，例如在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大部分华人在荷兰人的矿山和种植园当工人。

荷兰殖民者的“分而治之”政策

荷兰人需要华人创建的商业网。起初，在荷兰人与华人之间有了商务关系。对于那些对荷兰人有功的华人巨商，荷兰殖民当局授予他们雷珍南、甲必丹和玛腰的职衔（三者愿意为中尉、上尉和少校。荷兰殖民者给某些华侨首领授予这类职衔，

要他们协助管理华侨事务——译者)。随着殖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华人巨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士间的竞争加剧,荷兰殖民当局便采取歧视华人的措施。于是所谓的“通行证”条例出笼了。它实施于1863年至20世纪30年代。华人被迫居住在只有华人的聚居区。这样就在爪哇的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唐人街,类似欧洲犹太人聚居的犹太区。华人务必持有通行证,并且只能到他们工作的地点去。20世纪初,当华人奋起抵制时,荷兰殖民当局才停止实施上述通行证制度。

荷兰殖民者播下种族主义种子

荷兰人将印尼社会分隔成几部分。他们将华人分离于“原住民”社会。荷兰人给华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同于“原住民”。华人只能进华校。荷兰殖民者把殖民主义制度造成的印尼人民的贫困归咎于华人。华人成了替罪羊。他们在华人少数人集团与原住民多数人集团之间进行挑拨,互相仇视。

荷兰殖民者将印尼社会强行分隔的做法,延续了数百年之久,这自然在华人少数人集团与印尼多数人集团之间形成了厚厚的藩篱。荷兰人的挑拨离间必然在两个社会集团间播下了种族主义的种子。

荷兰殖民者挑拨离间的伎俩

上述种族主义种子是印尼革命时期(1945—1949年)种族主义骚乱的基础。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妄图卷土重来的荷兰殖民者总是利用华人作为分裂印尼社会的工具和诋毁印尼国际声誉的手段。历史证明,荷兰人经常把监狱里的刑事犯纠集起来,唆使他们到印尼管辖的地区对华人进行骚扰、抢劫和焚烧等活动。

接着,荷兰部队出来向那些制造骚乱和破坏的刑事犯开枪,以此“平定”骚乱,给人印象是荷兰人保护了华人,华人是荷兰人的同盟者。这就是华人经常成为印尼管辖区内人民泻愤的对象,并且在管辖区的一些华人到荷兰殖民者控制的地区避难。荷兰人还常利用种族主义骚乱向世界舆论显示:印尼无力维护社会安定。

印尼建国初期(1945—1949)

印尼的沙里尔政府在内阁中任命华人部长,旨在处理少数人集团事务。1946年陈宝源当了部长。当阿米尔·沙里夫丁替代沙里尔任总理时,萧玉灿接替了陈宝源担任少数人集团事务部长。虽然陈宝源、萧玉灿努力使大部分华人继续支持印尼,但由于吞噬华人生命、财产和损害华人尊严的种族主义骚乱酿成的恶果,华人更倾向于支持中国或荷兰。

1949/1950年期间，印尼巩固了她的独立地位。华人的不安全感减少了。活跃在政界的华人著名人士开始有效地说服华人：除了承认印尼为祖国外，华人别无他路。

议会民主时期（1950—1959）

后来的印尼政治形势的发展，显然无助于华人少数人集团与印尼多数人集团之间的和睦相处。议会民主时期（1950—1959）政局动荡造成了内阁频繁更迭，于是出现一些代表众多人数的政党。这些政党领导人需设法筹资，以维护其各自政党的生存。同时他们谋求致富的欲望在滋长。他们想接管华人手中的资产，而这些资产实际上属于印尼国内经济成分。他们奉行的政治优先政策，并非想铲除殖民主义经济，即接管荷兰控制的跨国企业，而是接管华商数十年来掌握的资产。

在这一形势下，管辖经济的一些部长颁了若干歧视性的条例。从1950/1951年的朱安达起，后至1952/1953年的苏米特罗，又至1953/1954年的依斯加克，这些部长发布的条例限制华裔在运输（大轿车和货车运输）、进出口和碾米等方面的活动。1959年总统第10号法令禁止华侨在内地经商和居住，致使在1959/1960年间有十万华侨撤回中国。

以印尼民族党的苏纳里约（1953—1955年间任外交部长）为首的一些政党领导人，在替代华人集团作用的思想影响下，企图养活华裔公民的数量。于是若干禁止外籍人员经商的条例出笼了，结果造成许多华人无法再经商。对此，华人感到茫然，因为根据1946年的国籍法和1949年圆桌会议协定，许多华人已成了印尼公民，而如今又要变成外籍公民。后来，由于萧玉灿为首的华人议员们的坚决抵制，上述政党领导人的企图在国会中没有得逞。

有领导民主时期（1959—1965）

在有领导民主时期，许多种族主义条例被废除。鉴于苏加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亲近，华人的政治地位获得改善。虽然种族主义骚乱还时而发生，但当局总是加以谴责和镇压。一九六五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的国家方针大计规定：为了国家经济建设，保障华商所拥有的国内资本。

苏哈托继承分而治之政策的衣钵

但是，华人与苏加诺的“蜜月”因（1965年的）“9·30事件”和苏哈托政权的出现而中断。苏哈托一贯将华人与中国等同起来。以至于在其执政的初期，华人集

团遭到迫害。苏哈托上台后，开始了“新程序”时期。1966年正式使用含有贬义的术语“支那”，旨在使华人集团有自卑感；封闭华校；正式禁止使用华语（汉语）；有步骤地强制华人大规模地将华文姓名必为印尼姓名；公然颁歧视性的法规、条例。排华事件层出不穷。

苏哈托继承了荷兰人分而治之政策的衣钵。结果给人的印象仿佛华人是苏哈托的同伙。华人被指责为造成印尼人民贫穷的祸根。政府和武装部队的领导人进行针对华人挑唆活动。种族主义骚乱通常由苏哈托的人挑起，煽动群众杀害华人，抢劫其财产，强奸华人妇女。骚乱发生后，苏哈托政府假惺惺地采取措施，以表明他们在“保护”华人。

最近的种族主义暴乱

在苏哈托政权今年垮台的前几个月，5月13/14日，在华人区出现一批卡车载着体格强壮、剃着平头和穿着军靴的人。他们煽动群众袭击华人住宅和商店，进行焚烧和抢劫；他们煽动一部分群众无耻地强暴成百名华人妇女，甚至把她们杀害。

在短短两天中，有40个大商业区、4100家商店和办公室及1200所住宅遭到破坏。据估计，有2000人丧生。

这次排华暴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因为当局在暴乱发生时袖手旁观，对成千名受害者的呼救置若罔闻。在华人受害者不断增多、他们的财产遭破坏时，军队才开始平定局势。至于那些暴乱的指使者，至今仍逍遥法外。

华人的出路

种族主义是殖民者留下的产物，后来又在议会民主时期（1950—1959）被一些政党领导人继承；在苏哈托的“新秩序”时期，种族主义的种子得到繁殖，以至于华人成了民众泻愤的对象。

如何铲除种族主义的根源呢？这需要在三个方面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首先，华人应参与政治。他们的代表要能参与制订反种族主义的法律或废除种族主义的条例。第二，参与印尼共同富裕的活动，投入所有的资产、经验和专长，以有利于整个印尼。第三，华人应果断地、认真地融合于印尼民族，把印尼人民的愿望看作华人的愿望。

1998年8月译于北京大学外文楼

（原载香港《地平线》1998年10月号）

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问题

DRS · H · JUNUS JAHJA

《印度尼西亚日报》编者按：B·J·哈比比总统于1998年6月23日要求最高评议院就有关“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问题”提出概念性思想方案。作者为此写了这篇专文，并由本报简译，分期刊出。

（1）在印度尼西亚的华族

在印度尼西亚大约住着600万华族，他们世代住在这里，几乎一百巴仙都已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籍民。“印度尼西亚籍民”（WNI）这个称呼宛若是给“支那”。（CINA）另一个术语是“中华”（TIONGHOA）后裔专用的，但新秩序政府正式把它改为“支部”。最近新闻部长又提倡再用回“中华”。

在泰国和菲律宾，华族的存在已不成为问题了，因为他们（指华族）已为当地人民全面接收，成为泰国人或菲律宾人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情况却非常不相同，在当地人民的眼睛里，他们仍被认为和感觉为外国人。

一般来说，WNI已经不懂华语了，因为自1958年开始，有禁令限制已入印度尼西亚国籍的人不能再就读于外国学校。1969年政府封闭的印度尼西亚的华文学校。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诚然正在展开同化工作，俾使有关的WNI能更快地与人民大众融合成一体。他们当中，目前已有一部份人进行了全面性同化，也已经为他们的环境完全接收成为平等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这是由于他们的行为、交际和职业与“原住民”相当密切之故。有一部份人正进行同化，另有一部分人则不要或没有能力进行同化。总的来说，大部份的WNI仍在同化过程中。

大多数的WNI跟随或信奉中国传统的宗教和信仰，即是道教、孔子学说、佛教或三者间杂，仅有一小部分信奉了伊斯兰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印度尼西亚已有1至200万人信奉基督教，最近，年轻的一代转入信奉“日莲诸宗”（NICHIREN SYOSYU INDONESIA，简称NSI），这是由已故塞诺·苏诺

托领导下由日本传入的佛教的一支分派。

(2) 历史的遗产

WNI仍然被当作外国人,乃是由于荷兰殖民主义者在侵占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封努山达拉居民实行了离间政策,把他们分成三个等级:

最高级者:欧洲人;

居中级者:外来东方人,华族占多数;

最低级者:荷属原住民

这三个组群的生活完全分居,他们扮演的角色和经济地位差异悬殊。荷兰人在华人与印度尼西亚原住民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结果呢?直至今日,留下相当深的憎恨感。

荷兰殖民者已经离开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现在几乎都已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公民。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通过同化过程,设法使这两个组群合成一体。两个组群之间通过私人方式或集体方面进行交流。

殖民主义者有计划地进行离间政策,他们把原住民说成劣质的、没有信用的民族;而认为优质的华人是狡猾的、双面忠诚的,不喜社交的民族。

现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鼓励各WNI融社会中。政府自1945年确定两个族群的团结,使非原住民或WNI尽快成为“印度尼西亚真正的民主爱国者”(1945年11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宣言)。自1978年,“国家总方针”(1945年11月1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宣言)。自1978年,“国家总方针”(GBHN)政治同化加以确认。

面对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鸿沟问题,为期仍然还很久,在这种极为敏感的情况下,终于在雅加达和梭罗发生了5月30日至15日的骚乱事件。

(3) 同化对结合

在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初期,在华族圈内,有关成为WNI之后,对“政策”和“自下而上之路”,具有非常尖锐的不同观点,那就是“同化”(ASIMILASI)对“结合”(INTEGRASI)的对立看法。

华裔并不是“统一”的,美坦华人与梭罗华人不相同,他们之间具有“道地的”(TOTOK)与“侨生的”(PERANAKAN)分别。华族没有固定的区域,希望作为个体的他们能与亲近当地的原部族,如在米纳哈沙能与卡哇努阿

(KAWANUA) 族亲近，而在梭罗能与爪哇族亲近，余此类推。

同化观念乃来自（青年誓词）（SUMPAH PEMUDA），当时（指1928年），爪哇青年会（JON JAVA）、安汶青年（JONG AMBON）、苏马特拉青年会（JONG SUMATRANEN BOND）、史勒析斯青年（JONG CELEBES）及[史卡雨·鲁昆（SEKAR RUKUN）融成一体，成为（年轻的印度尼西亚）]（INDONESTA MOEDA），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部族，成为一个时代逆流的新观念。

某固定范围的人施用的“结合”制度，他们要融合，但提出许多“条件”，他们坚持华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并力求承认他们是与爪哇部族、巽他部族及其他部族有同等地位的部族。这种观念体现于“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机构”（Badan Permusyawaratan Kewarganegaraan Indonesia），该机构的成员几乎百分之百是华族。

1965年印共九卅运动结束了“同化”对“结合”的矛盾。

（4）新秩序的法律产品

印尼共产党九卅运动之后，政府颁布了有关问题的基本规定的，其中包括下列各项：

临时人协有关辅导民族统一的决议，该决议列NO. III /RES/MPRS/1966。其中禁止双重国籍和产除一切障碍，加速同化过程。

内阁主席团有关仍用中国姓名的印度尼西亚籍民换名的决定书，该决定列NO.127/U/KEP/12/1966。

总统有关宗教、信仰和中国传统风俗的训令，该训令列NO.14/1967，1967年12月6日颁布。

在印度尼西亚能引起心理、思想和对同化过程不适影响的宗教、信仰和中国传统风俗，必须整顿。

凡近似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必须在家里以家族式或个人方式进行，禁止WNI在外国学校读书。1958年10月，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并有华语授课的学校封闭。印尼共产党九卅运动之后，完全消除华文学校。些此以后，年轻一代华人已不懂华语了。

对于外商WNI基本措施，颁了240/1967号总统决定书。

在法律方面，外商印度尼西亚籍民具有与其他印度尼西亚民族相同的地位。

根据1945年宪法第六章第一条文,载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条件是原住印度尼西亚公民,这是唯一的不同点。

1988年的“国家总方针纲要”(GBHN)申明:“各种同化努力必须在所有的生活范围内继续进行。”由此可以看出:新秩序下决心在印度尼西亚实施对华人的同化政策。

(5) 数项事实

根据外国观察家的看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在新秩序其间实行的同化过程,是值得令人骄傲的,40岁以下的华裔已不懂华语了。

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婚姻关系也开始发展,同化政策的另一个影响是倾向中国的各种风俗习惯之退色,渐渐减少。

此时也出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已经换了名字,不懂华语的WN I,经常仍然被当作是“外人”。他们的居民证(K T P)上还附上特别的记号,并且必须出示K - I表格,这些对民族建设的过程是非常不利的。对同样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籍民,往往仍有人为的“习惯”,那就是把他们加以分类区别,最近以来,成为国家公务员、各政府银行、国营企业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非原住民越来越少。他们宛若被推入仅可过私人生活的范围内,特别是从商。

(6) 数项令人悲痛的事情

在金融和经济方面实施的非定规化和官僚主义作风,使私人特别是华族使劲努力向上,贫富的鸿沟日益增大,原住民将继续赶不上,社会妨嫉的现象难以避免。原来已进行的相当成功的华族同化过程,突然激烈的倒退。

我们不反对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不过,如果在印度尼西亚的广众面前(其大部分人听不懂)讲华语,对我们之间的融洽会带来“离群”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已经到了实行服兵役的时候了,在60年代曾经实行过的“紧急义务兵役”(WAJIB MILITER DARURAT,简称WAMILDA),当时很多华族学者参加该“紧急义务兵役”产生非常肯定的成绩。

为使政府的同化政策能更快的、更有系统的传到人民中间,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电影连续剧Si Unyil的各种镜头,又如Sesame Street,由各种肤色组成的美国孩子群,都以很轻松的方法显出于电视荧幕上。

(7) 经济鸿沟

经济鸿沟牵制着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宗教和文化虽有决定作用，但它们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自荷兰的各企业于1958年离开印度尼西亚之后，渴望着民族化的印度尼西亚经济，尚未能实现，城市地区中间与零售商仍然操在华族商人的手里。华族企业进入荷兰留下的各经济领域。由于原住民企业家为数有限，扩大了华族在经济方面的生存机会。

新秩序政府的经济政策对华族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华族企业家放线发展，大大超越了殖民时代的涉及面。

在本领的原住民企业家人数不多，贫穷的非原住民WNI为数也不少，但他们的存在不能引起大家传媒的关注。由于本身的本事，加上政治的关系，非原住民的大班们飞黄腾达。政府在推动使原住民企业家成为强大的自力的工作上，尚未取得成就。换言之，经济鸿沟问题内的SARA（注：它是种族、宗教、血统和派别的简称）范围，孕育了危险的种子。

在原住民——纯印度尼西亚阶层中，仍缺少能干的企业家，因此需要设法促使尽量多住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拥有像纯印度尼西亚人一样的民族主义觉悟性。

非原住民族必须拥有原住民的精神实质，而非原住民必须更深入地体现其原住民的精神实质。

印度尼西亚政府毫无选择地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领会社会大众对克服经济鸿沟的要求，因为它与“非原住民问题”是有密切的关系。推动强大和自立的原住民企业家的成长，在不需“弱化”已经稳固的经济阶层去提高软弱的经济阶层。美国和马来西亚曾经采用这种模式去提高当地原住民的经济状况。

处理经济鸿沟问题和非原住民族问题，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责任，经济稳固的人必须觉悟到，他们并非在社会真空中生活和工作。

我们有必要成立一个咨询论坛，其成员由非原住民的各大企业家、社会名流及知识分子组成，用以协助政府解决与非原住民族问题对等的经济鸿沟问题。警告不守法的企业家，不要由于某种活动而引带发生社会不安；铲除城市的贫穷区及农田，用以兴建房屋、高尔夫球场及其它的举动，必须避免。

上述咨询论坛也须带动政府代表，原住民各企业家及知识份子，使它成为

一种由总统直接领导的正式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命名为“克服经济鸿沟委员会”(Dewan Penanggulangan Kesenjangan Ekonomi)。

经济鸿沟问题能够好好地、彻底地克服,而非原住民问题也能够顺利地解决。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民族建设的根基是1928年的青年誓词,对华裔WNI的同化政策是正确的,种族或后裔的排外主义是不能够接受的。

其实,同化政策已经进行得相当成功,600万华裔多数正在同化过程中,倾向祖国的趋势可说很少了,他们不应该仅仅倾向上流阶层,日常生活中应该与广大人民互相交往。

经济鸿沟是一项重要的问题,必须尽快地全面解决。经济鸿沟仍在白热化,应该想出种种积极措施,有如马来西亚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一样。

政府在经济方面的政策应该使原住民的经济强固,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当家作主。换句话说:“原住民强固,乃是同化的钥匙。”

对同样印度尼西亚公民有差别性的法律产品应该废除,包括内政部长到NO. X ● I /1997之训令,又1945年宪法第6章第1款有关印度尼西亚总统的条件必须是印度尼西亚人之条文也应考虑加以修正。

有必要实施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原住民与非原住民融洽在一起,使电视、无线电收音机和印刷大众传媒朝向这一方向走。

服兵役应该加以考虑,因为对一般性的品德建设及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同化工作,具有非常积极的效益。(赖多译)

(原载《印度尼西亚日报(华文版)》1998年8月5日—8日)

印尼骚乱调查始末

乔之音

印尼政府委托的调查骚乱联合小组，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在11月3日将调查报告公诸于世：根据反复核查，证实印尼各城市骚乱期间，共有66名妇女遭到强奸，其中大多数是华裔妇女。

这个调查结果来之不易，很有必要将此次调查始末留下纪录。

华人受害者率先讲话

今年5月13日至15日，在雅加达发生了印尼独立52年来最严重的骚乱，华人成了主要的袭击目标，世人已经从电视荧屏上目睹了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特别是6月份媒体陆续报道骚乱期间华人妇女被强奸的消息，印尼一些人权组织又公布了被强奸的华人妇女数字，更激起全球华人社会的义愤。

印尼官方除了由武装部队发言人于5月16日发布一组极不完整的统计数字，说明雅加达骚乱造成的损失外，由于它背负“镇乱不力”的沉重包袱，加上自身固有的歧视华人顽症，因而不可能作出调查骚乱真相的表态。

作为骚乱的直接受害者，有切肤之痛的印尼华人，率先提出了调查骚乱真相的正义要求。

6月上旬，雅加达骚乱过后不到一个月，一个由40位华裔人士组成的代表团会晤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骚乱期间华人遭到各种不人道待遇的报告，要求调查骚乱期间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当时就有人声泪俱下地诉说了其侄女被强奸后服毒自杀的惨案。

7月2日，100位印尼华裔人士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联合国敦促印尼政府彻底调查雅加达5月骚乱事件，找出迫害华裔的“有组织黑手”，把他们控上法庭，依法处置。

印尼有良知的社会团体和有识之士也要求政府调查雅加达骚乱事件。6月10日，在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教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主席瓦希德主持下，印尼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孔教等各宗教领袖联合发表声明，要求政府

查清骚乱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将他们绳之以法。国立印尼大学的艾米沙林教授要求政府调查骚乱事件后，向印尼人民公布调查结果，使华裔人士安心。

全球各地华人以各种方式声援印尼华人，从发表声明到游行示威，严厉谴责印尼排华暴行，强烈要求印尼政府查清骚乱真相，依法严惩肇事者。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印尼总统哈比比於7月15日宣布印尼政府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负责调查骚乱和强奸事件。

调查工作曲折艰难

7月23日，由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马祖基·达鲁斯曼挂帅的调查实情联合小组在雅加达宣告成立。该小组由18名政府官员和非政府机构、人权组织的代表组成。政府官员来自司法部、内政部、外交部、妇女事务部、国防与安全部等部门，以及武警部队、总检察署。

尽管调查小组奉印尼政府之命成立，并对哈比比总统负责，表面上很有来头，但实际上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当时就有人指出，雅加达骚乱已经过去一个多月，印尼政府才设立调查小组，未免太迟了，预料会增加调查工作的难度。此外，还有人对调查小组的人员构成特别是有军方官员参与，持不信任态度。

虽然面临重重阻力，调查小组还是确定了三个月完成调查工作的目标，并於8月14日设置三个机构，分别负责材料核实、资格证明和受害人实情调查。

8月26日至28日，调查小组分别传讯了雅加达特区省长苏迪约梭、前雅加达军区司令夏弗里·沙姆斯丁少将、前雅加达警长哈马米·纳塔少将。9月2日，又传讯了武装部队情报机构首长扎基·安瓦尔·马卡里姆少将。调查小组成员班庞向传媒通报传讯情况时称：“这4名官员都承认，有人煽动骚乱。”苏迪约梭在听证会上指出，雅加达5月骚乱，不仅是人民对贫富悬殊现象表示愤怒，也是煽动者挑起的。他虽未说出谁是骚乱的组织者，但他认为“有狡猾而肆无忌惮的人在操纵骚乱”。沙姆斯丁证实，参与骚乱的一些人来自雅加达以外的地方。扎基指出，4月9日，他领导的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就觉察到5月20日可能发生骚乱的迹象，并向武装部队作了通报。

令人惊讶的是，8月28日晚上，班庞驾车到一家餐馆用餐时，将装有苏迪约梭、沙姆斯丁等人作证记录的公文包放在车上。当班庞吃完饭回到车上时，发现公文包不翼而飞，但汽车没有被损坏的痕迹，警报器也没有响。

强奸案件颇具争议

调查骚乱期间发生的强奸案件，是调查小组的工作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骚乱期间究竟有没有发生强奸案件？联合调查小组中的政府官员和民间代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针锋相对。

非政府组织早已接触到强奸案的一些受害人，掌握了一些材料，因而肯定骚乱期间有妇女被强奸，并且指出受害者中大多数是华裔妇女。“人道志愿者”组织7月中旬曾经发表报告，宣称有168名妇女遭到强奸，强奸案发生在雅加达152宗，梭罗、棉兰、泗水16宗，其中20人已经丧生，强奸事件从5月骚乱一直持续到7月初。

但是，官方代表站在维护政府利益的立场上，否认骚乱期间发生强奸案件。8月17日至10月4日，印尼军政要员，从武装部队司令兼国防部长维兰托到警察总长鲁斯曼哈迪，从妇女部长阿拉维雅到新闻部长约斯费，轮番出动，硬说骚乱期间未曾发生过强奸案，其借口是找不到证据，警方没有接到报案。那位警长甚至气势汹汹地威胁说：如果非政府组织不能提呈证据，警方将会援引有关法律指控他们造谣。

印尼军政官员的谬论，受到广泛的抨击。印尼妇女救援组织发言人法尔塔·芝埃克称，被强奸使受害人造成很深的心理创伤，她们的恐惧感至今仍未消除。有的人神情恍惚，不敢见人。因此，让她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揭发，是不可能的。她还说，在日本占领期间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印尼妇女，也是过了40年才敢站出来讲话。

据联合调查小组成员卡扎松卡纳和受害人调查小组主席萨里巴纳透露，经过大量耐心的工作，至少有10名受害者表示准备作证，但是，警方和某些人的威胁，又把她们吓退了。

参加联合调查小组的司法部长穆拉迪承认，寻找证据是困难的，特别是要求被强奸的受害人作证更困难。

联合调查小组主席马祖基批评军政要员的言论干扰调查工作。他说：“我要再次强调，强奸案确实发生过，现在我们所要调查的是发生多少宗强奸案。”

印尼有些人不仅抵赖，还有人对调查联合小组的民间代表和人权组织的义务工作者不断进行恐吓，包括打电话、写匿名信，甚至寄手榴弹邮包。10月9日晚上，参加强奸案调查的17岁华裔女义工马塔迪纳塔（王静丽）在家中被人

杀害。印尼反种族歧视组织负责人卢比斯指出，这无疑是对印尼华人的恐吓，令他们不敢说出事情的真相。

水落石出尚有余波

纸毕竟包不住火。11月3日晚上，联合调查小组在雅加达的司法部举行记者报告会，公布长达28页的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指出，在骚乱期间总共有85名妇女遭到性暴力侵犯。经调查小组核实，52人被强奸，14人遭到强奸及虐待，10人受到性侵犯或虐待，9人遭到性骚扰。

这个结论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有客观事实根据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强奸的52人中，有3名受害者亲自诉说，9人根据医生报告，3人由受害者家长报告，其他27人根据神职工作者报告。被强奸及虐待的14名受害者中，3人根据医生报告，10人根据目击者报告，另有1人根据陪同者提供的资料。

调查报告指出，强奸事件在不同地点几乎同时发生，受害者大部分是华裔妇女。

报告称，由於印尼的法律不完备，这些强奸案不可能起诉。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联合调查小组主席马祖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一句话：有理由怀疑陆军战略后备部队与这些暴行有牵连。调查小组发现，5月14日的骚乱事件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总部的一次会议有关。

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当时由前总统苏哈托女婿博拉博沃担任司令。他因涉嫌策划绑架反苏哈托分子，已於8月下旬被清除武装部队。

因此，调查报告提出的八项建议中，就有一项是要求政府调查陆军战略后备部队5月14日会议的真相。

调查报告还提出：政府必须立法确保受害者及证人的安全，批准有关反对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

不过，武装部队维兰托已经否认军队介入雅加达骚乱，声称陆军战略后备部队那次会议是“例会会议”。

在联合调查小组11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未见调查小组中的任何一位政府官员身影。他们为何缺席？确实耐人寻味。

调查报告的发表，将在印尼政坛上激起波澜。哈比比政府对调查报告将采取什么态度，受到人们密切关注。

（原载《华声月报》1998年12月号）

印尼暴乱调查报告能否揭露真相？

余文锁

印尼总统哈比比下令成立的5月暴乱真相联合调查委员会(TGPF)预定今天(10月23日)向哈比比提呈调查报告书。根据消息,这份受到印尼国内外,包括国际华裔社会广泛注意的报告书,是由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联合组成的委员会人员,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在今年5月间发生大规模暴乱事件的6个城市(棉兰、巨港、楠榜、雅加达、梭罗和泗水),向数百名暴乱的目击者和受害者,进行调查之后所收集到的资料而编写成的。

这份报告书所要调查的事实,涵盖了5月中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这三个事件是参与反政府运动的活跃分子遭神秘绑架和杀害、特里萨迪大学示威学生遭军警枪杀、5月13日至15日之间在6个城市发生的排华暴乱以及集体强奸华妇的暴行。联合调查委员会对于前两个事件比较容易得出结论,这是因为前战略后备队司令,也就是苏哈托的女婿普拉波沃已因涉及秘密绑架事件而被革职,至于涉及枪杀示威学生的军警人员也已经依照军法办理,因此该委员会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如何确定在几个城市发生的排华和集体强奸华妇暴行的真相,以及这三个事件之间是否互相关联和它们是否由同一个集团主使。

据联合调查委员会主席马朱基透露,这份报告书基本上将分析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调查人员所搜集到的资料,以及向政府提出建议,以便采取后续的法律行动。

印尼舆论界所关心的焦点是这项调查,是否能够在4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达致令人信服的结论。这4个问题是:第一,5月排华暴乱事件是否为一项有组织的行动?第二,如果暴乱是有组织性的,那么是否有军方人员涉及此事?第三,神秘绑架、枪杀学生和排华暴乱三个事件之间是否互相关联,以及由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或集团在幕后主使?第四,强暴华妇事件是否为一项有计划的

阴谋？

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第一个问题，军方所持的一般态度是5月暴乱是群众因对学生被枪杀感到愤怒而自发地爆发，但是联合调查委员会上月发表的初步调查报告，却否定这种看法，认为从暴乱事件中显示的种种特点来看，这些暴乱事件是有组织性，因此预料调查报告书可能加强这种观点。该委员会认为，关于暴乱是有组织性的看法，可从暴乱在6个城市同时发生以及暴乱方式几乎一模一样可以看出。虽然在这期间，也自发地发生个别的暴乱事件，但大多数的暴乱事件是由外来者集体乘坐公共汽车到来煽动而引发的。这些神秘的煽动者在暴民毁坏或放火烧毁屋宇或进行掠夺之后，就迅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军方是否为5月暴乱事件幕后“隐藏的黑手”？参与联合调查委员会工作的维护人权和研究所执行所长阿都哈金认为，暴乱事件与军方有关。他这样重复地笑着对记者说：“要在雅加达和其他4个城市同时发动具有这么大破坏力的暴乱事件，当然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才行。在印尼这样的国家，具有这种本事的人才不多，除了军方，难道还有别人？”

据说联合委员会已经发现一些关于军方人员涉及5月暴乱事件的强有力证据。该委员会在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显示有一个特种部队人员承认在梭罗发生暴乱事件前4天，曾收买平民参与暴乱；在棉兰，有特种部队人员穿着平民服装，肩上挎着M-16枪支和手上执拿FN-45手枪，煽动群众参与暴动。除此之外，一些与军方有关系的群众组织和武术团体人员也涉及这些暴乱事件。

针对军方是否涉及这些暴乱事件，该调查委员会主席马朱基说，这方面的情况是复杂的，印尼武装部队内部存在着不协调的现象。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是：武装部队内部的派系是否存在着尖锐对立的现象？或者部队内部是否某些人故意搞这些暴乱事件？他认为，虽然如此，作为一个整体，武装部队没有牵涉这些暴乱。

神秘绑架、枪杀学生和排华暴乱三个事件是否由同一个有势力的人物或集团在幕后主使？对于这个各方所关心的问题，该调查委员会将作出什么结论？

从迹象来看，该调查委员会似乎无法把这三个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得出明确的结论。在这个问题上，前战略后备队司令普拉波沃除了被指涉及下令神秘绑架反政府的活跃分子事件之外，还无法证实他与这些事件有牵连。不过社会

上至今流传关于他有意制造一种不稳定的局势,以利他实现夺取武装部队总司令,或总统职位的企图。因此,该调查委员会如何对这个问题作出结论,很受各方注意。

调查人员不断接到恐吓

另一个最热门的问题是究竟有多少名华裔女性受到暴徒集体强奸?关于这个问题,参与调查委员会的人权志愿组织(TRUK)曾经提出报告,指出从5月暴动发生后到7月底之间,该组织接到在6个城市发生168名华裔妇女遭受强奸事件的报告。它相信,这些强暴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但是该组织的人员不断接到恐吓以及一名女性义工最近遭到杀害的事件,显示这项调查工作不易展开。至今该委员会只能调查到11名受害的女性。

调查委员会主席马朱基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该委员会不会把所有收集到的具有敏感性的资料呈交给政府。该组织保留这些资料,目的是要保障有关受害者的安全,同时是为了防备军警当局提出质问时,可作为证明。

难怪参与调查工作的法律与人权委员会主席亨达尔迪,对于这份报告书内容的可靠性,表示质疑。他希望该调查委员会拟定报告书时,不要删除或淘汰所收集到的事实和资料,以免影响报告书的内容素质。

(原载新加坡1998年《联合早报》)

印尼 5 月暴乱调查报告因政治因素内容被歪曲

孙传炜

参与调查印尼今年5月暴动真相的印尼学者苏利托博士，对联合调查团星期二发表的报告书的可信度质疑。他认为，调查团成员之间的政治角力，已使报告书的一些内容受到歪曲。

苏利托博士在今年7月底，受联合调查团委托，负责搜集5月暴乱的证据。他昨天在东南亚研究院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透露，拥有充足证据证实曾发生的强奸案，只有13起，而不是调查团后来公布的66起。

苏利托博士也对调查团指暴乱事件与5月14日陆军战略后备部队的一个会议有关的说法表示怀疑。他相信，调查团成员肩上的政治包袱，使他们无法客观地反映5月暴动的真相。而报告书内容清楚显示，调查团里的非官方组织成员在这场政治角力中占了上风。

不过他也强调，强奸事件发生的次数肯定远比能够证实的数目高。他说：“我有足够证据证明13宗强奸案确实曾发生，但这不代表强奸事件只有13宗。”

“问题是，当他们（联合调查团）说，强奸事件共有66宗时，他们是怎么样总结出这个数字的？我们手头上的资料可是完全一样啊。”

苏利托博士目前在东南亚研究院担任客座研究员。他证实，在13宗强奸案中，至少有9宗的受害者是华裔妇女。

印尼官方在今年7月23日委任7名政府代表和11名来自人权组织和民间组织的代表组成联合调查团，调查5月13日至15日印尼暴乱的真相。该调查团在本星期二公布它的调查报告书。

报告书指至少有85名妇女在暴乱中遭到性侵犯，其中52人被强奸，14人被强奸及虐待，10人受到性袭击及虐待，另外9人遭到性骚扰。这些妇女大多数是华裔。

这份长达28页的报告书也声称,5月暴乱是由于政治精英争权夺利所引发的,有人故意制造混乱局面,以建立宪制以外的权力。

报告书暗示,暴乱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总部在5月14日举行的一次会议有关。这支部队当时是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中将指挥的。

苏利托博士说,调查团的成员之一,印尼法律援助学院主席维佐扬托出席过有关会议,他可以证实当天会议没有特别议程,“除非其他出席者在维佐扬托抵达之前开了另外一个会议。”

不过,苏利托博士同意,人民示威演变成暴乱,很可能是有人在背后煽动造成的。“许多在暴乱中被焚烧的建筑物,都是现代化建筑物,你事先如果没有作好准备工作,给你一盒火柴,你有能力把这样的建筑物烧掉吗?”

“我们在事后研究一些示威者抛掷石头的方法,发现他们的手法和抛掷手榴弹的手法一模一样。”

他最后说:“对我而言,事情的关键不是强奸事件的数目,而是强奸案是否有一些政府官员在背后阴谋策动,或只是一一些人趁乱行凶。”

“如果是有人趁乱行凶的话,数字是重要的,10宗强奸案和100宗强奸案差别很大。不过,如果这些事件是政府阴谋策动的,哪怕只有一宗,就已是足够了。”

印尼政府不可能采纳调查报告书所有建议

印尼学者苏利托博士说,印尼政府不可能采纳联合调查团报告书提出的所有建议。

苏利托博士昨天在东南亚研究院的研讨会上说:“一些建议,如签署人权公约,其实已经纳入了政府的议程。不过,那些比较具争论性的建议就不会被采纳,这包括和强奸事件有关的建议。他们会这样说:‘我们连受害者都无法找到,怎样落实这些建议?’”

苏利托博士认为,法律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在印尼,涉及鸡奸和强迫口交都不足以构成强奸的罪名。

他也相信,印尼国防部长维兰托不会同意对5月14日在陆军战略后备司令部举行的会议展开调查,因为“这过于敏感”。

维兰托在本星期三驳斥调查团暗示军队介入5月暴乱的说法。他说,有关会议只是一般的例会会议,没有涉及任何颠覆行动和犯罪行为。

(原载新加坡1998年《联合早报》)

各方反应篇

一. 中国政府和传媒 对印尼华人被迫害事件的立场

中国妇联发表声明要求严惩凶手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 杨国强 谭国器）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今天发表声明，对今年印度尼西亚一些华人妇女惨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向受害妇女表示慰问，并要求印尼政府严惩凶手，为受害妇女伸张正义。

声明指出，我们强烈呼吁印尼政府正视事实，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彻底查处、严惩凶手，为受害的华人妇女伸张正义，并保证不再出现类似事件，确保华人妇女正当权益受到合法保护。

声明强调，严重侵犯妇女人权的野蛮犯罪行为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对此表示谴责和愤慨。我们关注和同情受害的华人妇女，并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慰问。此前，中国政府已表明严正立场，要求印尼方面查处凶手，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件。

连日来，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及团体也通过各种方式对此残暴行径表达了愤懑之情。

（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6月6日）

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今年5月，印尼发生社会骚乱，成千的当地华人华侨商店受到洗劫。据报道，许多华人妇女惨遭强暴。对这种犯罪行为，中国人民和旅居海外的华人社团均极为关注，深表义愤。

国际社会广泛强烈地谴责在印尼发生的这些暴行。国际舆论用“野蛮”、“惨无人道”等字眼来描述这些事件，认为在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竟发生这类掠人财产、奸人妻女的事情，这是对现代文明的亵渎。

人所共知，在印尼的华人华侨历来奉公守法，辛勤劳动，与当地其他民族和睦相处，为印尼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前印尼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关头，华人华侨继续为印尼摆脱经济困境，维护社会稳定进行不懈的努力。作为印尼社会积极而重要的成员，他们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尊重，他们的生命财产理应得到有效的保护。但他们的遭遇却恰恰相反。印尼一些不法分子在混乱中对处于少数地位的华人进行残忍的攻击，实为法理难容。

印尼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以后，中国向印尼提供了真诚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帮助。中国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尼的国际援助计划，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印尼提供出口信贷和免费赠送药品。还应当指出的是，为了帮助包括印尼在内的东亚国家尽快摆脱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惜作出很大牺牲，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印尼发生严重侵害华人华侨生命财产事件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尼政府进行交涉，对华人华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表示强烈关注和不安，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这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也反映了广大华夏子孙的正义要求。

我们注意到，印尼政府已经就此事表明态度。哈比比总统承认这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并下令组成调查委员会，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阿拉塔斯外长承诺一定把凶手绳之以法。但据报道，有的人士至今仍对这些严重事件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否认。这是此类事件至今仍时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认为，印尼有关当局应以严肃态度正视事实，尽早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严惩不法之徒，认真保护当地华人华侨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印尼华人华侨问题。这有利于印尼在国际社会恢复信誉，吸引投资，稳定社会，使国家经济尽快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8月3日）

还华裔妇女以公道

《中国妇女报》社论

今年5月中旬，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等地，爆发了大规模政治骚乱。而当地大批一直对华人怀着种族仇视的不法之徒，便借此机会残暴洗劫华人华侨商店。更令人发指的是，仅5月12、13、14日这三天里，就有468名华裔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印尼暴徒有组织地强奸或轮奸。

因骚乱引起印尼政局的重大变化，使国际舆论在骚乱当时，一时没顾及到许多华人华侨妇女被强暴的事件。时隔一个多月之后，华裔妇女在印尼所遭受的惨剧，才陆续得以披露和曝光。

国际社会在强烈谴责这种暴行的同时，一致严正指出：这些强暴行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组织的集团”进行的种族犯罪。并认为印尼不法之徒的可耻行径，为即将跨进21世纪的世界历史，留下了一笔不堪入目的罪恶污迹。

众所周知，在印尼社会当中，华人华侨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为繁荣当地经济，为印尼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当地的华裔妇女，更是以她们温良恭俭的美德，与当地其他民族和睦相处。正因如此，她们在这场骚乱中蒙受如此非人道的野蛮欺侮，实为法理难容。尤其令人气愤的是，一些印尼军人和警察，在街头目睹华裔妇女遭强暴时，竟然袖手旁观不予制止。

中国政府和人民，旅居海外的华人社团，对发生在印尼的暴行报以关注并深表义愤。中国广大妇女更是时刻关心着每一位生活在海外的同胞。我们对印尼发生的华裔妇女惨遭残害的严重事态，表示强烈的关注和不安。在此，我们代表全体中国妇女，强烈要求印尼政府彻底对此事件进行严厉查处，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使当地华人华侨妇女的基本人身权利得到起码保证。

我们注意到，印度尼西亚新任总统哈比比谴责了这一“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并下令成立一个由国防部、司法部和非政府人员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暴乱事件和强奸案。然而，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有的人士至今对这些严重事件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否认”；一些调查人员遭受到恐吓……这就是此类事件时有发生的社会动因。

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然而，我们不幸地看到种族歧视的法西斯阴魂依然未散，印尼5月骚乱发生的强暴华裔妇女的严重事件更是提醒人类，当我们行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不要忘记向各种践踏人道的暴行宣战！

（原载《中国妇女报》1998年8月5日）

正义和良知的呼唤

新华社记者

今年5月，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骚乱。据“印尼全国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有千余人在骚乱中死亡，数千家商店、银行、办公楼和住宅被砸、抢、烧，经济损失难以数计。其中印尼华人受损最为惨重，大批华人为躲避灾祸出国逃难。人们在为骚乱的发生感到痛心之余，更对少数暴徒向无辜华人施暴感到义愤。近期，有关华人妇女在骚乱中遭强暴的惨剧被陆续曝光。国际社会为之震惊，纷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全球华人更是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印尼政府尽快查明真相、严惩凶手。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印尼华人、华侨的命运始终牵动着华夏子孙的心。中国政府更是责无旁贷，尽最大努力向印尼华人华侨提供关怀与帮助。

骚乱期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外交官们对护侨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当雅加达整个城市陷入骚乱时，大使馆处乱不惊，全体动员，昼夜加班，对早在领事部登记的300多位中国公民和华侨逐个拨通“生命热线”电话询问安危，倾听求助。使馆官员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多次开车冲过骚乱中的街区，将受困的中国公民和香港同胞及印尼华人华侨送至安全地带。使馆签证人员24小时值班为离境的中国公民和印尼华人提供服务，为他们争取宝贵时间。当众多受难同胞迫切要求离境却苦于无法购到机票时，使馆努力促成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和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增加3个航班，大使一直把电话打到印尼有关官员家里，请其发放飞行许可证，使馆工作人员则通宵达旦打电话向四面八方的同胞提供飞行信息。当200余人及时、安全地飞离雅加达上空时，共和国的外交官们却彻夜未眠、粒米未进……在海关的另一头，国内有关部门积极配合，为他们的入境和居留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

骚乱发生后，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交涉和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等形式阐述对华人处境的关切，敦促印尼政府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华人的正当权益，减少和消除华人的恐惧心理，增加他们在当地生存的信心和勇气。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印尼当局一直保持接触，并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大使还赴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亲自慰问。面对华人接连不断的申诉和求助，中国大使馆官员耐心地倾听、解释，向他们传达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骚

乱事件和华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关心。

近期华人妇女遭强暴事件被揭露后,中国政府对此表示了严重关注和同情。唐家璇外长7月在出席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期间同印尼外长阿拉塔斯着重谈了这一问题,明确表示华人与印尼其他公民一样,其正当权益应受保护。唐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印尼政府重视目前事态,尽速查处,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重蹈覆辙。唐外长结束访问马来西亚返京途经香港时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再次表示中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高度重视,强烈要求印尼政府确保华人华侨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对罪犯严加惩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7月14日和28日先后两次发表谈话,对印尼华人妇女在骚乱中遭强暴表示严重关注和不安,要求印尼政府彻底查处,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极大震撼和不安,也受到社会各界强烈谴责。《人民日报》于8月3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敦促印尼政府尽早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严惩不法之徒,保护印尼华人的合法权益。8月6日,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表声明,对印尼华人妇女惨遭强暴表示强烈关注,向受害妇女表示慰问,要求印尼政府严惩凶手,为受害妇女伸张正义。

印尼新政府已承诺对华人遭迫害和强暴的事件进行调查,严惩凶手。哈比比接任总统后即表示了对排华骚乱的关注,到华裔聚居区视察民情,并于7月15日正式表态,“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国人民”谴责5月骚乱期间发生的强暴妇女事件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表示已下令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暴乱事件和强暴案,誓言此类事件不会重演。哈比比近日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对华裔以“伙伴”相称,表示与华裔“亲如一家”,政府将对包括华裔在内的所有印尼人一视同仁;哈比比还表示他已打破惯例,下令停止在华裔的身份证上加盖特别注明字样。阿拉塔斯外长在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承认5月伤害华人事件是印尼的一个耻辱,公开对此深表遗憾,允诺严加调查,誓将凶手绳之以法并代表政府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国防和安全部长维兰托对印尼武装部队未能防止骚乱向受害者家属表示了歉意,强调军队将依法惩处所有在5月骚乱中犯有强暴妇女行为的人,并宣布成立荣誉委员会负责查处违纪军人。司法部长则表示要取消对华人的特别行政管制。

印尼一些人士和媒体也谴责5月骚乱的祸首,要求政府彻底查清事件真相,严惩元凶。印尼当地人权机构、妇女组织和社会团体自发向政府提供线索,希望政府加快调查进程。

印尼华人多年来辛勤劳动,艰苦创业,为印尼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作为印尼社会各民族家庭中的成员,他们的命运与印尼各族人民休戚与共。广大印尼华人在印尼安下了自己的家,他们的合法权益理应受到印尼政府的有效保护。国际社会对印尼骚乱中华人遭受迫害和强暴的事件义愤填膺,反映了人们的正义要求,完全是合情合理的。痛定思痛,印尼骚乱虽已过去近3个月,但是这场骚乱造成的恶劣后果,特别是对当地华人心理造成的伤害至今仍难以消弭。印尼政府目前已就处理5月骚乱事件作出一些积极反应,承诺对此事严加调查,定将凶手绳之以法。人们希望印尼政府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对不法之徒严惩不贷,认真保护当地华人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妥善和公正地处理华人问题。只有这样,印尼各民族才能和睦相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经济才能早日恢复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陈宝鏊 强烈要求印尼确保华人权益

中国驻雅加达大使在印尼今年5月发生排华暴动之后，曾亲自前往印尼外岛华人集中的城镇慰问当地华裔。驻印尼大使馆也代表中国政府向印尼华人社团做了大量解释和安抚工作。

中国驻新大使陈宝鏊昨天说，中国政府和民间一直都对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的事件，以及印尼华裔的遭遇深表关注，并且一直都和印尼当局保持接触。

她说，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曾两度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印尼政府重视这些事件和尽快查清真相，并加以处理，同时强烈要求印尼政府确保华人华侨的安全和他们的合法权益。

陈大使昨天应中华总商会邀请，在它所主办的一个讲座上讲话时指出，中国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也对印尼华人妇女遭强暴的事件纷纷表示强烈关注，除了向受害妇女表示慰问，也要求印尼政府惩罚凶手，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她指出，中国仍爱护移居他国和放弃中国国籍的华人，也不忘记他们对促进所属国家和中国的经济文化等交往所作出的贡献。

不过，她说中国严格区分华人和华侨的作法，虽然使一些华人感到不满，但这是为了海外华人自身的利益，以让他们更好地在居住国生活，同时也是为了维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对此，她说由于印尼的大多数华人已是印尼公民，因此印尼华人的问题终究是印尼的内政问题，必须由印尼政府自己解决，中国政府不能越俎代庖。

她说：“中国可以基于人道主义表示关注和同情，但是不能做任何干涉内政的事情，这是为了整个地区局势的稳定和维护中国和印尼两国的友好关系。”

陈大使昨天针对当前的中国形势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发表讲话时，也重申人民币不会贬值。她说明的原因有三个：首先，中国是个“高度负责任的大国，历来说话算数”，中国还参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多边援助计划以及给予双边援助，共拨出了50多亿美元援助泰国、印尼、韩国和俄罗斯等国。

另外，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良好，人民币无需贬值。第三个原因则是日元

币值已逐步稳定，日无持续暴跌对人民币贬值造成的压力基本上也已缓解。

陈大使也说，最近长达三个月的严重水灾，虽然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下降0.5%，但是灾后的重建工作将在冶金、建材、食品、纺织、化工和医药等行业带来新的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使经济增长上升大约0.5%，得失大体抵消。

她说，中国政府已制定扩大内需、增加投资力度的具体方案，以确保中国能实现全年经济增长8%的目标。

在谈到以朱镕基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在今年所大力展开的政府机构改革和国有企业工人下岗的问题时，陈大使说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顺利进行。国务院各个部委的改组工作基本上已完成，分流出去的干部已得到妥善的安排。针对外商到中国投资所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抱怨，陈大使也承认存在这些现象，而中国政府已承诺对此尽力改善。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0月9日）

还是没说清楚

——评印尼 5 月骚乱调查报告

《中国妇女报》社 评

11月3日，世人瞩目的印尼5月骚乱真相调查报告终于在两度推迟后公布。报告证实了人们对印尼5月骚乱的一些猜测，即5月骚乱的确是一场经人策划的、有组织的骚乱，而在以华人为主要袭击目标的骚乱发生期间及之后，也的确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强奸华人妇女事件。

就这份报告的内容而言，实在无任何新意，其发现和结论基本在各种媒体上都曾有过相关报道，同时报告中存在着明显“淡化”和“遮掩”痕迹，公布的数字与估计相差甚远。

再者，调查报告虽承认5月骚乱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体强奸华人妇女事件，但却又强调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强奸是有组织的。同时对骚乱发生的背景和动机，也好似有“犹抱琵琶”隐晦。在肯定调查团公布报告勇气的同时，我们也充分体会到了“邪不压正”这条社会公理的真正含义。

然而，印尼政府对这份报告所表现出的勉强、冷漠，甚至怀疑实在令人气愤。“联合实情调查团”作为官方委任成立的骚乱调查机构，本应得到印尼政府的支持，而其出台的报告也至少应该得到官方的承认。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印尼总统哈比比仍未对报告本身作出任何正式表态，只是在报告发表后的第6天下达了要求相关部长对报告进行研究和讨论的命令。

而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维兰托，更是在报告公布的第二天就公开为军队辩护。他反驳调查团有关怀疑军队参与骚乱的分析，指出战略后备部队5月14日召开的军官大会只是一般例会，并不涉及任何犯罪行为及颠覆行动。

印尼政府内的一些官员们似乎都不愿承认和面对5月骚乱以及华人妇女受害事件，即使在官方调查团将调查报告明昭天下以后，他们还是想方设法

地进行拖延和狡辩。

哈比比总统既然早已承认“5月骚乱是印尼历史上最耻辱的事情”，那么面对调查报告的结果和建议，就应该立即付诸行动，进行深入调查，追究和严惩幕后黑手，并采取有效措施杜绝悲剧的重演。

这不但是印尼政府现在必须严肃面对的紧迫问题，而且也是印尼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否挽回国际形象，能否摆脱经济危机，能否走向文明的关键！

（原载《中国妇女报》1998年11月24日）

二. 世界各地华人声讨 印尼暴徒迫害华人大事记

囡囡

从1998年7月起至年末,印尼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门前从来没有象这段时间这样“热闹”:抗议的口号声,聚集的人群,雪片般涌来的呼吁书……

当印尼5月暴乱中掠劫华裔,奸虐华妇的真相被一桩桩揭露出来时,整个世界愤怒了:各国政府、社会团体、国际组织及世界舆论同声谴责,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更是义愤填膺,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着对非人道暴行的谴责和一脉相连同胞的声援。于是,在印尼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前便出现了一道独特风景。

现根据所见有限资料,将世界各地华人举行的谴责抗议印尼暴徒残暴华人事件的活动录于此。

7月

● 17日

▲印尼大批妇女在印尼国际部前示威。

▲马来西亚多个团体集会印尼驻吉隆坡大使馆抗议并发起77个团体联署抗议书。

● 18日

▲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代表向印尼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抗议备忘录。

△马来西亚华社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发起签名盖章抗议运动。

● 20日

△香港华侨华人总会举行声讨印尼暴徒暴行集会。

▲加拿大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向印尼驻加使馆递交联合签名的抗议书。

▲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华大会堂代表马来西亚全国77个团体联合签署的抗议书提呈印尼驻马大使馆。

● 23日

△马来西亚柔佛州颖川陈氏公会及青年团向印尼驻新山领事馆提交抗议书。

△新加坡妇女行动与研究会向印尼驻新加坡使馆递交抗议书。

● 24 日

△马来西亚华人最高团体——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连同13个洲的中华大会堂及7个乡团体代表到印尼驻吉隆坡大使馆提交抗议备忘录。

△住在香港的100多位海外华侨游行到印尼驻港领事馆抗议。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最高代表机构大马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代表230多个华团向印尼驻马来西亚使馆递交抗议备忘录。

△香港四十多个妇女团体代表及80多个印尼华人前往印尼驻港领馆示威。

△香港前线政治运动领导人刘慧卿议员率30名示威者前往印尼驻港领事馆抗议。

● 25 日

△一连几天，美国旧金山华人开展支持印尼华人签名运动。

△北美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渊网”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起“黄丝带”运动，希望借电子邮件的传播力量，让更多的人正视印尼华裔的惨况。

● 26 日

△1500多名香港市民到印尼驻港领事馆示威抗议。

△纽约“抗议印尼虐华联合会”在华埠举行“万人签字”运动。

△数千名香港市民参加声讨印尼暴徒践踏人权大游行。

● 27 日

▲台湾女“立委”潘维刚、刘光华等人前往印尼驻台代表处抗议。

△60多名华裔菲律宾人在马尼拉亚细安区域论坛会场示威。

△台湾多个妇女团体到印尼驻台北贸易代表处抗议。

△由菲律宾人权律师描牙星和慈桥基金会董事长蔡金钟率数百名菲中人士在马里拉大酒店举行请愿集会。

● 28 日

△菲律宾1000多名华裔学生上街示威集会。

● 28 日

△台湾“国民大会”形成议案，公开谴责印尼虐华暴行。

● 29 日

△美国印尼华人联盟和由纽约华人抗议印尼虐华事件联合会等多个侨团发起在全美各地抗议印尼虐华事件。

● 29 日

△台湾多个妇女团体联合宣布发动募捐和“一个一信”关心印尼受暴妇女的活动。

● 29 日

▲菲律宾 100 多名华裔中学生在马尼拉示威。

8 月

● 1 日

△300 多名信奉回教、基督教和佛教（多为华裔）的印尼民众在雅加达举行烛光晚会。

● 3 日

△香港妇女发展联会等 15 个妇女团体代表前往印尼驻港领事馆递交请愿书。

△1000 余名美国旧金山市民聚集在马连那中学参加抗议印尼排华暴行的社区大会。

△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三届大会的近 200 名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签署联合声明，谴责印尼排华暴行。

● 4 日

△近百名菲华各界人士在马尼拉一宾馆举行声讨座谈会。

△菲律宾华人华侨各界代表近百人在马尼拉集合抗议。

● 7 日

△近万名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分别在纽约、华盛顿、洛城、旧金山、芝加哥和加拿大多伦多的印尼使领馆前集会示威。

△2000 多名美国洛杉矶华人和中国留学生在印尼驻洛杉矶总领馆前示威。

△美国纽约地区的百多个华人团体的上万民众及美国政界人士在印尼驻纽约总领馆前示威。

△500 多名加拿大华人在渥太华印尼大使馆前集合示威。

● 8 日

△由美国波士顿香港民主促进会组织的华人在市区示威。

△几百名旅居美国大华盛顿区的华侨和学生聚会印尼驻美国大使馆前示威。

△近百名旅日中国人自愿在印尼驻日本大使馆前示威抗议。

△新西兰市华人团体组成“黄丝带运动委员会”在市中心会场静坐抗议。

△500多名加拿大华人在渥太华印尼大使馆前示威。

● 9日

△数百名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和旅美留学生集合在印尼驻美大使馆前示威。

● 10日

△台北市议员李承龙率40余名民众前往印尼驻台代表处抗议，并泼洒尿液，投掷鸡蛋以示不满，激动之时还怒掴印尼驻台台北代表处副处长一记耳光。

△200多名北京大学生联名向印尼驻华使馆提交一份措词强烈的抗议书。

● 11日

△30多名香港人前往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关注印尼华人命运。

△约10名北京市民在印尼驻中国大使馆周围示威。

△由英国各界华人组成的支援印尼华人委员会在伦敦唐人街发起抗议签名运动。

● 14日

△美国亚特兰大地区的38个华人团体的2500名代表举行示威集会。

△300多名新加坡妇女集会示威。

● 16日

△菲律宾一个反印尼暴行的组织在印尼驻马尼拉使馆前集合示威。

△台湾多个妇女团体举办“用爱止暴——为印尼受暴妇女祈福”活动。

△来自美国波士顿和大纽约地区工区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聚会联合国总部集合示威。

● 17日

△北京大学学生前往印尼驻北京大使馆示威和递交抗议书。

△1000多名菲律宾华裔学生在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前示威。

△澳大利亚堪培拉的200多名华人到印尼驻澳大使前示威。

△纽约华人团体的200多名代表在印尼驻纽约总领馆前集会抗议。

△菲律宾马尼拉各界华人2000多人在印尼驻菲大使馆前集会抗议。

△香港9个妇女团体的数十名妇女上街举行抗议请愿书签字活动。

● 18日

△菲律宾13个华社团体的代表在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抗议请愿。

● 21日

△近400名泰国各阶层人士（其中华人妇女为多）在印尼驻曼谷大使馆前抗议示威。

● 25日

△新加坡前进妇女行动与研究学会发起签名抗议活动。

● 26日

△香港民主党等多个压力团体发动反印抗暴行动。

● 29日

△旧金山市华人议员邓式美、叶克本、余育良等人在市议会举行听证会并致函印尼驻旧金山总领馆。

9月-12月

△9月4日

香港多个妇女团体的代表前往印尼驻港总领馆抗议。

△10月5日

菲律宾1000名华裔商人学生到印尼驻马尼拉大使馆前示威。

△12月3日

大约100多名美国旧金山华人在华埠游行示威，配合联合国人权宣言签署五十周年，“捍卫印尼人权行动委员会”在前一天发起示威游行，抗议印尼当局继续漠视和迫害华人。大约100人上午从三藩市林逊街的“国际特赦组织”大楼出发，沿市场街和都板街游行到华埠花园角广场，要求美国停止对印尼提供经济及军事援助，并呼吁民众寄信给国会议员关注此事。

三. 印尼政府对印尼华人 受迫害事件的态度

哈比比：暴乱期间系列强奸案 “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

(雅加达综合电) 印尼总统哈比比昨天指5月暴乱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强奸案，“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他誓言，这类事件将不会重演。

哈比比总统的一名顾问过后说，他已下令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调查暴乱事件和强奸案。

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说，5月13至14日的雅加达暴乱，造成1200人丧生。此外，数百座建筑物和数千辆汽车遭纵火，有许多华人妇女被强奸。

哈比比对妇女抗暴协会代表团说：“我对这一切事件表示深切遗憾。我将给予全社会保护和提供安全措施，以免国家历史上最不人道的事件重演。”

他说：“我代表印尼政府和全国人民，谴责一些地区的暴力行动和骚乱，包括对妇女强暴的事件。”

哈比比的顾问蒂薇说，总统下令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将与军方及其他国家机构的调查委员会同时展开调查。

她说，总统的委员会将调查整个事件，包括暴乱和强暴妇女的案件。

蒂薇说，哈比比已下令政府的几个部和总检察署迅速协助设立这个委员会。

印尼的人权团体说，暴乱是有组织和有系统的，它们担心政府展开的调查将会有缺陷。全国人权委员会上星期要求展开独立调查。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7月16日)

哈比比：华人不回国印尼不会完蛋

（雅加达讯）印尼总统哈比比认为，5月暴乱之后华人纷纷离开印尼，为当地印尼人提供了进入工商界的新机会。

哈比比前天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发表了他对国内华人问题的看法。

他说，印尼华人如果因不信任自己的国家而不愿回国，政府是不能强迫他们回国。他指出，融入印尼社会的华人，并没有在5月暴乱期间遭殃。

哈比比对访员说：“如果华人因不信任自己的国家而不愿回国，我是不能强迫他们的，没有人可强迫他们。但你们会不会以为如此一来我们就完蛋呢？”他咯咯发笑说：“他们的空位将被其他人填补。”

哈比比的言论与一般人的看法相抵触。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印尼华商如果回国，将对印尼经济的复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虽然华人在印尼全国人口中只占3%，但华人是印尼经济的骨干。自5月发生暴乱之后，数以千计华人为了自己的安全而纷纷逃往外国避难，大多数是逃到新加坡和澳洲。

哈比比似乎对华人回国一事存在着复杂矛盾的心情。他说，华人离开印尼，为当地印尼人进入一向被华人垄断的工商界提供了新机会。

他指出，对印尼进行350年殖民统治的荷兰人，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打开了门户，使他们成了印尼国内的中产阶级，他们比土著印尼人获得更多机会。

他说，在印尼独立之后，当地华人利用他们的经验发财致富，但国内的大多数人力资源是印尼人。

哈比比承认，5月暴乱可能是有组织的，而华人成了受攻击的目标。但他说，那些与印尼社会融为一体和肯协助别人的华人，就不会受攻击，也不会遭殃。

他认为华人与土著印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属于社会性质的。

哈比比的谈话可能使许多还留在海外的印尼华人增添了疑虑：也许政府是不欢迎他们回返印尼。

负责调查5月暴乱期间华人妇女惨遭强奸案件的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达鲁斯曼说：“只有转变态度才能争取华人回来，否则是无法争取他们。”

他说：“在印尼，有人对华人存有复杂矛盾心情，一方面对惨遭强奸的华人妇女表示同情，但对华人回国却存在着矛盾心理。这与几个月前华人离开印尼时的情形完全一样。”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7月20日）

哈比比质疑报章有关华妇被强暴的报道

余沧歌

有关大量华人妇女被强奸的报道,除引起雅加达某些回教团体及其他人士的反弹外,被视为哈比比总统政治大本营“回教知识分子协会”出版的机关报《共和日报》,昨日在头版刊出署名文章,质疑国内外媒体对有关强奸案报道的真实性。

这篇题为《真的发生了大规模强奸案吗?》文章指出,国内外媒体有关强奸案的报道已引发雅加达及香港等地一连串的示威浪潮,有人推测这是有意损伤印尼声誉的宣传,故意散发这些不确实的消息,目的是要破坏印尼政府及人民在国际上的形象。

文章指媒体没有经过再三调查,全文照抄志愿救援工作小组发言人依达纳迪雅发表的强奸事案调查报告,造成由于经济危机而受损的印尼形象雪上加霜。

文章引述社会学家艾迪努尔的话说,有关发生大规模强奸的报告是令人难以相信及不合理的。某些非政府组织活动分子发表了片面报告书,并且不敢举出受害人及向警方投报,该报告书有系统地丑化印尼政府及人民,这是对5月暴乱所造成损失的一种报复行动。

艾迪努尔认为,政府应该要求志愿救援工作小组出示证据。

文章最后说,所有各方都在等待事件调查结果,使之真相大白,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必须依法处理,若是没有证据的话,也要把丑化国家民族的人绳之以法。

此外,印尼回教团结委员会执行主席苏马科诺声称,该委员会将对《雅加达雅加达》周刊就有关强奸案的报道,向法院提出控诉,因被认为会在各宗教信仰徒之间挑拨离间。

该刊是由天主教背景的罗盘报系报业公司所出版,不久前刊出强奸受害人华裔女子菲菲安被凌辱报道,其中说:“暴徒在喊叫:干掉华人,干掉非回教徒!”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3日)

哈比比改变态度盼印尼华裔回国

（香港讯） 印尼总统哈比比最近一改以往的态度，表示他深切盼望那些自5月间雅加达暴动爆发后便离开印尼的华裔，能够回国。

62岁的哈比比星期六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访问时，似乎急于想改变他在过去受访时所持有的立场。

他曾经表示，他并不关心逃到海外的印尼华裔是否回国，因为自然会有人取代华裔在分销系统和其他商业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过，哈比比在这次的访问中，却声称自己是印尼华裔的“伙伴”，并且强调，他在呼吁华裔回国方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他说：“我有许多华裔朋友，其实他们不只是我的朋友，我们的关系亲如家人。暴动的发生不只让我感到难过，我也觉得受到了羞辱。我绝对不会再容忍这类事件，那是犯法的，我们绝对不会让它再发生。”

上任70多天的哈比比也要求留在国外的华裔相信他。他除了对华裔表示同情之外，也说自己是“站在他们那边”的。

谈到不敢回国的华裔，他说：“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应该回来继续像过去那样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不过，他接着又说：“我已经尽力争取他们回来。我不能够开我的专机去求他们，我也不会去亲吻他们的双脚。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我办不到。”

哈比比指出，他已经表达了自己对华裔的关心，并且打破惯例，停止在华裔的身分证上加上特别的注明。

他也为原指印尼土著的词汇“本国人”（Pribumi）下了新的定义。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华裔。即使你不是华裔，不过，却不关心社会，为所欲为，那么在我心中，你也不是本国人。”

他也说，其内阁已经同意在不分宗教和种族的情况下，贷款给所有在暴动中蒙受损失的中小型企业。

当被询及有关印尼最大回教组织领袖瓦希德指责哈比比的内阁里有3名排华部长时，哈比比要瓦希德公开他们的身分，并且拿出证据依法起诉他们。

他也重申对5月间暴动的谴责，并且要求外界不要一根竹竿打翻全船人。

他说：“你不能够因为发生了这些事件就断定印尼2亿多人口都是这样的。”

哈比比在长达85分钟的访问中,也对于他必须依靠军方支持以继续执政的说法作出反驳。

他说:“我对于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依赖,就如我依赖内阁中其他成员一样。他们要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必须先征求我的同意。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一支合作无间的队伍。”

谈到掌管武装部队的维兰托将军时,他说:“我可以信赖他。他是军事科学的专家,而且懂得聆听。他经常来见我。我清楚知道他所要采取的每一项措施。”

他也强调:“我并不软弱,我知道该怎么做。”

他以海外国家和机构上个星期承诺给予印尼的新援助款项为例子,说明这显示了外界对他具有信心。

上任时不被看好的哈比比也自豪地指出,他担任总统已经70多天了,这比他担任副总统的时间还要长。

他说:“有人曾经当面告诉我:总统,在改善印尼人权记录、司法体制、透明度,以及落实民主制度和奠定现代经济的基础方面,你在30天内所做的,比上一任总统在30年内的成就来得大。”

这名曾雄心勃勃要在印尼建立飞机工业的总统,也以飞机来比喻经济状况。

他说,印尼就犹如一架“坠落”的飞机。不过,现在这架飞机已经平稳了,而且在海外援助金的协助下,很快地又可以再度往上飞了。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5日)

哈比比：5月暴乱不是排华事件

（香港讯）据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刊》报道：印尼总统哈比比接受该报访谈时声称，印尼5月的暴乱不是排华事件。

他说：“这次暴乱不是种族问题引起的，而是人们因不公平和对社会差距感到失望引起的。这种事件也可能在北京或香港发生，这不是排斥他族的事件。”

他前天接受访谈时，也呼吁那些抗议印尼华裔妇女遭强奸的香港人采取实际态度。他警告说，他不能保证会采取提控行动。

询问他是否相信印尼华裔妇女遭强奸之事时，他回答说，他有责任保持客观。

他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来找我或带人来见我。我只能相信我所看到的。”

哈比比说：“我是总统，也是知识分子，我又接受作为科学家的教育，因此我必须对此事采取客观态度。”

他说：“我要告诉香港人民：采取实际公平的态度。”

哈比比接着说：“众所周知，印尼人民已和平生活了很多年，我们也很爱护华社。让我们在未来100年甚至1000年维持这种状况，不要被犯罪行为干扰。”

他否认5月暴乱具有排华性质之后说，印尼有了悠久的和谐传统，他不禁要问，谁有权在真相查明之前就随意下结论。

他说，抗议者必须了解到，他只能把是否提控的问题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哈比比本人曾两次谴责5月的排华暴行。他在两星期前独立日发表演讲时，曾抨击对华人妇女的强暴是野蛮行径。

哈比比在谈到5月暴乱事件时说：“我将确保这类事件不会重演。我们将维护受法律保障的价值观。”

他强调，在他领导下的印尼，即使是总统及其家眷，也可能被送进监牢。

他说，没有人可超越法律，虽然每个人都有权进行适当诉讼。

访员问他，一旦调查苏哈托财产的工作完成时，他是否准备把这位前总统

送进监牢呢？他回答说：“我告诉你，我不会偏袒任何人，我这样的谈话就很足够了。我谴责所有犯罪行为。”

他说：“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但每个人有权被假设为清白无罪。”

哈比比提到他已下令让警察不再受武装部队控制，但不可仓促行事，以免影响到社会稳定。

哈比比没有确实承诺要放宽长期以来对中华文化的限制，但他警告说，把印尼华人与原住民区分开来是有侮辱性的，也是令人为难的。

他说：“在我眼中，他们不是华人，他们是印尼人。”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8月31日）

哈比比否认回教徒强奸 200 名华妇

（雅加达综合电）印尼总统哈比比昨天否认回教徒在 5 月雅加达暴乱期间强奸 200 名华裔妇女。

他在总统府向 50 名食油制造商和销售商发表演讲时说：“国际网络上散播印尼回教徒强奸妇女的谣言是不确实和捏造的。”

他呼吁他们提高警惕，提防有人为了达到反印尼的政治利益而散播这类旨在破坏国家团结的谣言。

在座听哈比比演讲的 50 名商人中，有些是印尼华裔。

一个进步回教团体及其他许多回教组织已坚持要政府调查是否有回教徒介入 5 月动乱期间的强奸、掠夺和骚乱案件。

哈比比向这批商人誓言，政府将平等对待所有印尼人，包括当地的华人。他说：“我们并没有根据宗教和种族来区别对待印尼人。”

5 月的动乱导致苏哈多被迫下台而由哈比比接任总统。

在印尼全国的 2 亿人口中，约有 90% 人信仰回教。

哈比比说，他深信，由于各界人民积极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印尼肯定可解决所有的问题和经济危机。

印尼自发生经济危机以来，国内的物价不断高涨，基本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 年 12 月 22 日）

印尼政府承认 5 月暴乱曾发生 76 起强奸案

（雅加达法新社 12 月 21 日电）印尼政府在研究官方调查团就 5 月暴乱事件所作的调查报告之后承认，5 月暴乱期间曾发生 76 起强奸案，但否认这些罪案是有人预先组织干的。

国务部长阿巴丹戎昨日在总统府对记者说，政府经过自己的检查之后发现 52 起强奸案，这与官方调查团提供的数字一样多，另外 24 起强奸案是暴乱之后发生的，这比调查团所发现的 14 起还多。

这是印尼政府首次对官方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意见。

但阿巴丹戎说：“根据我们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强奸案是有人预先组织下下的。”

他接着说，强奸案的受害者包括各族人民。这些数字是政府对官方调查团提呈的结果进行了研究之后得出的。

官方调查团是由政府、总检察署、全国警察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的。

阿巴丹戎是在哈比比会见了委任设立官方调查团的七名高级官员（五名部长、总检察长和全国警察总长）之后发表这番谈话。

他说，这项调查报告将转交给有关政府部门，但他没有说明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

他指出，有关由前总统苏哈托女婿普拉博沃领导的特种部队，涉嫌绑架及虐待活跃分子的调查仍在进行中。

助理国防部长巴礼斯说，强奸案发生在首都雅加达、东爪哇省沟水、中爪哇省梭罗、北苏门答腊棉兰和南苏门答腊省巨港，以及苏门答腊岛的楠榜省。

他说，根据 52 名受害者提供的资料，其中 15 起案件已开始处理，另外的其他案件还在调查中。

他说，在已开始处理的 15 起案件中，3 起是根据受害者的直接供证，9 起是根据受害者医生的供证，以及另外 3 起是根据受害者父母的供证。

暴乱事件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总部的一次会议有关。当时的陆军战略后各部队司令是普拉博沃。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 年 12 月 22 日）

附录：

印尼华裔应对暴乱负责

马斯里·阿曼 (Masli Arman)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者按：

印尼5月的暴乱中，华裔印尼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的财产被掠夺，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强暴。连迟迟表态的哈比比总统也不得不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指责强暴华裔妇女“是印尼历史上最不人道的行为”。可是，印尼某些人却仍然声称华裔的遭遇是“咎由自取”的。以下是翻译自7月30日《雅加达邮报》所发表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该报后来也发表了数篇驳斥该文谬论的文字。

我们刊登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让读者知道有些印尼人竟然这样看5月暴乱，难怪很多华裔仍然不敢回去。

5月13日至14日雅加达暴乱将被证明是土著印尼人和印尼华裔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分界线。政府务必要迅速查出凶手，将他们送上法庭，严厉地绳之以法。

一些观察家评论说，暴乱是经济差异造成的，与敌对集团的种族关系没有联系。对此，我不以为然。

经济上的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起了作用的因素，但问题的根源可以简洁地称为印尼华裔的种族傲慢态度和种族优越心理。

轻视土著人民的心理

如果冲突是经济不平衡的结果，为什么很富有的土著印尼人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丝毫未动？反之，为什么许多并不那么富有的华人的店铺却被焚毁？

以下的情形表明，很显然的经济怨恨属很小的因素，而华人确实表现出一种优越感、自负感乃至轻视土著人民的心理。

1995年11月的一天，西爪哇普瓦卡塔 (Purwakarta) 的一位华人店主蛮横地指控一名穆斯林装束的土著印尼年青女子在商店内行窃。在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或移交警察的情况下，店主就要那可怜的姑娘绕着商店游走示众，迫使她承

认自己是窃贼。

后来那姑娘还被迫穿着穆斯林服装去清洗厕所和拖洗肮脏的地板。如所预料的那样，普瓦卡塔后来发生了至少两天的凶猛的暴乱。在此期间，数百家华人商店被烧毁或摧毁。

1996年12月的一天清晨，西爪哇伦格斯登克洛克（Rengasdengklok）的一家华人对着一群吵吵嚷嚷，正准备作晨祷的穆斯林青年大声辱骂。那天以后可以预料的暴乱事件根本不需去探究。我认为，这种不喜欢穆斯林集会或祷告方式的华人根本就不该住在清真寺附近。

但是，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西爪哇，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数百万穆斯林及数千清真寺，因此，他们应普遍地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更加宽容。

几年前，泗水的一名年轻印尼女佣，无故遭其华裔雇主折磨，全身多处被热铁棒烫伤。

数月以前，如媒体广为报道的那样，另一名印尼女佣在新加坡被华人雇主残忍地迫使她吃狗屎，结果导致严重的疾病。

无论如何，我们不用试图缩小在5月暴乱中遭强奸的华人少女和妇女所遭受的深深的创伤和侮辱，但是普瓦卡塔、泗水及新加坡诸多事件中，印尼少女遭受的痛苦和侮辱，在性质上和华裔妇女的经历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一位印尼华裔妇女（郭燕妮）在今年5月29日发行的香港《亚洲新闻》发表文章说，她的家人和亲戚在雅加达经常称土著印尼人为“番鬼”，意即下等人。她还写道，如果不是要找佣人，许多印尼华裔与土著印尼人没有任何社会交往。

应与印尼土著融合在一起

我的观点是，如果华人真正要被接纳，他们应该抛弃任何可能存有的错误的优越感，并自由地与土著印尼人融合在一起。

几周前，《共和日报》发布了一则具有文化意义的新闻，谈到人民协商大会的巴拉穆里（AA. Baramuli）与100多名华人社团成员的会面。

该报报道说，出席会议的华人相互都用华语交谈，显然喜欢华语超过了印尼语。

这种在公共场合不尊重国语的自傲的例子，使我想起最近一名经常说华语的著名华人所提出的一个奇怪的建议。

他暗示，印尼应重新公开使用华语与华文，也应允许在雅加达街头公开表演华人的舞蹈。

我确信，印尼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接受这种易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甚至会带来暴乱的、令人惊讶的建议。

一次令我终身难忘的冲突是发生在吉隆坡的暴乱。它是由游行的华人无耻的、不可理喻的挑衅引起的。他们在以为他们的政党在当时的普选中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后，变得极为自高自大。在多个场合下，华人解开裤子，掏出其阳具，露给当时恰巧在场的不幸的马来男人和妇女看，并要他们滚出吉隆坡，回到他们原来住的丛林中去。

可以充分肯定，第二天，成千的马来人（及一些同情他们的印尼人）予以狂热的报复，杀死了数百华人男子、妇女和儿童。

在普瓦卡塔，伦格斯登克洛克和吉隆坡暴乱中，华人显然是有罪的，因为他们的自大行为激起了土著民族的报复。雅加达五月暴乱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我相信，基本的内在原因仍然是与华人有关的。比如，一般印尼人光顾哥尔多克（Glodok）商业区及其他区的华人商店所遭受的轻视，不礼貌和粗暴的对待长年积累而成的怨恨。但我认为，与华人最相关的暴乱原因是这样一种现实，即许多华人联合企业不能偿还其巨额的国内外债款。

一些华人外汇投机者故意操纵的策略在造成目前的经济危机，印尼盾的崩溃及物价的飞涨中起的作用激起了很大愤怒。无论如何，在上述诸种情形显然起因于印尼华裔的同时，实际激发暴乱的直接原因似乎是5月12日特里萨克蒂大学枪击所引起的混乱的紧张局势。这显然是与华人无关的。

在我看来，公众对华人的傲慢造成最近经济恶化所应负的重大责任，结果引起如此深刻和广泛的愤怒是毫无疑问的，并无需任何大规模组织蓄意策划民众的暴乱。

不过，总的来说，如果华人对土著人民表示了较多情感的话，普瓦卡塔、伦格斯登克洛克，吉隆坡乃至雅加达的暴乱（及强奸）将不会发生。

在这方面，我想作如下的说明。在我出生的西苏门答腊，有一句古老的米南加保（Minangkabau）谚语。似乎很适合于当地民族，他们数世纪以来喜欢到远离家乡的各地旅游和移民。谚语说：Dimana bumi dipijak, disitu langit dijunjung。用更简单和通俗的话说，其意思是，无论你旅游和定居在哪里，总

要使自己为当地人所喜爱，使自己适应新居住地的文化与传统。

应该抛弃大量的“华族性”

它就像一句客人应怎样对待自己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的格言。我相信，华人可以从中学到一两点东西，以便更好地与土著民族同化。

比如，他们应该抛弃大量的“华族性”，如华语、华文、华族姓名等。我确信，这些只是为拥有印尼公民的特权和利益所付出的很小代价。

根据我的粗略估计，目前印尼大约有600万华人，其中70%左右已经相当好地同化了，而只有其余30%或者对同化不热心，或者反对同化。

我诚挚地希望，到下一代人，即到2020年为止，所有或绝大多数华人将彻底同化或融入本土文化。到达这一程度时，将他们称为非土著人，或华裔印尼公民或华裔将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将简单地称他们为印尼人，地地道道的好印尼人，我肯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大使，总经理，甚至三星或四星将军。

至于那些仍然可能拒绝同化，继续拥有优越感的少数人，我将建议他们放弃其印尼公民权，并住在别的地方。

我并不是一个一些读者想象的心胸狭窄或有沙文主义思想的土著印尼人。自从20世纪的50年代在澳洲一所大学获得本科和研究生学位后，直到最近我还是为几个国家的一些大型采矿和石油公司工作。

这使我能不断地与许多不同国籍和种族背景的人密切合作，包括十多位东南亚华族专业人员，我与他们有着愉快的合作关系。

在雅加达恐怖的5月暴乱中，一位华人朋友的房子被粗野的暴徒烧毁后，我还给他经济资助，以缓和这种将来不会成为热烈争论对象的观点，但是，我希望如华人著名领袖，商人谢建隆最近的提议的那样，华人社会在回顾和反思时对这些问题的应加以考虑。

(本文由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湛焕义翻译)

(原载新加坡1998年《联合早报》)

后 记

对生活 在印尼的几百万华人华侨来说,1998年是痛苦难忘的一年。他们在“黑色五月”中的不幸遭遇将成为永远的心痛。印尼“五月暴乱”中发生的残害华人事件,已引起国际舆论和全球人士的同声谴责和愤慨。为向世人展示这一事件的真相,警醒世人,同时也给后人和历史留下一份研究资料和真实的记录,我们特地编辑了这本《'98印尼华人遭遇实录》。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查阅了海内外华文报刊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分析文章,面对扑面而来的材料,我们感到震惊,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呼唤着我们应该将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告诉世人。为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精心编辑选取了其中的主要部份,汇编成书。书中既有历史背景的交待又有许多亲身遭受暴乱之苦的印尼华人的哀诉;既有许多深入现场的记者采写的鲜活报道,也有许多资深的学者专家对这一事件鞭辟入理的分析评论。应该说这是一本相当客观而又全面深入地了解印尼华人遭遇的书。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查阅和采用了海内外华文报刊上大量有关报道,对这些入选的文章本书均一一标明作者和出处:一是对刊载这些文章的报刊和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二也是希望本书所选文章的作者见到本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按有关法律规定致付稿酬。

本书选自海内外华文报刊的文章诸多,文中的某些地名和人名的译法不尽相同,如“苏哈托”和“苏哈多”、“苏哈图”;“椰加达”和“雅迦达”等。为保持文章的原样,我们均未做改动,保留文章原样是为了尊重作者原意,也说明文章表述的观点并非编者全部认同,我们只是实录,特此说明。

在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有幸请到资深外交官、印尼归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张伟超先生在百忙之中拨冗为本书作序,在此特致谢意。

《华声月报》电脑室的苏建国、孙立丹、王忠海、高颖、沈萌、吴楠、白岩、杨晓坤、孙岩、胡予芳、白雪等一群年轻人 为本书的打字排版出胶片,夜以继日,其精神可佳;叶小刚、李勃英也参加了部分校对工作,在此也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和我们的编辑水平所限,书中错漏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正并原谅。

编者

1999年1月1日